

CSSCI 扩展版来源期刊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RCCSE 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重庆市一级期刊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ISSN 2096-3378



2025/3

统一战线学研究
二〇二五年第三期（总第五十一期）

《统一战线学研究》征稿启事暨投稿须知

本刊征稿启事暨投稿须知（2023年10月修订）反映办刊宗旨和用稿要求，敬请作者在投稿前仔细阅读、对照处理，以使稿件经制度化流程得到更高效率的办理。

一、常设专题

统一战线学研究前沿、统一战线领域风险治理、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一国两制”实践回顾与展望、国际热点事件的统战观察。

二、选稿标准

秉持“以专业视角研究统一战线，以统一战线视角研究中国、探析世界”办刊理念，提倡宽视角、学理化、多学科、多方法、多层次研究统一战线。倾向选用从宏观和中观层次研究统一战线的稿件，坚持“以题审文、按质取文”。

三、具体要求

（一）导向。稿件须旗帜鲜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用学术讲政治。注意防范具体表述、引用注释或参考文献、图表中的话语歧义与隐形意识形态风险。我刊在审编校全程中对存在意识形态问题的稿件实行“一票否决”。

（二）选题。立足宽广时空视野，及时回应党和国家战略关注，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角度新颖、力求前沿，坚持大统战视角，立足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对统一战线议题作出使读者有较大启发的研究，避免“就统战谈统战”。

（三）立论。立论基础坚实，问题提出部分应包含研究背景陈述、文献述评、创新点阐述等内容。要有精到的文献综述，开门见山地指出所研究问题、理论价值和政策依据、现实意义。重视援引前沿成果（含正文论述），且实际引用了大量的期刊前沿文献。参考文献一般不少于30条，其中引用近3年期刊论文不少于10条，同时注意回溯三年以上的代表性论文。

（四）论证。论证中注意材料支撑，使用丰富、可信、有说服力的论据，避免泛泛而谈。题目、摘要、关键词、图表应做到规范、简洁、清晰。

（五）文字。提倡简洁、清晰、准确、顺畅、朴素的文风。表述符合文法规范，主谓宾结构清晰，无病句，无文字差错，无逻辑错误。请逐一仔细核对原文，如发现问题较多、学术态度不端正的，特别是如在编校中发现文字硬伤、低级文字错漏情形，即使已经审理录用的稿件也将作退稿处理。

（六）注释与参考文献。注释使用尾注体例。引用各类文献时务必核实原文，确保准确性。参考文献体例详见《本刊文后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细则》：<https://mp.weixin.qq.com/s/kv8cyCnRcp7QbkyXlJeX0g>。

（七）篇幅。不少于12 000字，论述深入的优秀论文篇幅可达1 5000~20 000字左右。

（八）学术诚信。论文须为原创，严禁任何学术不端行为，文字重合率一般不高于15%。作者在投稿前应明确作者顺序（依据作者的实际贡献），投稿后不接受对作者署名及顺序、基金项目等基础信息的更改。

（九）审稿周期。审稿周期为一个月。来稿超过一个月未收到本刊返修意见或有关回复的，作者可自行撤稿。审稿流程：一审→二审（含专家外审）→三审。

（十）其他约定。对契合办刊宗旨和用稿要求的稿件，优先录用、优先刊发，优稿优酬（税前）、特稿特酬（税前）。

（十一）投稿方式。采取邮箱投稿，投稿邮箱：ysyxb@vip.163.com。

（十二）联系方式。电话：（023）62874725；微信公众号：[tyzxyj](https://mp.weixin.qq.com/s/RXpUuqE7ivLXv5qv54MYEQ)；开放获取：<https://cqsy.net.cn/?Tongyi/Zhanxian/>。

征稿启事暨投稿须知详版请见本刊微信公众号相关推送：<https://mp.weixin.qq.com/s/RXpUuqE7ivLXv5qv54MYEQ>。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25 年第 3 期

主管单位：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

主办单位：重庆社会主义学院

出版单位：《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

协办单位：重庆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

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统一战线历史重庆研究基地

编 委：王 浩 王英津 王浩宇 田飞龙
吕 鹏 刘福军 齐鹏飞 李 俊
李 捷 杨 恕 肖存良 汪仕凯
汪曙申 宋 俭 张 建 张献生
陈 纪 陈 兵 陈奕平 陈家刚
相德宝 袁 征 钱再见 徐理响
郭永虎 黄天柱 蒋 锐
韩云波 薛庆超

(按姓氏笔画排列)

社 长：夏晓华

主 编：王 鸿

执行主编：林华山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25年第3期（总第51期）
双月刊 2017年创刊 第9卷

统一战线学研究前沿专题

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研究

- 01 作为标识性概念的“团结精神”：中国呈现与价值意蕴
/ 魏崇辉 王悦
- 16 民族文化产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原则与路径
/ 刘玉堂 李振鹏
- 29 从“大后方”到“大团结”：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 / 杜华君 何江艳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 43 论民营经济促进立法中的平等保护原则 / 刘绍宇 闫海

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专题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统战工作研究

- 56 “DeepSeek时刻”：从技术开源到技术正义的政治学分析 / 曹克亮
- 69 DeepSeek大模型本地化部署应用：功能检视、新兴风险及治理路径
/ 杨骏 李长健
- 84 文化安全视域下中国影视IP的叙事突围与新范式构建
——基于《哪吒》与漫威系列电影的比较分析 / 魏郡 卢言臣
- 99 集体记忆建构中华文化认同的理论构型与作用机制
——以《哪吒之魔童闹海》为案例 / 潘莹莹

- ◎ CSSCI (2023—2024) 扩展版来源期刊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入库期刊
- ◎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 ◎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 ◎ RCCSE 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引文数据库
- ◎ 重庆市一级期刊
- ◎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 ◎ 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 ◎ 中文电子期刊服务
- ◎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
- ◎ 龙源期刊网数据库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
- ◎ 博看期刊数据库

统一战线领域风险治理专题

反分裂反干涉反制裁研究

- 112 全面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的时代背景、主要意涵与创新路径 / 汪曙申
- 123 赖清德当局的“文化台独”：布局、危害与反制 / 钟厚涛
- 135 特朗普2.0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环境挑战与应对策略 / 徐政 占智勇
- 148 制度性话语权视角下西方指数霸权祛魅与中国自主评价体系建设 / 陈奇

国际热点事件的统战观察专题

世界变局与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研究

- 158 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四重逻辑 / 李丹 李龙龙
- 170 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成就、实践智慧与现实启示 / 蒋永强 张青兰
- 181 中国—中亚外交中的民心相通实践与成效——兼论对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启示 / 曾向红 安凯欣
- 195 亚洲安全模式的形成逻辑、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 / 黄正松 单凌涛
- 207 国际经贸斗争背景下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新环境、新挑战与新路径 / 陈玉斌

- 封二 《统一战线学研究》征稿启事暨投稿须知
- 封三 本刊文后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细则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Bimonthly)

2025 No.3(Sum No.51) Vol.9

- 01 "Spirit of Unity" as a Signature Concept: Chinese Representation and Value Implications Wei Chonghui&Wang Yue
16 Value, Principles and Pathways of Ethnic Cultural Industries in Strengthen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Liu Yutang&Li Zhenpeng
29 From "Strategic Hinterland" to "Great Unity":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Building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Through National Strategic Hinterland Development Du Huajun&He Jiangyan
43 On the Principle of Equal Protection in Legislation for Promoting the Private Sector Economy Liu Shaoyu&Yan Hai
56 The "DeepSeek Moment": A Political Analysis from Technological Open-Source to Technological Justice Cao Keliang
69 Application of DeepSeek's Large-Scale Model in Localized Deployment: Functional Review, Emerging Risks and Governance Pathways Yang Jun&Li Changjian
84 Narrative Breakthrough and New Paradigm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Film and Television IP from a Cultural Security Perspectiv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ased on Ne Zha and the Marvel Cinematic Universe Wei Jun&Lu Yanchen
99 Theoretical Configuration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s of Collective Memory in Constructing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A Case Study of Ne Zha: The Demon Child's Uprising Pan Yingying
112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Cross-Strait Integrated Development: Historical Context, Core Implications and Innovative Pathways Wang Shushen
123 Lai Qingde Authorities' "Culture Independence in Taiwan": Strategic Deployment, Threats and Countermeasures Zhong Houtao
135 Challenges to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nd Response Strategies During the Trump 2.0 Era Xu Zheng&Zhan Zhiyong
148 Debunking Western Index Hegemon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Discursive Power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ndependent Evaluation System Chen Qi
158 On the Fourfold Logic of Construct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Neighboring Countries Li Dan&Li Longlong
170 China's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Neighboring Countries: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Practical Wisdom and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 Jiang Yongqiang&Zhang Qinglan
181 China-Central Asia Diplomacy in People-to-People Connectivity: Practices and Outcomes—With Implications for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in Neighboring Regions Zeng Xianghong&An Kaixin
195 Formation Logic,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of the Asian Security Model Huang Zhengsong&Shan Lingtao
207 China's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Neighboring Countries Under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Struggles: New Context, Emerging Challenges and Innovative Pathways Chen Yubin



作为标识性概念的“团结精神”： 中国呈现与价值意蕴

魏崇辉¹ 王悦²

(1. 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240;

2. 上海音乐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031)

摘要：团结精神是对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政治目标而聚合各阶级、各方面、各民族的团结实践中集体心理意识的能动反映，标识着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精神气质。作为一个标识性概念，团结精神言说着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呈现于团结精神命题、团结精神思想与重要论述中，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团结实践中。统合来看，新时代日臻完善的团结精神概念被赋予解释历史、当下与未来的功能，同时被注入激活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效用，被建构为解决世界问题的方法。当前，发扬团结精神要求我们党要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生动活泼、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形成；加强思想引导，把党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广泛团结起来；从国内团结延伸至国际团结；确保中国人民的团结。中国的团结格局呈现出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渐次外延的同心圆结构，形成了兼具组织刚性与文化弹性的新型团结范式，为超大规模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了核心政治资源。以概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5.03.001

作者简介：魏崇辉，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王悦，上海音乐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项课题（A类）重点项目（昆山世界儒学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课题基金项目）“‘中国精神’的历史渊源及其新时代新形态研究”（23JDTC058）；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上海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对社会思潮的辨析与引导研究”（2024ZSS028）

引用格式：魏崇辉，王悦. 作为标识性概念的“团结精神”：中国呈现与价值意蕴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3): 1-15.

念为方法，围绕团结精神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对于为人类发展作出中国贡献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文化强国；中国精神；团结精神；统一战线；标识性概念；自主知识体系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 (2025) 03-0001-15

“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1]加快建设文化强国，要求“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不断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发展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2]。作为中国精神的基本组成，团结精神是中华民族的鲜明标识。“只有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观点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把精神文明建设贯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全过程、渗透社会生活各方面，才能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使全体人民始终拥有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开拓进取的主动精神、健康向上的价值追求。”^[3]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并领导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可逆转地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此过程中，团结发挥着关键作用。精神是人所特有的，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产生的观念的、意识上的成果，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心理状态，包括认识、情感、理想、信念、意志、信仰等。日常生活中的“团结”包含了实践与精神等面相。“团结”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被界定为两重含义：一是作为动词，强调“为了集中力量实现共同理想或完成共同任务而联合或结合”，如团结朋友；二是作为形容词，强调“齐心协力，结合紧密；和睦”，如团结友爱的民族大家庭^[4]。团结更倾向于过程、目标。团结精神既在实践层面上服务于团结（过程），又反映了团结（目标）。“人们在精神和思想层面越是具有自主自觉的意识，他们的实践活动也就越是接近‘自由王国’的状态。”^[5]本文的论述以团结精神为线索，以团结实践（过程与目标）为旨趣，涉及团结的精神与实践双重维度。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团结精神的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团结精神形成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学术研究不断升温，学界集中探究团结精神相关命题、思想与重要论述及其实践维度。

（一）团结研究的政治基调

团结精神是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标识性概念^[6]。尽管有多学科的视域，但政治是团结研究的基调。这里侧重梳理政治基调下的团结研究现状。

一是从社会团结的角度切入，沿着“团结—社会团结—社会团结理论”的逻辑，剖析培育个体性和公共性相统一的社会团结^[7]的现实意义。学者们在“个体化”的现代社会，挖掘社会团结的传统文化基础^[8]。社会团结以人类精神层面的共同历史叙事为纽带，“在大流动过程中增强大交融，在大交融过程中强化大团结”^[9]，为推动共同富裕、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精神动力。

二是从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团结的角度切入，立足于统一战线学理论，沿着“团结—大团结

魏崇辉, 王悦. 作为标识性概念的“团结精神”: 中国呈现与价值意蕴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3): 1-15.

一团结学”的逻辑, 展现作为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的鲜明特色的“团结奋斗”“构建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学’。”^[10]这一研究进路强调“以团结汇聚伟力为统战举旗定向”^[11], 将促进全体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作为“两个大局”视野下的统一战线新话语^[12], 系统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统一战线工作的一系列重要会议、重要文件、重大决策部署^[13]。

三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出发, 将团结奋斗视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的重要标识, 明确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团结思想的历史性创新, 创造了以“民族团结、党内团结、党群团结、党际团结友好和国际团结等”^[14]为内容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团结思想, 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探索“全过程的民主与全要素的团结”^[15]的统一。

(二) 团结精神研究

第一种类型主要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团结精神的重要论述出发, 把团结精神当成一个既定概念加以研究, 将其视为我国伟大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探寻其作用。一是将伟大团结精神与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和伟大梦想精神视为一个整体^[16], 揭示其在新时代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二是以某一区域作为研究对象, 探讨团结精神对该区域的革命运动和人民解放事业的宣传和鼓舞作用^[17]。三是以某一领域作为研究对象, 以历史研究法追溯团结精神的历史演进, 探寻其作用^[18]。可见, 团结精神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传承发展中孕育形成的一种伟大品格, 在新时代被赋予了更丰富的政治意涵。它不仅是凝聚中华民族力量的重要纽带, 更是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

第二种类型往往把团结精神视为一个由“团结”和“精神”构成的合成词进行研究, 将其视为人对团结的认知和反映并转化为人的意志的过程。一是从民族团结的角度切入, 沿着“团结—民族团结—民族团结精神”展开, 阐释民族团结精神概念及其历史、理论和实践逻辑。学者立足中国近现代史中的典籍文献梳理民族团结概念出现、演变、传播的过程^[19], 从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阐释新时代民族团结精神的基本内涵^[20]。二是彰显团结奋斗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重要组成的宏阔力量。中国共产党构建了一个“主体有力、主题突出、主线清晰、主旨鲜明的精神体系”^[21], 即团结奋斗精神体系。一方面, 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 团结奋斗精神激励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稳定了新生政权、促进了国家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创造了新时代新的伟业^[22]。另一方面, 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孕育形成的一种伟大品格, 团结奋斗精神在新时代成为凝聚全国人民智慧和力量、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应对国际国内复杂变局的重要支撑^[23]。

综上所述, 团结精神是一个承载深厚历史、内含多重向度的概念, 标识着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精神气质。团结精神言说着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 呈现于团结精神命题、团结精神思想与重要论述中,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团结实践中。以往研究更多是将团结精神作为既定概念, 而专门探讨其生成演进的研究较为鲜见。同时, 对作为标识性概念的团结精神的研究, 理论上有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中国人民, 实践中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团结, 积极维护多边主义, 反对单边霸凌行径, 在国际经贸斗争中取得胜利, 推动人类朝发展进步的大方向不断前进。

二、团结精神的出场: 激发背景与概念生成

生成于中国历史、凝结了中国智慧的团结实践及其中孕育的团结精神, 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发挥关键作用。如果把团结视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种具有明确目标的实践，那么团结精神显然是对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政治目标而聚合各阶级、各方面、各民族这一实践中集体心理意识的能动反映。“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4]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准确把握精神的本质，这一点也能从中国共产党对团结概念的应用演变中得到确证。精神和思想层面的自主自觉，必将推动实践活动走向“自由王国”。团结精神概念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诞生和成长紧密相连。

（一）概念视角下近现代的中国团结

团结一词在《资治通鉴》中即有记载。“‘团结’一词最初作为一种地方军事组织，引申为组织民兵丁壮，至清末扩展到一般民众的组织与结合。”^[19]在中国历史典籍中，团结一词往往指代与军事相关的组织或活动，“具有共同武备御敌的特殊意味”^[25]。纵览近代有关团结的概念使用可见，梁启超、孙中山等将团结与解决国家、民族问题相联系。

在梁启超那里，作为动词、作为名词使用的团结皆存在。1902年，梁启超在《中国之旧史》中多次使用团结这一概念。他指出：“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26]团结用于形容一种国民之间紧密联合的状态。想要达成这样一种状态，要“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26] 246}。梁启超将团结运用于以下场景中：聚焦御敌于国门之外，将国民的力量汇聚起来、形成一种紧密结合的状态，才能够使我们的民族在国际舞台上站稳脚跟。在梁启超的推动下，团结概念突破了中国古代指称的军事范畴，扩大至国民范围。

在孙中山那里，团结是中国人内在的一种天然优势，是一种动态的、将一定范围内的人组织起来的方式。首先，他以团结概念解释家族和宗族内部的紧密关系。1924年，孙中山在阐释“三民主义”时，注意到一个经验事实，“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团结力非常强大”。他认为，“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族”^[27]。可以看出，“在孙中山那里，社会建设是他总的政治设计的基础部分”^[28]。他所强调的团结与中国传统的社会关系紧密相关，而团结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把家族和宗族内部的紧密关系拓展至整个国族。这一把团结概念的指称对象拓展至中华民族全体群体的做法与梁启超对团结概念范畴的推展异曲同工。其次，以团结解读民族关系。孙中山强调，这个国族中的国民“同一血统、同一言语文字、同一宗教、同一习惯”，完全可以“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27] 6}。要把四万万一盘散沙的民众结合起来，根基在于各个民族之间的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最后，团结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概念。在《革命成功个人不能有自由团体要有自由》的讲话中，孙中山使用了团结概念，强调“大家都能够知道做人的常事，就是政治。大家能够公共团结起来做人，便是在政治上有本领的人民。”^{[27] 294}这里的团结概念被明确用于国家建构的政治领域。孙中山发出以民族主义“联合十二万万五千万人”^[29]的号召，进一步巩固了团结概念在政治建构领域的用法。可见，团结概念在近现代的使用经历了“国民组织—民族凝聚—政治建构”的范畴拓展。

（二）中国共产党将团结概念用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站在争取民族独立的立场上，对团结作出符合当时实际的理论阐释。1921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的俄文稿这样表述：“我们应当团结所有的人，竭尽全力与共同的敌人作斗争，因为我国的军阀是社会上一切其他阶级的敌人。”^[30]此时，中国共产党团结的对

魏崇辉, 王悦. 作为标识性概念的“团结精神”: 中国呈现与价值意蕴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3): 1-15.

象是“所有的人”。1921年8月, 陈独秀和区声白讨论无政府主义时指出, 如果一切社会、一切生产机关、一切交通机关的“小团结、小联合都不成, 大团结、大联合更怎能够成立呢?”^{[30] 42} 中国共产党要实现的“大团结”, 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及其组成的社会团体的参与。

首先, 中国共产党将团结的对象明确为无产阶级劳动者。1921年11月, 毛泽东在《所希望于劳工会的》中指出, 劳动组合的目的, 不仅是要“团结劳动者”, 更是要“养成阶级的自觉, 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 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30] 49}。劳工会是劳工的团结体, 代表的是劳动阶级的利益, 团结的对象是整个阶级。劳动者内部的团结成为谋求阶级利益的基础。团结概念的指称对象明确界定为劳动者, 意在使“全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30] 50}, “谋国际的团结”^{[30] 529}。中国共产党所要的团结, 不是“只团结某一个产业机关的工友”, 而是“扩而大之, 扩大到一个地方的团结, 更扩大到全国的团结, 并且要扩大到全世界的团结”^[31]。1943年1月1日《解放日报》社论《新年献词》写道: “过去一年——一九四二年, 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伟大团结英勇战斗的一年。”^[32] 中国共产党对团结概念的使用在对象上更加聚焦——特定的无产阶级劳动者、在视野上更加广阔——放眼全世界。

其次, 中国共产党将民主派、农民等纳入团结对象。1922年7月, 在《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指出, 无产阶级加入民主革命的运动, 是“因为在事实上必须暂时联合民主派才能够打倒公共的敌人”。唯有如此, 无产阶级才能“得着为自己阶级开始团结所必需的初步自由”^{[30] 139}。在这一期间, 团结概念的适用对象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内部所有人, 另一方面是民主派。中国共产党还谈到了共产主义少年与农民。《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议决案》指出, “他要收革命的少年劳动者大群众的坚强的团结成了他的唯一主力”^{[30] 158}; 《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提出, “必须农人自己团结及与城市工人联合”^{[31] 242}。随后, 中国共产党提出“全国农民工人大团结”的口号^[33], 少年劳动者、农民阶级“坚强的团结”也是革命力量的来源。

再次, 中国共产党从作为领袖革命阶级的地位出发定义团结概念。中国共产党人指出, 在团结各方面后, 要使其“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之下”^{[30] 139}, 最终才能形成无产阶级运动的强大力量。首先, 在推进团结过程中, 需要一个“领袖革命阶级”的领导。“辛亥革命里没有一个彻底的团结的真正能领袖革命的阶级, 所以失败。”^{[31] 290} 中国共产党明确认识到, 革命成功需要一个彻底的阶级作为团结行动的领导者。其次, 这个推进团结行动的“领袖革命阶级”只能是中国国民党。因为“中国国民党, 始终是领导中国工农群众, 团结于自己的周围, 与国际帝国主义及一切的反革命作坚决的斗争”^[34], 所有工农贫苦大众“只有团结在共产党旗帜之下, 才能得到永久的胜利和解除一切的锁链”^[35]。可见, 在革命的组织与动员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首先强调无产阶级劳动者内部的团结, 在此基础上重视民主派、共产主义少年、农民等各个阶级团结, 并以领袖革命阶级的力量将全体人民联合起来, “要如一个人一样”^[36]。

最后, 中国共产党明确了团结概念的使用范畴。中国共产党对团结概念的使用既关涉对象问题, 也涉及主体问题。在救亡图存背景下, 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就难以取得成功。作为团结主体的中国共产党更为强调和凸显团结概念在实践中的对象。这既是凝聚革命力量的现实需要, 也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使然。其中, 最为现实且迫切的问题就是团结各阶层一切力量以敌斗争。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强调, “注意团结全体中农, 要懂得团结农村中百分之九十的人口”^[37], 以夯实反封建的基础; “细心地团结学生的绝大多数为人民共和国服务”^{[37] 143},

以发挥革命知识分子的力量；做好拥军工作，“以进一步增强军政民的团结”^{[32] 63}；“使资本家获得相当的利润，并团结起来共同为战争的胜利和国家的建设而奋斗”^{[37] 137}。中国共产党加强对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一切其他爱国分子团结的倡议和动员。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团结精神概念的出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团结的认识和使用有一个渐进和实践反思的过程，包括对工人运动的分析、党内关系的研究、对统一战线的把握等，促进团结精神概念的出场。

革命语境下，团结精神既是一个彰显团结实践的整体概念，又是一个推动全民族统一的动员口号。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直接在重要文件中直接使用团结精神概念，致力于凝聚包括劳苦大众在内的绝大多数人对革命胜利的追求。1925年9月，《向导》第131期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为总工会被封闭告工友》指出，军阀们对工会的封闭只能是一时的，不能是永久的，封闭的只是工会，不是工会“万众一心的团结精神”^{[31] 499}。这是团结精神概念在中国共产党话语语境中的较早使用。此时，团结精神指向的工人团结凝固的精神，为“一旦时局变动，可以大举”^{[30] 389}提供支撑。

中国共产党对团结精神概念的使用场景在处理党内关系中得以拓展。中国共产党在鼓励以“团结全党为一体的目的”^{[32] 69}对部分党员进行物质与环境许可限度内的照顾的同时，批评党内“完全没有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伟大而忠诚的互助精神和团结精神”^[38]的少数人，将“明确的政治立场和诚挚的团结精神”^{[38] 591}的指示写入《我们对于过去参政会工作和目前时局的意见》，以党内团结精神引领和扩大全民族进步力量。

毛泽东明确团结精神的基本原则。1945年5月，毛泽东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指出，“我们这次大会强调团结精神，就是要在一个原则下团结起来，在正确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是头脑清醒的团结，不是盲目的团结”^[39]。毛泽东关于团结精神的分析，为团结精神概念奠定重要的语义基础。

中国共产党开始注重发挥团结精神的力量，在不断实现政治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团结精神的概念。1937年11月，中国共产党分析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指出“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40]，剖析了我们和其他党派所实现的统一战线，是在独立自主基础上的团结，离开了独立自主这个基础，“就没有任何的统一战线”^{[40] 394}。这一论断借助“独立自主”“统一战线”两个概念，明确了团结、团结精神的内在要求。1938年11月，毛泽东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中以“独立自主”阐释党的方针，指明中国共产党所遵循的“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40] 540}。中国共产党对于团结精神概念的使用，是注重独立自主与推进统一战线的统一。

三、团结精神的发展：时代演进与概念深化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团结实践，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和世界革命运动的必然结果。同时，这一实践可为当下更全面地理解和诠释团结精神提供基本依循。

（一）社会主义初步探索中团结精神概念的话语丰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将团结精神概念的理解与运用融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

魏崇辉, 王悦. 作为标识性概念的“团结精神”: 中国呈现与价值意蕴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3): 1-15.

成了“爱国主义精神”“国际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的精神”“互助精神”等丰富的团结精神话语, 并在关注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中凝聚更多独立自主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力量。

首先, 团结精神是集中所有力量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形成社会主义共识的重要政治概念。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指出,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41], “其基本精神是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41] 16}。这意味着以团结精神凝聚而成的“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革命大团结, 已经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形成”^{[41] 260}。“团结精神”与“人民民主专政”“政治上”“组织上”等政治话语的连用, 进一步巩固了其政治概念的基本属性。

其次, 中国共产党以多元化的话语和实践为团结精神概念注入新意涵。1954年4月15日通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总则(草案)》指出, 使全军人员团结一致要“树立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42]。1956年9月26日, 党的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强调, 要加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团结, “以‘全世界无产者, 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精神教育自己的党员和人民”^[43]。1957年5月, 邓小平指出, 要“在党的领导下, 用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青年一代, 团结全体青年积极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44], 不断扩展团结精神概念的内涵, 使其话语表达更加丰富。

最后, 中国共产党深化和夯实团结精神概念的现实基础。在社会主义改造中, 在推进合作社建设过程中, 注重“用集体主义的精神去教育广大的农民群众”^[45], 以“社会主义精神来处理社内外的关系问题”^{[42] 236}, 推进社员了解并接受社会主义的原则, 同时“提倡合作思想, 发扬互助精神”^{[42] 290}, “使社员利益同国家利益、使局部利益同整体利益正确结合”^{[42] 361}。经济领域出现较为密集的“集体主义的精神”“互助精神”等论述, 延展团结精神概念的使用范围。

中国共产党不断将团结精神概念置入社会主义的框架范围之中, 团结精神概念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团结一切力量拥护社会主义、践行社会主义的行动表征。1963年11月, 《关于一九六三年国家预算草案和预计执行情况、一九六四年国家预算初步安排的报告》指出, “全国上下, 同甘共苦, 克勤克俭, 一致努力”是被事实证明了的“一条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地克服困难的道路”^[46]。全国上下“同甘共苦”“一致努力”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弘扬团结精神的过程。这促使“我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更加强大了”^{[46] 364}。

(二) 团结精神概念的改革开放新样态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建设中理性考量、持续拓展团结精神概念的内涵。“团结一致向前看”“团结、批评、团结”“自力更生”等话语成为这一时期团结精神概念的主要呈现形式。

首先, “团结一致向前看”话语的传播过程是团结精神概念逐渐深入人心的过程。1978年12月13日,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题为《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 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安定团结十分重要”“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 首先要加强全党的团结, 特别是要加强党的领导核心的团结”^[47]。邓小平建构了一个以“党的领导核心”为中心的多圈层团结结构, 这个结构是中国共产党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方式。团结精神一步步向外扩展, 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全国各族人民的凝心聚力。1980年2月, 党的十一届五中

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指出：“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事，必须顾全党的、国家的和人民的大局，并且用这种顾全大局的精神教育群众。”^[48]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以“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己任，使团结精神概念被再次充实进新的内容，实现了团结精神在更深层次的建构和传播。1980 年 12 月，邓小平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一文中再次强调：“要提高全党同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信心”，“振奋精神，团结一致”，“首先要自己坚定信心，然后才能教育和团结群众提高信心”^{[48] 562}。这再次证明作为一种精神的团结，始终突出中国共产党这个核心。“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49]是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所构成的。

其次，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团结大多数”的要求。“团结大多数”是团结精神概念的应有之义，也是发扬团结精神的必由之路。要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首先要发扬团结精神，破除全体中国人民在思想领域的障碍，才能“团结一致向前看”。中国共产党积极阐发团结精神所要凝聚的群体。1978 年 12 月 22 日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欢迎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共同为祖国统一和祖国建设的事业继续作出积极贡献。”^{[48] 3}“爱国一家的精神”的表述既是团结精神的重要构成，也是团结精神要达成的重要目标之一。1979 年 9 月 29 日，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英雄的人民解放军，“一贯坚决服从党的领导，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发扬了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建立了伟大的功勋”^{[48] 184}。这阐释了人民解放军作为人民政权柱石的作用，以及他们为践行团结精神所作的贡献，在实践层面既有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又有同人民的联系；在思想层面发扬了作为团结精神重要内涵构成的“爱国主义精神”“国际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团结一致向前看”“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一家精神”等构成团结精神概念的话语体系，是破除思想障碍的必然要求，也是为现代化建设凝心聚力的历史现实考量。正如 1980 年 2 月 29 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所强调的，“本着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精神”“鼓舞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充满信心地献身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事业”^{[48] 382}。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团结精神概念理解的深化，反映了团结精神是同“四个现代化”事业相勾连的具有重大现实价值的概念。

最后，团结精神概念所关涉的话语嬗变有赖于中国共产党在制度、政治和思想层面形成关于民主与集中及二者之间关系的合理安排。1979 年 3 月 30 日，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阶段“健全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增强了全党的团结、党和群众的团结”^{[47] 165}。同年 6 月，邓小平在《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一文中，对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作出进一步解释，指出“团结、批评、团结”是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传统”，是推动“各方面的人士和群众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共同基础上不断增强团结”^{[47] 187}的重要基础。用民主集中制、统一战线法宝、“团结—批评—团结”来解析团结精神的辐射范围，使团结精神概念不仅仅是精神层面的思想共识，亦有了制度意义层面的功能。

因此，关于“团结精神”与“自力更生”“改革开放”话语的关系探讨也应运而生。1982 年 5 月，邓小平在向其他国家介绍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时提出，“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基于此，“振奋起整个国家奋发图强的精神，把人民团结起来”^{[47] 406}。1984 年 6 月，在《建

魏崇辉, 王悦. 作为标识性概念的“团结精神”: 中国呈现与价值意蕴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3): 1-15.

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中, 邓小平强调, 如果我们没有“走自己的道路”, 中国就“没有独立, 也没有统一”^[50]。1988年6月, 邓小平在总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基础上, 提出“形势逼人, 迫使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50] 269}。可见, 团结精神是中国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道路的精神支柱, 是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改革开放的一种精神动力。团结精神概念不断丰富, 逐渐走向具象化、实践化、清晰化。

（三）新世纪前后社会主义发展中团结精神概念的升华

新世纪前后, 中国共产党在新的语境中不断形塑团结精神概念。江泽民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面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振兴, 要继续发扬“伟大的团结精神, 不断增强全党全军在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基础上的团结, 不断促进全体人民和一切爱国力量的大团结”^[51]。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 “很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 要有一个安全稳定的内外环境”^{[51] 138}。对内来讲, 要增强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的精神, 高举爱国主义这面“动员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51] 121}的旗帜, “巩固和发展人民内部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关系”^{[51] 159}, 改革创新, 艰苦奋斗; 对外来讲, “弘扬团结精神”, 本着“团结、团结、再团结”^[52]的原则, 紧紧跟上时代发展的潮流, “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51] 164}。这意味着, 安定团结的局面以团结精神的聚拢得以稳固。

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顾大局”越来越成为团结精神概念强调的旨归。1993年, 胡锦涛在不同场合提出发扬“顾全大局、团结协作的精神”^[53]的要求; 2004年5月5日, 在江苏省考察工作时, 面向各级领导班子再次强调要“坚持讲政治、顾大局、重团结、守纪律”^[54]。“顾全大局”与“顾大局”的要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团结精神概念的认识深化。这也体现在视域的扩展上。例如, 2008年9月29日, 胡锦涛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要“弘扬团结、友谊、和平的奥林匹克精神”“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55]。这极大地开拓了团结精神概念的适用范围。

四、团结精神概念的完善: 伟大实践与价值意蕴

新时代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党的二十大报告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为主题, 将团结概念提升至国家战略和民族理想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才能胜利。”^[1]这一论断中的团结是现实的力量和通往胜利的道路, 表明新时代团结概念统合了党团结带领人民的实践活动及与之相适应的精神动力——团结精神。

（一）团结精神概念的完善与新时代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新时代的团结精神, 是对中国共产党以团结创造历史的精神运动的回顾, 是对中国共产党以团结开辟未来的精神反映。“只要13亿多中国人民始终发扬这种伟大团结精神, 我们就一定能够形成勇往直前、无坚不摧的强大力量!”^[56]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从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中国式现代化等层面阐释了作为标识性概念的团结精神, 为现阶段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重要的思想基础。

首先，团结精神概念被赋予解释历史、当下与未来的功能。2017 年 8 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队的贺信中指出，希望参加科学考察的人员“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艰苦奋斗、团结奋进、勇攀高峰的精神”^[57]，为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全球生态环境保护持续作出贡献。可见，习近平总书记将团结和精神联系在一起，使团结精神成为阐释科学家精神特质的重要概念。同时，这一论断表明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的团结，不仅是历史上中国科学家的特质，同时是当代科学家的禀赋，也必将成为未来科学发展进步的动力。

团结精神的概念建构形成了历史、当下与未来三个视角。2018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团结精神的人民。”^[56]团结精神是中国人民的本质特征。历史、当下与未来三个视角揭开了团结精神和中国人民的一种新关系，对团结精神概念的意义进行了再塑造，从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一论断的深刻阐述来看，其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其一，团结精神是对团结历史的凝练和感知。回溯历史，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共同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切实感知到 56 个民族经过团结实践已经“形成了守望相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56]，团结精神对于整个中华民族具有凝聚作用。其二，团结精神着眼于人民同中华民族的关系，强调内部团结。团结精神致力于唤起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的热情，以凝聚起来的热情共同创造中华民族的福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国各族人民“手挽着手、肩并着肩”^[56]共同捍卫了民族独立和自由。无论是基于历史传统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还是基于抵御外侮构建中华民族之观念，都能充分体现出中国人民在“外侮压迫下激起的‘内部团结’”^[58]。其三，团结精神是一种具有高度主动性的精神，它体现了中国人民拥有共同的行动逻辑。习近平总书记用“团结才能前进”^[56]说明，只有依靠团结人民的能动性，团结后的人民才能不断推动新的认识和实践。这个意义上，团结精神提供的个体与整体、历史与未来、实践与意识的框架对于解释中华文明的自我建构和自我发展是不可少的。

其次，团结精神概念被注入激活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效用。2018 年 5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所具有的伟大团结精神，“是一代一代中华儿女创造和积淀出来的，也需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59]。作为一种禀赋存在的团结精神，强调代际团结，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团结精神既是铸就中华文明的内在力量，也是展现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精神支撑。团结精神概念被赋予文明内涵和历史意蕴。2018 年 5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广大工程科技工作者既要有工匠精神，又要有团结精神”^[60]，以发挥工程科技作为产业革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杠杆作用。在这里，团结精神概念所指称群体在科技领域的凸显，旨在推动科技创新共同体的建构，是对团结精神概念中团结对象的进一步聚焦。此外，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新时代的历史语境，强调“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61]。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在各行各业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中国人民的团结精神。团结精神概念被赋予了“新时代”“社会主义”等内容。新时代每个社会主义建设者都是团结的对象，进一步丰富团结精神概念的时代内涵。

最后，团结精神概念被建构为解决世界问题的方法。2023 年 3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再次使用团结精神概念，倡导“以团结精神和共赢思维

魏崇辉, 王悦. 作为标识性概念的“团结精神”: 中国呈现与价值意蕴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3): 1-15.

应对复杂交织的安全挑战, 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62], 强调要以共赢思维、共建共享实践促成世界安全格局, 将“共赢思维”“共建共享”话语与团结精神联系起来, 在巩固团结精神概念世界眼光的基础上, 将世界政党纳入团结精神的团结范围之中。这次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本着团结精神进一步指出: “中国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 是国际正义力量的壮大, 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 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62]

(二) 团结精神概念的价值意蕴

新时代以来, 中国共产党在发扬团结精神中做出了更加宏阔、深入的实践, 将团结精神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华文明紧密联系在一起, 使团结精神概念成为表征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标识。同时, 团结精神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呈现, 也为世界携手同行现代化提供理念指引。标识性概念在命题、思想与重要论述、实践中得以呈现。以概念为方法, 笔者认为, 团结精神包含着如下基本价值意蕴:

第一,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拥有团结奋斗的强大力量, 展现出中国共产党的责任重大, 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创新是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的过程中实现的。

第二, 团结是我们追求的政治局面。我们党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想是形成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与安定共同使用的团结, 成为一种对中国人民民主基本样态的描述。要达成这一样态, 首先要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我们党的强大战斗力来源于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基础上的坚强团结统一, 这是我们党的制度优势。政治建设必须围绕着这个制度优势“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1]。团结对于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起到了纲举目张的作用。其次要正确使用统一战线这一强大法宝。中国共产党努力通过统一战线和协商民主凝聚社会的最大共识, 并以“最大的政治”标识性概念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锚定原则与方向^[63]。“大团结大联合”作为统一战线的主题, 其宗旨就是动员全体中华儿女“一起来想、一起来干”^[1]。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过程中, 注重以“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为标识的政党合作, 推进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民族团结。团结在这里, “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 而是实实在在的工作任务和工作体系”^[64], 有明确的指涉范围和指称对象。

第三, 要加强思想引导, 把党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广泛团结起来。要“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1], 深刻体现了团结共识与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 为展现中华文明现代力量夯实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这同样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只要加强思想引导, 把党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广泛团结起来”“是完全可以形成共识的”^[65]。团结概念为寻求社会最大公约数提供了必要的思想论域。

第四, 团结不仅具备国内的向度, 还具有深刻的世界意义。从国内团结延伸至国际团结,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更宽广的视野与更长远的规划。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共产党以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使命, “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1], 团结世界人民一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 抵御特朗普政府对世界的冲击。

第五，要确保中国人民的团结。团结在党的建设领域的运用，凸显出团结概念是囊括“核心—周边”的范畴，它明确了团结的对象和团结的领导者，很形象地说明了以中国共产党为圆心的人民、军队、政党、民族等主体之间的同心圆关系。如果不维护党中央权威，党的团结统一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首先，团结是中国人民的团结。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五个必由之路”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入总结，也是关于新时代党和人民奋进历程的昭示。“团结奋斗”作为“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被列入“五个必由之路”，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命题。这意味着，团结凝聚的不仅仅是全体中国人民，在更重要的意义上，它还赋予了中国人民以新的任务和功能，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贡献力量。中国人民以团结的力量求胜利，彰显我们党的政治优势与对人民期盼的现实回应。

其次，团结以同心圆结构为基本样态。其一，“军政军民团结是我党我军特有的政治优势”^[66]。党的二十大报告以“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1]将团结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双拥工作和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中形成的经验在新时代的统一战线工作、军政军民关系等方面展现出新的内涵。其二，我们党从政策上把广大台湾同胞纳入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实践的框架中，成为推动祖国统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坚持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坚定支持岛内爱国统一力量”^[1]，是对大团结大联合主题的回应。其三，中国共产党要“不断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1]。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引导不同阶层、民族、党派的人民摒弃分歧，团结在“中国梦”的旗帜之下，共筑共有精神家园的同心圆。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实践中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以社会各阶层和各界力量为半径的同心圆结构。

最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团结的根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1]，要落脚到用“团结奋斗”创造历史伟业。从这个角度讲，要切实展现团结精神内在的实践力量，必须依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千千万万中国人民把团结精神转化为强国复兴的磅礴力量。正如邓小平所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50]²¹³团结是判断一国政治运行状况的关键指标，对政治的评价必须“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67]。这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有益尝试，并已被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五、结语

从概念生成到命题提炼，再到思想与重要论述解析是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基本步骤。对作为标识性概念的团结精神的研究，是通过探讨团结精神相关命题，深入阐释中国共产党团结精神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团结精神的重要论述，以期构建中国团结学^[10]自主知识体系，推动符合中国实际的团结实践，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作为团结实践的精神面相，当代中国团结精神的发

魏崇辉, 王悦. 作为标识性概念的“团结精神”: 中国呈现与价值意蕴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3): 1-15.

扬, 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外风险挑战的适应性调整, 契合我国以中华民族大团结持续塑造中国确定性的战略需求^[68]。通过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共同强化认同、凝聚力量, 形成了兼具组织刚性与文化弹性的新型团结范式, 使中国的团结格局呈现出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渐次外延的同心圆结构。这种模式既延续了“大一统”的历史基因, 又创造出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团结的中国逻辑, 为超大规模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了核心政治资源。这正是中国韧性的根本所在, 也是进一步团结国际正义力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赢得国际经贸斗争的关键因素。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 年 10 月 16 日) [N]. 人民日报, 2022-10-26 (1).
-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锚定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 不断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N]. 人民日报, 2024-10-29 (1).
- [3]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22.
-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 [M]. 7 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1329.
- [5] 韩震. 论新时代的中国时代精神 [J]. 中国社会科学, 2023 (1): 4-23+204.
- [6] 何锡辉. 新时代党的建设标识性概念建构研究 [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5 (2): 11-22.
- [7] 王建民. 转型社会中的个体化与社会团结——中国语境下的个体化议题 [J]. 思想战线, 2013 (3): 79-83.
- [8] 胡安宁. 社会团结的传统文化基础 [J]. 学海, 2024 (3): 150-161.
- [9] 王云芳. 大流动、大交融与大团结: 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逻辑进路 [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1): 22-29.
- [10] 张献生. 构建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学” [J]. 政治学研究, 2023 (5): 3-16+207.
- [11] 刘家强. 以团结汇聚伟力为统战举旗定向 [J]. 红旗文稿, 2022 (16): 4-7.
- [12] 沈桂萍. 促进全体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两个大局”视野下的统一战线新话语 [J]. 贵州民族研究, 2023 (6): 51-57.
- [13]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 巩固发展大团结 携手共画“同心圆”——党的十九大以来统一战线工作综述 [J]. 党建, 2022 (4): 16-20.
- [14] 刘学坤. 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思想探析 [J].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3): 11-17+90.
- [15] 程同顺, 王雪珂. “凝聚民心”与“团结力量”: 全过程人民民主与统一战线的价值、制度与行动链接 [J]. 社会科学, 2024 (1): 105-117+142.
- [16] 辛向阳. 习近平点赞的中华民族伟大精神是什么 [J]. 人民论坛, 2019 (S1): 126-127.
- [17] 李小凤. 发扬团结精神 唤起全宁睡民——宁夏早期进步期刊钩沉 [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20 (6): 150-157.
- [18] 张爱红, 赵建雯. 奥林匹克运动“团结”精神的演进之路、现存困境和中国方案 [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22 (3): 37-46.
- [19] 张少春. 中文“民族团结”概念的出现及早期演变 [J]. 民族研究, 2024 (1): 31-43+136.
- [20] 沈向兴, 周月, 李娅婕, 等. 新时代民族团结精神: 建构与解析 [J]. 云南社会科学, 2022 (1): 62-69.

- [21] 吴艳东, 吕翠萍. 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奋斗精神的基本内涵与弘扬路径 [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2): 47-59.
- [22] 尤国珍. 团结奋斗精神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及实践路径 [J]. 北京社会科学, 2024 (3): 13-20.
- [23] 刘洋. 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精神的内涵、价值与传承路径 [J]. 贵州民族研究, 2024 (4): 41-46.
-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2.
- [25] 刘梦雪. 中国共产党“团结奋斗”话语的历史展开与语义发展 [J]. 社会主义研究, 2024 (5): 17-25.
- [26] 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 [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5: 241.
- [27] 曹锦清. 民权与国族——孙中山文选 [M]. 上海: 远东出版社, 1994: 2.
- [28] 郑杭生. 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研究与中国社会学使命 [J]. 社会学研究, 2011 (4): 12-21+24.
- [29] 孙中山文选 [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2: 30.
- [3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 1 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23.
- [3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 2 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338.
- [3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 20 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1.
- [3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 3 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145.
- [3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 5 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248.
- [3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 4 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710.
- [3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 8 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12.
- [3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 25 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21.
- [3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 16 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507.
- [3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 22 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527.
- [40] 毛泽东选集: 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394.
- [4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1 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2.
- [4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5 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188.
- [4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9 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272.
- [44] 邓小平文选: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276.
- [4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2 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498.

魏崇辉, 王悦. 作为标识性概念的“团结精神”: 中国呈现与价值意蕴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3): 1-15.

- [4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17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361.
- [47] 邓小平文选: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148.
- [4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365.
- [4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下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587.
- [50] 邓小平文选: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63.
- [51] 江泽民文选: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590.
- [52] 江泽民文选: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259.
- [53] 胡锦涛文选: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60.
- [54] 胡锦涛文选: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186.
- [55] 胡锦涛文选: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87.
- [56] 习近平. 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2018年3月20日) [N]. 人民日报, 2018-03-21 (2).
- [57] 习近平书信选集: 第1卷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129.
- [58] 郭台辉, 卢明佳. 百年中华民族意识觉醒的三个时刻 [J]. 探索与争鸣, 2021 (8): 141-150+180.
- [59] 习近平. 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8年5月2日) [N]. 人民日报, 2018-05-03 (2).
- [60] 习近平. 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 (2018年5月28日) [N]. 人民日报, 2018-05-29 (2).
- [61] 习近平. 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2020年11月24日) [N]. 人民日报, 2020-11-25 (2).
- [62] 习近平. 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 (2023年3月15日, 北京) [N]. 人民日报, 2023-03-16 (2).
- [63] 魏崇辉, 王悦. 作为标识性概念的“最大的政治”: 基本命题、全面展开与统战呈现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2): 69-81.
- [64] 林尚立. 协商民主: 中国特色现代政治得以成长的基础——基于中国协商民主功能的考察 [J]. 湖北社会科学, 2015 (7): 16-22.
- [6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46.
- [66]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17年8月1日) [J]. 求是, 2022 (15): 4-14.
- [67]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3年6月2日) [J]. 求是, 2023 (17): 4-11.
- [68] 林华山. 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基本概念、理论基础与学科体系 [J/OL].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11 [2025-04-30].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0.1023.c.20250429.1255.002.html>.

责任编辑: 林华山 校对: 卢媛



民族文化产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价值、原则与路径

刘玉堂 李振鹏

(华中师范大学 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民族文化产业是以少数民族地区具有地域性、民族性、独特性的文化资源为核心, 包含生产、销售、展示和传播等环节, 并加以创造性转化形成的相应文化产品与服务的特色产业。作为人文经济学的区域实践, 民族文化产业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着力点之一, 它不仅是讲好各民族团结故事的活态载体, 也是促进各民族共同富裕的先进模式, 更是推动各民族“三交”工作的坚实平台。基于现实发展需要, 必须在把握共同性与差异性相统一、物质性与精神性相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 通过夯实文化认同基础、厚植中华文化符号、培育特色产业品牌和激发民族主体活力等实践路径, 充分发挥民族文化产业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功能。

关键词: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文化; 民族文化产业;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中图分类号: D633; G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5) 03-0016-13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5.03.002

作者简介: 刘玉堂, 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二级研究员; 李振鹏, 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培养时代新人视域下青年倦怠问题治理研究”(24CKS105)

引用格式: 刘玉堂, 李振鹏. 民族文化产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原则与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3): 16-28.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现实, 深刻总结和提炼了新时代党在民族工作上的历史经验与未来方向, 创造性地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论断。2022年10月,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 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1] 2024年9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再次强调: “要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 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2] 十余年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论断随着时代的前进步伐持续深化, 中央对其“何以必要”“何以可能”“何以可为”等一系列问题作了深层次阐述和部署, 明晰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重点与发展方向, 推动理论与实践研究领域的拓展与延伸。2023年6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首次提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 都要紧紧围绕、毫不偏离这条主线。”^[3]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此成为民族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五位一体”建设的理论遵循, 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心所在。目前, 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论域广阔, 观点众多, 成果丰硕, 但既有研究基本从宏观维度出发, 以理论基础与内涵界定为研究趋向, 而从中观和微观层面考察具体群体、特殊群体以及区域的有关研究较少^[4]。正如有学者所言, 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成败, 从地理环境与区位结构审视, 作为我国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重点区域, 中西部地区是巩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助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区域^[5]。基于民族文化产业视角, 从民族文化资源创新转化的现实维度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跨学科研究具有内在必然性。

自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二分法”以来, 文化产业开始受到国家的战略性关注。党的十八大后, 我国对文化产业的政策定位则从“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转向“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文化产业呈现出稳步快速与高质量协调的发展新趋势^[6], 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作为文化产业的区域性分支, 民族文化产业是以民族地区具有地域性、民族性、独特性的文化资源为核心, 包含生产、销售、展示和传播等环节, 并加以创造性转化形成的相应文化产品与服务的特色产业。2025年3月17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指出: “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既要保护有形的村落、民居、特色建筑风貌, 传承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又要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让民族特色在利用中更加鲜亮, 不断焕发新的光彩。”与其他国民经济门类相比, 民族文化产业通常具有强大韧性, 在抵抗、吸收外部冲击下能依然保持自身的主要特征和关键功能, 拥有自我调适创新的能力^[7], 发展民族文化产业是少数民族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的过程, 有利于释放民族地区经济潜能并加快转型, 发挥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现实作用^[8]。由此观之, 兼具文化和经济双重话语的民族文化产业既是民族

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面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又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着力点。

对于民族文化产业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交叉性研究，当前主要立足行业门类视角，以专题形式探赜不同产业门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关问题。一方面，关注旅游业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耦合关系，集中讨论旅游业对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意义与发展路径^[9]。另一方面，考察少数民族影视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工具价值，并从政治属性和以人为核心的传播属性揭示民族文化与身份认同的相关性^[10]。从总括性研究看，以往学界倾向关注民族文化产业与乡村振兴战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文旅融合、新基建等重大政策的联动，却缺少对民族文化产业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时代议题的关注，理论体系有待完善，需以跨界互动的多学科综合研究深化相关课题^[11]。

综上，当前国内对民族文化产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成果相对有限，已有成果以微观视角为主，或侧重探究单个产业门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与路径，或以单个民族地区为案例，总结与归纳有关经验，宏观性研究相对薄弱。有鉴于此，本文基于整体性视角，通过分析民族文化产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逻辑，思考民族文化产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原则与实践路径，以期为新时期民族工作提供理论借鉴。

二、民族文化产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的力量，或者我们称之为构成综合竞争力的文化软实力，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黏合剂’。”^[12]作为人文经济学的区域实践，民族文化产业是民族地区全面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功能。其以增进共同性为基调，在文化、经济、社会三重维度上呈现出相应的价值逻辑：不仅是讲好各民族团结故事的活态载体，也是促进各民族共同富裕的先进模式，更是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工作的坚实平台。

（一）民族文化产业是讲好各民族团结故事的活态载体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即“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13]，其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镜像为文化指引。从历史演进脉络看，中华民族是“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14]，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同创造了绚烂的中华文明。中国古代社会十分重视多民族关系，汉唐时期奉行和亲政策，与回纥、突厥、吐蕃、契丹等民族都有姻亲关系，随之而来的跨域人口流动、物产和技术传播，极大地推动了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状貌的生成，各民族之间的心理维系得以加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凝练了“四个共同”的中华民族历史特征，从物理空间、历史主体、文化内涵等角度全方位概括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并强调了“坚持文化认同是最深层的认同”^[15]的民族工作要点。文化认同是人类心灵深处对相应文化结构及空间所产生的情感依恋，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流互鉴、团结进步的故事正是增强各民族文化认同的实践基石，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关键资源。因此，如何将各民族团结故事予以深度描摹和活态复现，使人们全面认识中华民族发展脉络以及各民族

和平交往的历史事实, 进而牢固夯实民族团结进步的文化认同基础是题中应有之义。

鉴于叙事时空的物理限制, 我们很难将各民族在历史上的交往交流交融状貌进行深度勾勒。因此需探寻活态化的演绎方式, 将各民族团结故事进行具象化转译, 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事实的立体呈现和情感渲染。作为一种跨媒介叙事, 民族文化产业是以民族地区文化资源为内核的产业形态, 其将各民族团结故事与当代人们喜闻乐见的生活方式相融合, 不仅能以影视、音乐、出版、游戏、旅游和设计等创意新业态构塑故事世界, 而且可以借助高品质的文化消费在人们的心理空间上完成文化意义的传播。例如, 民族影视是以电视剧、电影、纪录片、综艺、短视频等载体为代表, 围绕少数民族历史文化、故事传说、民俗风情以及自然名物等特色资源进行影视媒介转化的艺术生产。它借助视觉传播再现各民族共同斗争、共同生产、共同生活的历史与现实, 以此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真实形象, 进而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依归^[16]。根据壮族民间传说改编的电影《刘三姐》, 聚焦壮族民间山歌、服饰、舞蹈特色, 经过多年发展已成为多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 是多民族文化认同的生动实践。民族文化产业对各民族团结故事的跨媒介加工为人们建构起具有核心价值观的故事世界, 基于故事源文本进行的演绎、延展和创生能有效吸引不同区域、年龄和阶层的人群沉浸并参与到故事世界中^[17], 全景式地展现中华民族团结的历史故事和生活图景, 以文化共情实现文化认同。

(二) 民族文化产业是促进各民族共同富裕的先进模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组织实施脱贫攻坚战, 将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 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任务^[18]。这也给解决不同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是 56 个民族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 “民族地区要立足资源禀赋、发展条件、比较优势等实际, 找准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切入点和发力点。”^[13]我国少数民族多聚居于边疆地区, 相较东部沿海地区, 经济滞后、交通不便是阻碍民族地区发展进步的重要因素, 亦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梗阻。民族文化资源是少数民族长期以来生产生活过程中生成的蕴含物质与精神文化双重表达的重要载体, 对其进行产业转化具有鲜明的先天资源优势。这是民族地区将相对劣势条件转化为比较优势的动力引擎, 为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夯实经济基础。

一方面, 发展民族文化产业有助于推动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促进民族地区人民物质生活富裕。文化产业以内容创意为核心, 涉及文化产品的制造、营销、传播和推广等环节, 能够形成上下联动、左右衔接的产业链条, 带来多次产出的经济效益^[19]。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数据(见表 1), 2018 年以来西部地区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持续增长, 从 2018 年的 7 618 亿元增长到 2024 年的 11 697 亿元, 在全国所占比重平均值约维持在 8.93%, 持续为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释放利好信号。以民族旅游为例, 大量旅游人口流入民族地区, 推动交通、环卫、文化、网络、教育、医疗等地方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 这不但为游客提供了便利舒适的旅游环境, 更促进了当地居民生产生活质量提升。另一方面, 发展民族文化产业有助于培育少数民族干部群众文化自信, 促进各族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民族文化产业具有公共文化性质, 不仅能使文化客体受到民族文化的濡养, 而且会激发作为文化主体的当地居民参与文化建设的内生动力, 产生积极正向的情感效应, 有利于文化自信的生成。共同富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辅相成, 前者为后者提供丰富的物质

与精神条件，后者也为推进缩小地区发展差距、迈向共同富裕奠定思想基础。

表 1 2018 年以来西部地区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情况

年份	绝对额（亿元）	同比增长（%）	所占比重（%）
2024	11 697	4.2	8.3
2023	11 688	10.0	9.0
2022	10 793	0.5	8.9
2021	10 557	13.7	8.9
2020	9 044	4.1	9.2
2019	8 393	11.8	9.7
2018	7 618	12.2	8.5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等 12 个省、市、自治区。

（三）民族文化产业是推动各民族“三交”工作的坚实平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打牢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础。”^[20] 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是强化“五个认同”，强调各族人民必须对国家、民族、文化、政党以及国情等方面有全面认知，彼此形成感性与理性的双重统一，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则是强化“五个认同”的必由之路。从历史维度看，庄蹻入滇、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进藏等民族交往活动为多民族地区的来往互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等民族融合时期则是形成多元一体文化特征的关键阶段。从现实维度看，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仍然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五个认同”的重要方式。民族文化产业以绿色发展为引领，促进民族文化资源的共享创新，并从横向破除各民族文化的隔断，助推各族人民之间心灵互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由此成为加强各民族“三交”工作的坚实平台。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求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层面出发，在精神维度上促使各族人民厘清“五个认同”“四个共同”的多维逻辑，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凝心聚力。文化产业则以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为旨归，以具身认知为特点。在文化产业与云计算、人工智能、互联网的融合趋势下，文化产业借助数字技术营造沉浸式文化体验，以此深化受众对文化内容的整体认知^[21]。由于文化产业具有增进文化认同的功能，通过民族文化资源的产业转化，可将中华民族共有的情感内涵与少数民族的文化因子以具身体验的方式向外传递，架构起各族人民手牵手、心连心的文化桥梁，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实际、走进人心。例如，作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映像，源于中原上巳节的“三月三”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从民族传统节庆逐步向跨地域和跨族群的公共节日转型，成为汉、壮、苗、瑶、侗、仫佬、仡佬等多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每年的“广西三月三·八桂嘉年华”节庆活动使海内外各族同胞欢聚一堂，以文化旅游的具身体验共享多民族文化盛宴。与此同时，数字艺术、数字游戏、数字动漫以及数字文旅等新型业态的出现，将人的身体、环境和认知系统聚合于数字交互时空，以数字为媒接收、解码和认知

刘玉堂, 李振鹏. 民族文化产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原则与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3): 16-28.

外部环境, 在沉浸式体验中实现认知引导。如以长征为主题的全域行浸式数字体验馆——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利用人工智能虚拟交互、全息影像、全维度机械运动、虚拟现实技术和三维声场等科技手段, 将贵州红色文化与民族文化交融演绎, 强化游客对民族文化的深层理解和情感链接。

三、民族文化产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原则

当前,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正在合理地吸纳现代性文化元素, 并由此构建出兼具承续文化传统和彰现代趋向功能的全新样态^[22]。发展民族文化产业, 不仅是推动民族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有益实践, 而且是以文化经济化实践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举措, 能有效地增进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集体认同。由于民族地区多民族聚居和交错杂居的基本特点, 以民族文化产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长远工作, 需要把握共同性与差异性相统一、物质性与精神性相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等基本原则。

(一) 共同性与差异性相统一

民族文化产业既是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提质升级、文化创新发展的关键方式, 又是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共享互鉴的社会场域, 而不同民族间的文化碰撞与交融必然需要经历磨合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 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13]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13]推进民族文化产业必须厘清中华民族“主干”与“枝叶”的双重逻辑, 以共同性为主导原则进行民族文化资源的特色化创新。其一, 各民族共有的历史基因要求发展民族文化产业必须以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为先。在 5 000 多年的文明长河中, 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 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 再到唐朝“万邦来朝”的盛世景象等历史事实, 无不印证着兼收并蓄始终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积累和传承中华民族历史上形成的民族精神、典范精神和科学精神, 以产业建设推动文化传承是中国文化产业的重要使命^[23], 而借助民族文化产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仍需以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为先, 保护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遗产, 传承与弘扬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精神, 守住民族统一的文化根基。同时, 以之为纽带, 用文化共同性推动各民族相知相惜、相亲相爱。其二, 各民族的文化特性要求关注和尊重民族文化资源的差异性。受历史、自然、交通等不同因素的影响, 各民族的文化资源具有显著的差异化特点, 在发展民族文化产业时应重视各少数民族和地区的资源禀赋优势, 因地制宜, 扬长避短, 集中挖掘、开发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化资源。同时, 注重与中华文化主流思想相契合, 促进风俗习惯、文化艺术、饮食服饰等民族特色文化资源的创新转化, 在文化差异性中寻绎共同性, 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落到实处。同时, 由于民族文化资源的独特性, 更须有全局眼光, 对民族文化予以充分尊重和包容, 只有顺应地方文化发展规律, 方能实现地方经济和文化可持续发展。总之, 依托民族文化产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必须坚持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的重要原则, 把握好中华文化“主干”与各民族文化“枝叶”的关系。

(二) 物质性与精神性相统一

民族文化产业是民族地区改革发展的重要内容, 以之助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需要正确把握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一方面, 经济属性在客观上要求民族文化产业建设需要观照各民族群众的具体利益, 使各族人民共享发展红利, 尤其是关切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权利和实质收益。就普适

意义而言，民族文化产业是以市场逻辑进行民族文化资源共享的过程，高质量的民族文创产品和服务能惠及各族人民文化消费需求，有利于促进文化生产与市场消费的良性循环。就特殊意义而言，民族文化产业是民族地区主动将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相融合的过程，其依托无污染、低成本、可循环性强的特色文化资源，促进本地绿色经济稳步增长，能够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生产生活条件。例如，改编自同名散文集的现象级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于 2024 年上映，新疆阿勒泰自然与人文景观的浑然一体形塑着观众对理想世界的向往和期待，阿勒泰的文旅经济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据有关数据统计，2024 年 1 月 1 日至 9 月 18 日，阿勒泰接待旅游人数达 756.71 万人次，同比增长 29.38%；旅游收入达 66.42 亿余元，同比增长 33.98%^[24]。发展民族文化产业必须充分保证各民族群众的物质利益，方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经济基础。另一方面，文化传承性在本质上要求民族文化产业建设发挥产业对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和创新发展民族文化的带动作用。尽管文化产业是由市场主导的经营性产业，但其仍然是以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为建设取向的，这就要求民族文化产业建设必须坚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守卫好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根脉与各民族特有的文化基因。比如，文化润疆是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新疆各族人民的日常生活。文化润疆通过对新疆历史文化资源的有效利用，不断提高新疆民族文化产业的竞争力，以喜闻乐见的形式滋润各族人民的精神世界，在文化互动中引领各族人民尊重差异、包容互鉴、携手并进。发展民族文化产业具有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增强文化自信等积极意义。这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和繁荣稳定发挥着关键作用。

（三）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

当今国际形势动荡与变革交织，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某些西方政权利用传播优势不但鼓吹“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不实言论，试图打压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并极力渗透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暴力恐怖等危险思想，妄图解构中华民族共同体，这无疑对我国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带来了严峻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思想长城，各民族共同维护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才能有效抵御各种极端、分裂思想的渗透颠覆，才能不断实现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能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各民族根本利益。”^[13]民族文化产业具有增进文化认同的功能，必须掌控好内外双重局面，做到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第一，应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指引，凸显“大一统”的民族性。在搜集、整理和利用的全过程中，注重从民族自有文化体系探寻中华文化的共有基因，从差异性中探索共同性，深入挖掘中华文化符号，这是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助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根本保证。同时，也要以民族特色文化资源为依托，深刻阐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民族关系与“石榴籽”的文化模式，全面彰显 56 个民族的文化品格。第二，建立跨文化思维，以民族文化产业呈现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破除国际对中国的负面舆论。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建设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际传播体系十分必要。通过建构融通中外、破立并举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叙事体系，不仅能塑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形象，还有助于在民族问题上掌握话语权和舆论主导权^[25]。总之，通过民族文化产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要对内处理好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

刘玉堂, 李振鹏. 民族文化产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原则与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3): 16-28.

的关系, 凸显“大一统”的民族性, 又要建立跨文化思维, 增强国际传播能力, 向世界讲好中国民族团结的故事, 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繁荣发展。

四、民族文化产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中华民族共同体”由“中华民族”与“共同体”组构, 二者并非同一反复, 而是彰显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共同性和不可分割性, 突出强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26], 而捍卫共同性这一首要地位是题中应有之义。中华文明共同性在互动延展中持续增长, 是各民族向内凝聚、团结统一的必然结果, 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整合和规范各民族价值理念的鲜明体现^[27]。民族文化产业既是为适应社会多元需求, 推动民族地区文化资源转向现代重构的经济实践, 又是立足中华民族共同性, 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实现民族互嵌、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实践。因此, 需以共同性为根本指引, 从夯实文化认同基础、厚植中华文化符号、培育特色产业品牌、激发民族主体活力等方面使各民族在深度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 夯实文化认同基础, 树立融合示范标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 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 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8] 中华文明具有统一和包容的特性, 由各族人民共创共建共享, 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与文化心理, 并从中呈现出不同风格的民族特色。文化认同是各民族团结进步的精神根脉, 只有充分认识到中华文明统一和包容的突出特性, 夯实文化认同基础, 方能破除有关工作环节上的心理壁垒。

一方面, 国家和地方政府、民间团体以及各类文化主体必须夯实文化认同基础, 以民族文化产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行政角色而言, 政府是促进地域文化与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应定期、系统地开展各级党政干部培训, 聘请地方教育系统乃至全国的知名学者、优秀一线地方从业者, 讲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文化产业以及民族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等相关理论和知识, 全面强化党政干部对民族文化产业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耦合意义的清晰认知。同时, 要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教育, 发挥国有文化企业的平台优势, 积极对接民族文化产业链条上的有关民营企业和团队, 参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的产业投资、项目研发、产品营销与推广传播, 并激发民族地区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主体的内生动力, 以文化认同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走深走实。

另一方面, 树立民族文化产业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融合示范标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大政方针, 努力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29] 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是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创新升级, 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举措。民族地区要在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工作中, 坚持以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为引领, 丰富和拓宽各民族全方位互嵌的文化路径, 在示范区评价体系中积极融入民族文化保护利用的有关指标, 树立民族文化产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融合示范标杆, 出台引导和激励政策, 在资金支持、市场竞争、人才帮扶、技术支撑等方面分门别类地为其提供基础保障, 以此强化民族文化产业对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促进作用。

（二）厚植中华文化符号，增强产业联动效力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人类文明形态，在 5 000 多年的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与积累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寄托着各民族儿女共同的情感依归和人生愿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图式，通过重复性思维和实践在日常生活的具体情境中潜移默化地内化民族认同和形成共同体意识，日常消费图式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30]。发展民族文化产业，是基于民族文化资源，厚植中华文化符号，以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的双重形态促进民族文化由族内走向族际、由传统走向现代、由形式走向内容的转换机制，文化与产业联动能以具象化的生活情景有效强化各民族相知相识相认。

第一，厚植中华文化符号，正确厘清中华文化共有符号与单一民族文化符号的关系。符号是承载特定含义的象征物，具有表征族群文化、进行文化意义传输的媒介属性。发展民族文化产业必须把握各民族共有的文化符号，注重以共有符号勾勒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面相与现实状貌，也要关注民族文化资源所蕴藏的特有基因，凸显少数民族的文化性格与风俗习惯。民族文化产业只有厚植中华文化符号，方能建构起个人主体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链接纽带，实现个体与国家意识的深层次联结。

第二，契合时代发展理念，推动民族文化创意产品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教育。近年来，作为独具中国符号元素的“新国潮”正在推动新时代文化生产与消费理念的颠覆性创新，持续丰富着现代文化创意产业的表现形态^[31]，成为引领当下文化创新发展的风向标，为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活力提供了全新契机。民族文化产业是依托民族文化资源进行产业发展的市场形态，在大众消费市场拥有广阔的前景，是进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的鲜明载体。因此，应在厚植中华文化符号的基础上，契合时代发展理念，立足“新国潮”语境，不断生产具有时代风格与民族特色的文化产品，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融入民族文化创意产品设计、推广以及营销等诸环节，以文化差异性为起点，在民族文创产品叙事中感知共同性。

第三，增强产业联动效力，注重数字技术赋能。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民族文化产业各个门类，尤其是民族地区旅游、教育、体育、健康、影视等受众数量庞大的产业，在跨行业、多领域中增强民族文化产业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中的联动效力。当前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5G 等新兴技术推动着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尤其是 AR、VR 等技术与文化内容的完美融合，催生了数字化、虚拟化、体验化、跨界化、圈层化的文化创意业态^[32]。发展民族文化产业必须注重数字技术赋能，以高端技术为引擎，培育民族文化产业新业态，构建产业联动矩阵，全面激发民族文化的创造力。

（三）培育特色产业品牌，彰显中华民族形象

当前，促进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领域之一，就是在基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会贯通的基础上，打造文化产业 IP，以新理念、新设计和新科技进行创新转化^[33]，而民族文化符号因具有地域性、民族性和差异性的显著特征，成为发展文化产业独特且重要的 IP 资源。因此，可以民族文化资源为 IP，根据民族地域特色，积极建构相应的文化产业品牌，在民族文化宣传体系建构与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全面彰显中华民族形象，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向各地区、各民族传递。

一是培育特色产业品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依托民族文化资源，培育民族特色文化产业品牌，不仅能打造民族特色的身份标识，而且能使民族文化多样性实现跨媒介传播，并建立消费

认同机制, 使各民族群众在民族文化品牌消费中互嵌共融。例如, 民族传统节日是民族地区人民生活的时间符记, 具有鲜明的文化标识, 将之融入旅游业, 塑造独具特色的产业品牌, 可吸引民族地区之外的游客和市场主体,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34]。彝族火把节、傣族泼水节、蒙古族那达慕、壮族“三月三”、土家族女儿会等皆是依托民族传统节日并以旅游培育特色品牌的典型案例, 不但丰富了各族人民的休闲娱乐生活, 更在节日旅游的过程中巩固了“五个认同”与“四个共同”的思想基础。同时, 要建立长效宣传机制, 持续扩大民族文化影响力。除传统宣传方式外, 民族文化产业要利用媒介化社会的信息优势, 联动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等各类新媒体, 加强全民生产与传播, 促进民族文化的资源共享与体验。此外, 要充分考量影视产业的“共同体叙事”特征, 关切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建构^[35], 以民族地区历史人物、民间故事、民间传说、民间神话为蓝本, 生产优质的少数民族题材影视作品, 将民族文化融入主流文化生产过程, 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化消费方式, 扩大民族文化影响力。

二是提高国际传播能力, 彰显中华民族形象。当前我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不断提升, 但国际话语权塑造还有待加强, “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 “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36]。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平台, 民族文化产业必须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基本原则, 以各民族丰富多样的物质与非物质形态的文化遗存为核心资源, 提炼出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内涵, 并融入创意元素, 加以产业利用转化, 全方位突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形象, 展现中国各民族从古至今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面貌与现实生活。此外, 由于我国民族聚居地区主要位于边陲, 与周边国家联系紧密, 在语言、习俗、信仰等方面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文化共性, 要善于借助民族文化创意产品的媒介性, 进行民族符号的跨文化传播。例如, 位于中国西南部的广西是以壮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地, 与东盟国家壮侗语民族同根同源。铜鼓、绣球、山歌等民族文化符号承载着中国与西南周边国家的文化情感, 具有推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先天优势。

(四) 激发各族群众主体活力, 壮大文化产业人才队伍

以民族文化产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各民族团结进步、繁荣发展。究其本质, 这是发挥各族群众的文化主体性、促进各民族互动共融的文化实践, 也是催动民族文化迸发活力的有益尝试, 必须充分关注各族群众的文化权利, 激发各族群众主体活力。

首先, 充分关注各族群众的文化权利。民族文化是特定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空间与心理基础, 在当地政府、外来企业等域外客体对其进行产业转化的过程中, 可能会出现忽视文化内部发展规律、难以平衡社会与经济效益等现象, 造成文化活力逐渐弱化的后果。因而, 需更加关注各族群众的文化权利。这种文化权利既体现在民族文化主体参与地方文化产业政策制定前、制定中、实施前以及实施中等全过程^[37], 又表现为需要健全民族文化资源转化利用的利益分配机制, 充分保护各族群众收获应有的效益, 真正使其在民族文化资源产业化中清晰地认识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意义。

其次, 努力壮大从事民族文化产业的人才队伍。民族文化产业以少数民族特色文化资源为基础, 相较于普遍意义上的文化产业, 其不仅需要经营、创意、管理、传播等多种属性的现代人才类型, 谙熟本土独特文化的生产型人才也同样关键。作为民众集体创造的产物, 壮族“三月三”具有极强

的复合性，既有五色糯米饭、绣球等物质生活符号，又有拜山、唱山歌、抛绣球等社会生活符号，更有祖先崇拜、自然崇拜以及史诗、神话传说、文人故事、民间谚语等多层次的精神生活符号，对其进行产业转化就需要发挥不同文化熟悉者或生活主体的功能，这是本土人才的优势所在。因此，要关注民族地区本土文化人才，结合文化产业的多样人才类型，不断壮大从事民族文化产业的人才队伍，在具体工作实施中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最后，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培育民族地区创新人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38] 相较东部沿海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发展迟缓，兼具前沿认知、技术本领和文化知识的民族创新人才的相对匮乏对推动民族文化产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形成一定的阻碍。民族地区要以中华文化认同为基点，加强跨文化适应教育，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民族地区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目的是“让各族大学生明确中华文化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是对各民族文化兼收并蓄的集大成”^[39]，进而缩小各民族的心理间距，消解因民族文化差异性而造成的交流隐患。同时，要鼓励民族地区精通民族语言、生活习俗的本土干部牵头相关工作，加强民族地区大、中、小学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历史文化教育，使新生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为民族文化产业建设发展储备创新性力量。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40]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纲”，涉及实体性的“中华民族”、整体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三个核心范畴，贯通以“多元一体”标识中国力量，以“五个共同”标识中国价值，以“四个与共”标识中国精神^[41]。以民族文化产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立足中华文明统一性，以增强中华文化认同为根本指向，以民族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基本任务的系统性工作。民族文化产业不仅是讲好各民族团结故事的活态载体，也是促进各民族共同富裕的先进模式，更是推动各民族“三交”工作的坚实平台。未来应以增强“五个认同”、深化“四个共同”为着力点，在把握共同性与差异性相统一、物质性与精神性相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基础上，从夯实文化认同基础、厚植中华文化符号、培育特色产业品牌、激发民族主体活力等四个方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鉴于民族地区历史沿革、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等差异化因素，以民族文化产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项体系庞大、步骤繁琐的艰巨任务，某些方面仍然值得细化思考。尤其是民族地区文化资源产业运作过程中的多元主体关系值得重视，政府、市场、居民等多元主体实际上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并不断推动民族文化产业向前发展的力量共同体，如何依据不同地区、不同主体的实际情况，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工作，理应是重点关注的领域。这对推进

刘玉堂, 李振鹏. 民族文化产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原则与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3): 16-28.

民族文化产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 年 10 月 16 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39-40.
- [2]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巩固发展中华民族大团结 李强主持 王沪宁宣读表彰决定 赵乐际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N]. 人民日报, 2024-09-28 (1).
- [3] 习近平在内蒙古考察时强调 把握战略定位坚持绿色发展 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 蔡奇陪同考察 [N]. 人民日报, 2023-06-09 (1).
- [4] 郭利芳, 欧妮.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现状与趋势——基于 CiteSpace 的知识图谱分析 [J]. 民族学刊, 2024 (9): 72-83+156.
- [5] 陈文元. 国家战略腹地建设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要素与实践维度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1): 53-62.
- [6] 黄永林.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引导成效及未来方向 [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2 (19): 72-82.
- [7] 晏雄, 范朋, 解长雯. 民族文化产业韧性演化机理及强化策略研究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7): 125-132.
- [8] 田海林.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阈下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实践路径——以武陵山区为例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2): 45-51+183.
- [9] 崔榕, 田晓梦. 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逻辑进路研究 [J].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1): 103-111.
- [10] 刘琮宇, 胡宗锋.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像中的反映——以贵州民族题材电影为例 [J]. 贵州民族研究, 2024 (6): 83-88.
- [11] 刘玉堂, 李振鹏. 近五年国内民族文化产业研究: 基本观点、态势、问题及展望 [J]. 中国民族学, 2021 (2): 264-280.
- [12] 习近平. 之江新语 [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149.
- [13]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汪洋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1-08-29 (1).
- [14] 费孝通.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民族学文选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1: 479.
- [15]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2019 年 9 月 27 日) [N]. 人民日报, 2019-09-28 (2).
- [16] 石谷岩. 新时代民族题材影视生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构 [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23 (3): 40-47.
- [17] 陈先红, 宋发枝. 跨媒介叙事的互文机理研究 [J]. 新闻界, 2019 (5): 35-41.
- [18]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光辉篇章 [N]. 经济日报, 2021-08-13 (10).
- [19] 黄永林. 从资源到产业的文化创意——中国文化产业现状评述 [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34.
- [20] 习近平在西藏考察时强调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 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N]. 人民日报, 2021-07-24 (1).

- [21] 邵明华, 高洋. 数字技术何以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 基于文化产业视角 [J]. 深圳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4): 56-64.
- [22] 董潇珊, 陆永胜.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价值向度 [J]. 思想教育研究, 2025 (2): 52-59.
- [23] 黄永林.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论纲 [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28.
- [24] 实现旅游收入超 66 亿余元 阿勒泰市旅游“泰”火爆 [EB/OL]. (2024-09-20) [2025-03-20]. <http://wap.xjalt.gov.cn/003/003016/20240920/0a3c50b4-5255-4520-a0d0-e49a5af670a6.html>.
- [25] 于运全.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际传播新进路 [J]. 民族研究, 2022 (3): 33-49+139.
- [26]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编写组.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民族出版社, 2023: 4.
- [27] 高永久, 冯辉.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共同”意涵与建设要求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6): 56-69.
- [28]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作重要讲话 李克强俞正声讲话 张德江刘云山王岐山出席会议 [N]. 人民日报, 2014-09-30 (1).
- [29] 习近平在宁夏考察时强调 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谱写好宁夏篇章 [N]. 人民日报, 2024-06-22 (1).
- [30] 欧阳彬, 魏莹. 日常生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逻辑理路与实践向度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6): 82-93.
- [31] 刘玉堂, 李振鹏. “新国潮”语境下影视民俗的文化实践与认同建构 [J]. 宁夏社会科学, 2024 (4): 188-196.
- [32] 黄永林, 宋俊华, 张士闪, 等. 文化数字化的多维观察与前瞻 (笔谈) [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1): 52-69.
- [33] 黄永林.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基因的结构特征和保护利用 [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2): 114-123.
- [34] 刘玉堂, 李振鹏. 民族传统节日与旅游融合发展的内在要求与实现向度 [J]. 民族艺术研究, 2023 (4): 152-160.
- [35] 饶曙光, 李道新, 赵卫防, 等. 地域电影、民族题材电影与“共同体美学” [J]. 当代电影, 2019 (12): 4-17.
- [3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212.
- [37] 江婉.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保障 [J].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19 (6): 43-49.
- [38]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二〇二四年七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N]. 人民日报, 2024-07-22 (1).
- [39] 颜军, 袁柏顺.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牢民族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5 (2): 47-55+183.
- [40]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3 年 6 月 2 日) [J]. 求是, 2023 (17): 4-11.
- [41] 林华山. 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基本概念、理论基础与学科体系 [J/OL].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11 [2025-04-30].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0.1023.c.20250429.1255.002.html>.

责任编辑: 王京菁 校对: 龚静阳



从“大后方”到“大团结”： 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 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

杜华君 何江艳

（北方民族大学 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摘要：作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是统筹推进新时代“大后方”高水平安全建设与高质量发展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战略支点，也是经由推动民族地区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助力各民族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乘势之举，更是经由区域协同发展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以巩固发展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应有之义。就理论逻辑讲，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理论根基同源、实践主体同一和根本目标一致的内生机制，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就实践进路讲，要构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政治引领、文化铸魂、发展固本、社会融通和法治护航的联动机制，坚定走好新时代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通过构建“战略势能转化—制度融合赋能—政策协同推进”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国家统合范式，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辟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与国家制度政策实践知行耦合的创新进路。未来，关键在于实现从建好建强新时代“大后方”到巩固发展中华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5.03.003

作者简介：杜华君，北方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研究员、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讲师；何江艳，北方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西北民族地区三线建设遗产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价值挖掘与活化利用研究”（21CMZ008）

引用格式：杜华君，何江艳. 从“大后方”到“大团结”：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3): 29-42.

民族大团结的系统集成，将国家战略腹地的“硬实力”转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强纽带”。

关键词：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新安全格局；新发展格局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 (2025) 03-0029-14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就“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1]作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1] 52-53}的战略部署。2023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时强调：“四川是我国发展的战略腹地，在国家发展大局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2]考虑到“我们的主要家当都摆在沿海一带”，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时，创造性提出“新时期、新时代还是有一个大后方的概念的”，指出“你们这里也要成为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增长极，一个新的动力源”^[3]。2023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5]的具体部署。

目前，学界围绕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研究有三个维度：一是本体认知上系统阐释了国家战略腹地作为“经济韧性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和动力源”^[6]的时代内涵；二是实践路径上聚焦四川^[7]、重庆^[8]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9]等重要区域，同时围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10]和关键产业备份^[11]等重要指示提出实践策略；三是实践场域上转向系统集成，如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12]、发展新质生产力^[9]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3]协同推进。可见，学界已形成从基础理论到实践探索再到系统集成的研究架构，但存在以下不足：侧重经济维度的价值阐释，忽视其具有政治、文化、社会等多维一体的“共同体”意涵；系统集成策略缺少政策嵌套的理论建构及逻辑贯通，如尚未建立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协同推进机制并缺少政策适配研究。进一步挖掘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共同体”意涵，能够使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与党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系列部署系统集成并形成强大合力。如何在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中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实现更高层次的团结统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地区各民族只有不断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加强经济交流合作，才能更好推动国家经济繁荣、更好实现自身经济发展。”^[14]这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更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明确了任务。

本文将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引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研究之中，力图在延长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既有研究链条的基础上，阐释其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一方面旨在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筑牢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民族认同根基，将国家战略腹地的“硬实力”转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强纽带”，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与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协同推进的实践新路。另一方面意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中，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国家属性引领，实现从建好建强新时代“大后方”到巩固发展中华民族大团结的系统集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辟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与国家制度政策实践知行耦合的创新进路。如何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也是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命题。本文对二者关系的讨论及其如何在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中乘势赋能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论证，是在特定维度上回应这一时代

命题的尝试。

二、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时代意涵

“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 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 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 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14]³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这个历史进程中融聚而成的民族实体, 正致力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作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 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部署。当前, 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相辅相成、同向奔赴。在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正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时代必然。“新时代推进国家战略腹地建设, 具有广阔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战略功能, 能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系统支持, 有利于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13]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战略支点, 不仅能够推动人口规模、共同富裕、文明协调、生态和谐与和平发展这五大中国式现代化特质的深度融合, 而且正在践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路向”^[15]。

(一) 超大规模现代化之路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根本底气和时代机遇”^[16], 也是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强大根基和超大动能”^[17]。“我国是拥有 14 亿多人口的统一多民族国家, 仅少数民族人口规模就高达 1.25 亿”^[17], 中西部地区承载着近四成人口, 但人均资源占有量、基础设施密度和公共服务水平与东部地区相比仍存在显著差距。首先, 宏观来看, 国家战略腹地通过产业协同发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布局等, 能够有效缓解超大规模人口现代化进程中资源错配、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和要素流动不畅等问题。例如, 当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增长极的打造, 既能承接东部产业转移, 又能激活中西部资源禀赋。其次, 具体来看, 这种空间重构不是简单的产业位移, 而是需要通过优化人口经济地理格局, 使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与人口分布形成动态适配; 还需要通过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推动东西部协同发展, 为人口规模优势转化为现代化动能提供实践载体; 更需要通过区域协同发展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纽带。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培育新质生产力和发展新兴产业的过程中, 既可深化民族互嵌, 也可有效推动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具象化为产业协作网络。最后, 整体来看, 当边疆与内地、沿海与内陆、东部与中西部、战略腹地与核心区域形成深度协同的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时, 各民族自然结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价值共创、使命共赴的命运共同体。这种空间重构在本质上, 正是承继了历史上“大一统”格局通过政治整合与经济互补以维系超大规模共同体的历史经验, 当下则是以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为载体, 通过制度性安排和区域性政策以确保各民族共享发展机遇。这种高超的治国理政智慧使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场域。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既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纵深, 也厚植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物质根基, 还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注入了新的时代动能, 更为超大规模人口现代化提供了兼具包容性与安全性的中国方案。

（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之路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基本目标和现实任务”^[16]，也是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经济基础和本质要求”^[17]。国家战略腹地建设遵循共同富裕的目标指向，正是着力破解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关键举措。一方面，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边疆地区的发展具有梯度差异，但本质上是生产力布局与资源要素配置的空间矛盾。当前，通过在中西部地区培育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既能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产业升级腾挪空间，又能为欠发达地区创造就业机会。例如，内蒙古的风电基地使牧民转型为新能源技工，广西的跨境贸易区让边境村寨接入全球供应链，西藏的藏地桃花节带动文旅融合和云南的咖啡产业链惠及各民族。诸如此类的“造血式发展”超越了简单的财政转移支付，通过产业赋能使“地理边缘”转化为“开放前沿”，让共同富裕的发展理念看得见、摸得着。再如，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正在通过“川渝一盘棋”的协同机制，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既增强产业链韧性，又带动区域收入均衡增长。另一方面，我国中西部民族地区与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区域重叠，这种以国家战略腹地为支点的经济布局，有效破解了传统发展模式下的区域失衡，更使“一个民族也不能少”“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决不让一个兄弟民族掉队，决不让一个民族地区落伍”的共富理念和政治承诺转化为可感可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各民族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物质基础。这种双向互动的发展模式通过产业链跨区域协同形成发展合力，使得中国式现代化成果的创造与分配在空间维度实现有机统一，也使得共同富裕的成果真实可感。这能够有效防止出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区域发展中常见的“虹吸效应”与“边缘崩溃”困局，防止因资源分配失衡导致的两极分化陷阱。

（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之路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实践领域和功能指向”^[16]，也是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鲜明特色和重要保障”^[17]。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和各民族文化交融的天然场域，中西部民族地区通过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架起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桥梁。例如，贵州“村超”赛事以乡土足球激活地方文化，川西非遗工坊让传统技艺对接现代设计，证明精神文明创造本身就是生产力。又如，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通过产业协同与文化共建，既推动了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实体经济发展，又在巴蜀文化保护中打造了三星堆与金沙遗址联动展示区，成为区域均衡发展与文化创新发展的典范。这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互促的现代化，将地域文化基因转化为现代产业动能，既注重历史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战略腹地建设肩负着推动区域均衡发展的时代重任，通过跨区域资源整合为破解西方现代化进程中“重物质、轻精神”的倾向提供了中国智慧，也为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

（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广泛共识和生态底蕴”^[16]，也是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现途径和必由之路”^[17]。国家战略腹地发挥着生态安全屏障的关键作用。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青藏高原等战略腹地，与集资源富集区、水系源头区、生态屏障区、文化特色区、边疆地区于一身的民族地区重合，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使命重大。一方面，国家战略腹地建设通过加强长江黄河上游生态保护和生态屏障建设，推动民族地区经济

发展与国家安全战略的深度融合, 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另一方面, 国家战略腹地建设通过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发展清洁能源产业, 可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这种绿色发展模式突破了传统工业化路径依赖, 找到经济发展与生态安全间的动态平衡点, 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探索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路径。

（五）和平发展之路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是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时代担当和作用领域”^[16], 也是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世界愿景和格局担当”^[17]。“当前, 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1] 60}, 国家战略腹地建设践行“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 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1] 23}的辩证法。历史昭示我们: “中华民族历史上不缺乏尚武精神, 但和平却始终是我们的第一原则。”^[17]在全球化风险倍增的今天, 国家战略腹地的产业备份系统建设、能源资源储备体系完善、边境地区开放开发和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打造等, 既在构筑抵御“黑天鹅”“灰犀牛”事件的经济安全防线, 又为高水平对外开放锻造战略支点。例如, 成渝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保障全球供应链韧性, 中欧班列构建亚欧大陆发展动脉, 这些印证着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对“和平与发展”的物质支撑。通过国家战略腹地建设, 我国不仅强化了发展自主权, 还以区域协调发展激活了内生动力, 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中国智慧。“中国的和平崛起, 不依靠对外的殖民掠夺, 靠的是向内发力、苦干实干, 靠的是维系和巩固超大规模共同体的能力, 靠的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信念。”^[17]国家战略腹地的“硬实力”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强纽带”交织共振, 中国式现代化正以其特有的东方智慧开辟着人类文明进步的新境界。

三、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逻辑

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是新时代中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与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双重命题。二者看似分属不同领域, 前者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建设以提升国家综合实力, 后者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14] 3}, 实则二者具有理论根基的同源性、行动主体的同一性和根本目标的一致性。深入认识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在关系, 有助于揭示和“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民族工作战略与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国家总体战略之间”^[18]的互构机制, 也有助于系统解析和深刻把握国家制度政策实践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深刻影响。

（一）理论根基的同源性

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战略思想”^[17], 也均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成果, 两者具有理论根基的同源性。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1] 16}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中华民族独特历史与精神文明的现代性延展, 也是汲取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思想精华的创新性成果”^[18]。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作为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 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创新。这一战略部署是对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贯彻, 也是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的深化。就历史唯物主义讲, 马克

思主义强调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国家战略腹地建设通过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推动生产要素向中西部流动，正是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的实践回应。就辩证唯物主义讲，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直面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双重目标。例如，通过在中西部布局能源基地、“在国家战略腹地构建事关国家安全的关键产业与要素备份基地”^[10]，化解了东部发达的城市地区发展过度集中的风险；又通过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增强经济韧性，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体现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立自主性和实践创新性”^[18]。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提出，也是深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强调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理念，鲜明提出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形成了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19]2024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纲领性文献”^[20]，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成果”^[21]。这一系列重要指示及重要论述，阐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所包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核”^[18]。通过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可以深刻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轨迹”^[18]和准确把握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总体要求。总之，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成果，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时代性、创新性，也展现了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创造性。

（二）实践主体的同一性

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均需要不断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以凝心聚力，更需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主体力量，两者具有实践主体的同一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1]46}；“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1]70}。当前，面对“两个大局”的严峻考验，以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为战略支点，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就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经验来讲，“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由各民族共同缔造的，也必须由各民族共同维护、巩固和发展”^{[14]4-5}。就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内在要求来讲，需要发挥全国各族人民的主体力量，更需要巩固发展中华民族大团结，因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正是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实践主体。当前，“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19]，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不仅指明了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实践主体，“也揭示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增强主体凝聚力的共同性方向”^[18]。始终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方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推进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汇聚更多力量。

（三）根本目标的一致性

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看似具体目标不同，但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引擎，两者具有根本目标的一致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各族人民的共同梦想，既

成为各族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共同团结奋斗的引领动力, 也昭示着各族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共同繁荣发展的前途命运。”^[22]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价值坐标与实践导向。一方面从“空间一体化”^[10]的角度来看, 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着力破解“胡焕庸线”东西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核心区域与战略腹地联动不足的空间矛盾, 正通过“产业转移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优化空间经济政策和国土空间体系”^[10],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安全屏障, 发展安全腹地。另一方面就增进共同性以铸牢意识形态根基的角度来讲,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正致力于凝聚多元力量,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更为磅礴的奋进伟力。在此意义上, 两者共同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目标。前者通过统筹发展和安全, 为后者提供了实践载体与战略支点, 而后者则为前者强化价值引领与熔铸奋进合力。这种内生机制的发掘, 不仅在理论层面回应了新时代中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与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双重命题, 更在实践层面破解了区域协调发展困境的难题, 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四、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演进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通常是在国家制度和政策推动下演进的。现如今, 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正通过一系列国家制度和政策实践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进程中, 需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主动统筹“两个大局”, 应对风险挑战。

(一) 捍卫国家统一与接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新中国成立初期, 我们党在捍卫国家统一、确立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建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同时, 通过布局区域经济发展和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双重路径, 开启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纪元。一方面在经济工作领域, 国家通过“一五计划”重点发展东北、华北等工业基地, 并逐步向中西部地区延伸工业项目, 建设基础设施。虽然这一时期的区域经济发展布局仍以东北和东部沿海为重点, 但通过川藏公路、宝成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中西部地区逐渐被纳入国家战略视野。这些举措为后续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接续推进筑牢了“压舱石”。另一方面在民族工作领域, 我们党在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 确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形成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为主要内容的民族工作方针政策。从1949年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到1952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 再到1954年宪法规定“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23], 一系列法律文件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 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增进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共同性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15] 320-321}。

(二) 加强国防建设与协同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1964年启动的“三线建设”是国家首次系统性将国防战略重心由东北和沿海地区转向西部内陆腹地的标志性事件。针对当时严峻的国际局势, 毛泽东强调, 要吸取苏联在二战初期“一不准备工

事，二不准备敌人进攻，三不搬家”的惨痛教训^[24]，同时指出，“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25]。要“着眼于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考虑大山、大河、天险等地形特点以及铁路交通、工业分布与国防力量的现状”^[26]，将全国划出一、二、三线，意在建设一套大纵深、多梯次、可回旋的战略防御体系。“一线地区指边疆和沿海，一、三线之间称为二线地区，一、二线地区的腹地称‘小三线’。”^[27]三线地区在地理上包括京广线以西、甘肃乌鞘岭以东和山西雁门关以南、贵州南岭以北的广大地区；在行政区划上分布在“西南的四川（含重庆）、贵州、云南，西北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还有湘西、鄂西、豫西、晋西、粤北、桂北等，共涉及13个省区”^[27]，俗称“大三线”。这些地方是国家战略后方基地建设的重要区域，涵盖多个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和少数民族分布集中的云南、贵州、青海、四川等省，还涉及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大小凉山、六盘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等少数民族聚居区。三线建设时期，超过1000万人直接参与建设，间接辐射到的人数更是难以计量，这不仅带动了三线建设地区的经济发展，还通过技术工人和知识分子的跨区域流动，促进了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据统计，1964至1980年，全国三线地区共投入2052.68亿元，相当于1953至1964年投资的3倍，在中西部建成了1945个大中型企业、科研设计院所^[27]。其中，“建成400多个军工企业、80多个国防科研院所”^{[27] 96}。

其一，在工业化方面，经过三线建设，中西部地区形成了以华中为中心的新兴工业基地和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机械工业基地，在西北地区建成了汉中、天水、银川、西宁工业区等一批新的、各具特点的工业中心^[28]。其二，在城市化方面，大量沿海地区的国防军工企业和与之配套的相关产业按照“大分散、小集中”的布局原则向中西部大转移，使一大批城市及其区域经济社会得到快速发展。比如，形成了“攀枝花‘钒钛之都’、绵阳‘科学城’、六盘水‘江南煤都’、十堰‘汽车城’等多个新兴工业城市”^[29]；促进了都匀、绵阳、德阳、凯里、宝鸡、汉中等普通县城转型为重工业城市；带动了重庆、成都、贵阳、西安、兰州、西宁、银川等中心城市的崛起。其三，在交通基建方面，建成了一批重要的铁路、公路干线及其支线，如川黔、贵昆、成昆、湘黔、襄渝、阳安、太焦、焦枝和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等10条铁路、8046公里和各类公路约22万公里^[30]。在水路方面彻底整治了长江航运，通航里程和吞吐量均得到快速发展。这些西南交通网经长江水道，通过宝成、湘黔、黔桂铁路与华中、华南和西北铁路网相连，构建起了一个新的全国铁路交通网，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横向上的互联互通。总之，当年这种基于生产力布局上的战略统筹，不仅增强了我国的国防实力，还为我国战略后方建立起了一套门类比较齐全、可应对战争的工业生产体系，使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形成相对互补的产业格局。同时，围绕众多城市、工程、基地、工矿企业、科研院所和日常生活基础设施的建设，快速推进了中西部民族地区的现代化水平，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赓续发展夯筑了经济基石。

（三）区域协调发展与不断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际地缘政治局势的缓和，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逐渐凸显，在新的经济发展思想的指导下，我国逐步实施了“东部沿海优先发展、先富带动后富”的区域发展战略^[31]。此时期，东部沿海地区取得较快发展，带动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但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仍旧突出。1991年3月，《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首次提出要“促进地区经济的合理分工和协调发展”。这是首次在政府报告中提出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标志

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被提上国家议事日程。1999 年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标志着国家开始通过政策倾斜和资源调配, 系统性缩小东西部差距。2000 年以后, 国家相继启动了“东北振兴”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至此, 中国逐渐形成了“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全新局面^[6]。与此同时, 民族工作进一步深化。200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对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 将区域协调发展与民族团结进步紧密结合。此阶段, 国家在中西部地区布局能源基地(如“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工程)、交通枢纽(如青藏铁路)和云南边境贸易试验区等一系列具有全局性意义的重大战略, 依托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了区域发展的经济纽带, 通过产业链延伸促进了各民族经济相依, 由此深化了“经济互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格局。

(四) 安全发展并重与统筹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赋予了区域协调发展以新的时代意涵。党的二十大作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2023 年 12 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 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的具体部署。国家战略腹地建设逐步实施开来, 但需指出的是, 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与三线建设不同, 其核心目标并不是以备战为目的, 而是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国家战略腹地建设通过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关键产业备份基地等举措, 增强统筹“两个大局”的战略能力。2023 年 7 月以来, 四川努力打造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并坚持“川渝一盘棋”^[2], 重点布局电子信息、高端装备等战略性产业, 形成与东部沿海互相支持的经济格局。当前, 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协同推进正在深度展开。

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角度讲, 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既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物质保障, 也激活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在动能。其一, 通过布局关键产业备份基地和战略性资源储备中心, 能够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做好应对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突发事件的准备。例如, 西安光子产业集群突破“卡脖子”技术, 贵阳大数据中心护航数字经济安全和中西部诸多地区新型储能项目的落地等, 既保障了我国产业链的自主可控, 又为未来产业的升级迭代预留了弹性空间。其二, 中西部地区依托成渝、关中、长江中游等城市群, 一方面承接东部产业转移, 布局战略性高精尖产业, 促进装备制造、新型能源、人工智能等产业集群。这既缓解了东部沿海城市地区生产要素价格高昂的成本压力, 又通过产业链备份增强整体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利用“一带一路”陆海联动节点优势, 建设向西开放的新高地, 将内陆腹地转变为国际循环战略通道。例如, 四川依托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发展, 保障了粮食安全与能源安全, 通过中欧班列(成渝)串联起亚欧大陆产业链。其三, 通过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 依托能源资源优势, 能够缓解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助力中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转型。例如, 青海和内蒙古清洁能源通过特高压网络直送东部, 农副产品借助冷链物流覆盖全国, 让“胡焕庸线”东西两侧形成了生产要素的深度互嵌; 宁夏“东数西算”工程在虚拟空间层面增进了东西部间的经济联系; 四川的页岩气通过“川气东送”点亮长三角万家灯火。这些地域性资源禀赋正在升华为国家战略能力, 地方发展诉求与国家整体利益实现了有机统一。这种“安全+发展”理念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不仅提升了统筹“两个大局”的战略能力, 更激活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生动力。

综上，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经历了从“被动防御”到“主动布局”、从“单一目标”到“协调发展”的历史进程。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关系，也由早期的“政治整合”“经济带”格局走向“安全+发展”协同推进的发展格局，体现了对“三线建设”历史经验的扬弃，又超越了“冷战”思维下的被动防御。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仅有助于解决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激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生动能，也有助于推动中西部民族地区实现从“战略纵深防御”向“主动韧性塑造”的经济社会转型。

五、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进路

当前，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既在有形的物质场域深耕，也在无形的精神场域涵养。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已经超越传统区域经济发展范畴，演变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系统工程。要通过构建“战略势能转化—制度融合赋能—政策协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国家统合范式，构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政治引领、文化铸魂、发展固本、社会融通和法治护航的联动机制。在此过程中，以国家战略势能向民族工作领域定向传导为引擎，以国家制度政策供给赋能民族事务治理体系优化升级为支点，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系统协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路径，可为“增进并强化中华民族共同性创造积极条件”^[32]，可在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中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实现更高层次的团结统一。

（一）政治引领：筑牢共同奋斗的核心主轴

政治引领作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逻辑起点，旨在“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不断巩固各民族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14]⁷。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根本政治保障。一方面在制度保障机制上，通过完善优化党委领导民族工作、统战部门统筹协调的治理架构，既要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深度嵌入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也要将各民族发展诉求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例如，“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33]不仅实现了产业链跨区域延伸，更通过党组织联建共建机制，将“五个认同”“四个与共”融入职工培训体系，使生产要素流动与政治认同构建形成共振效应。这种机制创新打破了以往民族工作的行政化局限，既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过程中通过“党建+产业”模式将党的民族政策转化为发展动能，也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向生产生活场景的融入中，增强了各族群众对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认同与支持。近年来，面对国际地缘政治动荡，我国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始终保持社会稳定，充分验证了制度保障机制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在政治引领实践中，要把党的制度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以实践创新推动思想政治基础的持续巩固，推进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中实现党的领导与民族团结进步的双重目标。例如，贵州借助东西部协作机制，建立“东部研发+贵州制造”的产业协作模式；广西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研发+广西制造+东盟市场”产业协作体系；云贵川三省建立的“赤水河流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带”助推联创共建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这些案例充分印证了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同心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制度效能。

（二）文化铸魂：提供强大的精神文化支撑

文化铸魂作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关键环节，意在“着力构筑中华民族

共有精神家园, 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强大精神文化支撑”^{[14] 7-8}。一方面, 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增进中华文化认同。例如, 通过数字技术复原敦煌壁画中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实, 打造出了可感可知的“五个共同”教育基地。“三星堆”成为中华文化共同体建构的“超链接”, 在科教、文旅、文创等业态的共同推动下, 持续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与此同时, 需要突出中华文化符号的整合功能, 如将长江、黄河等地理标识与长征精神、抗战精神、三线精神、红色文化等相结合。要在文化维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基础, 在经济发展中守住文化根脉, 通过文化反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另一方面, 实现产业发展与文化赋能的有机结合, 让国家战略腹地成为活化利用文化遗产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场域。例如, 贵州“村BA”使地方文体活动升华成为各族群众共享共乐的文体盛事, 吸引了全国乃至世界关注的目光。广西“三月三”节庆活动既促进文旅消费, 也以山歌对唱等形式深化了各族群众的情感联结。又如, 中西部民族地区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中, 各民族产业工人在职业技能培训中同步接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 很多企业将中华文化元素融入产品设计, 等等。这种生产场域的文化实践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获得具象化载体, 使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与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协同推进。

(三) 发展固本: 创新共同富裕的动力机制

发展固本作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中之重, 重在“加快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扎实推进各民族共同富裕”^{[14] 8}。国家战略腹地建设要服务中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促进各地区在经济上更加紧密地连在一起、融在一起, 确保实现共同富裕。一方面, 通过制度性安排破解中西部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 构建“东西互济”的经济协同网络, 推动中西部民族地区深度嵌入国家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以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同时, 完善“飞地经济”治理模式, 以数字经济为纽带破除地理阻隔, 使中西部民族地区的清洁能源与东部沿海发达城市的算力需求精准对接, 在战略嵌入与要素重组中培育新质生产力, 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这种经济协同模式可将国家战略腹地建设需求与民族地区发展诉求相结合, 在保障产业链安全的同时筑牢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 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 需以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 筑牢民生底板,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不断提高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 促进发展成果公平惠及各族群众”^[19]。例如, 通过跨省医疗联合体、云端教育资源共享平台等技术治理手段, 让优质资源穿透地理阻隔。

(四) 社会融通: 培育深度互嵌的联结网络

社会融通作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途径, 旨在“推动各民族全方位嵌入, 积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14] 9}。其一, 以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空间重构为抓手, 通过基础设施网络化重塑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地理格局。统筹规划跨区域交通、能源、数字“三位一体”新型基建体系, 重点打通边疆地区与内陆城市群的立体通道, 以高铁、5G网络、特高压输电网络、“东数西算”工程的互联互通消解地理阻隔。例如, 成贵高铁的全线贯通, 不仅激活了川黔滇经济走廊, 助力西南经济腾飞, 更通过“高铁+文旅”模式, 让苗族蜡染、侗族大歌等非遗在更广范围内传播共享。其二,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 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 不断拓宽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的实践路径。依托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科学引导民族地区人口向区域中心城市有序流动, 同步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配置, 深化户籍、教育、社保等领域改革, 使迁移人口成为各民族文化互

鉴、经济互促和社会互嵌的有效载体。在优化人口、资本、技术等要素流动效率的同时，更要在实体层面编织起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联结网络，增强各族群众的归属感。其三，重点培育多民族经济协作组织与社会共同体，依托产业链分工合作、技能培训、创业扶持等政策工具，使经济互嵌成为社会融合的“黏合剂”，力图在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筑牢“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社会结构和现实基础。

（五）法治护航：完善治理现代化制度框架

法治护航作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保障，意在“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不断提高民族事务治理能力和水平”^{[14] 9}。一方面，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制度保障需要依托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法治化治理的双重路径。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逐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在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同时，赋予民族地区灵活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创新升级法治文化的浸润工程，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例如，青海省通过设立“马背法庭”的创新形式，在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区，法官骑马前往牧民家中进行诉前调解和案件审理，体现了“法治精神贯穿民族工作”的实践要求。《关于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研究体系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重大现实问题研究”^[3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5] 29}，这表明制度建构已从单一政策供给转向系统性、协同性治理，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提供了更坚实的法治基础与制度支撑。

总之，在制度嵌套与政策嵌入中构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五维一体”实践进路，意在直面统筹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与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双重命题，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辟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与国家制度政策实践知行耦合的创新进路。

六、结语

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其一，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正是统筹推进新时代“大后方”高水平安全建设与高质量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战略支点。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家战略腹地建设通过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强化资源保障能力、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可为应对外部不确定性提供战略纵深，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稳定发展夯筑物质之基。其二，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正是通过区域协同发展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以巩固发展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应有之义。通过国家战略腹地建设载体的系统性升级和结构性调整，能够促进核心区域与战略腹地协调联动，带动边疆与内地、中西部民族地区在更高维度上实现价值整合、要素重组与动能转换。由此，可将区域差异化特征转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结构性优势，促进国家意志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政治引领、经济互嵌、文化传承、社会融通等多层面形成更高维度的有机统一。其三，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正是经由推动民族地区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助力各民族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乘势之举。未来，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衔接机制及其政策适配研究，亟待向微观层面的精细化调适倾斜。尤其需要从全局性高度统筹、从社会化服务着手、从日常性所需发力，实现从建好建强新时代“大后方”到巩固发展中华民族大团结

杜华君, 何江艳. 从“大后方”到“大团结”: 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3): 29-42.

的系统集成, 将国家战略腹地的“硬实力”转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强纽带”, 在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中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实现更高层次的团结统一。

此前, 学界侧重从经济维度阐释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价值与功能。当前, 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已经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迈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新阶段^[35]。要从实体性的“中华民族”、整体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三个核心范畴, 贯通以“多元一体”标识中国力量, 以“五个共同”标识中国价值, 以“四个与共”标识中国精神, 对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一体研究。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条件^[36]。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中的资源整合、产业调整和空间重构只是基础, 精神共融才是内核。因为在建好建强新时代“大后方”的进程中, 只有各民族共同经历了奋斗的艰辛与成功的喜悦, 这种共同经历和集体记忆方可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种精神共融产生的强大力量, 能够将不同地区、各民族的力量汇聚在一起, 推动中华民族大团结不断迈向新的高度。只有在这种命运与共的团结奋斗中, 各民族才能明确意识到自身发展与国家发展休戚相关。在这个意义上, 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是凝聚各民族力量的关键纽带, 不仅能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厚植奋斗根基, 汇聚更为磅礴的奋进伟力, 还能够让各民族在共同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的实践中深刻感受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强大向心力。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52.
- [2] 习近平在四川考察时强调 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返京途中在陕西汉中考察 蔡奇陪同考察 [N]. 人民日报, 2023-07-30 (1).
- [3] 任平. 以“新格局”绘写“新篇章”——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观察 [N]. 人民日报, 2024-06-04 (1).
- [4]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李强作总结讲话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N]. 人民日报, 2023-12-13 (1).
- [5]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13.
- [6] 蒲清平, 马睿. 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内涵特征、重大意义和推进策略 [J].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4): 37-48.
- [7] 廖艺, 陈发扬. 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四川样本”: 优势、困境及对策 [J]. 西昌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5 (1): 19-26.
- [8] 龚勤林, 宋明蔚.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内在逻辑、现实基础与路径选择 [J].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4): 21-36.
- [9] 姚树洁, 房景. 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战略腹地建设 [J].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4): 1-20.
- [10] 张可云. 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 [N]. 中国经济时报, 2024-10-09 (1).
- [11] 瞿商, 黄一栩. 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4-11-26 (4).
- [12] 汤继强. 中国式现代化与国家战略腹地建设 [J]. 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4 (2): 3-25.

- [13] 陈文元. 国家战略腹地建设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要素与实践维度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1): 53-62.
- [14]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2024 年 9 月 27 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5-6.
- [15]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民族出版社, 2023: 353.
- [16] 杜华君, 张继焦. 从文旅融合发展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双重进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依循及实践指向 [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3): 45-57.
- [17] 潘岳.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J]. 中国民族, 2023 (5): 4-7.
- [18] 郝亚明, 秦玉莹.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协同推进逻辑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2): 37-44+182-183.
- [19] 习近平.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J]. 求是, 2024 (3): 4-8.
- [20] 王延中.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J]. 贵州民族研究, 2024 (6): 1-8.
- [21] 潘岳.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与实践 [J].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 2024 (5): 5-17.
- [22] 林华山, 龚静阳, 刘涓菡. 多维团结: 面向强国目标的统一战线历史方位与发展形态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4): 12-25.
-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5 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522.
-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 5 卷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391.
- [25] 罗平汉, 何蓬.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56—1965)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0: 353.
- [26] 马泉山. 新中国工业经济史 (1966—1978) [M].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8: 249.
- [27] 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21: 95.
- [28] 马洪, 孙尚清. 现代中国经济大事典: 第 2 卷 [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3: 1582.
- [29] 当代中国研究所. 新中国 70 年 [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9: 104-105.
- [30] 陈夕. 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 [M]. 北京: 中央党史出版社, 2014: 9.
- [31] 陈伟雄, 杨婷.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 70 年演进的历程及其走向 [J]. 区域经济评论, 2019 (5): 28-38.
- [32] 高永久, 冯辉.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共同”意涵与建设要求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6): 56-69.
- [33] 李现曾. 深刻把握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的丰富内涵与重大意义 [J]. 红旗文稿, 2024 (24): 29-32.
- [34] 中央统战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研究体系建设的意见》 [J]. 中国民族, 2023 (2): 4-5.
- [35] 林华山. 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基本概念、理论基础与学科体系 [J/OL].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11 [2025-04-30].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0.1023.c.20250429.1255.002.html>.
- [36] 陈华森, 鄢英.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空间嵌入——以云南和贵州为中心的探索 [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5): 56-69.

责任编辑: 王京菁 校对: 龚静阳



论民营经济促进立法中的平等保护原则

刘绍宇 闫海

(浙江大学 光华法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08)

摘要: 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民营经济进行平等保护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将平等保护原则贯穿始终。民营经济的发展史是对民营经济进行平等保护的立法史。民营经济领域平等保护原则的演变脉络伴随民营经济的产生和壮大, 经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理念到实践、从规范保障到促进发展的渐进式过程。根据《民营经济促进法》规定, 从法理的角度来看, 并结合我国基本国情, 民营经济领域平等保护原则涵盖形式平等保护、实质平等保护、个别平等保护三个方面的内容。全面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 要将其纳入法治轨道上推进, 通过立法贯彻平等保护原则的理念精神、执法落实平等保护原则的内容要求和司法保障平等保护原则的合法权益, 以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为民营经济平等保护的守法工作奠定相应的基础, 实现法治建设全过程对民营经济的平等保护。

关键词: 民营经济; 平等保护原则; 民营经济组织; 民营经济促进法

中图分类号: D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5) 03-0043-13

一、问题的提出

2025年4月30日,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以下简称《民营经济促进法》), 该法于2025年5月20日正式生效施行。

DOI: 10.13946/j.cnki.jcqi.2025.03.004

作者简介: 刘绍宇,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 闫海,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浙江省法学会重点课题“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法治保障研究”(2024NA01); 浙江立法研究院(浙江大学立法研究院)智库专项一般项目“《数字经济促进法》立法建议研究”(YB202402)

引用格式: 刘绍宇, 闫海. 论民营经济促进立法中的平等保护原则 [J]. 2025 (3): 43-55.

法律原则是任何一部法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法律的实施而言至关重要。平等保护原则对民营经济促进立法发挥了关键作用。平等保护原则是我国民营经济促进立法的核心原则，而《民营经济促进法》本身便是通过立法的形式推动市场主体平等保护法治环境的建构。在该法中，“平等”的表述共计出现 10 次，“平等对待”的表述出现 4 次，充分体现了平等保护原则的核心地位。这体现出通过法律实现民营经济平等保护的重要性。

在民营经济促进立法工作的推进过程中，平等保护原则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探讨。作为一项对民营经济促进立法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法律原则，一些学者从立法理念、功能定位、实施范围等视角开展相应的研究。在立法理念上，蒋悟真提出通过在立法过程中贯彻合法权益保护和公平发展的理念来实现对民营经济组织的平等保护^[1]。陈云良认为民营经济促进立法重点在于对民营经济的平等保护而非特殊保护^[2]。李建伟认为《民营经济促进法》在立法过程中应注重贯彻实质平等的理念，建立相应的制度机制予以保障^[3]。在功能定位上，于文豪阐释了民营经济平等发展和保护的宪法逻辑^[4]。刘俊海将平等保护原则作为民营经济立法的六项核心原则之一，认为其应当融入《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总则和分则中^[5]。张珺皓认为需要通过坚持平等对待原则来实现公私之间的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6]。王轶从平等原则入手，强调其不仅是立法准则，也是执法准则和司法准则^[7]。在实施范围上，王利明认为需要建立以平等保护原则为核心的产权保护制度，从市场准入、经营保障、市场监管和权益保护等方面强化对民营企业财产权的保护^[8]。此外，印波^[9]、刘雅玲^[10]、何燕华^[11]认为要对民营经济产权落实刑法平等保护。黄卫指出鉴于在某些税收优惠的实施上对民营企业区别对待，税法领域也应当是民营经济平等保护的重点内容^[12]。总体来看，现有的研究多注重从立法的角度来分析平等保护原则在整个民营经济促进立法当中的功能作用和实施范围。对平等保护原则的演变脉络、法理内涵、实现路径等重大问题，学界尚付之阙如。

平等保护原则不仅对如何立法具有基础性的指引意义，而且在法律的实施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本文在学界现有研究基础上探讨了《民营经济促进法》中的平等保护原则，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了对民营经济进行平等保护的演变脉络，从法理的角度解读该法中平等保护原则的内涵，从实践的角度探讨平等保护原则在立法、执法、司法过程中的实现路径，希冀为《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的相关立法工作提供相应的理论参考，也为实践中对民营经济进行平等保护的执法和司法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民营经济领域平等保护原则的演变脉络

我国民营经济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而发展起来的，现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民营经济领域平等保护原则的演变脉络伴随民营经济的产生和壮大，经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理念到实践、从规范保障到促进发展的渐进式过程。可以说，民营经济的发展史是对民营经济进行平等保护的立法史。

（一）1978—1991 年：确认民营经济的法律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民营经济曾短暂存在，之后便通过“一化三改造”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形成了以“一大二公”为代表的单一公有制经济。这一形态持续到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提出“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必要补充”的论断，为实行改革开放提供了准备。此举为民营经济的产生提供了政策指引，也拉开了民营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序幕。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指出“国营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13]。次年，1982年宪法颁布施行，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自此，我国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认了个体经济的法律地位。1988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增加了“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的内容。私营经济获得了法律上的承认，并允许其发展且受到合法的保护。这一阶段民营经济刚刚起步，在一定程度上营造了有利于其发展的法治环境。

（二）1992—2011年：保护民营经济的立法发展

尽管宪法已确立民营经济的法律地位，并提出要对其进行保障，但囿于宪法的抽象性，其很难在实践中具体适用。因此，需要其他法律法规对这些内容进行细化，方能建立起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并运用到立法、执法、司法等过程中，进而为民营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中央的政策导向为立法工作指明了方向，在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党的十四大报告首次提出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14]、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5]、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两个毫不动摇”^[16]、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17]等多方面的政策指引下，众多保护民营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有少数规范中蕴含了平等保护的理念。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以下简称《中小企业促进法》）出台，规定国家有义务为中小企业创立和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以扶持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2004年，宪法进行修改，明确提出“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200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首次明确规定对私有财产给予与公有财产同等的法律保护。2008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统一了内资和外资企业的所得税，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央和地方政府及部门在宪法和法律设定的立法权限内通过制定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这些法律再进行细化，并予以执行。此外，政府还通过各种改革，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平等保护创造有利条件。例如，2005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采取了放宽市场准入、加大财税金融支持等措施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三）2012年至今：全面落实民营经济的平等保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经济的作用举足轻重，市场主体平等保护则是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类市场主体最期盼的是平等法律保护。”^[18]市场主体平等保护最早出现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明确指出：“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19]。这表示产权

平等保护不因所有制的不同而对各经济主体实行差异化对待^[20]，并对民营经济领域平等保护的内容作出了明确的要求，也为其实施提供了方向。2014 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清理有违公平的法律法规条款。”^[21]这明确指出要通过法治手段来实现对民营经济的平等保护。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22]。这表明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国家对民营经济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高。2022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3]。在此指导下，“放管服”改革、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法治政府建设、强化检察诉讼监督等工作不断推进，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更高水平的平等保护，激发其内在的潜力和活力。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民营经济的发展成果显著。截至 2024 年 9 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数量超过 5 500 万户，在企业总量中的占比稳定在 92.3%，预计未来将有更大的发展^[24]。

通过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民营经济不仅需要法律的确认，还有赖于平等保护下的市场环境。民营经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变得越来越重要，是助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体现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新时代对民营经济进行保护的原创性贡献，贯彻了“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的理念。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平等保护的范围和标准也需要不断调整与完善，以适应新的经济环境和市场需求。

三、民营经济领域平等保护原则的法理阐释

在民营经济领域，平等保护的实践已经有了很多做法。但若要对民营经济进行充分的平等保护，需要从法理的角度准确理解《民营经济促进法》中平等保护原则的内涵。同时，这也是民营经济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前提条件。根据《民营经济促进法》规定，从法理的角度来看，并结合我国基本国情，民营经济领域平等保护原则涵盖形式平等保护、实质平等保护、个别平等保护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形式平等保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作为规范性概念的平等要求和平等主张，首先是一种形式平等，体现形式正义。”^[25]《民营经济促进法》第 3 条第 3 款对此有对应的规定，即“国家坚持平等对待、公平竞争、同等保护、共同发展的原则，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民营经济组织与其他各类经济组织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市场机会和发展权利。”从法解释学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可以明显发现其蕴含两个层面的内容。

一是规则平等，即国家平等对待民营经济组织，并对其进行平等保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写入了宪法、党章，这是不会变的，也是不能变的。”^[26]《民营经济促进法》的立法工作深入贯彻了党领导立法的原则，也是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第 1 条规定的“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生动体现。同时，这也需要在执法、司法、守法等方面贯彻平等对待民营经济组织并对其进行平等保护的要求，体现了法律规则的平等适用。

二是法律地位平等和权利平等，即民营经济组织与其他各类经济组织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并

在此基础上享有平等的权利。平等的法律地位是民营经济组织在市场经济中生存和发展的有力保障,也是其追求市场机会和不断发展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法律确认其有平等的法律地位本质上就是平等保护的一种体现。同时,权利平等不仅涵盖营业自由、产权处分等生产经营领域的权利平等,还包括对行政处罚、刑事司法等方面进行救济的权利平等。除了与其他经济组织之间的平等外,此部分的平等还涵盖民营经济组织内部之间的平等,即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由中国公民控股或者实际控制的营利法人、非法人组织和个体工商户,以及前述组织控股或者实际控制的营利法人、非法人组织之间内部的平等。

(二) 实质平等保护: 同等情况同等对待

从概念上来讲,实质平等保护与形式平等保护相对应。不同于形式平等保护的抽象性,实质平等保护则是具体到哪一范围领域以及何种情况下的平等保护,即同等情况同等对待。根据《民营经济促进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民营经济领域实质平等保护的较为广泛,主要集中在公平竞争、投资融资、科技创新、法律责任等方面。

首先,公平竞争是实质平等保护最为核心的要素。公平竞争制度不仅是维持市场经济秩序的基础,还是提高市场运行效率和资源有效配置的保障^[27]。之所以在民营经济领域特别强调公平竞争,则是因为在实践中民营经济组织遭受不合理不公平的待遇时有发生,如部分市场准入门槛过高、不合理地设置优先采购企业名录等。为了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民营经济促进法》建立了多种多样的制度机制,以保障民营经济组织享有广泛的平等权利,如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第10条)、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第11条)、平等使用各种生产要素和公共服务的政策(第12条)、制定平等对待民营经济组织的政策(第13条)、公平资源交易(第14条)、禁止非法使用行政权力干预民营经济活动(第15条),等等。

其次,投资融资是民营经济组织发展壮大的支撑力量。囿于抗风险能力差、多数民营经济组织的经济体量小等不利因素的影响,民营经济组织的投资融资一直以来是个“老大难”问题。《民营经济促进法》专门设置了第3章“投资融资促进”,为民营经济组织与其他经济组织在投资融资领域的平等对待保驾护航。在具体内容上,该章使用了11个“支持”,特别突出了对民营经济组织在投资融资领域平等保护的重视。在投资领域,支持参与国家项目工程(第16、17条)、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第18条),并为其提供便利的投资服务(第19条)。在融资领域,建立健全尽职免责机制(第20条)、提供便利的融资服务(第21条)、构建融资风险的市场化分担机制(第22条)、引导金融机构完善针对民营经济组织融资的制度体系(第23、24、25、26条)。在此方面,还需注重落实平等这一理念,切实解决民营经济组织“融资难”“融资贵”的现实难题,以避免出现歧视的情况。

再次,科技创新是民营经济组织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面对公平且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民营经济组织若不进行持续的科技创新,很快就会处于不利地位。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经济组织不仅是科技创新的重要推动者,也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在实践中民营经济组织面临研发能力较弱、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高端人才稀缺、国际竞争加剧等难题,制约了其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关键作用。为了平等保护并促进民营经济组织的科技创新,《民营经济促进法》专门设置了第4章“科技创新”,采用支持和鼓励的方式,引导民营经济组织

参与国家项目的研发（第 27、28 条）、参与数字技术的研发和数据资源的利用（第 29 条）、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第 31 条）、培养专门人才队伍（第 32 条）等，并且保障其参与相关标准制定的工作（第 30 条）。此外，加强对科技创新的保护工作，并提供维权援助、风险预警等服务促进矛盾纠纷的及时解决（第 33 条）。这将党中央、国务院支持民营经济进行科技创新的政策通过构建相应的制度框架嵌入到法律当中，使之更具有稳定性，也更容易得到落实^[28]。

最后，完善的法律责任体系是维护民营经济组织稳步发展的必要条件。民营经济平等保护的落实涉及政府、企业、个人等多方主体。因此，需要合理划分各方主体的法律责任，民营经济活动方能有序地发展。按照责任内容的不同，法律责任可分为第一性义务的法律责任和第二性义务的法律责任^[29]。第一性义务的法律责任是指法定的以及合法约定的义务。第二性义务的法律责任是指行为主体违反第一性义务而产生的新的特定义务。对于各主体的第一性法律责任，《民营经济促进法》第 5 章“规范经营”、第 6 章“服务保障”、第 7 章“权益保护”作了相对清晰的规定。对于各主体的第二性法律责任，《民营经济促进法》第 8 章“法律责任”建立了以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为主体的法律责任体系。此种双重责任体系既明确了政府、企业、个人等主体在维护民营经济组织平等保护领域的责任，又设定了违反此种责任需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起到了双重保障的作用。

实质平等保护注重通过同等条件同等对待的方式，实现公平竞争、投资融资、科技创新、法律责任等方面的平等对待，维护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保障民营经济组织在市场经济中的机会平等。

（三）个别平等保护：特殊情况特殊对待

我国通过形式平等保护和实质平等保护，营造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实现了对民营经济组织的平等保护。但因国有经济的特殊使命、信息不对称、政府失灵等因素的影响，若处理不当，极有可能产生危及国家安全、市场失灵、社会动荡等不利情况。因此，需要正确处理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赋予市场主体一定的社会义务，使综合效益最优化，进而推动高质量发展。

第一，民营经济组织与其他类型经济主体之间的差别保护。在公有制经济中，国有经济是主导力量，在能源、交通、通信、金融等关乎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和行业中占有主导地位。为了国家安全及社会经济稳定，国有企业和民营经济组织在一些特殊领域有所差别。例如，在市场准入领域，民营经济组织仅能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而国有企业除此之外可以参与军事设施、烟草、能源等关键领域；在社会责任方面，国有企业因受到国家管控而需要承担科技创新、环境保护、慈善事业等方面的社会责任，而民营企业则以追求利润为中心，其社会责任以自愿履行为主，国家进行倡导鼓励，但却不会强制；等等。但这本身并不会导致国有企业的特殊对待和国有企业与民营经济组织之间平等保护的对立。从总体来看，国有企业仅在有关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具有独特的法律地位，通常是以特许经营的形式存在。除此之外，在其他行业中，国有企业和民营经济组织处于同一法律地位，公平竞争。此外，国家根据情况的变化，通过制定特定行业特许经营的具体方法，在保障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同时，不断扩大民营经济组织的活动范围。

第二，民营经济组织内部之间的差别保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民营经济组织之间的差距

不断拉大, 有的甚至还在社会治理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 为了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社会公共利益, 需要在合理的范围内对部分事项作出调整。例如, 《中小企业促进法》第 11、12 条为了扶持小微企业的发展, 给予其相对优惠的财税政策, 而其他民营经济组织则不享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58 条规定仅有达到一定标准的个人信息处理者 (多为大型互联网企业) 需要建立健全个人信息保护企业合规、制定平台规则等特殊法律义务; 等等。未来, 还要适时减轻中小企业的税费负担, 鼓励科技创新, 以提高市场经济的活力。这些情况之所以出现并得到法律层面的确认, 是为了满足避免市场失灵、减少社会治理成本等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 在实施效果上起到了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作用。

此外, 还要避免不合理的差别禁止。作为一种特殊情况, 个别平等保护是为了在形式平等保护和实质平等保护均不能够起到对民营经济组织进行平等保护的领域范围内起到补充的作用。有了特别情况的个别平等保护, 必然需要一般情况下的差别禁止。划定二者的范围边界需要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的理念, 在保障国家安全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基础上, 最大限度保障民营经济组织的经营自由权, 并综合考虑对现有及未来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影响, 运用比例原则进行权衡, 废除对民营经济组织进行不合理限制的规定, 注重消除隐形壁垒, 并动态调整二者的范围边界。

形式平等保护是实质平等保护、个别平等保护的前提和基础。实质平等保护为形式平等保护的落实提供了明确的内容和方式, 而个别平等则从整体的角度注重对市场经济进行合理的调整, 以防止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由此, 这形成了对民营经济组织完备的平等保护体系, 不仅为民营经济组织的权利平等和规则平等的实现奠定了规范基础和实践指引, 并且还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民营经济领域平等保护原则的实现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把平等保护贯彻到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个环节, 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产权和合法权益。”^[30] 这表明了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民营经济的平等保护工作。守法是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前提, 立法、执法和司法同时又为守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一定程度上, 立法、执法和司法的质量决定了守法的质量。可以说, 民营经济领域平等保护原则的实现关键在于立法、执法和司法。在实现路径上, 需要立法贯彻平等保护原则的理念精神, 执法落实平等保护原则的内容要求, 司法保障平等保护原则的合法权益。

(一) 立法贯彻平等保护原则的理念精神

“良法”是实现“善治”的开端。立法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法律的实施效果。民营经济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 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必然会对民营经济的立法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平等保护原则自然也是其中的关键之处。因此, 要注重立法内容体现平等保护原则、完善备案审查制度、优化法律实施效果评估制度, 全面提高立改废释的工作质量, 以实现民营经济领域平等保护的“善治”。

1. 立法内容体现平等保护原则

作为民营经济领域立法的典型范例, 《民营经济促进法》内容全方位体现了平等保护原则, 并

且对市场准入、公共资源交易、权益保护等方面进行细化规定，落实对民营经济组织的平等保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小企业促进法》等法律也体现了对民营经济组织的平等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二）》通过对第 165、166、169 条的修改，将规制对象由国有公司、企业的相关人员拓展到民营企业内部关键岗位人员，补足了对民营经济组织进行刑法平等保护的关键一环。此外，由于我国法律规范体系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多种形式的规范组成，在立法内容体现平等保护原则上要重视以下三点。

第一，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原则，制定科学合理、符合民意的法律、行政法规等，以提高立法质量。立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立法内容才能反映人民意愿、得到人民拥护，更容易在实践中施行。因此，要进行开门立法，广泛征求意见，尤其是关于现实中不平等对待的情况，进行调研分析，提高立法的针对性。同时，及时将有关的政策转化为相应的法律。比如，将现阶段有关对民营经济进行保护的政策中提到的“规则平等、机会平等和权利平等”“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等方面的要求转化为相应的法律，夯实对民营经济组织进行平等保护的规范基础。

第二，根据地方实际，依照上位法的规定，制定符合本地区发展现状的地方性立法，以实现对民营经济组织的平等保护。法律若要保障其实效，必须具有可操作性。这一点对于地方立法尤为重要。由于地方发展不均衡等因素的影响，因地制宜，制定符合本地区发展的地方立法才能起到更好的效果。鉴于当前有的地方立法存在立法形式主义倾向、重复立法等问题，则需要坚持“少而精”“小快灵”的立法理念，围绕地方立法的时机、程度和成效，实现“慎立法、立良法”的目的，切实有利于落实民营经济组织在地方上的平等保护^[31]。

第三，根据技术迭代、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等情况，及时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调整，并注重对新兴领域民营经济活动的包容审慎监管。例如，因为电子商务的出现，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平等对待线上线下商务活动；因为疫情影响，出台减税降费的规范性文件；等等。此外，在新兴领域，民营经济组织不仅是该领域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推动力量，还是国际经济竞争中的主要力量。以人工智能产业为例，为了保护我国民营企业的竞争力，应当对该行业的监管坚持包容审慎的原则，并将其落实到立法层面。

2. 完善备案审查制度

有关民营经济平等保护的法律规范体系涉及方方面面，是一个“庞然大物”。若其法制得不到统一，便会产生法律冲突、法律适用等方面的难题。为了维护法制统一，我国建立了诸多制度机制。备案审查就是其中之一，并且其发挥着维护法律监督统一的独特作用。在具体实施上，要以合宪性、政治性、合法性、适当性作为重点，从法律、政治和理性三个维度，实现对审查内容的全面覆盖^[32]。在此方面，可将平等保护原则作为审查的重点内容，强化对下位法的审查。同时，还要注重体系化的审查，合理运用比例原则，从整体的角度来把握。备案审查制度自推行以来，不断进行完善，发挥促进法制统一的作用。例如，2024 年备案审查报告对违反上位法规定，不合理增加企业负担的地方性法规进行审查，法工委提出意见并沟通制定机关尽快修改^[33]。必要时可以采取联合审查的机制，推动共性问题的一站式解决。若经审查发现存有问题，应当及时与制定机关沟通交流，督促制定机关修改或废止，以此来维护有关民营经济平等保护的法律规范体系内部的法制统一。

3. 优化法律实施效果评估制度

法律实施效果评估制度是开展“立法回头看”的主要方式,对评价和提高立法质量有着重大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法律实施效果评估制度不仅对法律实施情况有监督作用,还为法律的新立、修改、废止、解释等工作提供科学客观材料。优化法律实施效果评估制度的关键在于抓住评估主体、评估程序、评估内容这三个重要因素。首先,评估主体自然是以立法机关牵头组织。由于法律实施的效果涉及立法效果、执法效果、司法效果、民众满意程度等方面,必要时可邀请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公众等主体参与其中,提高法律实施评估的准确性。其次,评估程序要建立健全一套从头到尾涵盖评估要点的确定、评估资料的收集、评估情况的分析与建议、评估反馈等流程的程序体系。最后,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根据立法目的、立法的预期效果、法律适用难题为重点,建立相应的评估内容,避免“大而不当”的评估倾向。同时,在整个过程中,可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应用其中,便于信息交流、资源共享等工作,提高工作的质效。

(二) 执法落实平等保护原则的内容要求

执法作为对民营经济组织进行平等保护的第一线工作,直接关系到民营经济乃至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此,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34]。政府作为执法机构既要积极落实平等保护原则,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还要恪守必要的限度,防止过度干预、权力寻租等情况的出现,以免对民营经济组织的平等保护造成不利影响。在具体内容上,主要涵盖以下三个方面。

1.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就提出新型政商关系这一理念,并指明其应当具有“亲”“清”两个方面的要求^[35]。2023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明确提出:“全面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使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36]对于政府而言,要坚持平等对待,明晰“清”的边界,推动“亲而有度”的政商关系构建。具体来讲,政府要坚持平等对待民营经济组织,积极作为,靠前提供政府服务,而且要守住“清”的边界,依据政策标准、法律标准进行。同时,政府还要加强廉政建设,守住底线,远离红线,积极服务民营企业组织的发展,打造“清而有为”的服务型政府品牌,以廉洁政府建设推动营商环境法治化水平的提高,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对民营经济组织的平等保护。其关键在于加强服务为民的政风建设,形成平等保护的行政文化,即对国有企业和民营经济组织一视同仁。

2. 规范异地执法行为

根据法律原则,执法活动通常受到地域管辖的限制。由于现有的法律法规未能对异地执法行为进行有效的规范,致使在实践中出现以“远洋捕捞”为代表的逐利性异地执法。《民营经济促进法》在第64条第1款要求异地执法应当遵守法定权限、条件和程序,并对案件管辖权的归属问题给出了解决方案。同时,《民营经济促进法》第72条规定,违法实施异地行政执法行为的,还要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此外,《民营经济促进法》第64条第1款提出要建立健全异地行政执法协助制度。这不仅可以有效防止异地执法行为异化,同时还减少了行政执法的成本。为了更好地规范异地执法行为,应当建立以进行异地行政执法协助为原则,以自身进行异地执法为例外的机制。在此基础上,还要说明自身单独进行异地执法的理由,涉及行政执法的,报送司法行政机关进行事后审查;涉及刑事侦查的,报送检察机关进行事后审查。这样可以从源头减少逐利性异地执法的产生,还可以起

到司法行政机关和检察机关对相关执法行为的监督作用，从而及时有效救济民营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

3. 统一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囿于现实情况复杂多样，法律的规定不可能尽善尽美，政府在确定行政处罚时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近年来，“小过重罚”的事件偶有出现。此类情况严重违背了民营经济领域平等保护原则的精神，也与宪法对市场经济的保护相冲突。“宪法上的市场经济的意义在于，它既是对市场手段合法性的确认，同时也是对政府权力的直接约束。”^[37] 这要求政府在履行行政职能时需要在法定权限、程序和要求下进行。因此，需要制定相应的规范性文件对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进行统一。2022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指出，要坚持法制统一、程序公正、公平合理、高效便民的原则，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规范性文件，以统一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同时，这也是《民营经济促进法》第 51 条规定并需要在实践中进行细化的内容。除此之外，目前推行的“首违不罚”“轻微违法行为不罚”“主观无过错不罚”等制度起到了警示作用，也避免了对民营经济组织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不必要的干扰。

（三）司法保障平等保护原则的合法权益

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同时，司法也是保障平等保护原则下民营经济组织合法权益的最后一道防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38] 这要求司法工作做到公正高效办理司法案件、及时执行生效法律文书、强化检察诉讼监督工作，以保障平等保护原则下民营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

1. 公正高效办理司法案件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24 年全国各级法院收案 4 601.8 万件，同比增长 1%，预计未来还会有很大的增长^[39]。因此，保障司法公正和效率是当前司法工作的重点难题。为了保障司法公正，要不偏不倚保护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尤其是民营经济组织和国有企业之间的案件。在具体实施上，要充分发挥案例指导制度的作用。如最高法发布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的 11 个典型案例，涉及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纠纷、民营企业名誉权等多个方面，对全国司法裁判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40]。其中，宁波东钱湖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宁波东钱湖文旅景区管理有限公司诉宁波巨大商业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大公司”）合同纠纷案影响力颇广。该案例中巨大公司是一家民营企业，另外两家公司则为国有企业，因两家国有企业不遵守合同约定且欲加重巨大公司的合同义务，转移经营风险，双方诉至法院。该案审理法院坚持平等保护的司法理念，依法准确认定违约责任，判决由这两家国有企业担责。此案是各类所有制经济平等保护的典型范例，对全国范围内民营经济组织与其他经济组织之间的案件审理起到了标杆性的示范作用。

此外，还要完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降低司法资源的压力，并将技术应用到办案的全过程中，提高案件办理的效率，及时将对民营经济组织的平等保护落到实处。一方面，持续完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特别是注重调解、仲裁等与民营经济纠纷解决密切的制度，发挥其“分流阀”的作用，缓解司法资源在“质”和“量”两个方面的压力。另一方面，对案件进行繁简分流，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入案件办理过程中，提高办理案件的效率。随着科技的进步，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智能技术的更新迭代为构建智能时代全流程、全场景与集约化的诉讼服务新模式提供了可能。

2022年,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规范和加强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意见》进一步加快了这一进程, 并确定了在审判工作方面坚持法官主导, 人工智能技术辅助参与的模式, 以在维护公平正义的同时提高办案效率。人工智能的应用是建立在算法基础上的, 人工智能司法本质上就是算法司法。要建立以算法为中心的治理模式, 不断优化算法的训练数据、运算模型和输出结果, 维护司法公平正义, 以高效保护民营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

2. 及时执行生效法律文书

长期以来, 执行难是司法领域的一个“顽疾”。同时, 执行难还要与“执行不能”区分开来^[41]。“执行不能”是指因被执行人履行能力不足、涉案财产尚未区分认定等原因导致难以执行或无法执行的情况, 需要理性看待。具体而言, 由法院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因诉讼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对于此类法律文书的执行难, 可以通过正在推进的审执分离改革, 采取建立稳定且充足的人财物配备制度、持续推进执法信息化建设、加强审执衔接工作等方式, 提高执行的效率。另一类则是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非诉行政行为等非诉法律文书。而此类法律文书执行难不仅在于执行, 还在于审查。除了采取以上措施外, 法院还要对该类法律文书进行审查后, 才能视情况依法予以执行。尤其是对于非诉行政行为而言, 要通过审查促使政府依法行政, 避免“小过重罚”情况的出现。同时, 法院不能越俎代庖, 要尊重政府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将以“重大且明显违法”作为裁定不予执行的审查标准^[42]。

3. 强化诉讼检察监督工作

我国宪法将检察机关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经过长时间的发展, “法律监督”在诉讼层面具体化, 逐步形成了以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刑事检察、公益诉讼检察的“四大检察”新格局^[43]。《民营经济促进法》第66条强调检察机关对涉及民营经济组织及其经营者的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 维护其合法权益。一方面要保持刑法的谦抑性, 厘清行政违法和刑事司法之间的界限, 另一方面要严格细化刑法介入民营经济的条件, 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新兴领域, 突出行政法先行规制的地位。此外, 还要完善行刑反向衔接过程中的检察监督工作。检察机关因具有检察监督的职能在行刑衔接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44]。对于不构成犯罪的处理, 检察机关应当移送给具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处理, 并且扮演外部监督的角色, 保障相关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同时, 在民事诉讼中, 检察机关可通过抗诉、检察建议等方式, 纠正民事诉讼和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错误, 及时维护民营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

立法、执法和司法为民营经济领域平等保护原则的守法工作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而守法工作的深入又反过来促进立法、执法和司法工作的开展, 并减少相应的治理成本。这种良性循环形成了对民营经济组织进行平等保护的完整法治保障体系。

五、结语

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 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 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在我国既有法律、政策已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了必需的制度环境的情况下, 《民营经济促进法》被形塑

为政策基准法，这既非徒劳之举，亦非制度供给过剩；相反，这种立法体例可以达成该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独特功能^[45]。为了更好地落实民营经济的平等保护，建议制定配套的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切实将民营经济的平等保护落到实处。同时，需要将平等保护原则贯彻落实在执法、司法、守法等法治过程中，并注重法治宣传的引导作用，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

参考文献：

- [1] 蒋悟真. 民营经济促进法立法理念及其制度实现 [J]. 东方法学, 2024 (6): 28-40.
- [2] 陈云良. 民营经济专门立法的理据、定位及体系表达 [J].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3): 247-260+288.
- [3] 李建伟. 民营经济促进法中实质平等理念的立法表达 [J]. 法治研究, 2025 (1): 33-45.
- [4] 于文豪. 民营经济平等发展的内涵与制度体系 [J].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23 (6): 37-52.
- [5] 刘俊海. 论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六项核心原则 [J]. 法治研究, 2025 (1): 59-76.
- [6] 张珺皓. 论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域外镜鉴与中国探索 [J].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 2025 (2): 96-108.
- [7] 王轶. 民营经济促进法的立法原则 [J].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3): 240-246+287-288.
- [8] 王利明. 论平等保护民营企业产权 [J]. 上海政法学院学报 (法治论丛), 2023 (3): 1-17.
- [9] 印波. 民营企业产权的刑法平等保护——以《刑法修正案(十二)》为分析重点 [J]. 法学杂志, 2024 (3): 20-38.
- [10] 刘雅玲. 依法平等保护原则指导下对民营经济的刑法保障 [J]. 法学, 2023 (1): 95-107.
- [11] 何燕华, 张睿琳. 民营经济的刑法保护: 规范演进、现实问题与完善路径 [J]. 吉首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5 (1): 105-115.
- [12] 黄卫. 民营经济税法平等保护的制度内涵及其体系化建构 [J]. 南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6): 69-80.
-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 上 [G].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7: 384.
-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G].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19.
-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G].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22.
- [16] 胡锦涛文选: 第 2 卷 [G].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528.
-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G].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0.
- [18] 习近平. 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254.
- [19]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N]. 人民日报, 2013-11-16 (1).
- [20] 罗昆. 中国合同法上的产权平等保护 [J]. 法学研究, 2024 (6): 3-20.
- [21]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N]. 人民日报, 2014-10-29 (1).
- [22]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 年 10 月 18 日) [N]. 人民日报, 2017-10-28 (1).
- [23]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

刘绍宇, 闫海. 论民营经济促进立法中的平等保护原则 [J]. 2025 (3): 43-55.

- 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 年 10 月 16 日) [N]. 人民日报, 2022-10-26 (1).
- [24] 刘坤.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N]. 光明日报, 2024-12-15 (1).
- [25] 王元亮. 平等的学理基础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131.
- [26] 习近平. 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8 年 11 月 1 日) [N]. 人民日报, 2018-11-02 (2).
- [27] 刘戒骄, 刘冰冰, 翟羽佳.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长效制度分析 [J]. 天津社会科学, 2024 (6): 133-142+176.
- [28] 赵树文. 民营经济促进法的立法建构——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 (草案征求意见稿)》 [J]. 学术论坛, 2024 (6): 1-20.
- [29] 张文显. 法理学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165-166.
- [30]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强调 完善法治建设规划提高立法工作质量效率 为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工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出席 [N]. 人民日报, 2019-02-26 (1).
- [31] 沈国明. 论提高地方立法质量的路径与方法 [J]. 地方立法研究, 2024 (6): 32-48.
- [32] 林来梵, 赵逸伦. 论备案审查内容与标准的体系化 [J]. 浙江社会科学, 2024 (8): 51-62+157.
- [33] 蒲晓磊. 公布多起案例回应社会关切 [N]. 法治日报, 2024-12-23 (2).
- [34]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李强作总结讲话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N]. 人民日报, 2024-12-13 (1).
- [35] 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建工商联委员时强调 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 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J]. 中国纪检监察, 2016 (5): 4.
- [36]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 (2023 年 7 月 14 日) [N]. 人民日报, 2023-07-20 (1).
- [37] 韩大元. 中国宪法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范结构 [J]. 中国法学, 2019 (2): 5-26.
- [38] 习近平. 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22.
- [39] 张军.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二〇二五年三月八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N]. 人民日报, 2025-03-16 (2).
- [40] 孙航, 余亚如. 坚持能动司法 依法平等保护 最高法发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典型案例 [N]. 人民法院报, 2023-08-01 (1).
- [41] 张甲天. 新时代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问题的调研报告 [J]. 中国应用法学, 2024 (4): 105-114.
- [42] 王青斌. 论行政非诉执行案件的司法审查标准 [J].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9): 45-59.
- [43] 王海军. “法律监督”概念内涵的中国流变 [J]. 法学家, 2022 (1): 1-14+191.
- [44] 刘艺. 检察机关在行刑反向衔接监督机制中的作用与职责 [J].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24 (2): 18-38.
- [45] 卢丹韵, 靳文辉. 《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政策基准法定位 [J/OL].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15 [2025-05-19].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0.1023.C.20250512.0941.002.html>.

责任编辑: 卢媛 校对: 林华山



“DeepSeek 时刻”： 从技术开源到技术正义的政治学分析

曹克亮

（中国计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DeepSeek 时刻”预示着人工智能发展的特殊节点。一方面，它破除了人们一味地对“大力出奇迹”的算力幻想；另一方面，它引领了人工智能算法开源的崭新趋势。“DeepSeek 时刻”并非技术开源与技术闭源争论的起点，也不只是技术路径分歧和知识分享边界的争论，更折射出人类文明演进中反复出现的开放权与控制权的内在张力。从历史维度来看，它是技术民主化与精英垄断的周期性对抗；从现实维度来看，它是创新效率与风险控制的二律背反；从文化维度来看，它是认知方式与科技伦理的东西方分野；从政治维度来看，它是数字主权与数字殖民的量子化博弈。“DeepSeek 时刻”不应被刻意政治化和过度意识形态化，它不是新的“斯普特尼克时刻”。DeepSeek 的技术开源是推动人工智能和网络空间向着创新、安全、普惠发展的重要佐证。“DeepSeek 时刻”是推动技术正义分配走向全人类社会基本结构的重要时刻。“DeepSeek 时刻”的真正实质是从技术正义到公平正义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彰显。人工智能不应成为技术霸权、经济强权、政治威权的现实工具，而应该成为推动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坚实基础。

关键词：“DeepSeek 时刻”；人工智能政治；技术开源；技术正义；政治正义；全人类共同

DOI：10.13946/j.cnki.jcqis.2025.03.005

作者简介：曹克亮，中国计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中国计量大学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高校辅导员研究）“数字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研究”（22JDSZ3004）

引用格式：曹克亮，“DeepSeek 时刻”：从技术开源到技术正义的政治学分析[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3）：56-68.

曹克亮. “DeepSeek 时刻”：从技术开源到技术正义的政治学分析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3): 56-68.

价值

中图分类号: TP18;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5) 03-0056-13

一、问题的提出

2025年1月20日,“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在瑞士达沃斯-克洛斯特斯拉开帷幕。本次年会的主题为“智能时代的合作”,旨在聚焦如何重启增长,如何利用新技术增强社会和经济的韧性。“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董事会主席克劳斯·施瓦布表示:“世界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但2025年论坛年会将致力于发扬合作精神,秉承建设性的乐观主义态度,寻求以更可持续、更加包容的方式塑造即将到来的智能时代。”^[1]在与达沃斯相距万里之外的杭州滨江,中国人工智能公司 DeepSeek (深度求索) 同期发布 DeepSeek-R1 生成式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其一经发布便震惊了整个行业和全世界。DeepSeek 的惊艳登场堪称人工智能发展的“DeepSeek 时刻”。它不仅给人工智能行业和整个科技企业带来震动,也让以技术开源、“小力出奇迹”、降本增效、降耗增质的中国国产大模型“通过提质增效的方式锚定 AI 普惠‘新坐标’”^[2],对以美国政府科技“脱钩”、某些科技公司技术“断链”和资本“堆栈”方式为主导的人工智能发展模式进行深刻反思。这种反思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就人工智能开源和闭源的技术正义争论角度而言,开放合作研究和开源力量已经成为技术发展正义的普遍共识。二是就经济和社会的开放性正义发展角度而言,“这波创新浪潮将促进各企业探索具有成本效益的 AI 开发和部署方法,加速赋能千行百业”^[3],从而带来知识经济和智能社会发展的强大后劲与十足韧性。三是就政治正义角度而言,全人类共同价值中的技术和平、技术发展、技术公平、技术正义、技术民主、技术自由等问题必然受到更多重视。技术视角下的“DeepSeek 时刻”不是中美之间科技竞赛或政治博弈的产物,而是全人类对于科技发展和技术普惠带来更多发展价值和幸福获得感的坚定信念。这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占据道义制高点并在人工智能这一科技发展具体领域中的现实体现。

目前,国内有关 DeepSeek 的讨论和研究刚刚开始。2025年2月21日,“DeepSeek: 人工智能的中国时刻?”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从政治学视野来看,与会专家发表了深刻的观点和针对性的看法^[4]。鲁传颖教授认为:“DeepSeek 通过低成本和开源的方式,打破了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垄断,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陈忠教授指出:“人工智能(如 DeepSeek) 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是文明史背景下的必然结果,与中国复杂的城市结构、治理体系、知识传递方式等因素密切相关。”余南平教授认为:“DeepSeek 之于中国的意义在于,低成本、开源的人工智能技术特别适用于中国完整的产业链,通过开源模型的垂端与边缘应用的大规模开启,将使中国丰富的生产与生活场景得以通过人工智能而‘赋能加速’,同时 DeepSeek 之于世界的意义则是以开源为生态而可以形成‘人工智能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奇琦教授认为:“DeepSeek 的开源特性为中国带来了低成本、本地化部署的优势,推动了人工智能的普惠应用。”汪行福教授指出:“DeepSeek 推动了 AI 技术发展和扩散,有力挑战了美国的霸权。但当下我们处于全球治理崩溃、地缘冲突激化的有毒环境, AI 的积极潜能发挥和其社会风险的控制面临严峻和紧迫挑战。”吴冠军教授指出:“DeepSeek 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重要代表,其发展不仅推动了技术的进步,也引发了关于技术

奇点和技术封建主义的深刻讨论。”

另外，从已经网络首发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针对 DeepSeek 的研究领域和问题也比较广泛和深刻。一是从技术细节角度阐述 DeepSeek 在模型训练中的技术优化与创新。学者们提到“混合专家”（mixture of experts, MoE）模型和稀疏注意力（Native Sparse Attention, NSA）机制的算法价值。张慧敏指出：“MoE 模型架构中的稀疏激活机制和无损负载均衡策略显著提高了模型训练的效率 and 性能。”^[5]二是从生成式人工智能监管角度阐述监管的重点。有学者认为应“将隐私保护与数据安全、技术创新与保护平衡、模型提示与反馈机制、模型安全性作为监管重点”^[6]。三是从 AI 话语权角度阐述 DeepSeek 的技术优势、战略布局和生态图景。有学者认为“DeepSeek 凭借‘技术+生态’双重优势，有望引领开源大模型发展，重塑全球 AI 话语权格局，推动 AI 技术向更加开放、透明和普惠的方向演进”^[7]。四是从传播学视角阐述“DeepSeek 时刻”的根本逻辑。有学者认为“DeepSeek 时刻”是“推动 AI 成功跨越主流化鸿沟，全面迈向最为关键的第三阶段早期大众的突破”^[8]。

本文通过对人工智能技术文化与技术正义的历史维度、现实维度、文化维度、政治维度的分析，认为我国应本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战略，强调动态而平衡地对待数字主权和人工智能的开源和闭源问题，坚定而积极地发展自己的人工智能技术并参与全球人工智能安全和伦理治理。“DeepSeek 时刻”不应被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定义，它既不是也不同于“斯普特尼克时刻”^①。“DeepSeek 时刻”是人工智能开源的技术正义，是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安全发展、普惠发展的正确之路，为推动人工智能从技术正义到公平正义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价值转换与提升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DeepSeek 时刻”：人工智能技术开源与闭源的历史纷争与现实评价

人工智能发展的历史并非十分漫长。自 1956 年达特茅斯会议以来，人工智能的发展才算真正进入正式轨道。就人工智能研究的开源来说，人工智能研究一直主张开放和共享的开源模式，人工智能学术界也普遍推崇基于知识共享的开源精神和开放合作研究。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人工智能的开源研究是主流。然而，随着一些商业公司开始涉足该领域，才有了一些商业闭源的趋势。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专家系统的兴起，专家系统的逐步商业化导致更多闭源软件的出现。商业公司为了保护自身知识产权和商业利益，选择不公开源代码。20 世纪 90 年代，深度学习开始兴起，开源软件开始增多，并推动了深度学习研究的扩展，但是，商业公司仍然受到利益驱动，加强了闭源。2000 年之后，在人工智能开源力量的推动下，人工智能的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不断获得飞速进展。但是，很多商业公司的开源似乎是一种象征性的开源，它们只有在确保自身技术绝对领先和商业利益得到切实安全保护的前提下才“不情愿”地开源。在外部象征性开源和内部实质性闭源的交织状态下，人工智能发展现状显示出技术权力归属与知识共享边界、技术开放获取与利益持续获取的矛盾。2010 年以后，开源的理念、趋势虽然有所壮大，但是一些较为先进的人工智能公司只是开源了基础框架，仍旧保留核心算法和数据的闭源。这种开源是“半开源”或“非实质性开源”。

^① 1957 年 10 月 4 日，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 1 号（Sputnik 1，意为“旅行者 1 号”），这一时刻被称为“斯普特尼克时刻”（Sputnik Moment）。

曹克亮. “DeepSeek 时刻”：从技术开源到技术正义的政治学分析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3): 56-68.

在人工智能开源派看来，人工智能开源能够促进人类知识的共享以及知识边界的扩展，从而依靠全人类的智慧力量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进步，避免少数精英和最先进科技公司垄断 AI 技术。在人工智能闭源派看来，人工智能闭源能够保护原始创新和知识产权不受侵犯，从而激励人工智能公司投入更多人力、物力、财力、智力等资源进行研发和创新突破，同时能够防止因技术不成熟导致的技术滥用风险，防止 AI 失控。二者各执一词，在现实策略上各自为政。

表 1 人工智能领域主要开源的软件、开发方及贡献（2000—2024 年）

年份	名称	开发方	贡献
2007 年	Scikit-learn	INRIA（法国国家信息与自动化研究院）	首个系统化的 Python 机器学习库，奠定数据科学开源生态基础
2008 年	Apache Mahout	Apache 基金会	基于 Hadoop 的分布式机器学习算法库，推动大数据与 AI 早期结合
2011 年	MLlib	Apache Spark 社区	集成在 Spark 中的机器学习模块，实现大规模数据并行处理
2015 年	TensorFlow	Google Brain 团队	静态计算图框架，工业级深度学习开源标杆，推动 AI 工程化
	Keras	François Chollet（后并入 TensorFlow 生态）	高层 API 设计范式，降低深度学习门槛
2016 年	OpenAI Gym	OpenAI	标准化强化学习训练环境，加速算法迭代
	PyTorch	Meta AI（原 Facebook AI Research）	动态计算图框架，成为学术研究主流工具
2017 年	AllenNLP	艾伦人工智能研究院（AI2）	模块化 NLP 研究工具包，推动可解释性研究
	Fairseq	Meta AI	序列生成模型工具库，支撑机器翻译等任务
2018 年	BERT	Google	开源预训练语言模型，开启 NLP 新时代
	Fast.ai	Fast.ai 团队	简化深度学习实践，推动教育普惠
2019 年	Hugging Face Transformers	Hugging Face	统一接口集成 BERT、GPT-2 等模型，构建开源 NLP 基础设施
	Detectron2	Meta AI	目标检测与图像分割框架，推动计算机视觉落地
2020 年	GPT-2（部分开源）	OpenAI	首个展示强大生成能力的开源语言模型（最终开源完整版）
	JAX	Google	函数式自动微分库，支撑科学计算与 AI 融合
2021 年	AlphaFold	DeepMind（Google 旗下）	开源蛋白质结构预测模型，革新生物医学研究
	DeepSpeed	Microsoft	分布式训练优化库，支持千亿参数模型训练
2022 年	Stable Diffusion	Stability AI、CompVis、Runway	首个开源的文生图扩散模型，引发生成式 AI 爆发
	LLaMA	Meta AI	开源基础大模型（非商用许可），挑战闭源模型霸权
2023 年	LLaMA 2	Meta AI	首个允许商用的开源大模型，重塑行业竞争格局
	Falcon	TII（阿联酋技术创新研究所）	中东首个开源大模型，推动全球多极化技术生态
2024 年	DeepSeek-R1	DeepSeek	提出细粒度专家分割策略，设计动态负载均衡算法

备注：该表为作者根据与 DeepSeek 自然语言对话整理而成，对话时间：2025 年 2 月 20 日，表格整理时间：2025 年 2 月 20 日。

目前看来，人工智能开源与闭源各有利弊。但是，**人工智能开源与闭源的争论，不只是技术路径分歧和知识分享边界的争论，更折射出人类文明演进中反复出现的开放权与控制权的内在张力问题。**它反映出人类在技术民主制与技术精英制之间的理念对抗。它表明创新效率主义与风险控制思维的深层次矛盾。但是，人工智能经过多年发展，开源模式是大势所趋。“开源模型意味着更低的使用成本、更灵活的部署和开发”^[9]，同样意味着人工智能公司之间生态争夺战的激烈和对大规模应用落地的迫切愿望。

“深度学习三巨头”之一、Meta AI 首席科学家杨立昆（Yann LeCun）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不是中国追赶美国的问题，而是开源追赶闭源的问题。”^[10]任何将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开源闭源问题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讨论，都将是不明智的。人工智能开源与闭源涉及很多层面。就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现实角度而言，开源更需要勇气、担当、魄力和胸怀，因为开源意味着曾经的智识付出和资源投入没有获得回报。人工智能发展涉及数据、算力、算法三个主要层面，开源主要针对的是算法开源。算法作为人类智力和知识层面的现实汇聚和显示，它本应符合智力平等和知识平权的人类远景和进化趋势。正如“自由软件之父”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Stallman）将“自由软件”作为一种生活态度一样，这种“自由”和公开的软件必须满足“四个标准”。“用户能够自由运行软件；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写软件，并与他人合作，进行软件的再次开发；能够自由传播、分发软件；能够自由传播、分发软件的修改版本”^[11]，否则就是“非自由软件”。“非自由软件”可能导致软件控制者控制软件、软件控制用户的“非正义权力”和“数字殖民”的发生。理查德·斯托曼的“自由软件”思想显然有不少过激之处。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公司通过对先进人工智能的算法垄断和闭源操作，试图建构“技术利维坦”。那些主张闭源的西方有关科技公司正试图通过垄断算法，以实现超级平台、超大利润、超强垄断目的。就“技术租佃制”视角而言，这种对算法闭源的技术垄断加速了“技术租金的致富狂欢与资本积累的集权”^[12]潜在趋势。就算法平台角度而言，它无疑在建构一种基于算法的“技术封建主义”。就国际竞争而言，它无疑是对技术平权的忽视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及技术落后地区发展普惠型人工智能技术权力的不公正对待。算法开源固然有诸多不利因素，但是，针对算法闭源的各种操作无疑都隐藏着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主导的双重目的。这种利益主导不仅仅来自科技公司内部，甚至会被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一国“技术锁国”他国的手段。因此，企业利益和国家利益就以算法闭源的形式得到了绑定和巩固。另外，就国家政党政治角度来说，算法正成为政党构筑其思想主张和话语阵地的得力助手。算法的效用发挥“源自其不透明性和可否认性”^[13]，它不仅可以不被察觉地散播虚假政治消息、收集对手情报、蓄意制造对立情绪等，还能对这些行为进行轻易的否认而难以被曝光和追责。

三、“DeepSeek 时刻”：人工智能技术文化与技术正义的多维审视

人类在发展技术的道路上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着各种观念对抗和理念冲突，体现为历史维度、现实维度、文化维度、政治维度的矛盾交织状况。

（一）历史维度：技术民主化与精英垄断的周期性对抗

人工智能并非技术民主化和技术精英化对立的开始。自 1474 年威尼斯共和国颁布世界上第一部

曹克亮. “DeepSeek 时刻”: 从技术开源到技术正义的政治学分析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3): 56-68.

成文专利法《威尼斯专利法》以来, 就规定技术发明人享有 10 年的独占权, 之后就要公开技术细节。专利法从一开始就在技术民主化和技术精英化垄断之间徘徊。就人类来说, 这种徘徊和矛盾实际上是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困顿和徘徊。1790 年, 美国通过首部专利法, 并设立专利审查制度, 旨在推动本国农业和工业技术的创新。自此以后, 德国、日本等国的专利制度纷纷建立, 开启了工业革命专利制度作为“国家创新激励工具”的序幕。爱迪生与特斯拉直流电交流电的争端就是最显著的证明。可以说, 目前人工智能开源与闭源之争就是工业革命之后的“遗产”。人工智能开源与闭源之争是专利制度背景下技术垄断与技术共享悖论的当代版本。Hugging Face 以推动机器学习模型的民主化和降低人工智能门槛为开源软件树立了榜样, 它与“OpenAI 并不 Open”的闭源策略(或“梗阻性开源”策略)相比较, 似乎是历史的重演。伴随互联网 TCP/IP 协议和万维网的开源基因, 互联网作为开放平台的地位得以逐步建立, 互联网被拥有去中心化观念、大众民主化意识的早期科技精英打造为极具科技意识形态属性的“加州意识形态”。

“加州意识形态”是自由市场原则与科技热情观念相互结合的产物。它充分展现了嬉皮士反主流文化的开放意识, “正是围绕新技术显而易见的解放潜力”^[14]被塑造出来的。这种“解放潜力”必定与大规模的技术开放和开源相关联。同时, 这不仅仅是一种技术的开源意识形态, 而是体现为整体性的“互联网原教旨主义”开源文化意识形态的印记。开源文化意识形态向往更开放、更平等、更个体化的网络, 从而解构既有的资本主义文化体制和已经固化的“系统世界”。同时, 不论是科技公司还是国家政党到底是推动技术开源还是主张技术闭源都不是任意的, 而是动态地取决于“梅特卡夫定律”^②(Metcalfe's Law)所带来的网络市场价值和潜在巨大利益。因此, 人工智能的技术民主化和技术精英垄断只是表面现象, 只是利益权衡的周期性对抗。从长远来看, 没有什么“绝对的秘密”, 更没有什么“永久的闭源”。人工智能“根据‘梅特卡夫定律’, 超大规模的网络‘扩容’必然会促使企业进一步降低价格, 选择开源设计将成为大势所趋”^[15]。特斯拉开源专利、开拓市场, 获得了巨大成功, DeepSeek 开源 DeepSeek-R1 助力人工智能进一步发展, 都是顺应技术发展潜在趋势、形塑行业发展有利局势的行为。

(二) 现实维度: 创新效率与风险控制的二律背反

约瑟夫·熊彼特提出“创造性破坏”的经济思想, 意在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动力来源于经济结构的“动荡”。所谓“动荡”, 即一种对旧经济结构的破坏性创造。只有这样, 才能推动新的经济结构转型和生产与消费的崭新升级, 从而推动增长。“创造性破坏”在实践中蕴藏着创新效率与风险控制的二律背反难题, 即创新维持在什么程度内, 才不至于出现风险; 把风险控制到什么范围内, 才不至于阻碍创新。人工智能技术开源与闭源的现实, 则充分展现了这种二律背反。一方面, 随着美国政府对有关国家和企业实行严格的技术禁运, 一些国家在技术发展中始终处于不利局面, 这既破坏了全球技术创新的土壤, 也拖累了世界经济进程, 更导致美国以技术禁运和技术闭源为借口的去全球化和“美国优先”战略的深层加剧。另一方面, 美国限制高端芯片出口的做法, 直指中

② “梅特卡夫定律”由计算机网络先驱罗伯特·梅特卡夫提出。该定律描述的是网络价值与网络节点数量之间的关系, 文字表达为: 网络价值=网络节点数的平方, 公式表示为: 网络的价值= $k \times n^2$ 。其中, k 是价值系数, n 是用户数量。

国高端核心技术发展权力。美国 2022 年《芯片与科学法案》中有一个“护栏条款”，其实际内容是“禁止接受美国政府资助的半导体企业未来 10 年在中国和其他‘被关注国家’（包括俄罗斯、朝鲜和伊朗等）扩大或新增先进制程的半导体产业的投资，否则将收回全部资助”。该法案的目的是确保半导体企业将下一轮投资集中在美国及其伙伴国家^[16]。这种显而易见的、具有针对性偏见的所谓技术“风险控制”，实际上是一种以国家政治手段、法律手段干扰技术进步、阻挠技术创新实施的无耻行为。其根本目的在于利用所谓芯片“风险控制”打击和削弱其他国家的高新技术发展，限制甚至是阻断其发展的权力。

芯片和算力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基础。OpenAI、xAI、谷歌、Meta AI 等都在大力囤积芯片，建造超级算力工程。xAI 一直在使用位于孟菲斯的大型数据中心（其中包含 200 000 个 GPU）来训练刚刚推出的 Grok 3。这个大型数据算力中心是同类最大的完全连接的英伟达 H100 芯片群集。马斯克说“Grok 3 的开发计算能力比其前身 Grok 2 高出‘10 倍’”^[17]。从美国政府和科技企业的行为来看，创新效率和风险控制的二律背反不是真正的“背反”，实际上是“我要创新”而“你要限制”的双标一体化。这种“创造性破坏”也沦为国家之间“我创造”并破坏“你创造”的战略打压与技术威慑。美国“鼓吹‘中国科技威胁论’大搞舆论和意识形态冲突，公开指责中国 5G 技术和网络安全的威胁”^[18]，实际上是为自身科技垄断和技术霸权寻找借口。人工智能算法闭源也好、芯片禁运也罢，其真正的现实维度不是指向“创造性破坏”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生产消费调整问题，而是指向“谁创造”和“对谁破坏”的国家技术战略问题。相比之下，“DeepSeek 的开源战略与去中心化模式降低了行业门槛，推动了全球技术协作与分布式智能生态的构建”^[19]。DeepSeek 推动创新效率的做法，与美国华尔街以资本为基础、以利益为导向、以技术为挡箭牌的行为相比是重大进步。这也是又便宜、又好用、又开源的 DeepSeek 引发美国各界震荡和关注的原因所在。DeepSeek 的“便宜、好用、开源”刺破了资本的假象、技术的藩篱和政治的丑陋。人工智能行业作为一个既需要大量资本投入又需要强大人才储备的行业，它在资本密集加人才密集的轨道上确实面临创新保护与利益风险的经济模型的现实困扰。但是，这种创新与风险的二律背反不是技术性的，而是制度性和政治性的。

（三）文化维度：认知方式与科技伦理的东西方分野

包含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行业和工程领域一直存在着一种“技术弥赛亚主义”和“硅谷工程师文化”。所谓“技术弥赛亚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技术终结论思维和技术救赎论思维的矛盾与综合，是一种技术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矛盾体。“技术弥赛亚主义”一方面相信技术的“历史转折点”必将到来，另一方面想象一种“技术的失控”，即“期待人工智能时代之到来……人工智能似乎仅仅是一个占位符：它象征一种人类无法控制、无法揣度的力量，被一群智慧但同样谦卑的祭司（人工智能学者、科技巨头）守护，最终将带给我们一个全新的世界”^[20]。所谓“硅谷工程师文化”则秉承一种浪漫主义的技术无国界的信仰，旨在技术开源领域无所顾忌地狂飙突进。“硅谷工程师文化”是在技术创新、快速迭代以及创业精神交织中形成的独特文化现象。实际上，“硅谷工程师文化”不过是“硅谷共识”在计算机工程领域和技术人员群体中的深化。这些群体秉持一种理想主义色彩的“极客共和主义”思想和“用代码改变世界”的理想追求，主张以开源文化和技术社区推动知识共享。这种技术的文化认知与极具东方色彩的集体主义、共和主义思想有着某种关联性，如强调技

曹克亮. “DeepSeek 时刻”: 从技术开源到技术正义的政治学分析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3): 56-68.

术对大众和集体的包容性与开放共享性、去中心化的平等。

然而, 西方社会的“技术弥赛亚主义”和“硅谷工程师文化”终究隐藏着很多潜在的危机。比如, “技术终结论”与“技术救赎论”与我们主张的技术实用主义和技术创造美好生活的观念有着根本性差异。“硅谷工程师文化”更像是一种对资本主义传统逐利与自私文化的反叛, 它潜藏着技术乌托邦的盲目性和技术英雄主义的个人化色彩。这与我们主张技术的集体协作和科技攻关同样存在本质差异。“硅谷工程师文化”主张“容忍失败”的创新风险与显著利益获取等比例的激进策略, 可能造成技术失控与社会危机。这与我们强调科技向善的“善文化”记忆和朴素的人民情怀的道德伦理认知有着根本差异。进一步来说, 即便“技术弥赛亚主义”和“硅谷工程师文化”怀有一种技术救世的理性精神, 作为被资本控制的硅谷和科技公司也难以真正将这些理想付诸实施。这些公司和工程师人群不过是资本和政客捞取政治利益和获取财富与社会影响力的筹码。马斯克全力站台并与“特朗普 2.0”深度绑定, 担任政府效率部 (DOGE) 关键岗位。从表面来看, 这是进行所谓“减员增效”改革, 而实质是科技精英与政治精英联袂并合作把持科技、经济、社会、政治权力的激进实践。我国《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明确指出, 要“建立完善符合我国国情、与国际接轨的科技伦理制度, 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和保障机制, 努力实现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促进我国科技事业健康发展, 为增进人类福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有力科技支撑”^[21]。我国的科技文化和伦理是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科技文化和伦理, 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科技进步的文化和伦理。它与西方社会的科技文化和伦理认知有着显著而根本的差异。

(四) 政治维度: 数字主权与数字殖民的量子化博弈

人工智能开源与闭源的战略选择还涉及一个重要维度——安全, 即数字主权安全问题。数字主权 (Digital Sovereignty) 是数字全球化进程中, 数据成为生产要素和重要战略资源, 某一国家或地区在数字领域内对数据、技术基础设施、网络空间的自主控制权。数字主权的核心是确保本国或本地区在数字时代的国家利益、公民权利和国家安全不受外部威胁。数字主权的实质是技术主权, 而技术能力成为数字主权能否得到保障和是否安全的关键。数字主权问题改变了传统安全的定义和支撑安全的条件, 也导致数字主权安全不仅仅关涉本国或本地区的数字安全问题, 还成为国家 (地区) 主导他国 (地区) 网络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工具。因此, 数字主权安全问题容易被“工具化”。“随着数字主权被视为一种安全化工具, 这将导致安全威胁认知的改变, 进而引发主权能力代差下的国家权力竞争、‘国家—网络科技巨头—国际对手’复杂三角关系深度嵌入地缘政治博弈、加剧数字空间安全困境和秩序退化等现象。”^[22] 数字主权安全问题涉及多个方面和多种层次, 诸如数据主权安全 (最重要的是数据管辖权和处置权等)、技术主权 (芯片技术、操作系统、云计算平台等)、网络主权 (网络空间的独立性和安全性以及信息操控和网络攻击等)、规则安全 (如数字领域的法律法规, 如隐私保护法规、算法治理法规等)。

人工智能的开源和闭源问题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 而是涉及多方面的网络数字主权安全问题。它不仅涉及国家网络安全、国家技术秘密, 还牵涉数字经济秩序和大规模利益主导的问题, 也涉及意识形态安全和价值观在网络世界的争夺与主导权问题。人工智能是数字主权和网络安全监管中最重要技术形式。欧盟在数字主权和安全监管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法案, 如《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简

称 GDPR）（2018 年）、《数据治理法案》（2022 年）、《欧洲芯片法案》（2023 年）等。美国出台了《云法案》（CLOUD Act, 2018 年）、《芯片和科学法案》（2022 年）及其他行政命令，并建构“芯片四方联盟”（CHIP4）。拜登政府末期加紧签署相关人工智能行政命令，升级对华半导体出口的管制措施“武器库”。2024 年 3 月 30 日，“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工业与安全局（BIS）发布‘实施额外出口管制’的新规措施，修订了 BIS 于 2022、2023 年 10 月制定的两次出口限制新规，全面限制英伟达、AMD 以及更多更先进 AI 芯片和半导体设备向中国销售”^[23]。特朗普则表示：“中国公司发布的 DeepSeek 应该为我们的行业敲响警钟，我们需要在竞争中集中精力取胜。”^[24]

可见，人工智能开源和闭源不仅涉及数字主权问题，还涉及全球数字空间安全治理以及诸多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安全等重大议题。它甚至可能被工具化为一种“数字武器”，造成“数字主权”就可能异化为数字霸权的托词和单向度监管扩张的手段^[25]。人工智能安全和数据算法保护问题是数字主权和数字殖民量化博弈的最前线，中国在此问题上应保持审慎态度，本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战略，本着科技向善、数字为民的国家属性和民生属性，强调动态而平衡地对待数字主权和开源与闭源问题，积极发展自己的人工智能技术并参与全球人工智能安全规则制定和伦理治理。

四、“DeepSeek 时刻”：从技术正义到公平正义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彰显

“DeepSeek 时刻”是技术开源超越技术闭源的重要时刻。“DeepSeek 时刻”是推动技术正义分配走向全人类社会基本结构的重要时刻。“DeepSeek 时刻”是彰显从技术正义到公平正义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时刻。

（一）技术开源超越技术闭源

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用“范式”来解读科学革命的内在结构和本质，强调科学革命的“范式优先性”原则。库恩指出“范式是团体承诺的集合”^[26]，并且“一个成熟科学共同体的那些范式是能够被相对容易地确定的”^[26]³⁶。从库恩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人工智能的开源与闭源之争实际上不是科学内部的认识论问题，人工智能领域的绝大多数专家其实都已经认识到开源才能代表人工智能的未来。Meta AI 首席科学家杨立昆（Yann LeCun）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在法国巴黎 2025 年人工智能行动峰会上不仅再一次炮轰了生成式 AI 是没办法只通过文本训练达到人类智慧水平，而且再次强调了人工智能开源的重要性。他说：“AI 平台需要共享，它们要会说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了解所有的文化、所有的价值体系以及所有的兴趣中心，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公司可以训练出这样的基础模型，必须以有效的方式协作完成。”^[27]人工智能开源模型虽然“缓慢”，但正在“坚定”地超越闭源模型。人工智能开源趋势之所以“缓慢”，主要是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安全利益主导的问题，而不是技术正义本身的问题。在科技伦理正义和政治经济正义的交织博弈中，带有科技谦逊主义的技术正义有时不得不在政治经济正义的统摄之下才能进行。人工智能的开源与闭源的科技伦理正义问题之争，也是具体领域的正义问题与政治正义问题的具体表达。“这恰恰证明政治正义与伦理正义在内容上直接相对，政治领域的正义样态决定了伦理正义的实现情况。”^[28]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工智能的闭源都是由那些技术领先者所主张，他们不仅想暂时保持技术领先，而且想一直保持技术领先。这显然在人们的道德情感和价值观念中就陷入“非正义”的状况

之中。同时，他们又想通过闭源（与科学范式相背）的方式获得额外的巨大利益，这显然也让他们陷入超额利润和超大经济利益获取的“非正义”状况之中。不止如此，一个由资本操控的国家及其政党通过各种超越技术竞争范式的方式推动这种“非正义”变成国家战略，致使其陷入政治的“非正义”状况之中。这相当于用强大国家机器将技术问题强行政治化和武器化。“技术利维坦”发展为一种被“政治利维坦”裹挟的“技术-政治利维坦”混合体。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希望通过技术霸权实现政治霸权和世界秩序的主导权，它无疑是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背叛。并且，它是用非科学范式的方式搞科学对立、技术对立，用非正义的方式实现经济强权和政治霸权。

（二）分配正义视角下的技术正义“异化”布展

技术正义不仅存在于技术内部，它也会扩展到生存正义、发展正义、劳动正义等各个领域。就生存正义角度来看，由于受到人工智能闭源的影响，很多国家无法掌握相对先进甚至是普惠型的人工智能技术，其在人工智能时代的生存权就有可能遭受挑战。“数字鸿沟”不应是数字技术内部的认知鸿沟差距问题，而应是一个多维度、宽视角的概念。它不仅牵涉数字技术的可及性问题，也涉及数字技术是否可用和可用程度的问题，这对于个体和国家来说都很可能是生存权的问题。消除数字鸿沟不仅需要关注人群、性别等议题，更应关注全人类生存正义的共同价值性问题。

从发展正义角度来看，它既指向个体发展也指向国家发展。就个体发展来说，个体只有在掌握基本的技术和技能基础上才能实现生存与发展，人工智能素养是当下最为重要的支撑个体发展的基本素养。如果人工智能闭源趋势性地扩展开来，势必对一些个体的人工智能素养提升带来障碍，从而失去参与劳动和社会竞争的机会优势，先天性地、被动地陷入“无用之人”的境地。这不仅仅是个人学习提高的问题，它在制度和实践层面是涉及更深层次的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普及与应用的扩展问题。同理，一个国家的发展必须以生产力（最重要的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基础和前提。由于人工智能闭源的消极影响，一些国家必然陷入先天“无人工智能”的发展困境，已经输在起跑线上。按照罗尔斯正义分配理论，正义要在社会基本结构上运行才能真正实现，而社会基本结构显然不是单单指向国内社会基本结构，也天然地指向全人类的社会基本结构。“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大型科技企业利用关键技术形成新的市场环境，借由大数据、知识产权和特定的技术路线使收益更加集中，有可能加剧经济和社会不平等。”^[29] 这些国家势必陷入发展迟滞的困境之中。

从劳动正义角度来说，随着人工智能的“奇点更近”，“技术替代论”“无用阶层”“无用之人”等论调甚嚣尘上，每一个劳动者都或多或少地陷入某种“智能恐慌”之中。劳动权作为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具体形式，一定程度上正受到人工智能的深刻影响。撇开技术的资本性和奴役性不谈，我们追求的劳动正义一定是与掌握劳动工具的先进程度相对应的。没有人工智能工具的加持，任何人想在未来实现“自由劳动”、高效劳动都将十分困难。因此，人工智能开源是推动人工智能快速普及应用的重要技术前提，人工智能快速普及应用是推动未来劳动正义实现的关键。当我们谈论人与资本异化、技术异化时，实际上也是在谈论一种“关系异化”。这种资本-技术异化不是单项和单线的，而是双重交织的。同时，人与劳动工具的关系异化不仅仅是“人的机械化”（人被机器奴役）、“人的义肢化”（人沦为机器的义肢）、“人的器官化”（人成为机器的器官）的问题。人与劳动工具的关系异化也天然地表现为人连基本的劳动工具都将缺失和没有的“异化”（非正常化）。人和技术之间构成了一种“无关系的关系”。它是一种人的劳动条件和劳动能力先天性丧失的“异化”。

同时，它也就对人的生存正义、发展正义、劳动正义构成了“异化”。

（三）从技术正义到公平正义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必然指向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技术等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人工智能开源和闭源问题作为一种技术公平、技术正义的具体问题，显然不是仅仅孤立地嵌入技术范畴之内。如果推动技术发展的公平、正义难以在全人类和全社会获得观念性的维持和实践上的延续，它必将首先带来基于技术的人类社会在和平、发展、民主、自由等方面的缺陷和重大问题。比如，算法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可能带来和平与安全的问题，引发“算法即权力”“代码即力量”的技术政治难题。同样地，基于算法的“信息茧房”必然给人类的精神意识、情感认知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使基于理性精神和共同价值的人类信任基础、道德基石遭受挑战，带来政治信任的撕裂和政治共识难以达成的困局。从技术开源到技术正义的转变和实现，并不是一种针对技术的道德绑架，它不能有损技术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知识产权的制度安排，它不能成为“为开源而开源”的技术道德慷慨主义或技术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人们要在尊重技术发展规律、经济规律、政治规律的前提下，尽力推动从技术正义到公平正义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转换和实现，这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景。这一共同愿景旨在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人类认识论基础，实现面向不同民族、国家、社会、个体的科技向善和技术助善，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技术供给有效保障的前提下逐步实现。

1957 年 10 月 4 日，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 1 号，开启了人类进入太空探索的新纪元。但是在冷战背景下，它也直接推动了美国于 1958 年成立 NASA 和启动阿波罗登月计划，进而引发美苏“太空竞赛”。有人将中国人工智能 DeepSeek 的横空出世称为“DeepSeek 时刻”，并将其作为中美人工智能竞赛和技术角力的显著标志。基于这种背景得出的这个结论是一个片面的认识。就技术角度而言，人类的技术进步从来都不是个别国家靠着技术封锁、技术禁运、技术打压和搞“技术民族主义”就能压制的。“美国对华技术遏制未来将继续朝着系统性、极端性和冒险性的方向发展”^[30]，但没法阻挡 DeepSeek 的出现，就已经说明问题。美国搞技术层面的“小院高墙”既不符合技术发展规律，也不符合政治发展规律，更不符合全人类共同价值，注定失败。中国人工智能 DeepSeek 的出现得益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开源和生成演化。DeepSeek 宣布开源，是对人工智能进一步发展的又一次助力与责任担当的彰显。DeepSeek 的出现也说明中国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道路的正确性。中国的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必将有利于世界、有益于全人类。它也显著地彰显了中国坚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技术务实之处。

五、结语

凯特·克劳福德在《技术之外：社会联结中的人工智能》一书中认为：“通过观察人工智能设计和使用中的权力动态，我们可以看到高度集中和不透明的制度所带来的根本性的民主挑战，这些制度在公共机构和私人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其首要任务却为股东利益所驱动。”^[31]人工智能最早是用于军事目的，就连达特茅斯学院的人工智能项目都是由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资助的。人工智能是军事和政治的优先项目。人工智能发展的技术正义一直以来都受到更深层次的挑战，甚至被用

曹克亮. “DeepSeek 时刻”: 从技术开源到技术正义的政治学分析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3): 56-68.

于以技术支撑强劲霸权思维和民族主义逻辑的工具。或许, 人工智能的算法开源和算力开放不能完全阻止各种权力与政治的渗透, 也不能阻止和动摇资本侵蚀和股东利益的基本结构。但是, 基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朴素正义情感, 我们仍然必须审慎思考人工智能是什么、为谁服务、边界在哪儿的问题。这不是针对人工智能开源与闭源的情境主义思考, 而是关于人类未来命运议题的慎重决断。

2024 年 11 月 20 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 2024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开幕视频致贺, 指出: “我们应当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大势, 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把安全作为底线要求、把普惠作为价值追求, 加快推动网络空间创新发展、安全发展、普惠发展, 携手迈进更加美好的‘数字未来’。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 把握信息革命发展的历史主动, 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人民、造福世界。”^[32] “DeepSeek 时刻”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安全发展、普惠发展的重要时刻。它既展现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成就, 也展现了在人工智能领域,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愿与世界各国一道把握和推动人工智能革命的历史主动意识和担当精神。探寻人工智能时代大模型 DeepSeek 对智能衍生逻辑的变革, 既要求我们从社会历史活动出发真实应对人工智能时代智能存在与表达的面相, 又要在技术逻辑的创新与变革中追问其表达的人类性意义^[33]。DeepSeek 的推出和技术开源为打造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 [1] 2025 冬季达沃斯 | 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开幕在即, 呼吁开展智能时代的合作 [EB/OL]. (2025-01-15) [2025-02-20]. <https://mp.weixin.qq.com/s/XiK49N6MN1T10hFbQ8Znjg>.
- [2] 杨俊峰. 锚定 AI 普惠“新坐标” [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5-02-18 (5).
- [3] 余惠敏. 大模型加速赋能千行百业 [N]. 经济日报, 2025-02-19 (1).
- [4] 张润坤, 赖诗奇. 全景扫描 | “DeepSeek: 人工智能的中国时刻?” 学术研讨会综述 [EB/OL]. (2025-02-24) [2025-02-25]. https://mp.weixin.qq.com/s/jffKdPoqErKM_qU7uVW-sA.
- [5] 张慧敏. DeepSeek-R1 是怎样炼成的? [J]. 深圳大学学报 (理工版), 2025 (2): 226-232.
- [6] 邓建鹏, 赵治松. DeepSeek 的破局与变局: 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监管方向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 99-108.
- [7] 段玉聪. 抢占 AI 话语权: DeepSeek 的技术优势、战略布局与未来生态图景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 109-125.
- [8] 方兴东, 王奔, 钟祥铭. DeepSeek 时刻: 技术—传播—社会 (TCS) 框架与主流化鸿沟的跨越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 126-135.
- [9] 刘怡鹤. DeepSeek 开源影响几何? [N]. 上海证券报, 2025-02-20 (8).
- [10] 刘扬, 任重. 专家解读: 中国新 AI 大模型为何火爆全网 [N]. 环球时报, 2025-01-27 (8).
- [11] 郑小小. 软件自由的传教士 息安神级程序员理查德·斯托曼 [J]. 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 2016 (8): 70-71.
- [12] 涂良川, 张宝翠. “技术租佃制”重构资本寄生逻辑的政治叙事 [J]. 国外理论动态, 2024 (5): 97-105.
- [13] 亨利·基辛格, 埃里克·施密特, 丹尼尔·胡腾洛赫尔. 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 [M]. 胡利平, 风君, 译.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23: 171.
- [14] 塞德里克·迪朗. 技术封建主义 [M]. 陈荣钢,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4: 7.

- [15] 沈淑莎. 拥抱开源, 抓住第三次芯片浪潮机遇 [N]. 文汇报, 2023-04-10 (2).
- [16] 史九领, 洪永淼, 刘颖. 美国《2022 年芯片与科学法案》对我国相关产业的影响与对策 [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4 (2): 379-387.
- [17] 马斯克的 xAI 发布最新旗舰大模型 Grok 3 [EB/OL]. (2025-02-18) [2025-02-21]. <https://mp.weixin.qq.com/s/DQjuKX4cm5Abor8W94zkvQ>.
- [18] 郭永虎, 于艳文. 美国对华科技遏制: 演进、影响与中国应对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3): 154-165.
- [19] 蔡天琪, 蔡恒进. DeepSeek 的技术创新与生成式 AI 的能力上限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 136-143.
- [20] 你要自信, 人类! | 技术弥赛亚主义与人工智能 [EB/OL]. (2025-02-04) [2025-02-21]. <https://mp.weixin.qq.com/s/tTQTjYnEiCzHBtsr-mcA7w>.
- [21] 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 [J]. 中国科技奖励, 2022 (4): 10-12.
- [22] 罗有成. 数字时代主权的嬗变与国际安全秩序重塑 [J]. 国际展望, 2024 (6): 89-112+161-162.
- [23] 美国出口限制再升级: “绝不能让中国得到最尖端的芯片” | 硅基世界 [EB/OL]. (2024-03-30) [2025-02-21]. https://mp.weixin.qq.com/s/wJW71tKNmUIjYuQzALz_Rg.
- [24] 中国 DeepSeek 爆火, 特朗普发声 [EB/OL]. (2025-01-28) [2025-02-21]. <https://mp.weixin.qq.com/s/L4iUUXkTU-NvZUMpMbVyWA>.
- [25] 廖凡. 数字主权与全球数字治理 [J]. 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7): 47-60.
- [26] 托马斯·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 [M]. 金吾伦, 胡新和,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152.
- [27] Meta 首席 AI 科学家杨立昆再次炮轰生成式 AI | 中企荐读 [EB/OL]. (2025-02-22) [2025-02-22]. https://mp.weixin.qq.com/s/_0B1NyqZGigfLZd7xciSLQ.
- [28] 刘同舫. 技术进步与正义困境 [J]. 社会科学战线, 2021 (5): 43-51.
- [29] 刘佳. 信息技术的分配影响与制度变革——以罗尔斯分配正义理论为研究框架 [J]. 开放时代, 2023 (5): 62-80+6-7.
- [30] 潘亚玲, 肖迅韬. 美国技术民族主义的结构转型与美对华技术遏制 [J]. 外交评论 (外交学院学报), 2024 (6): 24-47+166.
- [31] 凯特·克劳福德. 技术之外: 社会联结中的人工智能 [M]. 丁宁, 李红橙, 方伟, 译. 北京: 中国原子能出版社,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4: 16.
- [32] 习近平向 2024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开幕视频致贺 [N]. 人民日报, 2024-11-21 (1).
- [33] 涂良川, 高镁琪. 大模型考问智能本质的哲学叙事——从 DeepSeek 效应的技术叙事谈起 [J].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5 (2): 50-58.

责任编辑: 林华山 校对: 卢媛



DeepSeek 大模型本地化部署应用： 功能检视、新兴风险及治理路径

杨骏 李长健

（华中科技大学 法学院/法律与公共政策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DeepSeek 大模型本地化部署应用是人工智能实践的重要方向之一，是新时代我国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内容。由于 DeepSeek 大模型具备开源性、低成本和高性能优势，其本地化部署应用能够在政务处理、教育培训、科学研究等方面，给使用主体带来工作辅助、效率提升、协助决策等功用。DeepSeek 大模型本地化部署分为全本地化部署和伪本地化部署，针对不同的使用主体，可以在实现深度个性化定制、构建生态创新体系以及推动基础能力升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然而，DeepSeek 大模型本地化部署在硬件设备要求、运行稳定性方面仍存在一些实践不足。其在本地化部署应用后，生态链条得以进一步延伸，同时也可能引发新兴的安全漏洞风险、用户权益保障风险以及数字国别竞争风险。基于适应性治理的理念，在完善具体治理路径时，应以弹性化制度工具推动规则科学更新，以多元主体协同完善生态治理路径，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化国际合作发展。

关键词：科技强国；人工智能；DeepSeek；本地化部署；功能；新兴风险；适应性治理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5.03.006

作者简介：杨骏，华中科技大学法律与公共政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李长健，中国农业农村法治研究会副会长，华中科技大学法律与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深化基层矛盾纠纷化解共建共治机制及其风险预判研究”（18ZDA16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法治保障研究”（YCJJ20242302）

引用格式：杨骏，李长健. DeepSeek 大模型本地化部署应用：功能检视、新兴风险及治理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3）：69-83.

一、问题的提出

DeepSeek（深度求索）是一家致力于通用人工智能（AGI）研发的中国企业，由知名金融机构幻方量化战略孵化而生。自 2023 年成立以来，公司相继推出了基于 MoE 架构的 DeepSeek-R1 模型，并陆续开源了 DeepSeek-V2、DeepSeek-Coder 等系列大模型。2024 年 12 月 26 日，公司进一步发布并开源了 DeepSeek-V3 大模型。与 OpenAI 开发的专有模型 ChatGPT 相比，DeepSeek 在性能表现上可与顶级 GPT-o1 模型比肩，同时在推理成本方面仅需 GPT-o1 十分之一不到的投入即可实现同等水平的表现。DeepSeek 作为我国领先的自主研发开源 AI 大模型，是我国经济、科技强劲发展的成果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何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和可持续增长之路，是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各国经济各有各的难处，应该合作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坚持创新驱动，把握好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低碳技术等重要机遇，创造经济增长新的动力源，支持知识、技术、人才跨国流动。搞‘小院高墙’、‘脱钩断链’既损人也不利己。”^[1]《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2]在具体实践上，DeepSeek 大模型通过本地化部署有效满足了政府机构、企业等不同主体对数据主权和安全合规的严格要求，并能针对性地优化各行业应用场景，在优化社会治理、推动经济发展、促进沟通协作上发挥了重要作用。2025 年 2 月 8 日，DeepSeek 在苏州市公共算力服务平台成功完成本地化部署，提供完整的软硬件一体化解决方案。随后，众多企业、教育机构等组织通过官方 API 接入了 DeepSeek 大模型，或将其嵌入自有服务器及边缘设备，实现了“数据不出域、计算不离场”的安全运营目标。相较于 ChatGPT 等大模型，DeepSeek 大模型较低的使用价格和算力依托使其使用门槛更低，性能与顶级大模型保持了同一水准和质量。在可预期的未来，DeepSeek 大模型本地化部署应用将会成为人工智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国际交流的重要方式之一。

DeepSeek 大模型在进行本地化部署后，技术演进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使得技术与规制之间的风险控制更加难以平衡。在人工智能初步发展之时，我国已有学者提出需要将风险社会置于法治社会的背景之中，通过法律吸纳和化解风险^[3]。在旧有的监管中，更强调对 AI 的开发者和开发企业及其适用范围进行一定约束^[4]。数字经济时代，技术的接入不仅带来了商业模式、产品和决策等创新，技术甚至决定了市场的控制权，导致权力配置结构发生改变^[5]。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我国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数字技术应蕴含数字正义观，缩小数字鸿沟，实现数字现代化^[6]。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良好运转离不开数据预训练的准确生成以及人类使用后的反馈强化学习，不断优化调试参数权重，进而探索较为满意的结果^[7]。当前关于 DeepSeek 的研究中，有学者指出 DeepSeek 大模型打破了算力垄断、利用算法模式、知识蒸馏等，实现低成本训练以及高效的结果输出，更有利于降低应用成本，实现大模型的快速发展^[8]。其优势在于能有效降低计算功耗，内核和部署更适用于技术后发主体、国家和地区，实现低门槛高性能使用，更有利于不同主体搭建自身的本土生态大模型^[9]。DeepSeek 大模型本地化部署更带来了智能平权，打破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智

能垄断, 助力中小企业拥有自身的技术控制话语权^[10]。其开源性特征决定了未来的发展更依赖于全球技术协作与分布式智能生态, 同时也帮助 DeepSeek 进一步自我成熟学习^[11]。其在深度思考、中文语料、开源共享、免费使用等方面的优势, 也为中华文明的传播提供了强大助力^[12], 发挥对人类文明前进方向的指引作用^[13]。DeepSeek 创始人梁文峰表示, Triton 框架让 NSA (原生稀疏注意力机制) 的代码可转译兼容 CUDA、ROCm 或华为 CANN, 解决国产 GPU 被“卡脖子”问题, 实现跨平台部署^[14]。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上, 其由内容生产工具升级为跨学科思维伙伴^[15], 人类思维力量和社会经济活动亦可反助推 DeepSeek 发展^[16]。可以看出, DeepSeek 大模型本地化部署应用是当前的发展趋势, 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强大的助推作用。然而, 如何对其中的风险做到提前预判及防范, 是当前学界不可忽视的问题。

综上所述, DeepSeek 大模型作为我国刚刚诞生的顶级开源大模型, 其相关研究还较少, 特别是针对 DeepSeek 大模型本地化部署应用尚未有学者进行系统论述, 当前更多研究关注 DeepSeek 宏观上的发展超越。DeepSeek 大模型诞生之初, 线上服务便遭到了美国政府的大规模恶意攻击。2025 年 2 月 7 日,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联合提出的《政府设备禁用 DeepSeek 法案》, 妄称对 DeepSeek 实行“长臂管辖”^[17]。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 经济政治环境的复杂性、技术安全的不确定性以及法律法规的滞后性等因素, 为 DeepSeek 大模型的大规模应用带来了诸多风险与挑战。本文基于 DeepSeek 在社会发展中的实践应用及现有研究成果, 评估 DeepSeek 大模型本地化部署的功能特性, 识别其潜在风险, 并提出相应的治理策略, 旨在促进 DeepSeek 大模型的有效应用, 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二、DeepSeek 大模型本地化部署应用的功能检视

与 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普及化应用推广相比, DeepSeek 大模型自问世以来展现出更为强烈的社会渗透力。其低成本、开源性以及低算力需求的特点显著降低了使用门槛, 使得众多企业能够尝试接入并部署该模型。与此同时, DeepSeek 大模型的开源性和包容性促使社会各类信息平台涌现出大量关于其本地化部署的技术指南, 为多元化主体参与、开发和训练大模型提供了便利。当前, 无论是政府机构等公共管理主体, 还是学校、医院等公共事业单位, 均有不同使用主体陆续公开其部署方案, 相关部署功能涵盖以下方面。

(一) 类型划分: 全本地化部署和伪本地化部署模式的功能区分

DeepSeek 大模型本地化部署策略主要分为全本地化部署和伪本地化部署两种模式 (如表 1)。全本地化部署是一种完整的技术栈部署方案, 它将模型训练、推理、参数权重以及运行时环境等核心组件全部迁移至部署主体的专有物理服务器或私有云设施中。这种部署模式能够实现完全离线运行, 在封闭的网络环境下通过内网服务接口提供模型能力, 确保数据流转和计算过程始终在可控的本地环境中进行。与之相对的是伪本地化部署, 这种模式在本地仅构建轻量级的服务封装层, 实际的计算能力和模型存储仍然依托租赁公有云基础设施, 通过 API 网关调用云端服务。它虽然表现为本地化服务形态, 但本质上仍是一种云服务调用方案。

表 1 DeepSeek 大模型全本地化部署和伪本地化部署区分

维度	全本地化部署	伪本地化部署
数据传输路径	完全内网闭环，无外部出口	需通过专线连接云端 API
投入成本	初期投入高，长远投入低	长远投入高，初期投入低
文本处理能力	吞吐量大，速度快	吞吐量小，速度慢
流量监控	可审计模型内部计算过程	仅能监控 API 调用元数据

全本地化部署需确保模型训练、推理过程及数据存储均在用户自有或指定的环境中完成。在技术层面，要求构建完整的技术架构体系，包括私有算力集群、本地化知识库以及独立的 API 接口。虽然这种部署方式对使用主体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但从数据安全与合规性角度而言，其完全符合《网络安全法》第 37 条关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在中国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应当在境内存储”的强制性规定，为国内机构的使用提供了法律保障。特别是企业的数数据财产权利日益重要，其全流程加密性成为重要内容^[18]。基于自身数据方案对大模型应用、调适和升级打造的全本地化部署，会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以广州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为例，其依托原有 28 年的数据量和终端设备，全面接入 DeepSeek 大模型后，实现“数据+算法+产业”交叉融合，进而带动数据产权登记等工作在效率跃升、风险可控、价值倍增等方面实现深度突破^[19]。可见，全本地化部署具有更强的监管可控性和安全性，且使用主体能够根据自身需求进行针对性的功能优化与提升，从而促进其高质量发展。

相比之下，伪本地化部署主要依托镜像服务器或 VPN 实现表象的本地化，其核心算法和训练数据仍依赖租赁的云端服务器，使用主体并未真正掌握核心控制权。然而，伪本地化部署也具有独特优势。首先，混合云架构支持灵活的算力调配，既能提高使用效率，又可有效预防《电子商务法》第 19 条关于服务中断的禁令。其次，大模型的更新迭代更具敏捷性，大模型在自身云端服务器更新后即可被伪本地化部署主体使用，同时在新建站点时可通过复制现有镜像架构提升效率，实现运营效率提升。最后，伪本地化部署主要采用租赁云服务器而非大量购置 GPU 服务器，不仅硬件投入较低，运营成本也可根据需求灵活调整。伪本地化部署通过技术架构的灵活设计，在成本控制、敏捷响应与多元化协同等方面展现出了一定优势，这些特点使其特别适合中小市场主体在发展初期追求运营效率和快速适配的需求。

（二）实践突破：DeepSeek 大模型本地化部署应用的功能拓展

DeepSeekR-1 大模型发布以后，我国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展进入了世界领先梯队。从我国自身的发展基础来看，在 DeepSeek 大模型发布之前，我国腾讯、阿里巴巴和网易等科技企业已发布了自身研发的 AI 大模型，在不同赛道取得了一定成绩。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不断拓宽，AI 大模型不仅可以助力企业发展，也在政务处理、教育培训、科学研究等方面实现了大规模应用。从我国的发展基础来看，当前我国的数字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处于世界领先行列。2024 年我国 10G PON 端口数已达 2 820 万个，具备大规模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移动通信基站总量达到 1 265 万个，面向公众服务的互联网数据中心已部署 83 万个机架，可共同构建一个能够提供多元化算力服务的强大网

络体系^[20]。从政策促进来看, 2017 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中, 我国就将开源开放作为基本原则, 参与人工智能全球研发和治理, 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创新资源。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制定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也强调, 构建负责任的人工智能研发应用体系, 促进国际合作交流。从制度监管来看, 我国出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是世界上率先制定的部门规章管理办法, 对数据来源、基础模型和服务提供者都作了相应规范要求^[21]。国产大模型 DeepSeek 的数据来源、训练方式和设计架构等契合我国国情, 极大助力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极大促进世界人工智能发展进步。

DeepSeek 大模型本地化部署主要在以下方面实现功能拓展。首先, 具备面向垂直行业的深度定制功能。随着企业业务的精细化发展, 需要在更多功能层面进行深入探索。以 DeepSeek 的发展历程为例, 其最初需求起源于金融量化分析需求。在金融分析领域, 企业可将 DeepSeek 本地化模型与内部数据库对接, 利用其多模态理解技术, 通过历史数据交叉分析, 生成比市场公开信息更具前瞻性的投资决策方案。在工业制造领域, DeepSeek 的全本地化部署可实现对现有工艺参数的动态优化, 结合数据模型快速计算并形成决策建议, 有效提升产品质量。例如, 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完成其全本地化部署的“管网大模型”, 在管网智能调控、长输管道方案评估以及 HES 体系审核实现落地应用, 提升作业效率。在政务服务领域, 通过整合历史政策文件并纳入服务器系统, 借助 DeepSeek 强大的自然语言交互功能, 可将申请条件、办理流程等结构化信息更清晰地呈现给民众, 显著提升办事效率。例如, 武汉汉阳政务服务接入 DeepSeek, 推出数字人“汉小阳”, 通过对高频业务办理数据的全面分析, 优化事项审批逻辑, 提升群众办事效率, 带来了更好的体验。其次, 具备构建完善的生态创新体系的能力。各行业生态系统的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 DeepSeek 从字段级溯源功能的开发入手, 实现对训练数据中每个标注源头的追踪, 并通过构建决策路径回放系统, 形成完整的全链条、全方位生态体系。传统边缘智能体在诸多应用场景下, 其算力预先部署的利用率有限, 而 DeepSeek 本地化部署后通过边缘智能设备与物联网协同, 可实现深度集成, 降低传统人工审核和计算流程的成本, 强化对边缘智能体的利用效率。企业亦可基于自身数据场景, 构建科学的程序决策系统, 推动生态系统的优化升级, 全面提升运营效率和体系化水平。最后, 推动部署形态创新突破。DeepSeek 大模型通过独特的蒸馏技术, 有效突破了算力瓶颈, 实现了性能提升。在模型蒸馏与量化压缩过程中, 企业可先在完整版模型上开展训练, 再通过蒸馏技术提取其中的核心能力, 逐步迁移至小参数模型。这不仅能提升现有设备的性能, 还可推动设备向小型化、智能化方向发展。以智能手表的医疗监测功能为例, 该技术可在保持原有硬件配置的基础上, 实现更高性能和更低功耗的双重优化, 为用户提供更强大的功能体验, 进而推动传统行业基础能力的全面升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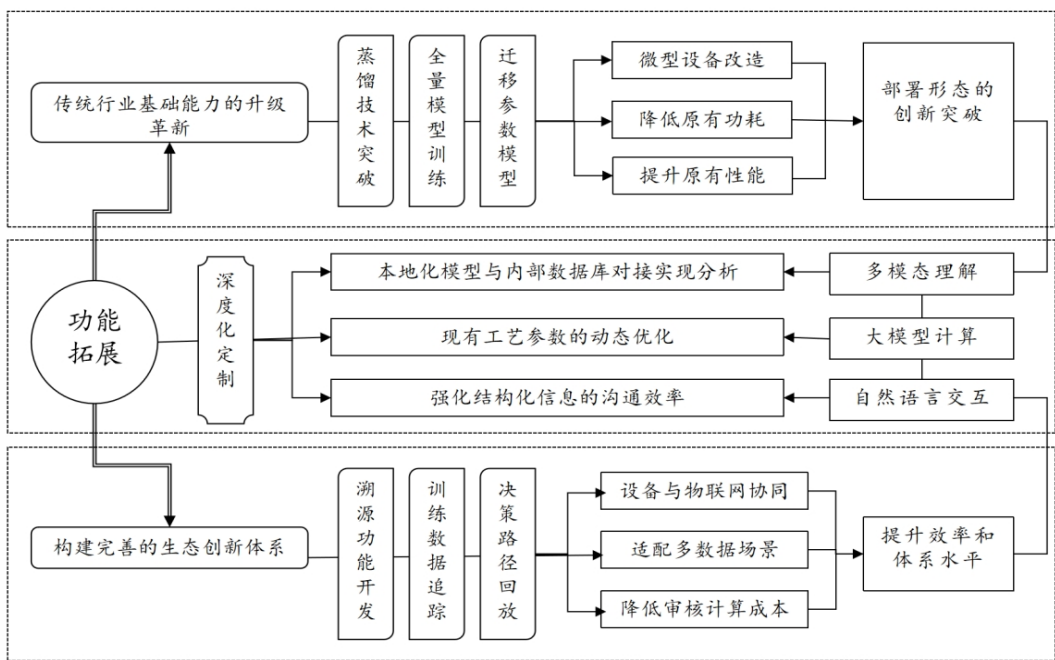


图 1 DeepSeek 大模型本地化部署的功能拓展

（三）实践隐忧：DeepSeek 大模型本地化部署应用的部分不足

技术发展往往会伴随新的争议，关于 DeepSeek 大模型本地化部署应用的争议在本质上是技术能力、合规成本与监管要求之间的博弈。当前，DeepSeek 大模型本地化部署正在快速展开，虽然个人、企业乃至其他主体均可实现本地化部署，但是诸多使用主体基于对大模型、自身硬件设备和使用需求，尚未真正实现本地化部署的完美适配，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产生了部分不足。

其一，DeepSeek 大模型本地化部署对硬件设备要求较高，部署和使用成本均需考量。以个人部署场景为例，尽管官方推荐使用配备 24GB 显存的 RTX 3090 显卡，然而实际应用中该配置仅处理 10 余页文档便可能耗尽显存资源，引发内存溢出错误，导致系统崩溃。这一硬件瓶颈同样存在于企业的全本地化部署中。全本地化部署方案对 GPU、内存及存储空间等计算资源提出了较高要求，需要强大的经济支持。特别是在当前算力需求持续攀升的市场环境下，以英伟达 A100、H100 为代表的高性能显卡价格不断上涨，其年度折旧成本不容忽视。此外，系统运行维护和模型更新所需的隐性成本也应纳入考量范围。特别是在部分应用场景中，全本地化部署可能因业务量波动而导致算力闲置或算力堵滞，突发流量增大时则应对能力受限。比如，国铁公司春运期间和平时数据流量差异较大，以高硬件配置应对平时的使用频率可能导致亏损，而应用较低的硬件配置则无法满足春运期间和节假日的流量需求。在伪本地化部署过程中，虽然官方 API 按 token 计费，且使用主体无需考虑硬件折旧风险，然而从长期来看，企业高频调用的成本可能高于全本地化部署成本。因此，在评估 DeepSeek 大模型本地化部署的可行性时，需要全面权衡其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是否能够超过初始部署成本和持续运营成本。

其二，DeepSeek 大模型本地化部署存在运行稳定性问题。模型的运行效率主要受限于部署版本

和硬件配置两个因素, 不同版本间的模型参数量和计算能力差异显著。当硬件配置和模型性能均不理想时, 可能导致推理速度下降, 影响用户体验。目前, 本地化部署版本经常出现功能受限的情况, 其部署多为静态模型, 缺乏动态数据整合能力, 无法使用联网搜索和多模态解析等核心功能。这使得在代码生成、信息检索以及内容生成等任务中, 本地化部署版本的准确率相比云端计算版本呈现明显下降趋势。伪本地化部署虽然可以满足使用的需求, 但仍旧存在不稳定性, 不适合大型企业等主体的使用要求。从 DeepSeek 官网可知, 其云端服务器在 2024 年 12 月出现 1 次 API 重大中断, 2025 年 1 月出现 2 次, 1 月 27 日到 2 月 5 日每天都出现部分中断情况, 时间均为 5~6 个小时^[22]。DeepSeek 用户量在北美、欧洲和印度等地区快速增长, 使得稳定的国际使用环境日益重要。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威胁和漏洞信息共享平台 (CSTIS) 近日监测发现, 已有攻击者在 DeepSeek 大模型本地化部署场景中实施了钓鱼攻击, 传播恶意程序, 造成了严重危害。DeepSeek 大模型本地化部署仍需主动提升运行稳定性, 确保安全、稳定地使用。

三、DeepSeek 大模型本地化部署应用的新兴风险

DeepSeek 大模型本地化部署应用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重要方向, 在功能开发、深度定制化需求满足等方面展现出显著优势, 在社会、商业等诸多领域对生态体系实现了创新构建。然而, 技术发展过程并非基于单一向度, 而是科技、制度、政策和文化的多元融合, 构建出了新的交融空间。相较于 ChatGPT 等闭源式人工智能, DeepSeek 大模型本地化部署应用可能面临诸多新兴风险。

(一) 安全层面: 新兴安全漏洞风险

DeepSeek 大模型本地化部署所依赖的复杂技术架构, 在提升自身性能以及延长使用链、产业链和生态链的同时, 也带来了更多的安全防护漏洞, 在已有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安全防护体系之外形成了多维度的新型风险面。

其一, DeepSeek 大模型本地化部署中的外部安全是新兴风险之一。虽然 DeepSeek 大模型采用全本地化部署策略有效降低了数据上的云风险, 但若本地服务器安全防护不足, 仍可能引发敏感数据泄露。全本地化部署延长了生态链与使用链, 增加了参与主体数量, 其复杂的算法架构与海量参数交互特性可能存在多重安全隐患, 包括模型逆向工程攻击和对抗样本注入等。攻击者可能利用模型未知弱点篡改输出结果或窃取敏感训练数据。值得注意的是, 本地化部署所依赖的硬件加速组件(如 GPU/TPU)也可能成为新的攻击载体。攻击者可通过固件漏洞植入侧信道攻击代码, 间接获取模型计算过程中的中间数据。若缺乏有效的动态防御机制, 权限管理漏洞可能导致越权访问。攻击者甚至可能利用 API 接口暴露弱点, 对传输链发起攻击, 导致敏感数据泄露、系统服务中断、算力资源被恶意占用, 严重情况下甚至会造成模型文件被破坏或删除等安全风险。例如, DeepSeek 自发布以来即遭受来自美国的大规模 IP 网络攻击, 攻击形式已从初期的代理攻击升级为针对应用层的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 破坏性持续增强^[23]。未来安全威胁不仅可能指向 DeepSeek 开发者本身, 还可能波及采用本地化部署的终端用户, 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当前, 我国已有学者关注到这一状况, 针对当前的法律制度框架难以应对多元的技术发展和风险漏洞, 提出以适应性治理来统筹应对发展和安全^[24]。在基础的安全性问题上, 应立足于统筹性视角构建系统性防护体系。

其二，使用主体进行二次开发以构建定制化模型过程存在安全风险。DeepSeek 大模型的重要特征之一正是开源性。从监管合规的角度分析，《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都明确要求，面向公众提供服务的定制化模型必须履行算法备案义务。然而，现有法规体系仍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算法备案范围界定不清、备案信息透明度不足以及法律效力定位模糊等方面^[25]。从法律规制的视角来看，要通过提升算法透明度和可解释性来完善问责机制、实现安全防护的目标，仍面临诸多实践性挑战。从流程链视角分析，二次开发的定制化模型存在多重安全隐患。首先，在数据采集阶段，若未经授权获取互联网文本、图像数据或包含个人信息的语料，且未进行充分脱敏处理，可能违反《著作权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规。其次，即使采用公共语料库进行训练，由于样本数量庞大，难以对每条数据进行全面审查，可能导致微调后的模型在特定场景下产生不合规输出。此外，定制化大模型的参数具有动态交互特性，其决策过程难以追溯，不仅可能导致使用方做出错误决策并遭受损失，还使责任界定变得更为复杂。这些因素都增加了 DeepSeek 大模型本地化部署的难度。

（二）服务层面：用户权益保障风险

DeepSeek 大模型的最终服务对象依旧落脚于人，理想的 DeepSeek 大模型本地化部署应用应是给人的工作插上“生产力”翅膀，辅助人能够更顺利地完成任务，乃至提升整个工作系统的效率。然而，在本地化部署 DeepSeek 大模型的实际应用场景中，用户权益保障面临多维度的系统性风险。

首先，多层次监管要求带来复合性挑战。以当前备受关注的医疗行业应用为例，部署机构需同时满足多重法规要求：既要遵循《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28 条关于敏感医疗数据单独授权的规定，又要符合《医疗卫生机构网络安全管理办法》中网络安全等级保护第三级标准的要求，还需满足《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对 AI 模型可解释性的强制性规范。在这种多法规交叉监管的环境下，大模型在本地持续训练过程中可能引发数据合规边界模糊化问题。特别是当用户数据经过多次迭代训练并融入本地化部署模型参数后，如何界定衍生数据的权属以及相关删除权的行使方式，目前尚缺乏明确的司法解释。这种法律规制的滞后性使部署机构面临潜在的法律风险。更值得关注的是，DeepSeek 大模型的本地化部署也可能加剧“技术黑箱”效应。尤其是当数据和服务器完全运行于企业内部闭环系统时，严重制约用户权利行使，例如隐私政策使用专业术语而不提供通俗解释，本地化部署后台抓取数据权限难以监管等。随着商业利益的不断增强，用户的知情权益保护可能面临更大挑战。

其次，人机主体的协同界限较为模糊。DeepSeek 大模型本地化部署的理想使用关系是人机协作。然而，从现有应用场景来看，大量场景存在人机替代的实际情况。以学术论文写作为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使用者具有透明度义务，确保学术诚信的履行、学术规范的演进^[26]。DeepSeek 大模型可作为理想的辅助工具在创作上发挥助力功能。然而，随着其本地化部署的推进，脱离了云服务器对数据的监管，本地化模型的数据处理和算法运行变得愈发隐匿。这不仅增加了监管难度，也使得 AI 辅助创作的内容鉴别和溯源面临重大挑战。目前，AI 辅助写作的规范主要依赖于学术期刊、教育机构等组织自行制定的规则和标准，例如通过设定 AI 贡献度上限等方式来划定人机协作的边界。值得注意的是，过度依赖大语言模型不仅可能损害创作者自身的权益，还可能影响其他参与主体的合法权益。因此，明确模型部署方在训练、审查和使用环节的具体义务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最后, 在本地化部署场景中, 知识产权风险呈现出独特的复杂性。这种部署模式涉及多方主体参与内容生成, 使得权属界定更加困难。尤其是在训练数据方面, 当部署方采用第三方数据供应商的标注数据进行本地训练时, 由于大量数据采购协议中的权属条款模糊不清, 致使模型产出物的知识产权归属处于法律空白状态。此外, 参与主体和链条的多元化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当使用者并非直接使用大模型, 而是使用第三方本地化部署的大模型所生成的具体内容时, 涉及的主体扩展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方、部署方和使用方, 这使得知识产权的界定更加复杂, 也为权责划分带来了挑战。

(三) 主权层面: 国别数字竞争风险

从全球发展态势来看, 世界已进入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战略竞争新阶段。各国在制度构建、标准制定、技术路径选择及发展战略等方面呈现出显著差异, 围绕大模型的国际竞争正在深刻重塑全球战略格局。

首先, 以技术为内核的生态体系竞争愈发激烈。当前, 发达国家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优势实施新型技术管控, 企图构建“数字宗主国—技术附庸国”的全球生态结构。在此背景下, DeepSeek 大模型突破了美国的算力垄断, 实现了发展中国家的技术突围。其开源特性体现了中国包容开放的技术发展理念, 这与 OpenAI 的发展轨迹形成鲜明对比。OpenAI 的创始投资人之一马斯克曾表示, 公司最初致力于 ChatGPT 的开源发展, 但最终演变为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的闭源模式。值得警惕的是, 随着大模型部署的深入推进, 国际数字竞争将愈发激烈。关键技术的“断供”风险严重威胁着本地化部署的可持续性, 尤其是供应链风险向基础软件层延伸的趋势更为危险。跨国企业在本地化部署过程中面临着与不同生态架构兼容的挑战, 加之他们对中国商用密码算法体系的排斥, 导致二次开发成本显著攀升, 本地化部署面临重大困境。DeepSeek 大模型力图用开源打破信任壁垒, 代码完全透明, 任何开发者都可以审查、修改和部署, 通过技术民主化来重建市场信任。闭源模型仅能依靠公司内部的研发团队, 其迭代速度在本质上与开源模型存在显著的数量级差异。DeepSeek 力图在技术栈通过模型本地化部署的定制化训练、私有化部署等实现盈利。DeepSeek 试图构建更为多元的应用场景, 在这一过程中, 本地化部署是重要环节, 必然是生态竞争中的焦点。在未来的理想链条中, 本地化部署企业通过 DeepSeek 提升效率、获取利润, 云端服务器收取一定的租赁服务费; DeepSeek 则基于自身专利和标准收取“生态税”进而获得盈利, 超越部分闭源开发公司直接收取费用策略, 形成开源生态体系。

其次, 技术标准、监管重心和发展战略的不一致, 可能导致由技术争端转向政治争端。当前, 中国、美国和欧盟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监管重心、发展策略均有所不同: 中国强调发展和安全并重, 美国更侧重发展, 欧盟更侧重于安全, 世界范围内缺乏人工智能发展的协同制度和机制^[27]。技术标准与地缘政治的深度融合已成为当前重要趋势。以 DeepSeek 大模型的发布为例,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数据安全”和“隐私风险”为由实施技术封锁。3月5日, 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宣布将 DeepSeek 列入“实体清单”, 污蔑其利用人工智能模型获取美国公民的生物特征数据。意大利、澳大利亚、爱尔兰等国紧随其后。意大利在苹果和谷歌应用商店下架 DeepSeek; 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以“可能存在的数据跨境风险”为由, 要求 DeepSeek 暂停在欧盟地区的服务; 澳大利亚呼吁民众谨慎使用 DeepSeek 的技术。与此同时, DeepSeek 公司的核心人才面临谷歌等科技巨头的高薪招揽风

险，凸显了技术主权争夺正在重塑全球人工智能产业格局的现实。在这场数字主权的博弈中，大模型本地化部署既是防御屏障，也是战略武器。发达国家试图凭借技术先发优势提前构建“人工智能霸权”，通过标准捆绑、数据黑箱和算法、算力垄断等手段巩固其主导地位。

最后，意识形态及文化主权争端日益激烈。DeepSeek 本身显示着一种文化创新与文明发展。梁文峰表示：“事实上，开源更像是一种文化行为，而不是商业行为，因为给予实际上是一种额外的荣誉，这样做的公司也会更具有文化吸引力。”^[28]巴西国家信息技术研究所前所长塞尔吉奥·阿马德乌认为，DeepSeek 的开源推动了大型语言模型的普及，使技术基础设施较为薄弱的小型企业、国家甚至个人能够在不依赖科技巨头产品或将数据交给这些公司的情况下，训练属于自己的“主权 AI”。在当前 DeepSeek 大模型本地化部署中，我们要防范服务器封闭性使其可能成为西方价值观渗透的新载体。如若监管和使用不当，本地化部署企业可通过设定文化参数权重，实现认知操纵。这种认知操纵具有技术隐蔽性，即模型在回答争议性问题时，通过注意力机制调控实现观点倾向性引导，产生文化适配挑战。新兴经济体更应通过自主创新与战略协作寻求突破，在技术自立与开放合作之间探索平衡发展之道。

四、DeepSeek 大模型本地化部署应用的治理路径

当前，DeepSeek 大模型处于发展应用的初期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是平安中国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要把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摆在首位，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要完善公共安全体系，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加强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安全等方面工作。要着力防范重点领域风险。”^[29]根据这一要求，应针对 DeepSeek 大模型本地化部署应用可以预见的风险以及已经暴露出的发展问题，开展针对性治理。

（一）治理思维：以适应性治理理念完善制度体系建构

适应性治理理念是我国学者针对当前人工智能发展中的思维困境、工具困境以及体制困境提出的治理理念。适应性治理具备灵活性和动态性，指应对外界变化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特征，多要素行动主体展开合作治理、信息交流等活动，提高治理灵活性和适应性的过程，适应多种治理场景^[30]。适应性治理的本质是通过制度体系与技术生态的协同进化，实现对风险不确定性的动态管控。在 DeepSeek 大模型本地化部署应用场景中，这一理念可通过如下几个方面实现。

首先，遵循动态演化的治理原则，实现制度与技术的协同发展。在未来的治理实践中，监管规则需要与 DeepSeek 大模型的研发、部署及迭代更新保持同步，以克服传统静态监管框架的滞后性问题。作为适应性治理框架下 DeepSeek 大模型本地化部署的核心原则，动态演化强调治理制度应具备与技术发展同步更新的能力，实现从风险识别到规则优化的全链条治理，确保监管规则能够及时适应模型迭代带来的新变化。在关键节点，应注重在治理激励中主动适应政策环境，组织架构上借鉴中国发展的历史经验，在确权分配中合理实现外部转化^[31]。动态演化原则的核心在于通过对制度体系进行数字化重构，赋予治理规则持续迭代与快速部署的能力。这一过程类似于软件系统的持续集成和交付机制，旨在构建出一套能够与技术革命进程相适应的现代化治理方案。

其次, 构建新型利益共联机制, 实现合作共赢。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可有效赋能公共服务体系, 提升不同服务的供给效能和资源要素配置水平。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独特优势有助于激活和整合资源要素, 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数字权利均等化^[32]。DeepSeek 大模型本地化部署不仅为使用主体创造了新的增量价值, 还引入了多元化的参与主体, 重构了既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因此, 在构建利益共享机制时, 需要特别关注数据所有权确认以及生成内容的价值评估等关键环节, 实现存量与增量利益的科学分配。例如, 在 DeepSeek 大模型部署实践中, 可以基于 token 计数等量化指标进行价值评估, 推动不同主体与行业间建立统一的跨领域协议框架, 从而实现计价标准的规范化和利益分配的合理化。

最后, 根据不同应用场景和风险类型, 结合技术特征与风险等级, 制定差异化的治理策略。当前, 我国在这个领域的监管一定程度上存在标准缺失、分级管理模糊等不足^[33]。在 DeepSeek 大模型本地化部署过程中, 要针对不同规模、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主体制定差异化的部署方案。例如, 对于金融、医疗和政务等规模较大、资金充足且对数据保密性要求较高的行业, 全本地化部署更有利于其安全稳定发展; 对于中小型互联网企业, 伪本地化部署更符合其实际需求和状况。在具体治理策略方面, 应针对不同行业的核心风险制定相应的防控预案, 实现对 DeepSeek 大模型本地化部署的合理运用。未来的人工智能相关法律法规不仅要针对人工智能采取分级分类使用风险指引, 也要延伸至对本地化部署应用场景的分级分类指导, 出台相应制度手段予以补足。

(二) 治理手段: 以弹性化制度工具推动规则科学更新

从世界范围看, 大模型技术与制度监管之间往往存在时序错配问题。这一矛盾在 DeepSeek 等大模型本地化部署过程中尤为突出。主流大模型每季度即完成一次重大迭代更新, 其技术演进速度远超传统立法进程所需的 2~3 年周期。这种显著的节奏差异使得现有监管框架难以有效应对大模型发展所带来的新兴风险与挑战。

其一, 基于 DeepSeek 大模型发展推动敏捷立法机制的技术实现。目前, 各界纷纷建议加快制定《人工智能促进法》。然而, 目前的讨论更多集中在人工智能技术本身, 对其本地化部署的探讨相对不足, 这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在相关立法的过程中, 可尝试建立动态立法沙盒体系, 探索允许试运行、试点突破性规则, 对本地化部署的预训练阶段、微调阶段和推理阶段如何强化监管实现多方探索, 强化对当下现实问题的重点部署。例如, 对于用户知情权保障的风险, 可强化智能合约驱动的规则引擎, 强制要求生成电子个性化告知书, 注重将法律术语转化为用户可读文本, 保障用户权益; 可设置一定容错区间, 以绝对禁止行为、相对禁止行为和安全行为等进行划分, 指导使用者开展本地化部署 DeepSeek 大模型。敏捷立法机制应注重实时动态监测、多元合作和信息反馈、强化针对性规则设定^[34], 实现立法对 DeepSeek 大模型本地化部署的前置保证。

其二, 构建完善的分级授权立法架构, 建立本地化部署的“中央立法—地方条例—行业公约”的三级规则内容体系。当前, 对人工智能立法模式有诸多讨论, 既有基于“央地”模式的传统立法建议, 亦有基于功能模块组合的立法倡导^[35]。基于实践发展所需, 建议可通过“中央—地方—行业”三级体系构建相关法规体系。在中央立法层面, 以《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现有数字法律体系为基础框架, 并在未来可能颁布的《人工智能促进法》中针对 DeepSeek 大模型本地化部署的特殊性设立重点监管领域。具体包括: 禁止使用未脱敏的个人生物特征数据进行

模型训练，禁止在未经安全评估的情况下向境外提供模型参数，禁止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领域部署未经国产化改造的国外框架等核心规制，从而明确监管边界。在地方立法层面中，更多是围绕省、地市级的行业促进规范条例进行设立。地方立法通常具备一定灵活空间，可基于区域实际发展情况，通过制定相关鼓励清单、豁免审批目录等促进性措施，激发基层创新活力，推动区域经济发展。DeepSeek 大模型本地化部署亦需要一定的部署公约和标准建设，由行业协会主导制定的自律性公约将成为重要的补充治理工具。行业公约应重点联合需要部署 DeepSeek 大模型的头部企业参与，加强与现行法律法规的衔接，并在实践中经过检验成熟后，申请升级为地方标准或行业强制性规范。三级规则体系并非孤立运作，而是构建兼具刚性与灵活性、统一性与差异性的治理框架，平衡国家安全、地方创新和行业自治等多重治理需求。

（三）治理格局：以多元主体协同完善生态治理路径

DeepSeek 大模型本地化部署治理的复杂性源于技术黑箱性、影响广泛性和风险不确定性三重特征。DeepSeek 大模型作为 AI 技术的集大成者，其治理复杂性远超传统技术系统，单一主体治理模式已难以应对技术演进中的伦理风险、安全漏洞和权责争议等问题。对此，亟需构建政府主导、企业担责、科研支撑、公众参与、行业自律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体系。

首先，政府和企业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政府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引领者，应充分发挥其在规则制定和底线保障方面的基础性职能。当前，DeepSeek 大模型本地化部署尚缺乏具体的制度规范和操作标准，政府主体应划定技术应用的伦理红线和安全底线，发挥引领者和监管者作用。可建立内部跨部门协调机制，实现监管数据的互通，推动公共数据的开放，以提升模型训练和部署的质量。同时，强化备案登记，以确保安全底线的维护。企业作为技术创新和责任履行的主体，需构建商业价值与社会责任的协同并进机制。在硬件层面，无论是开发者还是使用者，都应对自身的硬件设备及供应链进行严格的筛查，以确保硬件的可信性。此外，企业需重视用户参与机制的完善，对自身的文本和生成内容进行多维度的审核，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并强化算法的价值对齐，确保技术发展符合伦理规范。

其次，科研机构、行业协会以及公众个体发挥着协同和辅助作用。高校和科研院所应承担第三方的辅助评估角色。基于当前的公共数据以及行业发展诉求构建评估指标体系，开展前沿技术的预研，培养针对性开发的应用型人才，并可开发公共实验平台供支持企业进行测试。公众参与是治理合法性的基础，其关键在于完善公众的知情权保障。因此，需要在未来的立法过程中强化听证、备案及其他程序性流程，拓宽沟通渠道，提升公民的技术素养，使其能够更好地参与和使用 DeepSeek 大模型。同时，还需探索数据权益分配机制，在部分试点地区尝试允许个人通过贡献数据获得模型收益的分成。行业组织应填补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治理空隙，制定团体标准和自律公约，通过软性手段促进行业发展，搭建争议调解平台，开展使用主体应具备的能力认证，从而在 DeepSeek 大模型本地化部署过程中，以柔性治理的理念协助处理不同主体之间的纠纷。

最后，治理格局需从多元协同治理逐渐转化为多元协同“生态化治理”。从主体维度来看，需要纳入更多新型参与者。当前，DeepSeek 大模型以及其本地化部署后的参与主体能否作为独立法人主体尚处于否认阶段，但是未来赋予人工智能技术人格亦是一种探索^[36]，如 DeepSeek 大模型自身通过可解释性接口参与治理决策。从监管维度来看，可以重点发展“智慧化监管”技术，利用 DeepSeek

大模型对其自身及本地化部署后的参与主体进行监管, 构建动态演进的治理算法。从空间维度而言, 应建立虚实融合的治理场域, 在元宇宙环境中模拟不同治理方案的效果。特别是在本地化部署后, 存在更加多维的硬件空间、软件空间、原生云端空间和次生使用空间等, 这些空间可以进一步融合转化, 实现治理现代化。在文化维度上, 需要培育“技术向善”的生态文化, 使负责任的创新成为行业的共同基因; 更多开展不同形式的文化交流, 形成对技术使用的文化共识, 尊重文化差异, 最终形成关于技术及文化的合作倡议宣言。

(四) 治理导向: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化国际合作发展

DeepSeek 大模型的开源性特征注定其不属于某一国家、某一领域, 只有通过世界的力量才能使其高质量发展。全球化发展与本地化部署应用之间的张力, 要求各国突破零和博弈思维,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构国际合作范式。DeepSeek 大模型作为中国自主创新的技术代表, 其本地化部署不仅是技术落地的工程问题, 更是全球治理规则重构的战略议题。面对技术霸权、数据主权争端、伦理标准冲突等挑战, 需运用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合作机制, 在尊重文化多样性与发展差异性的基础上, 推动形成技术可控、利益均衡、责任共担的 AI 治理新秩序。

伦理治理是人工智能治理的重要内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可有效协调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二者关系^[37]。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 DeepSeek 大模型本地化部署提供了国际合作的價值基石。这一理念基于共同安全观、共同利益观和共同责任观, 摒弃对绝对安全的追求, 超越零和博弈, 倡导共同承担治理成本。从技术特性来看, 大模型的训练依赖全球数据资源, 其影响力跨越国界, 尤其在跨境虚假信息传播方面, 可能带来难以预估的后果。此外, 深度伪造和算法歧视等风险具有全球外溢性, 单个国家难以独自应对。从发展的角度来看, 全球主要的 AI 算力和发展集中于美国、中国和欧洲, 一些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面临技术边缘化的风险。因而,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国际合作框架, 是未来 DeepSeek 大模型本地化部署应用走出去、干得好、做得快的必要条件。

在具体机制设计中, 践行多元包容思维。DeepSeek 大模型本地化部署应用过程中, 应具备包容性创新思维, 保留各国基于文化特性的治理空间。建立大模型治理的国际标准互认机制, 重点关注国际间个人数据与匿名化训练数据流动规则的区分。鉴于 DeepSeek 大模型的开源特性, 可以在线上建设开源模型社区, 推动 DeepSeek 基座模型的定向开放, 吸引全球开发者贡献优化模块, 从而降低对欧美单一主体的技术依赖。DeepSeek 大模型的全球化部署不仅是技术创新扩散的过程, 更是人类文明协同进化的试验场。中国科技企业不仅要在芯片封锁和算法瓶颈上实现“硬实力”的突破, 还需培育“软实力”, 推动规则互认和价值共鸣。未来, 随着量子计算、脑机接口等颠覆性技术的融合, 国际合作将向“神经层”深化, 不同文明的知识图谱将被重新编码, 最终在数字共同体中实现“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的治理新境界。

参考文献:

- [1] 倪浩, 甄翔, 于文. 习近平会见国际经济组织负责人 [N]. 环球时报, 2024-12-11 (1).
- [2]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二〇二四年七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N]. 人民日报, 2024-07-22 (1).
- [3] 吴汉东. 人工智能时代的制度安排与法律规制 [J].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17 (5): 128-136.

- [4] 陈冬梅, 王俐珍, 陈安霓. 数字化与战略管理理论——回顾、挑战与展望 [J]. 管理世界, 2020 (5): 220-236.
- [5] 陈德球, 胡晴. 数字经济时代下的公司治理研究: 范式创新与实践前沿 [J]. 管理世界, 2022 (6): 213-240.
- [6] 陈健. 中国数字现代化对西方数字现代化的超越与重构 [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4 (4): 38-49.
- [7] 陈锐, 江奕辉. 生成式 AI 的治理研究: 以 ChatGPT 为例 [J]. 科学学研究, 2024 (1): 21-30.
- [8] 邓建鹏, 赵治松. DeepSeek 的破局与变局: 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监管方向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 99-108.
- [9] 齐芳, 杨舒, 詹媛, 等. DeepSeek “破圈”意味着什么 [N]. 光明日报, 2025-02-28 (1).
- [10] 谢新水. 智能跃迁、开源创新与主权 AI: DeepSeek 现象推动人工智能开源创新生态体系建设 [J]. 电子政务, 2025 (3): 40-48.
- [11] 蔡天琪, 蔡恒进. DeepSeek 的技术创新与生成式 AI 的能力上限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 136-143.
- [12] 代金平, 覃杨杨. DeepSeek 类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中华文明发展传播研究 [J/OL].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14 [2025-05-28]. <https://link.cnki.net/urlid/50.1023.c.20250305.0808.002>.
- [13] 王闻萱, 王丹. 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 DeepSeek 的核心特征、价值超越及未来路向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2): 94-107.
- [14] Yuan J, Gao H, Dai D, etc. Native Sparse Attention: Hardware-Aligned and Natively Trainable Sparse Attention [J]. arxiv preprint arxiv: 2502.11089, 2025.
- [15] 郭蕾蕾. 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教育变革: 机制、风险及应对——以 DeepSeek 为例 [J]. 重庆高教研究, 2025 (3): 38-47.
- [16] 涂良川, 高镁琪. 大模型考问智能本质的哲学叙事——从 DeepSeek 效应的技术叙事谈起 [J].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5 (2): 50-58.
- [17] 鲁传颖. 从 DeepSeek 禁令看美国技术焦虑 [J]. 当代世界, 2025 (2): 76-77.
- [18] 钱子瑜. 论数据财产权的构建 [J]. 法学家, 2021 (6): 75-91.
- [19] 刘珊, 许旭波, 奕步. 全国首创! 广州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全面接入 DeepSeek [N]. 南方日报, 2025-02-28 (3).
- [20] 2024 年通信业统计公报 [EB/OL]. (2025-01-26) [2025-03-02]. https://www.miit.gov.cn/gxsj/tjfx/txy/art/2025/art_641c048c5d4f4e308098bf6c4e3dcb4a.html.
- [21] 周辉. 人工智能基础模型安全风险的平台治理 [J]. 财经法学, 2024 (5): 3-22.
- [22] All Systems Operational [EB/OL]. (2025-03-04) [2025-03-04]. <https://status.DeepSeek.com/>.
- [23] 白云怡, 赵觉理. 应对 AI 安全风险, 有三方面可以入手 [N]. 环球时报, 2025-02-27 (7).
- [24] 张凌寒. 人工智能法律治理的路径拓展 [J]. 中国社会科学, 2025 (1): 91-110.
- [25] 韩世鹏. 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备案的法律属性与控制路径 [J].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24 (2): 119-128.
- [26] 程睿, 秦小红. 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者的透明度义务——以 ChatGPT 介入学术论文创作为视角 [J]. 学术研究, 2024 (3): 14-18.
- [27] 吴建南, 马太平, 周磊. 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的规则体系: 国际比较与协同进路 [J]. 中国行政管理, 2024 (12): 6-14.

杨骏, 李长健. DeepSeek 大模型本地化部署应用: 功能检视、新兴风险及治理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3): 69-83.

- [28] DeepSeek 为什么要开源? 这可能与人工智能的领导权息息相关 [EB/OL]. (2025-02-13) [2025-03-11]. https://roll.sohu.com/a/858859016_115479.
- [29]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把平安中国建设推向更高水平 [N]. 人民日报, 2025-03-02 (1).
- [30] 谢潇, 罗世杰. 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动态风险及适应性治理 [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5 (1): 112-125.
- [31] 王哲, 薛澜, 赵静. 开源创新组织的创新成本演化与动态治理机制 [J]. 公共管理评论, 2024 (4): 108-138.
- [32] 李长健, 杨骏.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数字乡村治理实践、风险及其防范研究 [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6): 107-115.
- [33] 张军荣.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溢出风险及监管规则研究 [J]. 行政法学研究, 2025 (2): 129-141.
- [34] 马国洋. 论“人工智能法”框架体系的多维动态模式 [J]. 东方法学, 2025 (1): 186-200.
- [35] 苏宇. 人工智能法律治理的框架选择: 从“分类分级”到“模块组合” [J]. 中国法律评论, 2025 (1): 63-74.
- [36] 梅夏英. 伦理人格与技术人格: 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的理论框架 [J]. 中外法学, 2025 (1): 26-44.
- [37] 李伦. 人工智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工智能伦理治理 [J]. 道德与文明, 2025 (1): 15-22.

责任编辑: 林华山 校对: 卢媛



文化安全视域下中国影视 IP 的 叙事突围与新范式构建

——基于《哪吒》与漫威系列电影的比较分析

魏郡¹ 卢言臣²

(1.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350;

2. 天津师范大学 国家治理研究院, 天津 300387)

摘要: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国际文化场域中, 文化安全正日益体现为一种复杂的叙事权互动。一段时期以来, 西方文化工业依托资本积累、技术优势与全球传播网络, 塑造了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叙事体系。其中, 以漫威电影为代表的超级英雄叙事范式, 在全球范围内构建起一套特定的文化认知框架, 影响着受众的价值取向和身份认同。比较《哪吒》与漫威系列电影发现, 二者呈现集体共生哲学与个人英雄主义的叙事差异、技术伦理与技术决定论的范式分野、多极化秩序想象与单边拯救叙事的实践张力。《哪吒之魔童闹海》等国产影视 IP 正通过结构性叙事创新, 拓展文化表达的自主空间, 创新出“本质祛魅—话语重置—价值反嵌”的叙事范式。《哪吒》系列电影的成功表明, 在全球文化互动中, 应在保持文化主体性的同时, 坚持开放包容、交流互鉴, 推动实现文化安全观的范式升级、重构现代性话语以及塑造文明对话新格局, 最终迈向“美美与共”的多元共生图景。

关键词: 文化主体性; 文化安全; 叙事体系; 文明互鉴; 影视 IP; 《哪吒》; 漫威

中图分类号: G122; J9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5) 03-0084-15

DOI: 10.13946/j.cnki.jcqiis.2025.03.007

作者简介: 魏郡,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卢言臣, 天津师范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助理。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重大突发事件信息公开质量研究”(20&ZD141)

引用格式: 魏郡, 卢言臣. 文化安全视域下中国影视 IP 的叙事突围与新范式构建——基于《哪吒》与漫威系列电影的比较分析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3): 84-98.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1]《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和联合国成立 80 周年之际关于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指出，“独特性是多极化世界的基础，尊重各国和各国人民的独特价值观念体系”，“坚决反对将人文合作政治化，反对采取歧视性、排他性手段，反对通过输出有害思想和错误观念，动摇他国文化主权根基”。

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文化安全不仅是应对外部文化侵蚀的防御性策略，更是塑造国家文化主体性的战略工程。长期以来，西方资本与技术主导的文化工业依托全球传播渠道，塑造了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话语体系。其中，以好莱坞文化产业为代表的超级英雄叙事范式，通过跨媒介叙事、英雄神话构建等，在全球形成了一种高度同质化的叙事逻辑，对受众的文化认知、价值观念及意识形态认同产生显著影响。在此背景下，寻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表达路径，成为学界关注的议题。

文化叙事创新是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应“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1] 45-46}。文化叙事创新不是对传统文化的机械复述，也非对西方模式的简单移植，而是通过多维路径实现对文化主体性的再表达，构建兼具民族特色与国际传播效能的叙事体系。作为文化生产的重要载体，影视 IP 的叙事创新呈现出拓展消费市场与提升文化影响力的双重意义。近年来，国产动画电影正以突破性实践回应这一命题。其中，《哪吒之魔童降世》及其续作《哪吒之魔童闹海》通过对传统文化元素的符号学重构和现代化演绎，在全球文化互动场域中开辟出一条迥异于漫威宇宙英雄叙事的新路径。其基于文化基因的创新转译，激活了传统美学的现代生命力。《哪吒》系列电影在演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内核的基础上，构建起具有本土文化特质的叙事体系，为多元文化共生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当前学界关于文化安全与影视 IP 叙事范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文化安全作为国家安全重要组成部分的理论与实践探讨。有研究指出中国的文化安全观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思想，以意识形态安全为核心要义；另有学者聚焦文化安全研究的出场及核心概念建构，指出文化安全研究是中国学术界在吸收国外研究成果基础上的自主探索^[2]。在实践路径探索中，相关研究呈现多维度推进态势。有学者提出以法治化为突破口，通过完善文化安全法律保障体系破解治理效能滞后难题^[3]；另有研究立足数字时代新变局，提出需建立技术自主创新机制与数字规制体系，防范文化领域的“数字殖民”风险^[4]。二是关于以好莱坞为代表的西方叙事范式演变及其文化输出机制研究。在全球化文化产业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以好莱坞为代表的文化工业体系成为文化安全研究的重要参照对象，其叙事范式演变呈现出双重驱动特征。技术维度上，有学者指出其通过多元宇宙叙事、游戏化机制植入与元宇宙交互体验等前沿手法，构建起具有高度沉浸性与延展性的叙事系统^[5]。产业维度上，漫威电影依托角色谱系化开发、模块化叙事架构与全媒体矩阵传播模式，形成文化产品的持续影响力输出机制^[6]。三是基于技术赋能与文化自信的叙事创新路径探索。作为文化传播的核

心载体，叙事体系的现代化转型成为应对全球文化竞争的关键突破口。现有研究从理论建构与技术应用双维度，构建出叙事创新的立体路径。在理论认知层面，学者们提出了创新性分析框架：强调通过叙事图式的动态转换与本土化重构，增强中国叙事在全球语境下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7]；从技术哲学维度聚焦数字技术引发的叙事场域嬗变，主张构建“价值引领—技术赋能—动态融合—多元治理”四位一体的创新框架^[8]。在实践创新层面，研究呈现鲜明的技术驱动特征。有研究指出，作为数字时代文化叙事的标杆案例，《黑神话：悟空》通过对传统文化符号进行数字解构，在虚幻引擎中重构具有东方美学特质的叙事空间，成功打造出兼具文化辨识度与全球传播力的 IP 矩阵^[9]。

然而，既有成果对文化安全视域下西方影视 IP 与中国影视 IP 叙事对比、中国影视 IP 如何在全球文化产业链中创新话语范式等议题，仍缺乏深入探索。鉴于此，本文立足文化安全与文化主体性视角，尝试通过《哪吒》与漫威系列电影的叙事对比，探讨中国影视 IP 的叙事突围路径，为构建更加多元、包容的叙事空间提供理论参考。

二、“解构与重构”：漫威与《哪吒》系列电影的叙事对比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双重浪潮中，电影中的东西方叙事差异渐趋显现。漫威电影以超级英雄叙事为载体，通过价值观编码构建全球文化影响力，而中国《哪吒》系列电影则通过对本土文化的创造性转译，开辟出迥异于西方的表达路径。这一叙事范式的分野折射出不同文明的价值取向，也在互动交流中催生新的表达范式。

（一）漫威电影的叙事框架与价值表达

漫威电影依托视觉奇观与商业运作，构建起跨媒介叙事矩阵与多维传播网络，将超级英雄塑造为具有全球辐射力的文化符号。漫威电影通过媒介融合策略将个人英雄主义、技术赋权与单边拯救叙事深度整合，在突破地域文化屏障的基础上将文化编码植入受众认知维度，最终实现对全球文化认同的深层形塑。

1. 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视觉化转译

作为全球化语境下文化生产的重要载体，漫威电影的叙事框架已超出单纯娱乐文本范畴，演变为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影像转译。其核心叙事逻辑从双重维度展开。一方面，漫威电影以个体英雄成长轨迹为叙事主轴，将市场驱动嵌入超级英雄的能力构建体系。例如，《钢铁侠》的装甲迭代映射科技创新的资本竞赛，《黑豹》的振金资源开发暗喻全球资源分配的话语争夺。另一方面，漫威电影在构建“技术救赎”的叙事母题中，将跨国科技资本的利益诉求美化为拯救世界的方式。这一叙事策略以斯塔克工业的军事科技垄断与瓦坎达的稀有资源主权之争，将新自由主义全球治理体系的内在矛盾具象化。它既标榜自由市场的“普世价值”，又通过技术垄断强化权力结构的不平等性。漫威电影的文化生产模式在为科技资本全球扩张提供价值背书的同时，也在话语层面实现了对全球治理特定“合法性”的再生产。正如哈维所言，“资本积累将自己的罗网扩散到了全世界愈发宽广的范围，最终将所有人所有东西都卷进了资本的流通过程”^[10]。

漫威电影构建的“救世主原型”与福柯提出的“自我技术”理论高度契合。福柯认为，“自我技术”即个体通过自我规范或借助他人协助，对躯体、思想、行为及存在方式进行系统性操控的实

践过程, 其目的在于实现自我转化, 达成幸福、智慧或“自身成为道德主体”等理想状态^[11]。漫威电影将技术具象化为超级英雄的道德主体性建构。如《蜘蛛侠》中“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的核心伦理, 正是通过自我规范将个体塑造为承担社会道德责任的主体。该叙事模式虽强化了个体能动性, 但同时会形成对集体行动的消解效应。在此种叙事模式影响下, 制度性变革诉求被象征性的个人救赎所取代, 社会责任渐趋从结构性反思转向对“道德完人”的想象性期待, 最终在现实映射中构筑起个体救赎与集体行动之间的伦理悖论。

在全球治理层面, 漫威电影通过全球安全叙事的构建, 深刻介入并形塑了国际治理话语的合理性框架。漫威电影以超国家危机为叙事支点, 将特定干预编码为维护全球秩序的正义逻辑。如影片《复仇者联盟》中, 面对洛基入侵纽约, 复仇者联盟采取跨国行动。影片将私力救济包装为具有道德“正当性”的全球治理实践。这一叙事策略在文化场域中强化了特定干预行动的正当性, 更在想象层面构筑起理想化的全球安全共同体图景。在此框架下, 观众在符号消费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某种权力运作的“正当性”叙事。

2. 全球文化认同的构建与运作逻辑

漫威电影通过多维叙事构建全球文化认同, 其策略背后有一套完整的运作逻辑。在角色塑造方面, 漫威电影突破地域界限, 使得超级英雄史诗既保持文化表达的多样性(如《黑豹》对非洲未来主义的探索), 又形成价值内核的统一性(通过英雄的成长叙事传递“普世”的人性光辉)。漫威电影采取“全球在地化”策略, 赋予地方文化以全球叙事权重, 如将东方武术融入复仇者战术体系, 创造出文化参与的平等幻象。在此过程中, 影片引导观众认同英雄个体, 并实现对漫威文化版图的想象性归属。在文化传播方面, 视觉奇观与数字媒介的强传播性加速了漫威宇宙的文化认同生成。特效技术创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感, 使得文化通过视觉符号突破语言壁垒, 转化为全球观众共享的情感密码。全球同步上映机制打破时空界限, 社交媒体的话题发酵将观影体验转化为文化身份标识, 观众通过弹幕、同人创作、预测分析等方式实现叙事再生产。这种沉浸式、参与式文化消费使电影从单向输出跃升为观众主动编织意义网络的互动场域。此外, “迪士尼+”的流媒体布局使得叙事空间得以延伸。最终, 在“技术—资本—叙事”的协同推进中, 漫威电影成功将娱乐产品升华为承载“全球想象”的文化母体, 形成文化认同培育的新模式。

数字时代, 全球文化互动呈现新的实践形态。漫威电影通过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视觉化转译、科技神话的史诗性建构以及跨媒介叙事的沉浸式延展, 创造出具有全球感染力的文化符号系统, 在吸纳全球受众文化反馈的过程中完成意义的再生产。在此种文化互动中, 各文化主体面临着双重挑战与机遇: 一方面, 应保持自身文明传统的主体性根基, 警惕文化同质化风险; 另一方面, 应主动参与全球文化网络的构建, 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表达。

(二) 《哪吒》系列电影的叙事解构实践

《哪吒》系列电影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叙事基点, 对古典文本进行了现代性转译, 对国际话语权力结构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影片将“共生”理念确立为核心叙事伦理, 通过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技术理性崇拜, 重构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网络。影片以视觉奇观为载体, 将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思想编码为具有全球传播力的文化符号, 在维护文化主体性的同时, 创造了跨文明对话的有效接口, 展现出群体协作、文明互鉴的世界观转向。

1. 集体共生哲学与个人英雄主义的叙事差异

《哪吒》系列电影通过“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核心宣言，在主体性建构层面完成了对中国传统“共生”哲学的当代转译。这一叙事逻辑对西方个人英雄主义的文化想象作出了深刻回应：哪吒的成长路径并非对既定秩序的简单反叛，而是在“天劫咒”的宿命框架中，演绎着个体生命与自然法则的共生共演。其叙事张力不在于主体对客体的征服，而是在天地化育、伦理实践和历史脉络中完成自我超越。这一叙事模式突破了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彰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辩证智慧。影片将个体自由置于宇宙整体性的维度中重新诠释，在坚守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创造出具有东方哲学特质的新型英雄叙事范式，为当代文化创新提供了富有启示意义的实践样本。

不同于西方个人英雄主义的叙事逻辑，哪吒的奋斗始终围绕着个体与群体、个体与国家的动态平衡展开。《哪吒》系列电影将个体生命轨迹嵌入集体记忆的网络之中，展现出中华文化的集体主义精神谱系^[12]。这一叙事结构深刻反映了中华文化对社会关系的系统性理解：个体价值的实现不是孤立存在，而是作为集体记忆的有机组成部分获得意义。影片通过代际传承的东方叙事范式，将哪吒的命运轨迹编织在宗法伦理与师承体系的经纬之中，这与漫威电影中蜘蛛侠“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原子化成长路径形成鲜明对照。李靖夫妇的亲情羁绊、敖丙与哪吒的世代恩怨，共同构建出东方文明的“关系本位”价值网络。《哪吒》系列电影的叙事策略既重塑了“天命”与“抗争”的传统母题，将个体反叛升华为集体协商的智慧，又通过代际伦理的具象化呈现，在文化基因层面重构了英雄成长的集体记忆框架。哪吒的莲花重生不仅是物理生命的延续，更是宗族伦理的当代转译和对共同体的归属确认。影片在“托莲重生”、以三头六臂对抗不公的视觉奇观中，完成了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价值序列的现代性诠释，塑造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创新表达重建集体认同的成功实践。

2. 技术伦理与技术决定论的范式分野

《哪吒》系列电影对技术本质的探讨，直指工具理性批判的核心议题，揭示出技术在权力逻辑主导下的异化风险。申公豹借助符咒术操控哪吒、敖丙命运的情节，实则映射技术在特定治理结构中可能被转化为操控个体、塑造社会秩序的权力工具。技术哲学视域下，技术并非中立，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与文化价值的嵌套中生成意义。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如果我们把技术当作某种中性的东西，我们就最恶劣地听任技术摆布了；因为这种观念虽然是现在人们特别愿意采纳的，但它尤其使得我们对技术之本质茫然无知。”^[13]当技术脱离道德规范与价值理性的约束，仅作为实现特定目的的工具，其功能性优势便可能异化为支配性力量，使个体主体性让位于技术所塑造的权力结构。这一逻辑与西方技术哲学中的工具理性批判相契合，揭示了技术在资本、权力驱动下导致人类存在方式的物化与规训危机。相较而言，漫威电影的超级英雄叙事往往以技术作为社会进步的象征，在强调科技赋能的同时，忽略了技术可能带来的伦理风险、权力不对称以及主体规训等问题。

生态智慧的视觉建构在“山河社稷图”水墨美学的意象中得以深化，在数字化表达的框架下展现出“天人合一”宇宙观的当代表达^[14]。这一自洽的生态系统不仅是自然景观的形态再现，更是对中国传统生态哲学的转译，其内在逻辑契合深生态学的核心思想。深生态学批判浅层生态学所推崇的资本驱动型、规模化技术路径，主张采用“中间的、适宜的和民主的技术”以促进生态系统长期稳定^[15]。这一理念与中国哲学中的阴阳五行观念高度契合，即任何技术的嵌入与发展必须置于生态

整体的均衡关系之中,“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16]。在此视角下,数字技术的运用应超越工具理性,回归生态智慧范畴,使其成为维护生态秩序、优化人与自然关系的媒介。

身体政治的叙事编码不仅关涉身体的能动性塑造,更是文化体系对个体身体规训与赋权方式的象征性表达。以哪吒的三头六臂法相金身为例,其形态并非单纯的战斗力增益,而是中国传统生命哲学的象征性再现。其映射出《黄帝内经》所揭示的“形神合一”原则,即生命体在内在精气的自我修炼与转化过程中,实现生理与精神的高度契合,从而突破原有的身体界限,抵达更高层次的存在状态。这一思维逻辑与《易经》“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技术观相呼应,强调通过自然法则与自我理性的极致探索,实现生命本体的升华。相较之下,现代技术理性主导下的西方身体增强逻辑更多依赖外部物质的介入,如钢铁侠借助机械装甲赋能个体。由此可见,不同文化体系下的身体政治建构,展现出不同的技术路径与意义生产机制:中国传统语境更强调内在生命力的自我调适与演进,而现代技术理性则倾向于以外部技术手段实现身体的功能跃迁。

3. 多极化秩序想象与单边拯救叙事的实践张力

在全球治理体系转型中,文化叙事既是价值观传递的软性载体,也是国际秩序想象的重要场域。《哪吒》系列电影通过创新叙事,彰显出多元主体协作治理的重要意义。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理性”理论,为理解这一叙事功能提供了理论框架——有效的公共决策不应诉诸单一权力意志或科技治理,应建立在多元主体平等对话基础上,生成共识性治理结构^[17]。面对“天劫降临”危机,《哪吒》系列电影并未复刻《复仇者联盟4》的精英决策模式,而是创造性地构建起涵盖民众、修仙者、龙族在内的多元协商治理体系。哪吒与敖丙联手破鼎、李靖夫妇倾情动员、太乙真人法器支援,多元主体共同编织出立体的协作网络。这一叙事逻辑展现出一种更具东方智慧的社会秩序想象。社会稳定不是依赖少数精英的决策能力,而是通过多元主体的互动实现动态平衡;危机治理不是单向度的权力执行,而是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协作实践。

《哪吒》系列电影的创新叙事实践表明,真正的文明进步不在于消灭差异,而在于建立承认差异、尊重共生的新秩序想象。这一认知取向在《哪吒》系列电影的叙事框架中得到了富有启示性的回应。影片中,龙族与陈塘关的冲突不仅构成叙事张力,也映射出文明互鉴的可能性。电影并未止步于冲突呈现,而是以“万龙甲”的集体献祭为叙事支点,提供了一种超越性解答。敖丙将龙族鳞片化为护体战甲的意象,在完成个人重构的同时,更隐喻着不同文明形态的共生可能——承认差异、尊重异质性,在相互包容、交流互鉴中实现文明价值的升华。这一叙事策略恰与当代全球治理转型形成精神共振,面对单边主义危机与传统霸权模式的结构瓶颈,国际社会正在探索更具协商性的治理新路径。《哪吒》的叙事由此获得双重价值:在文本层面,它突破了超级英雄叙事的个体中心主义;在全球治理的话语场域中,影片创造性地为构建跨文化理解与共生提供了具有东方智慧的叙事方案。

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在全球治理领域催生着叙事范式的深刻转型。《哪吒》系列电影的叙事逻辑与这一理念构成隐秘互文。不同于漫威电影将异质文明他者化的权力叙事,影片创造性地开辟出“美美与共”的文明互鉴路径。当哪吒与敖丙携手抵抗天劫、打败无量仙翁时,托起的不仅是视觉奇观,更是对文明共生可能性的诗意思象,这种想象正在数字时代的文化场域中生长出新的意义。通过这一叙事革命,电影在完成文化自信现代性转译的基础上,更为探索全球治理新范式提供了思路。

三、叙事突围：文化叙事新范式的三维构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文化建设来说，“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18]。长期以来，西方中心主义构建的“文明—野蛮”“现代—传统”等二元叙事，制约着全球文化多样性的良性互动。在此背景下，以《哪吒》系列电影为代表的中国文艺作品，正通过“本质祛魅—话语重置—价值反嵌”的创新叙事，探索兼具包容性与多元解释力的新范式。

（一）本质祛魅：解构西方中心主义认知框架

在全球文化交流的历史演进中，西方中心主义对全球文化话语体系的塑造产生了广泛影响。本质祛魅的核心任务在于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既定认知范式，使文化表达摆脱单一叙事逻辑的束缚，推动文明交流迈向更平等的方向。正如爱德华·萨义德所言：“西方文明”这个概念从本质上来说是无意义的^[19]，东方与西方的划分是历史塑造的结果，而非固定不变的文化现实，这种二元划分往往忽视了各文明的内部多样性与相互影响。因此，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模式，关键在于实现全球文化体系的多元价值认同。

本质祛魅的关键在于对既有文化权力结构的反思与重构，其核心目标是超越西方现代性话语的单一普遍性预设，推动多元文化主体间的平等对话。这一过程涵盖三个层面。一是对“传统—现代”线性史观的批判。线性史观将历史发展视为单向演进的过程，使非西方文化被固化为“前现代遗存”，忽视其在当代的动态性与创新性。因此，祛魅的首要任务即揭示非西方文化的动态特征，使其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创造性资源。二是对文化进化论的价值反思。西方主导的文化进化论基于等级化的文化认知框架，将西方模式自诩为人类文明的高级形态，忽略了不同文化体系的独立价值与多元发展路径。破解这一结构，需要构建更加开放、多元的文化发展逻辑，使不同文明在平等对话中共同塑造人类未来。三是对审美现代性标准的重新审视。现代美学话语体系多以个人主义和技术理性为核心，文化价值往往被边缘化。现代文化话语的交流共生，需要在尊重传统文化精神内核的基础上，构建更加信任、包容的审美体系。

本质祛魅的逻辑重塑机制遵循历史、文化、价值三重祛魅路径。一是历史维度祛魅，强调打破文化静态化的认知模式。文化不是凝固的过去，而处于永恒流变中。祛魅过程应揭示文化传统的动态性，使传统文化从被动承继的历史遗产转为主动创新的资源宝库，在时代精神的浇灌下持续生长。二是文化维度祛魅，强调主体性重构。非西方文化往往被简化为异域符号，其深层价值被遮蔽。祛魅过程须推动文化从被动再现转向主动表达，通过现代适应性创造，在全球文化体系中建立有效对话。这一过程与历史维度祛魅相辅相成，强调文化传统的现代适应性与再创造能力。三是价值维度的祛魅，强调非西方文化价值的再定位。祛魅过程应注重揭示非西方文化的内在理论逻辑，推动文化交流向平等共生模式转型，使非西方文化在全球语境中重获话语权。

在实践层面，本质祛魅的具体策略包含以下维度：一是符号能指的当代重组。例如，《哪吒》系列电影将“魔丸”这一传统意象进行数字化编码，突破“天赋异禀”的固化认知，使传统文化符号在保持辨识度的同时，获得符合现代审美的表达形式^[20]。这一重组在延续原型象征力量的同时，赋予其参与全球文化对话的现代性接口。二是叙事母题的再创造。文化创作应通过对经典母题的重新演绎，使文艺作品在保留传统文化精神内核的基础上注入时代价值，促进形成兼具历史厚度与现

实意义的文化表达^[21]。三是价值体系的拓扑转换。文化创作应在坚守文化主体性的同时突破地域界限, 促进全球文化场域生成新的意义网络, 推动跨文化深度对话^[22]。

(二) 话语重置: 构建多元文明的平等对话机制

构建多元文明的平等对话机制, 正成为数字时代全球文化传播的重要命题。以漫威电影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叙事, 将科技信仰与个人英雄主义等价值观编码进视听语言^[23], 形成了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传播范式, 塑造着全球受众的文化消费习惯。面对这一文化境遇, 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逻辑显得尤为重要。这要求文化实践者既要清醒认知既有文化范式的权力运作机制, 更要积极探索多元文明的对话可能, 推动全球文化在文明互鉴中向更高形态演进。

文化话语体系的拓展不是简单的对抗或拒绝, 而是通过文化融合与创新表达, 打破单一叙述逻辑, 构建具有主体性的话语体系^[24]。正如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理论所指出: “‘第三空间’本身就是一个混杂地带, 这种地带既容纳同一又容纳差异”, 而居于其间不同文化产生的误解“具有积极意义, 最终结果就是产生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新生事物”^[25]。相较于西方主流叙事中的线性英雄成长模式, 东方哲学强调循环与辩证逻辑。这一特质可丰富故事层次与文化意涵。《哪吒》系列电影正是通过“山河社稷图”的多维空间叙事, 突破线性时间主导的成长模式。这一叙事方式不同于漫威“多元宇宙”的拼接, 而是以“一花一世界”的哲学观念, 构建出有机生长的叙事矩阵。具体来看, 《哪吒》系列电影在叙事层面实现了三重创新突破。一是时空逻辑维度, 以“劫波”概念替代线性时间, 形成轮回与演进交织的叙事节奏。二是权力结构维度, 天庭等级制是需要打破的旧秩序, 与漫威体系中的神权合法性形成对比。三是危机解决方案, 其最终救赎源自集体意识的觉醒, 而非个体英雄的科技升级。这一叙事转向在拓展文化表达多样性的同时, 也强化了本土文化的主体性。

话语重置的核心在于叙事符号的转译。在全球文化传播中, 单向接受西方叙事逻辑或完全拒斥外来影响皆难以有效塑造文化主体性^[26]。因此, 需在文化基因延续与现代性表达之间构建起双向对话的动态机制。构建这一机制的关键在于把握“非对称博弈”原则, 既要避免文化本质主义的封闭性, 又要超越文化相对主义的妥协逻辑。《哪吒》系列电影为传统文化创新提供了方法论启示。一方面, 创作者对西方的团队作战模式进行在地化重构, 创造出“封神榜”式的命运共同体叙事。哪吒与敖丙的跨种族协作, 突破了正邪二元对立的传统框架, 展现出文化认同的困境与和解可能。另一方面, 传统符号的现代性激活也是话语重置的关键路径。《哪吒》中的“风火轮”从神话法器转译为连接个体记忆与集体无意识的精神载体, 其视觉呈现既承袭传统年画的美学神韵, 又通过粒子流体技术在代际传播中获得新活力。这一转译不是简单的符号复制, 而是通过媒介升级实现的文化基因重组。在“雷劫”概念的再编码中, 影片将传统灾劫叙事升华为东方美学的视觉奇观, 既延续了“天人合一”的哲学内核, 又借助现代视效技术赋予其宇宙级别的象征意义。此种非对称博弈策略, 使文化符号既保持本体论的深度, 又获得参与全球对话的现代接口。

文化生产机制创新是话语重置的关键环节。相较于西方话语体系中资本与技术驱动的传播逻辑, 中国文化产业强调文化基因的有机演进, 探索不同于线性现代化路径的文化表达模式。文化生产机制创新通过以下方式系统推进。其一, 构建神话原型创意数据库, 对传统文化元素进行数字编码与模块化处理, 形成可供创作者共享的基础资源池。这一方式可在保存文化基因原生形态的基础上, 通过算法分析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译, 拓展传统符号的当代阐释空间。创作者基于共享资源进行

个性化改编，既能提升产业效率，又能形成富有竞争力的文化产品矩阵。其二，构建跨媒介叙事矩阵。借鉴漫威“平行宇宙”的延展策略，中国影视 IP 开发可采取“母体生长”模式，强调文化基因的自我演化能力。通过“电影+游戏+虚拟现实”的深度融合，打造东方神话元宇宙。这一叙事矩阵不是简单复制西方经验，而是在保持文化基因内核的前提下，通过多元媒介拓展叙事维度，形成具有持续影响力的文化生态系统。文化生产机制创新使话语重置超越文本层面，深入文化生产与消费的底层逻辑，在数字时代重构文化权力的生成机制^[27]。

（三）价值反嵌：重建文化价值体系的意义网络

非西方文化在全球文化市场中正遭遇“双重脱嵌”危机。在横向的文化传播层面，传统文化被解构为空洞的消费符号，其本土意义网络在跨文化传播中遭到剥离；在纵向的价值认同层面，非西方文明在所谓“普世价值”的评价体系中遭受系统性边缘化，难以获得主体性认同。面对这一困境，价值反嵌成为重建文化主体性的必然选择。这种反嵌并非简单的文化符号输出，而是创造具有文化自主性的意义网络，使传统文化基因在现代语境中重新获得解释力。价值反嵌策略应立足时间与空间双重维度，回应地方性知识边缘化与文化主体性消解等深层结构性问题。一方面，传统价值体系的再嵌入应通过对文化资本的动态重塑，使价值体系获得新的诠释逻辑。另一方面，地方性知识需超越“全球—地方”的二元对立范式，转向互构性的空间生产。只有通过本土叙事回应全球性文化，使地方文化从“静态接收”转变为“活性塑造”，才能真正实现文化主体性的跃升。

价值反嵌的核心在于通过文化元素的创造性编码，在全球传播场域中维系文化主体性与内在张力^[28]。与西方文化产品强调技术逻辑和市场导向不同，非西方文化更关注价值观的历史延续性与语境适应性，这种差异决定了其独特的价值建构维度。本体论层面，价值反嵌需以动态生长的文化观替代线性发展范式。传统文化不是等待拯救的“遗产”，而是持续生长的生命体。认识论层面，价值反嵌要求以整体论视角重构文化认知。不同于西方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非西方文化更强调天人感应、阴阳调和的共生逻辑。哪吒与敖丙从对立到和解的叙事转变，正是东方整体思维在现代媒介中的创新表达。在方法论层面，价值反嵌需突破个体英雄主义的叙事框架，强调集体叙事与关系网络。正如《哪吒》系列电影展现的“逆天改命”，不依赖个人神力的拯救，而是通过重塑系统规则实现突破。这一叙事策略超越了传统主客对立思维。

社会生产价值反嵌的终极目标是建构文化主权。其核心在于打造具有自主能动性的文化治理体系，使文化主权的运作从象征性诉求转化为涵盖生产、分配与再生产的系统性工程。文化主权的运作需依托三大支柱系统。其一，意义生产系统构成文化主权的动力引擎。在全球文化竞争日益转向符号资本的背景下，文化主权不再仅依赖物质生产，而是愈加依托文化符号体系的能动塑造。因此，意义生产系统应通过历史叙事的动态重构与文化语汇的现代转译，构建具备跨文化可译性的意义接口，推动非西方文化由“被消费”向“主导叙事”转变。其二，价值评估系统重塑文化资本的知识生产机制。当前西方主导的评价体系塑造着全球文化商品的等级秩序，导致非西方文化处于价值洼地。应以本土文化逻辑为基点，构建多维度的评估范式与话语测度体系，增强与既有话语体系的对话能力。其三，意义分配系统掌控文化资本的全球流通结构。在平台经济、算法逻辑与数据治理主导的文化分配机制中，该系统致力于打破结构性依附，影响文化价值的定价权。由于全球传播渠道受制于跨国平台的算法权力，本土文化往往面临价值折损。文化主权的建构需依托技术自主性与分

布式传播机制, 借助区块链确权、人工智能驱动的文化传播策略及去中心化内容生态等创新手段^[29], 确保意义分配不再受制于西方平台的流量逻辑, 形成具有自主造血能力的文化生态系统。综上, 意义生产、价值评估与意义分配三个系统构成文化主权的核心支撑。文化主权的建构不仅关系文化身份的持续性, 也关乎全球文化格局的结构优化。唯有构建自主可控的文化治理体系, 形成兼具本土主体性与全球适应性的文化符号体系, 才能推动地方文化实现价值跃迁, 促进全球文化格局向更为均衡、公正、包容的方向发展。

本质祛魅、话语重置与价值反嵌构成文化发展的动态互动关系(见图 1)。这一机制的运作逻辑为: 在反思既有文化权力结构的基础上, 本质祛魅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既定认知范式, 推动传统文化观念的再解释, 促进形成新的文化表达范式; 话语重置通过叙事语法创新和叙事符码转译, 构建文明多元的平等对话机制; 价值反嵌进一步推动文化再生产, 重建文化价值体系的意义网络, 使文化创新形成螺旋式上升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 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 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30] 在“本质祛魅—话语重置—价值反嵌”的创新路径中, 非西方文化得以突破单向度“接受者”的角色桎梏, 文化主体性得以进一步巩固。这一路径有助于促进全球文化生态从权力失衡的藩篱中突围, 向多元共生的文明互鉴范式演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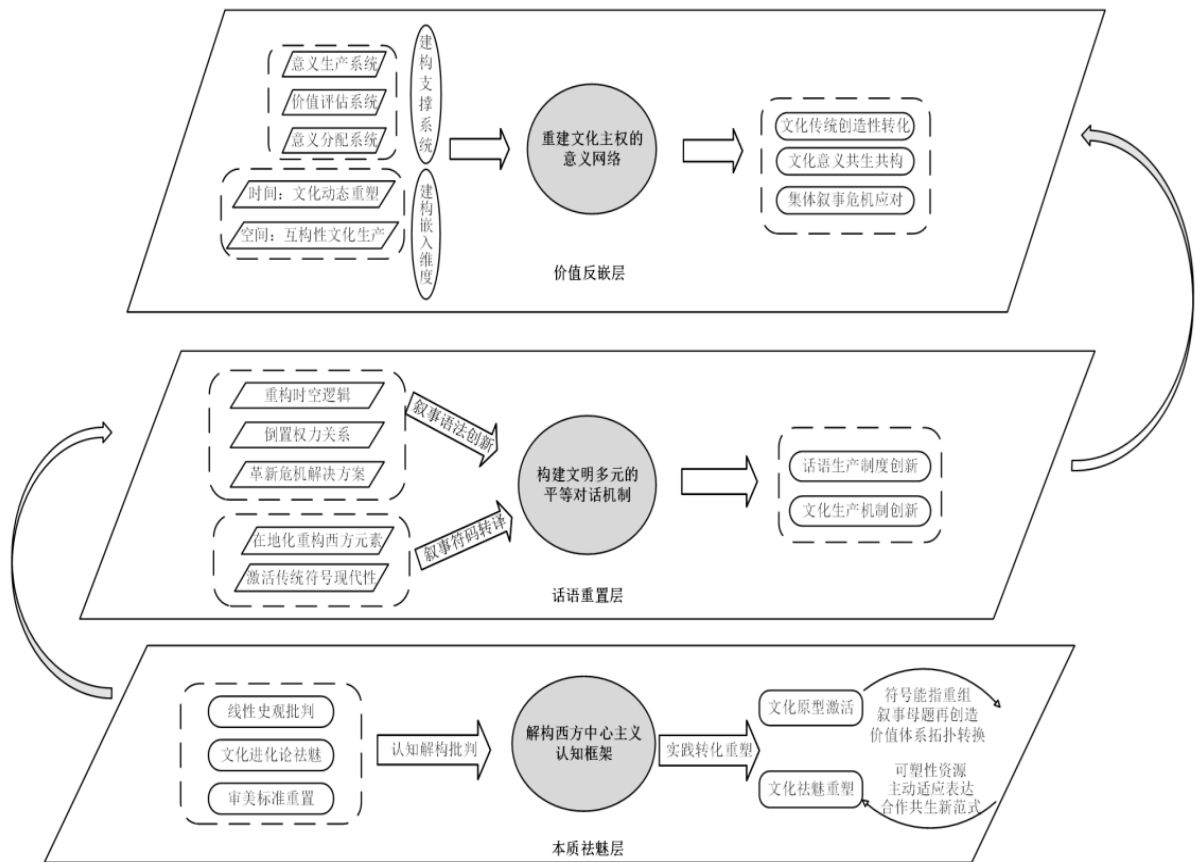


图 1 文化叙事三维构建图

四、走向“美美与共”：文化叙事新范式的理论启示

在“本质祛魅—话语重置—价值反嵌”的三维框架下，《哪吒》系列电影中的文化叙事既非对传统文化的简单回归，也非对西方模式的被动模仿，而是在解构与重构的动态平衡中探索文化创新的新路径。这一新范式表明，我们应在保持文化主体性的同时，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31]，同时应坚持开放包容、交流互鉴，以实现文化安全观的范式升级、重构现代性话语及塑造文明对话新格局。

（一）文化安全观的范式升级：从被动防御到主动建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应“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32]。这一重要论断为文化安全治理提供根本遵循。传统被动防御模式已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新时代文化安全更强调主动建构的治理智慧。

主动建构的核心在于创新文化叙事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33]这为新时代文化安全建设指明了方向。面对全球文化交锋新态势，文化叙事创新必须突破单一保护思维^[34]，确立“守正创新”的治理哲学。一方面，我们要以文化生产为基石、以媒介传播为纽带、以政策引导为保障，建立文化叙事创新的长效机制，推动价值观念从“理论形态”向“生活实践”转化，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通。另一方面，我们应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加快构建具有自主解释力的中国话语体系，主动提炼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在影视创作、文学艺术、数字传播等媒介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可见度。

主动建构内含文化治理方式的升级。数字化浪潮正重塑全球文化治理版图，传统单向管控模式遭遇前所未有的结构性挑战。面对传播渠道的颠覆性变革，治理主体“多元共治”成为必然选择。政府需搭建多元共治平台，发挥政策引导力，保障主流价值传播。市场主体要承担起文化创新主体责任，在守正创新中激活文化产业动能。社会力量应成为文化安全的“毛细血管”，推动公众文化素养提升，增强公众对文化安全风险的认识和应对能力。另外，文化治理方式的升级离不开科技赋能，可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实现文化安全风险预警、溯源等治理效能，打造出“智能监管+精准防护+高效传播”的数字化治理闭环，为数字时代的文化安全筑起铜墙铁壁。

主动建构需统筹文化认同教育、文化产业发展及国际文化交流等关键领域。我国的文化安全实践应围绕理想信念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文化生产创作、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及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协同推进，确保文化安全体系的系统性与可持续性^[35]。其一，文化认同教育需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增强文化自信，加强文化安全观的培育。依托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将爱国主义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全过程，实现文化安全意识的渐进式养成。其二，文化产业发展要平衡守正与创新，既通过政策扶持促进文化资源市场化运作，推进文创产品数字化升级，又通过健全市场监管体系防范外部资本无序扩张，确保我国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其三，国际文化交流层面应着力构建多边文化对话与合作机制，依托“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沿线各国文化深度交融，通过创新人文交流模式实现文明对话的常态化与制度化，推动不同文明和

谐共生、包容发展。

（二）现代性话语的重构：多元现代性的中国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权利和必然选择，关键是找到符合国情、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发展道路。”^[16] 中国的发展理念顺应当今时代发展潮流，为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智慧”^[36]。传统西方现代性理论强调工业化、民主政治与个人主义，难以回应文明多样性对发展路径的差异化诉求。中国方案为破解这一困局贡献出独特解题之道——既承认西方现代化在生产力解放等方面的历史贡献，又强调在本土文化根脉中探寻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

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肇始于 15 世纪大航海时代^[37]，通过长期的经济扩张、文化传播等方式形成特定的文明叙事。其现代性存在以下局限。第一，“经济依附性陷阱”导致发展失衡。西方发展模式将自由市场与政治制度捆绑，漠视后发国家的资源禀赋和治理结构的独特性，迫使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边缘。第二，“增长异化”消解文明根基。西方模式在社会层面追求增长至上主义，资本逻辑主导下社会公平缺失导致贫富两极分化^[37]。另外，西方现代化进程透支生态承载力触发系统性危机，致使人类生存面临更大挑战。第三，“叙事霸权”压制文明多样性。西方通过媒体传播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构建认知藩篱，持续消解多元文明发展道路的阐释权，以“普世性”掩盖了不同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的独特性和多样性。

现代化道路的多元探索始终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命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中国式现代化以其独创性实践，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虚假结论，为人类文明探索贡献中国方案^[16]。其一，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的有机结合。不同于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单纯的资本逐利逻辑，中国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共同富裕等举措来协调经济增长与民生福祉，确保发展成果惠及更多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例如，中国在脱贫攻坚战中取得历史性成就，为全球脱贫减贫事业贡献中国经验。持续优化的科技创新投入机制和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建设网络夯实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其二，中国式现代化注重文化自信与价值体系的创新发展。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坚持在文明对话中确立文化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突破“文明冲突论”的思维定式，以“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实现跨文化对话，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注入文化动能。在“一带一路”等多边合作平台中，中国倡导平等合作、互利共赢，强调“人类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因为平等交流而变得丰富多彩”^[38]，展现出开放包容、交流互鉴的现代性建构路径。其三，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面对全球气候变化与环境恶化挑战，中国式现代化构建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范式，以“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引领，抢占新能源革命的战略制高点，为全球生态治理和可持续发展注入了东方智慧。

（三）文明对话的新格局：共生互鉴的文化互动之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33]⁴⁰² 这体现了中华文化“美美与共”的智慧，也为探索共生互鉴的文化互动之道提供了指引^[39]。

构建包容性文化传播机制是促进文明对话的关键。文明交流互鉴的深层逻辑，在于超越零和博弈的思维。文明交流互鉴的基本前提是坚持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平等性、包容性^[40]。在推进文化交

流中，应既有“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客观认知，又要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主体胸怀，更要有“取长补短、兼收并蓄”的现实观照^[4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理念，正是这一文明观的哲学根基，它揭示出文明发展的本质不是单一文明的自我扩张，而是多元文明的互鉴共生。基于此，构建包容性文化传播机制成为促进全球文化共生互鉴的重要路径。中国通过孔子学院搭建语言文化桥梁，借国际艺术节创造艺术碰撞平台，以“一带一路”文化合作深化文明互信。这些实践既拓展了中华文化的传播维度，更重塑了全球文化治理的生态。不同于文化输出中的权力投射，包容性文化传播机制的核心在于创造平等的对话空间，在保持文化辨识度的同时建立跨文化接口。这一传播范式转型正在推动全球文化治理从“霸权主导”向“多元共治”演进，为文明交流互鉴提供制度性保障。

全球文化治理体系改革需以文明互信为基石，以合作共生为核心动能，以优化传播为重要动力。当前实践应聚焦以下方向。其一，构建互信机制。不同文明间的信任赤字，往往源于信息不对称和认知偏差。我们要建立多边文化合作平台，如“全球文明对话大学联盟”等机制，拓展各文化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空间。这一机制创新需要多元主体协同发力，如政府间签署文化合作备忘录，民间组织举办跨文化工作坊，媒体机构开设文明对话专栏。其二，深化跨文化合作。文化产业协作、学术智库对话、公共外交创新等多元合作形态，正在打破文化传播的失衡格局。各国可推动博物馆、美术馆等建立数字资源共享平台，促进学术机构开展联合研究，鼓励文化企业共建国际创意联盟，形成多层次、宽领域的文化合作网络。其三，优化传播路径。通过算法模型分析受众的文化偏好，运用智能翻译技术实现文化语汇的精准转译，借助区块链技术构建版权保护体系，以技术赋能打造文化传播的智能管道。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马克思预言的文化图景将得到实现，即“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公共财产”、“地方文学”成为“世界文学”^[42]，各文化主体将迈向真正意义上的“美美与共”。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33] 397-398}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出文化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也为坚守文化主体性指明了方向。在国际文化体系深度变革的背景下，中国影视 IP 的发展方向不仅涉及文化产业的竞争力，更关乎文明的交流互鉴。目前，中国影视 IP 在全球叙事体系中的影响力尚处于培育阶段。如何在既有体系中确立自身的话语权，并通过本土文化资源的现代性拓展增强文化影响力，是当前文化发展亟待解决的课题。在国际话语权竞争日趋激烈的复杂形势下，将中华文明的核心和精髓提炼出来，凝结成可感知、可呈现、可表达的标识性中华文明话语体系，阐释好当代中国的文明形态并传播出去，是赢得国际话语权，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扩大中华文明影响力的核心要义^[43]。以《哪吒》系列电影为代表的中国影视作品，通过对传统神话资源的现代性转译，实现内生性的叙事跃迁。影片在尊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的基础上，运用现代叙事方式、科技创新手段与全球化表达策略，使传统文化符号焕发新的生命力。

中国影视 IP 实现由技术应用层面向价值创造层面跃升，需在数字文明时代探索具有范式意义的

魏郡, 卢言臣. 文化安全视域下中国影视 IP 的叙事突围与新范式构建——基于《哪吒》与漫威系列电影的比较分析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3): 84-98.

创新路径。第一, 推动文化治理创新, 构建开放共生的文化生态。全球文化生态和文明互鉴的深度推进要求文化治理范式创新。中国应主动参与国际文化治理体系改革, 通过政策协调、机制创新、平台搭建等, 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开放包容的文化生态系统。第二, 强化文化科技深度融合, 抢占文化传播制高点。伴随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迅猛发展, 数据深度嵌入文化产业创意创作全过程, “生产—消费”链条中围绕数据进行符号创作成为常态, 文化产业的生产内容和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 数据成为推动产业价值生成的核心动力^[44]。技术变革正逐步重构全球文化传播格局, 以数字技术迭代推动文化基础设施创新升级。中国影视 IP 应加快科技赋能, 让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技术语境中焕发新生, 提高文化产品的市场吸引力。第三, 构建全球化叙事体系, 掌握文化阐释主动权。中国影视 IP 要突破文化壁垒, 保持本土文化内核, 探索符合国际受众认知习惯的叙事方式。中国影视创作应超越地域性叙事, 将中国精神融入类型化创作中, 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坐标下的现代化转码。通过治理创新、技术赋能、互鉴共生, 我们将推动全球文明对话迈向新高度, 真正实现“美美与共”的文化互鉴范式,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持久的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 年 10 月 16 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52.
- [2] 刘颖. 文化安全研究的出场及核心概念的建构 [J]. 宁夏社会科学, 2023 (3): 56-63.
- [3] 陈小彪. 国家文化安全治理困境及其法治应对 [J]. 学术界, 2024 (9): 162-173.
- [4] 吴琼, 孙程芳. 人工智能时代的国家文化安全风险及其规避 [J]. 南昌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3): 111-118.
- [5] 高书. 好莱坞电影的游戏化叙事策略研究 [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2023 (1): 54-63.
- [6] 张遥. 漫威电影类型化生产的市场优势与艺术模式 [J]. 学习与探索, 2023 (3): 168-173.
- [7] 周红兵. 图式转换与叙事创新: 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实践进路 [J]. 湖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2): 159-169.
- [8] 许丹荔, 蒲瑶. 人工智能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话语建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4): 58-69.
- [9] 何成洲, 刘珍珍. 游戏的跨媒介叙事与文化传播——《黑神话: 悟空》赋能中国文化的全球传播 [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1): 33-43+106.
- [10] 哈维. 资本的限度 [M]. 张寅,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 639.
- [11] 米歇尔·福柯. 自我技术: 福柯文选 III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159.
- [12] 徐国民, 陶富林. 集体主义: 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精神基础 [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24 (12): 13-24+103.
- [13] 马丁·海德格尔. 演讲与论文集 [M]. 孙周兴,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0: 5.
- [14] 张玉梅, 于园媛, 许馨仪. 融汇传统美学基因 创新当代视觉表达 [N]. 光明日报, 2025-03-02 (12).
- [15] 王云霞. 深生态学儒家思想的会通及其生态意义 [J]. 齐鲁学刊, 2019 (4): 25-33.
- [16] 习近平.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J]. 求是, 2025 (1): 4-19.
- [17] 尤尔根·哈贝马斯, 米夏埃尔·哈勒. 作为未来的过去——与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对话 [M]. 章国锋,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122.
- [18] 习近平. 必须坚持守正创新 [J]. 求是, 2024 (23): 4-14.

- [19]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M]. London: Classic Penguin, 2003: 347.
- [20] 魏郡, 张健. 网络符号消费下青年群体数字化生存的逻辑及反思 [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25 (2): 152-161.
- [21] 崔妍. 从“哪吒登顶”看文化自信 [N]. 人民日报, 2025-02-17 (5).
- [22] 邓莉.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 [J]. 山东社会科学, 2025 (1): 94-100.
- [23] 谢文君. 现代英雄史诗的多媒体形式与叙事密码 [J]. 民族艺术, 2023 (3): 67-77.
- [24] 仇华飞, 于利花.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 核心内容及其构建逻辑 [J]. 社会主义研究, 2025 (1): 164-172.
- [25] Bhabha, H.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M]. London York: Routledge, 1994: 28.
- [26] 郑人杰. 新时代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逻辑进路论析 [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5 (1): 9-16.
- [27] 唐润华, 何国平. 全球文化治理中智能传播的双重角色 [J]. 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1): 157-166.
- [28] 易华勇, 韩璞庚. 文化安全主体的现实境遇及其当代变革 [J]. 中州学刊, 2024 (9): 117-124.
- [29] 张伶俐, 王奕懿. “哪吒”出海: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动画电影进路 [J]. 中国编辑, 2025 (4): 101-107.
- [30] 习近平. 在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3 年 6 月 3 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8.
- [31] 赵剑英. 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发展逻辑 [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4 (11): 1-16+151.
- [3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241.
- [33] 习近平. 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57.
- [34] 刘衍峰. 中华文化主体性叙事机制创新与实践理路——基于《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案例分析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2): 122-134.
- [35] 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编委会. 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115-125.
- [36] 徐步. 顺应人民心声和时代潮流的发展理念 [N]. 人民日报, 2025-02-05 (9).
- [37] 李小云, 徐秀丽. 中国探索全球发展新模式 [N]. 人民日报, 2025-02-05 (9).
- [38]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 第 1 卷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142.
- [39] 夏秀. 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力的提升 [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5): 89-98.
- [40] 陈鹏.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基本前提、核心要义与实践路径 [J/OL].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13 [2025-05-30]. <https://link.cnki.net/urlid/50.1023.C.20250117.1643.002>.
- [41] 徐艳玲.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向度 [J].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5): 12-21.
- [4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35.
- [43] 邹慧. 国际话语权视角下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研究 [J/OL].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15 [2025-05-30]. <https://link.cnki.net/urlid/50.1023.C.20250429.1256.004>.
- [44] 刘洋. 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乘数逻辑: 上云、用数、赋智 [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5 (2): 21-29.

责任编辑: 龚静阳 校对: 王京菁



集体记忆建构中华文化认同的 理论构型与作用机制 ——以《哪吒之魔童闹海》为案例

潘莹莹

(西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72)

摘要: 基于集体记忆理论视角,《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文化实践为中华文化认同建构提供了典型样本。中华民族集体记忆通过“一体、双向、四域”的理论构型,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目标体,以记忆与认同的双向建构为方向轴,以符号域、身份域、价值域与实践域为作用空间,在“激活—流动—提炼—渗透”过程中实现向内聚力、向外传播、向上升华、向下扎根的立体塑造,推进中华文化认同从生发、接受、内化到外化的动态建构链条。在生发上,借符号编码与意义解码激活记忆、凝聚认同;在接受上,凭媒介濡化与跨域对话促进记忆扩散、强化文化感知;在内化上,以伦理解构与精神传承凝炼记忆精华、实现价值升华;在外化上,靠具身参与和情景嵌入推动记忆渗透、夯实实践根基。集体记忆建构中华文化认同,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效度的创新路径。

关键词: 中华文化认同; 集体记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哪吒之魔童闹海》

中图分类号: G122; J9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5) 03-0099-13

DOI: 10.13946/j.cnki.jcqi.2025.03.008

作者简介: 潘莹莹,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构建我国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研究”(22ZDA076);西北工业大学博士论文创新基金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哲学基础研究”(CX2024085)

引用格式: 潘莹莹. 集体记忆建构中华文化认同的理论构型与作用机制——以《哪吒之魔童闹海》为案例[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3): 99-111.

一、问题的提出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23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1] 这深刻揭示了中华文化认同在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核心作用。同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指出：“构建和运用中华文化特征、中华民族精神、中国国家形象的表达体系，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中华文化认同。”^[2] 2024 年 9 月，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必须不断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必须增进中华文化认同”^[3]。由此可见，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是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的重要抓手，也是巩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应有之义。

近年来，中国影视动画产业蓬勃发展，为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提供了可感知、可参与的新型媒介载体。2025 年春节档期，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简称《哪吒 2》）震撼登陆大银幕，凭借超过 150 亿的票房佳绩，不仅稳居全球动画电影票房榜首，还跃升至全球影史票房榜前 5 位，不断刷新中外影史多项纪录。《哪吒 2》不仅取得了傲人的市场成绩，其在海内外观众中也收获了极高口碑，人民网、央视网、新华网等权威媒体纷纷予以报道，形成了现象级的文化传播热点。海外媒体亦高度关注《哪吒 2》的“破圈”与“出海”现象，认为其成功“象征着中国日益增长的文化信心”^[4]。此外，《哪吒 2》的影响力已超越电影本身，带动了文旅、餐饮、周边产品等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成为推动文化与经济双赢的新引擎。有评论指出，“哪吒热”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旺盛的“消费力”、动画科技“硬实力”及中华文化“软实力”^[5]。《哪吒 2》凭借技术赋能、内容为本、文化为根、互动为媒的多维度文化创新能力，成功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大众共享、参与的当代集体记忆，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双重语境中引发广泛文化共鸣。

集体记忆是社会群体得以凝聚及延续的心理载体，依靠文物、文献、图像或各种集体活动来建构群体的文化认同^[6]。学界对集体记忆如何建构中华文化认同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第一，从宏观上探讨集体记忆在培育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实践中发挥的重要功能，如增强民族成员历史认知、强化民族成员身份归属和凝聚中华民族价值共识^[7]，以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强化情感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8]。第二，从微观上探讨某一特定文化通过多种形式的记忆建构而成为凝聚中华文化认同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如革命文化^[9]、传统节日^[10]、二十四节气^[11]等。既有研究为集体记忆建构中华文化认同提供了理论框架、实践策略、跨文化启示等层面的有益借鉴，但尚存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脱节。例如，缺乏对集体记忆内部要素协同作用建构中华文化认同的具体化阐释，也没有从记忆与认同的动态特性出发讨论二者之间的适应性关联。鉴于此，本文尝试建构一个以集体记忆统合符号、叙事、技术等要素的中华文化认同建构机制模型，厘清记忆机制与认同机制的动态关联，并以《哪吒 2》作为典型案例系统阐释集体记忆建构中华文化认同的作用机理，以期当代文化产业资源助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提供参考。

二、集体记忆建构中华文化认同的理论逻辑

集体记忆作为一种表征群体认知的结构化信息, 具有建构性、社会性、传承性等动态特征。中华文化认同亦是在不断变化的文化环境和多元文化共存的背景中持续形塑的流动性实践。阐释二者之间的动态关联, 需要构建一个整合性的分析框架, 梳理集体记忆理论范式变迁, 同时将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理论纳入分析机制, 以深入诠释集体记忆建构中华文化认同的逻辑理路。

(一) 理论关联: 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的互构性阐释

集体记忆的理论范式经历了从“社会框架论”向“文化记忆论”的转型。法国历史学家哈布瓦赫强调记忆的社会建构性, 认为个体记忆需依托集体框架才能被唤醒与重组^[12]; 法国历史学家诺拉提出记忆之场概念, 批判历史感知模式在媒介协助下以“时事的稍纵即逝取代了记忆”^[13]; 德国历史学家阿斯曼则进一步区分“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 指出后者通过一种“凝聚性结构”^[14]关联了回忆、认同与文化的延续这三个基本问题。从集体记忆的理论演进可以窥见, 集体记忆并非单纯的历史复现, 也并非作为生物现象的个体记忆的机械叠加, 而是经过社会化过程形成的、具有社会意义的认知基模和文化现象, 与个体身份建构、文化传承延续、群体文化认同密切关联。

集体记忆形成的过程伴随着身份认同、文化认同与国族认同的生成^[15]。这种记忆与多种形式认同的共生机制构成一种“阐释学循环”^[16]的动态辩证, 即通过集体记忆这一整体意识强化个体认同, 完成从整体到局部的循环, 再通过个体认同促使其更积极地参与集体记忆的传承, 完成从局部到整体的循环。这个系统体现为记忆筛选、认同初建、记忆再生产、认同新建构的螺旋迭代过程。一方面, 群体通过筛选、重组集体记忆中的特定记忆片段, 以叙事重构与仪式化活动将抽象的记忆转化为具身认知, 维系群体的文化连续性与认同合法性。另一方面, 文化认同的当代需求反向塑造记忆图式, 重构符合当代价值观的全新记忆与新的认同坐标系。可见, 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的共生互构形成了一个层次清晰、逻辑严密的系统。集体记忆既是文化认同的认知基础, 亦是其再生产的中介载体。基于辩证动态视角, 把握集体记忆与中华文化认同实践的普遍联系, 探寻二者发展的最佳结合点, 是在时空维度延展中华文化主体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生长点与实践突破点。

(二) 理论框架: “一体、双向、四域”的动态多层次分析

集体记忆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建构并非以碎片记忆简单拼合离散文化元素, 而是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目标, 依托一定媒介载体激活传统文化的历史记忆, 实现中华文化价值从认知图式到行为范式的系统性转化。从社会心理学来看, 中华民族群体对中华文化价值的认同“存在知、情、意、行四点特征”^[17], 在过程上外显且一一映射为“生发、接受、内化、外化”^[18]四个递进阶段。其中, “知”体现为对中华文化的理性认识, 是构成文化认同逻辑起点的“生发”基础; “情”表现为对中华文化的满意度, 从情感上表示赞同或持肯定意见, 形成文化认同的心理“接受”; “意”指向对作为中华文化深层次内核的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 对应文化认同的精神“内化”; “行”指在行动上接受中华文化的规范指导并形成自身生活方式反复践行, 最终实现文化认同的“外化”输出。在这个过程中, 集体记忆起到加速催化作用, 一方面通过构建社会文化关系纽带增强群体内部凝聚力, 另一方面作为群体共享的历史经验和精神资源塑造与外部世界互动交往的文化资本。进一步讲, 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随时间推移和社会环境变化而不断被重释, 呈现“激活—流动—提

炼—渗透”的流变特质，并以此促成中华文化认同不断生发、接受、内化、外化。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构成了在时序上递进生成、在空间上共时延展的复合体，而这复合体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雏形。

本文以认同形成的四阶段为基础、以系统论为方法，建构“一体、双向、四域”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 1），阐释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目标，中华文化认同的生成既是个体记忆不断聚合、集体认知不断凝聚的结果，也是社会历史变迁下记忆再生产满足群体现实情感需求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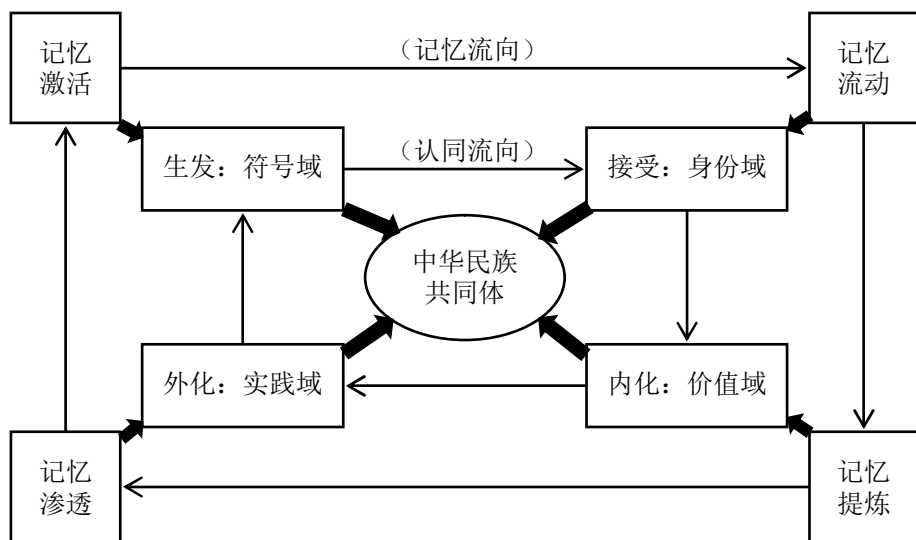


图 1 集体记忆建构中华文化认同的理论框架

其一，“一体”作为目标维度，是指中华民族共同体。集体记忆塑造中华文化认同的终极旨归在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彰显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价值。在全球化与多元文化主义冲击下，中华文化认同的建构需超越地域、族群等次级文化单元的碎片化叙事，锚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价值共识。

其二，“双向”作为过程维度，是指集体记忆的“激活—流动—提炼—渗透”递进机制向文化认同“生发—接受—内化—外化”阶段的转化过程。记忆的激活通过重构中华文化符号的可辨识度，触发中华文化认同生发；记忆的流动借助媒介化交往，促进广大人民对中华文化价值的自愿接受；记忆的提炼通过价值抽象化，推动中华文化认同的深度内化；记忆的渗透则通过仪式化、生活化实践，完成中华文化认同的外化。

其三，“四域”作为场域维度，是指符号域、身份域、价值域与实践域四大作用空间。符号域作为集体记忆的中介载体，通过视觉意象与仪式操演等形式凝聚中华文化认同的认知基底；身份域依托跨群体记忆共享，建构面向世界民族丛林的“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身份标识；价值域通过历史记忆的当代诠释，实现传统伦理价值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践域借助文化产业、教育体系等现实渠道，将抽象认同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的具身行动。

三、向内聚力：记忆激活与中华文化认同的符号生发

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议题，中华文化认同的建构与维系离不开文化符号的创造性生产与表达。文化符号是承载着特定文化意义、观念与价值的标识，能传达并强化某种文化的独特性和认同感^[19]。作为中华文化符号之一的经典神话可以通过符号编码与意义解码，激活中华民族集体记忆、唤醒中华民族原初情感，形成强大的文化内聚力。

（一）符号编码：经典神话重构，唤醒集体记忆

符号编码是将文化意义转化为可感知符号的过程。中国经典神话作为一种高辨识度的文化符号，不仅孕育并记忆着中华文化，而且在传承发展中逐渐形成能够彰显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文化基因序列。文艺作品再现和重构经典神话，挖掘其中蕴含的文化精神，是激活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

一方面，经典神话是承载集体记忆的符号系统。集体记忆作为群体对历史、文化、重大事件等的共同回忆，其本质具有抽象性与弥散性，需要依赖符号系统完成具象化承载。文本、图像、仪式等固化符号可以将抽象的文化记忆具象化为能感知、易迁移、可传承的实体，推动集体记忆跨时空、跨情境传递。中国经典神话经由世代口耳相传及历史文献记载等，成为承载集体记忆的关键符号系统。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20]从物质性来看，经典神话以文本、仪式、影像等物质形态持续存在，将抽象的集体记忆转化为具象器物。从精神性来看，远古先民在生产实践中积累的经验认知，以价值观念、理想愿望等精神要素形式暗合于神话的意象系统，实现跨代际传递。

另一方面，经典神话的现代符号编码以集体记忆的再生产过程实现传统文化基因的活性转化。集体记忆作为民间认知体系，始终反映现实政治权力、经济利益和社会定位，需不断地被唤醒、重构、固化、刻写，以适应社会变迁中群体的现实需求。集体记忆再生产过程不是对历史事实和旧时记忆的静态重述，而是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延续。经典神话的现代符号编码通过重新诠释传统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将传统文化元素与当代社会议题结合，激活集体记忆并赋予其新意义，从而重塑中华文化特质、激发中华文化力量。《哪吒2》运用赛博朋克式的视觉暴力重构神话场景，让大众熟悉的神话符号在祛魅与返魅的辩证运动中迸发现代性力量。影片中太乙真人的卷轴化为量子态的像素流、山河社稷图蜕变为虚拟现实沙盘、道教的炼丹炉置换为基因编码等隐喻，实现了传统神话符号的数字化再生产。

（二）意义解码：现代叙事转译，凝塑集体记忆

意义解码指受众通过文化经验、价值观念等主观框架对符号系统进行意义重构的过程。现代叙事通过转译传统符号，激活受众的能动性解码，使受众共享集体记忆并建构文化价值共识。

一方面，现代叙事以多元化叙事手法为集体记忆跨代际解码创造弹性空间。传统神话的线性叙事倾向于使用精炼复古的词汇和程式化的叙述模式，侧重于道德教化和权威化记忆的单向灌输。这种叙事模式虽能保持记忆传递的稳定性，但因缺乏互动性，容易使受众感到单调乏味。现代叙事转译则通过对经典神话的时空重置、视角转换与价值重估，将晦涩的传统符号系统转化为易被当代受

众感知的文化对话界面。《哪吒 2》采用双线并行的非线性叙事、群像叙事、方言叙事等手法，将传统神话与现代思考结合，在唤醒集体记忆的同时引发观众对规则、权威、偏见、自我认同等现代性困境的深刻反思。现代叙事以意义开放打破权威闭合，促使受众在解码集体记忆的过程中激发更深层的文化反思与认同自觉。

另一方面，现代叙事使集体记忆的传承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参与，建立中华文化认同与现实共识的动态互动。传统集体记忆的建构往往依赖于权力主导的意识形态叙事，而数字时代社交媒体互动、用户生成内容等参与式叙事打破了单一话语垄断，使集体记忆成为多元主体对话的过程。个体不再是记忆的被动接受者，而成为共同叙事的建构者。《哪吒 2》自上映以来，引发了全民参与式讨论和碎片化再创作。在微博、豆瓣、抖音、哔哩哔哩等社交媒体上，大量用户将自身“职场夹缝生存”“原生家庭创伤”等情感代入影片情节，拼合属于自己的文化认同模块。当不同人基于相似的情感体验，在同一部作品中找到中华文化认同的连接点，便会在无形之中达成一种关于社会现象、价值观念的共识。这种共识并非是自上而下的，而是由民众主动参与叙事自下而上凝聚而成。它反映了当下中国社会大众真实的心理诉求与价值取向，为中华文化的现实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四、向外传播：记忆流动与中华文化认同的身份接受

集体记忆作为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其存续机制依赖于“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21]。在深度媒介化的当代社会语境中，信息、技术、资本等要素重构了“流动的现性”框架。这种社会形态的液态化特征驱动集体记忆加速扩散，使中华文化认同在社会关系不断变换、身份标识频繁重构的语境中不断拓展边界。数字技术迅猛发展与中华文化交流传播全球化进程的深度交织，推动社会集体记忆在“相互协作”与“多元协商”中建构^[22]，中华文化认同在“自我身份建构”与“他者身份协商”中深化。

（一）媒介濡化：数字技术赋能，驱动中华文化记忆共享

媒介濡化指媒介在长期传播过程中对受众认知、价值观和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数字技术迅猛发展驱动媒介迭代升级，系统化、智能化、融合化、生态化的媒介平台，能够加快推进中华文化记忆的全景化呈现和全球化共享。

第一，以数字技术重构中华文化记忆的共享机制。技术是人的“器官、感官或功能的强化和放大”^[23]。与传统媒介依赖口耳相传、文献记载等可能导致记忆失真或遗失的情况不同，数字技术遵循“去中心化”模式，不断驱使个体成为集体记忆新创造与强扩散的节点，进而加速中华文化记忆在全球网络中自由流动。《哪吒 2》的票房神话首先是一场科技革新的胜利。从首部“魔童降世”到“魔童闹海”，饺子团队用 5 年时间完成了从传统手绘到智能工业化的跨越，更以“动态水墨渲染引擎”等自主技术突破，将东方美学的写意基因注入现代动画工业体系。随着影片在全球上映，引发了全球观众的热烈讨论和二次创作。在社交媒体上，观众分享自己的观影感受、绘制同人作品、制作表情包等。这些行为成为中华文化记忆扩散的重要节点。数字平台驱动的文化共享跨越时空障碍，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能够领略中华文化的精髓，增强了中华文化的吸引力、辐射力、传播力。

第二，以数字技术催生中华文化新型共同体。“共同文化具有强大的实践功能，它凝聚共识，

促进文化共同体形成。”^[24]数字媒介平台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拟态社会空间”。《哪吒2》爆火之后，各类围绕“哪吒文化”构建的虚拟社群纷纷涌现。在豆瓣小组、微信群、QQ群以及微博超话等多样化的数字平台上，成员们专注讨论《哪吒2》的传统文化底蕴、电影工业美学、技术解码、形象妆容等话题，不仅满足了自身在精神文化层面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需求，还以思想观念和文化创意的碰撞交融促进了中华文化传播，激发了当代中国多元文化的创新活力。

第三，以数字技术强化全球语境下的中华民族身份认同。身份认同作为超越个人意志规范的集体性范畴，其强化的心理机制往往建立在基于“我群”的社会“求同分类”和基于“他者”的社会“存异比较”之上，因而差异性的“他者”存在是身份认同不可或缺的认知坐标。数字技术的发展重构了全球信息流动的格局，突破了身份建构场域的传统地理界限，在虚实交织的数字化空间内形成新的认知坐标参照系，促进了个体、民族、国家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全球电影文化工业为例，好莱坞大片长期以来凭借强大的制作团队、先进的特效技术和深入人心的英雄叙事，在全球电影市场占据主导地位。不同于好莱坞大片动辄巨额投资、依赖工业化流水线制作，《哪吒2》充分发挥了本土数字技术优势，依托自主研发的动画建模、特效渲染技术，打造具有东方美学特征的视觉体系，有力突破了西方英雄叙事程式与电影技术标准对市场的垄断。这不仅激励中国文化产业继续探索和创新、为全球文化市场注入新活力和多元性，而且激发了全体人民的民族自豪感、文化自信心和身份认同力。

（二）跨域对话：中外文化交流互鉴，强化中华文化世界感知

文化之间的跨域对话是促进不同文明相互理解和尊重的重要途径。“世界各民族文化互鉴共进是人类文明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25]

第一，加强中华文化对外创新传播，促进中华文化记忆跨域流动，推动中华文化国际认同。集体记忆的生产与传播，伴随着记忆者、记忆内容、记忆形式及记忆实践的跨时空流动与转换。当前，民族集体记忆不再限于单一族群“记忆之场”，而是聚焦全球“记忆之旅”。世界文化形成“文化超级市场”，文化认同成为“建立在分化、差异（甚至对立）基础上的选择过程”^[26]。要在世界多元文化环境中传承好、发展好中华文化，我们需秉持开放的记忆观，借由对外文化传播和沟通过程，生成与维系中华文化的全球公共性记忆，助力中华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基于此，既要“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创新开展网络外宣，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27]，也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28]。这有利于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消除国际社会部分群体对中国的刻板记忆和文化偏见，进而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认同。

第二，把握中外文化之间的共识点，塑造情感共通，拓宽有效传播中华文化的途径。以“英雄”形象为例，英雄传播就是要让中国英雄得到全世界人民的尊敬和认同，成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力支撑，让英雄文化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起到重要作用^[29]。哪吒作为承载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英雄符号，与西方异质文化语境中的英雄认知图式存在本质性差异。这就导致哪吒、悟空一类的中国文化形象走向世界舞台时，容易遭遇集体记忆层面认知隔阂与场域错位带来的“文化折扣”效应。面对这一困境，既需要坚定不移地维护哪吒文化形象所蕴含的中国精神内核，保持中华文化身份的独特性与主体性，也要进行必要的创造性转化以适应国外观众的认知习惯与审美偏好，促进跨文化的有效理解与沟通。《哪吒2》对哪吒的英雄形象塑造保持了文化特异性

与普适性之间的动态平衡。西方超级英雄谱系植根于新教伦理与启蒙理性交织的个人主义传统，其救赎路径凸显原子化个体的超凡能力。相较而言，《哪吒2》中哪吒成长轨迹通过进阶，完成从个体觉醒到济世利他的价值升华，这种集体本位的英雄观折射出“天人合一”的东方智慧。同时，哪吒所展现的不畏强权、勇敢无畏与正义感等精神美德，是全人类共同尊崇的价值观。这些共通之处构成了连接中外文化沟通交流的桥梁，帮助国外观众更好地理解、尊重中华文化独特内涵。

五、向上升华：记忆提炼与中华文化认同的价值内化

核心价值观是国家和民族个体行为、社会构建和制度形成的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30]提炼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中的核心价值理念、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能够构建起贯通古今的文化价值坐标，推动中华文化基因与时代精神深度融合，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深层支撑。

（一）伦理解构：实现传统道德典范的创造性转化

传统道德典范创造性转化的本质在于将历史经验中的伦理智慧转化为现代社会的价值资源，以具象化、情境化的方式完成伦理价值传递。

传统道德典范的创造性转化，要将静态的道德训诫转化为动态的道德价值调和。集体记忆的建构本身就蕴含着一定的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它不是对过去的客观复现，而是塑造符合当下需求的共同记忆。“哪些事件被强调，哪些被淡化”，成为传统道德典范创造性转化的动态调和基准。《哪吒2》通过对传统哪吒故事的情节取舍完成了对传统道德典范的创造性转化。例如，传统哪吒故事中哪吒自刎“还骨肉于父母”是因“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孝道规范；《哪吒2》则剔除了“抽血割肉”的残酷仪式，转用“天劫咒”等超现实设定替代，避免对愚孝伦理的视觉强化。传统哪吒故事中哪吒与李靖的关系剑拔弩张，“毁庙劈像”情节将反父权推向悲剧高潮，而《哪吒2》重构家庭关系，李靖从封建家长转变为慈父，护家行动契合了当下家庭文明和睦的时代倡导。可见，《哪吒2》借助集体主义、家庭情感等新伦理维系价值共识，成功折射出当代中国道德伦理规范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动态调和。

传统道德典范的创造性转化，要通过情感共鸣而非道德说教完成价值传递。有学者提出一种“以道德感动取代规范制约”的伦理范式，强调塑造一个以“共情”或“将心比心”为价值底色的良好社会^[31]。感动是主体的思想感情受外界事物影响而有所触动的一种情感状态，认知心理学表明主体在接收情感附着的信息时更易形成长期稳固的记忆。情感共鸣是将抽象伦理转化为可感知的生命经验并使传统价值在当代获得自发性认同的重要突破口。例如，哪吒母亲离世时以血肉之躯拥抱浑身尖刺的哪吒，说出“娘从没在乎过，你是仙是魔，娘只知道，你是娘的儿”，让观众热泪盈眶，感受到中国式家庭伦理情感的深沉纯粹。哪吒从对命运的抗拒到对自身身份的接纳，完成了从“我命由我不由天”到“小爷是魔，那又如何”的转变，让观众看到了突破命运枷锁的力量，引发了人们对于自我价值和人生选择的思考。因此，传统道德典范创造性转化需以情感共振的方式赋予其生命力，进而推动伦理实践从“你必须如何”的规训升华为“我愿成为何人”的自觉选择。

（二）精神传承：实现传统价值体系的创新性发展

中华文化中的优秀思想、卓越理念、先进精神是推动中华文明发展延续五千多年的根本依据^[32]。传统价值体系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内核，其创新性发展核心在于“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33]。

在内容层面，《哪吒2》将传统价值观念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历时性精神积淀。《哪吒2》实现了中国传统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社会、个体层面的深度链接。例如，陈塘关保卫战以众志成城精神暗喻中国动画工业技术积累突破的“富强”之路；“灵魔共生”的设定以“和而不同”理念隐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和谐”之景；敖丙背负龙族复兴使命与哪吒建立跨族友谊，将传统“华夷之辨”转化为现代文明“平等”观；哪吒从“逆天改命”的个体觉醒到“守护陈塘关”的集体责任转变，将传统“忠君报国”思想转化为现代人的“爱国”主义；等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12个主题词均能在《哪吒2》的情节中找到相应内容。

在叙事层面，《哪吒2》汲取现实个体记忆熔铸于家国认同宏大叙事，引发共时性情感共振。在当代文艺创作中，创作主体与艺术客体的共振指向创作者与作品间的互文性对话，更蕴含着文化生产场域中个体经验与集体记忆的辩证统一。《哪吒2》导演杨宇的个人经历本身就是一段将个体记忆熔铸于家国情怀的生动例证。杨宇并非传统动画科班出身，却因对动画的热爱而转行。他将自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对中国现代社会的观察以及个人成长中的磨砺与坚持，融入哪吒这一经典角色的重塑之中，激发了观众对于个人命运与家国情怀的思考。当导演杨宇“十年磨一剑”^[34]的人生经历与银幕上哪吒莲花重生情节相映射时，个体记忆便通过艺术媒介升华为集体情感。由此，创作者个体记忆与观众个体记忆汇聚成共振性的集体记忆，在家国同构的叙事中建构中华文化的深层认同。

六、向下扎根：记忆渗透与中华文化认同的实践外化

中华文化认同的建构，既需要依托象征性符号的显性表达，更离不开具身参与的仪式化实践与日常生活场景的微观再生产。集体记忆向下渗透扎根的过程，是从实践层面建构中华文化认同的社会行动过程，也是中华文化认同从“内化于心”到“外化于行”的转变过程。

（一）具身参与：强化仪式化场景中的身体化实践

具身参与是集体记忆建构中华文化认同的关键机制。具身认知理论中，认知过程并非局限于身体的生理结构和大脑的抽象活动，自然、社会、文化和历史环境同样参与认知生成^[35]。《哪吒2》通过三重维度激活具身参与的认同效能，为集体记忆的现实渗透与中华文化认同的实践转化提供创新范式。

首先，多感官协同的沉浸式体验强化情感记忆留存。身体是知觉的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体，知觉层面的身体融合了具身和智性双重要素^[36]。在《哪吒2》的观影场景中，众多影院不仅采用IMAX、3D及杜比全景声技术提升观影体验，还推出了4D电影体验，巧妙融入震动、吹风、烟雾、气味等多元化感官模拟效果打造视听触觉协同的沉浸场域。沉浸式体验凭借刺激感官神经的空间化运动触发观众的身体记忆，促使观众在无意识间完成从情节记忆到情感记忆的融合转化，引导其在深度具身

参与过程中审视自身行为和在社会文化中的角色，实现从“旁观者”向“行动者”的身份转变。

其次，社交仪式的共同体建构创造新型记忆节点。法国社会学家保罗·康纳顿将身体的记忆沉淀与积累区分为“体化实践”与“刻写实践”^[37]，认为个人在文化记忆中的角色，无论是主动地再创造还是被动地承诺，都反复暗示着记忆媒介与具身实践之间的亲密关系。也就是说，集体记忆的存续依赖于历时维度的周期性重复和共时维度的节奏同步性^[38]。《哪吒 2》播出之后，许多年轻人选择与他人结伴观影，组成独特的“哪吒搭子”。这种搭子关系不仅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有了陪伴和分享的对象，更通过身体的共同在场增强了彼此的情感联结，将中华文化认同的内在情感外化为社交资本积累，促进了中华文化认同的场景延伸和实践转化。

最后，重复性消费行为强化集体记忆的身体实践。集体记忆的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周期性的唤醒和重构循环。《哪吒 2》的观影人次早已突破 2 亿，许多观众“二刷”“三刷”，推动影片票房与口碑不断创新高。这种海内外中华儿女重复观影的集体行为并非单纯的情节回顾，而是观众在已知叙事框架下对细节的深度挖掘与意义重构，也是一种文化认同与情感共振的爆发式表达。

（二）情景嵌入：巩固日常生活记忆的微观再生产实践

日常生活记忆的微观再生产，是中华文化认同从仪式化场景向常态生活渗透的必经之路。其作为社会再生产的基础领域，以现实实践将文化价值观念外化为自然化的行动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39]深入巩固中华文化认同，需要将中华文化符号嵌入饮食、服饰、语言等日常场景，形成从记忆到认同、从认同到惯习“日用而不觉”的生活链条。

一方面，文化 IP 连接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形成全新的文化消费模式。文化 IP 是一种以文化元素为核心的知识产权，可通过文本、音视频及衍生品等形式的创造性开发，将传统文化或现代文化符号转化为具有高辨识度、强变现能力的文化资产。文化 IP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源泉、以现代包装为手段，推动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生活场景历时关联，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打造文化 IP 形成“文化在场”效应，不仅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双重跃迁，而且通过日常生活重塑了现代人的文化认知与消费习惯。例如，哪吒 IP 以设计精美和创意独特的盲盒、手办等文创产品吸引了大量消费者购买和收藏；哪吒 IP 还与众多品牌进行跨界合作推出联名产品，如美食、服饰、文具等，进一步扩大了哪吒 IP 的影响力和传播范围。

另一方面，文化产业链协同创造文化新质生产力，打造文化高质量发展模式。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意深度融合，文化产业链协同则通过整合资源、技术、人才等要素，推动文化生产力向更高层次跃升。2024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针对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出两道“融合命题”：一是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二是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40]。《哪吒 2》的成功是文化产业链协同的典型案列。从技术端来看，它是百余家企业协同攻关动画技术的结晶；从产业端来看，它在播出后以科技赋能衍生品开发、文旅联动等全链条运营实现了社会效益与市场效益的统一。例如，江西某景区打造的“元宇宙陈塘关”利用 XR 技术还原神话场景，游客通过数字分身参与哪吒闹海剧情；四川某景区推出哪吒主题短剧，结合社交媒体传播实现品牌破圈。以《哪吒 2》为代表的一系列文化产业创新实践，推动传统文化资源与现代文化资源有机

共生, 促进文化与科技、旅游等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 实现跨界共生的发展模式, 加速文化产业新业态的持续涌现。

七、结语

培育和强化中华文化认同是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重大命题, 于文化传承而言是响应“两创”方针、坚持“两个结合”的核心之义, 于民族复兴而言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由之路。以《哪吒2》为例探究集体记忆建构中华文化认同的理论与实践机制, 不是拘泥于单个案例的具体挖掘, 而是见微知著形成可推广的现实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41], 党的二十大提出“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42]部署。以此为遵循, 要在“激活历史记忆、创新现代表达”中审视当代中国文化产业创新实践, 在“扎根当代实践、融通全球话语”中展望中华文化认同的全球传播图景。国际话语权视角下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是一个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实践之上、推动中华文明的实践与文明话语创造之间双向互动的过程^[43]。微观上, 推进中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应坚持守正创新, 以厚植历史记忆、构建当代记忆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 以符号生产、技术赋能、价值重构、实践互动的记忆转化原则推进中华文化认同向纵深发展。中观上, 巩固中华文化认同应依托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以物质与精神空间共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实现从“美美与共”到“人心归聚”的现实贯通。宏观上, 应进一步将中华文化认同上升至国家认同、文明认同的高度, 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 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和文明交流互鉴中展现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进而推进中华文化认同成为支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合法性、彰显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先进性的精神基石。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3年6月2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4.
-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N]. 人民日报, 2023-10-29 (1).
- [3]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2024年9月27日) [N]. 人民日报, 2024-09-28 (2).
- [4] 《哪吒2》打破纪录对好莱坞意味着什么? [N]. 环球时报, 2025-02-13 (12).
- [5] 《哪吒2》引发港澳观众热烈期待 影片举行香港首映礼并开始港澳地区预售 [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5-02-19 (4).
- [6] 王明珂. 华夏边缘: 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90.
- [7] 赵颖, 云桓. 以文化记忆培育中华民族文化认同: 载体、功能及实践理路 [J]. 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6): 97-103.
- [8] 李少霞, 魏莉, 岳喆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集体记忆维度——基于集体记忆历时、共时、即时的三重时序构建 [J]. 广西民族研究, 2024 (4): 76-87.
- [9] 刘然. 革命文化作为中华各民族集体记忆的文化认同功能 [J]. 广西民族研究, 2023 (5): 142-149.

- [10] 张宏邦, 卢柯含. 塑造与凝聚: 民族传统节日中的文化记忆与民族认同[J]. 民族学刊, 2024(12): 87-95+151.
- [11] 林继富, 何佩雯. “二十四节气”的集体记忆与中华文化认同[J]. 广西民族研究, 2022(6): 83-92.
- [12] 莫里斯·哈布瓦赫. 论集体记忆[M]. 毕然, 郭金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69.
- [13] 皮埃尔·诺拉. 记忆之场: 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M]. 黄艳红, 等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4.
- [14] 扬·阿斯曼. 文化记忆: 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 金寿福, 黄晓晨,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6.
- [15] 于苗, 吴慧娜. 新时代主题性电视剧的集体记忆建构与传统文化内涵表达[J]. 中国电视, 2023(1): 35-38.
- [16] 王子威. 从个体阐释到公共阐释——论“阐释学循环”概念的发展演进[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5): 39-47.
- [17] 李伯黍. 教育心理学[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75.
- [18] 易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机理研究[D].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 2017.
- [19] 李培鑫. 《黑神话: 悟空》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逻辑、路径与启示——基于文化符号视角[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1): 63-76.
-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81.
- [21] 刘亚秋. 记忆二重性和社会本体论——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的社会理论传统[J]. 社会学研究, 2017(1): 148-170+245.
- [22] 夏德元, 刘博. “流动的现代性”与“液态的记忆”——短视频在新时代集体记忆建构中的特殊作用[J]. 当代传播, 2020(5): 38-42+53.
- [23] 湛知翼, 胡翼青. 再论麦克卢汉“媒介即人的延伸”——媒介环境学经典理论重访之二[J]. 新闻记者, 2023(5): 38-51.
- [24] 胡爱玲, 武学佳. 走向共同文化构建文化共同体——威廉斯文化社会主义思想的旨趣[J]. 思想教育研究, 2024(10): 105-112.
- [25] 习近平向首届丝绸之路国际文化博览会致贺信[N]. 人民日报, 2016-09-21(1).
- [26] 韩震. 论全球化进程中的多重文化认同[J]. 求是学刊, 2005(5): 21-26.
- [27]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锚定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 不断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N]. 人民日报, 2024-10-29(1).
- [28]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34.
- [29] 韩云波, 熊敏, 张梦楠. 新时代青年英雄观的内涵因子分析: 一项基于新征程语境的实证研究[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3): 97-113.
- [30] 习近平. 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12.
- [31] 王庆节. 道德感动与儒家的德性示范伦理学[J]. 学术月刊, 2016(8): 32-39.
- [32] 郝保权, 潘莹莹.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辩证思维[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4(3): 4-10.
- [33]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17.
- [34] 石羚. 守护心中那团火[N]. 人民日报, 2025-02-18(4).
- [35] 陈简, 叶浩生. 意义的遮蔽——再论具身认知中的“身”[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潘莹莹. 集体记忆建构中华文化认同的理论构型与作用机制——以《哪吒之魔童闹海》为案例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3): 99-111.

2020 (5): 187-192.

- [36] 沈宇彬. 梅洛-庞蒂“知觉世界”的“时空性结构” [J]. 世界哲学, 2021 (3): 90-101+160.
- [37] 保罗·康纳顿. 社会如何记忆 [M]. 纳日碧力戈,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91.
- [38] 黄顺铭, 陈昭博. “有声的我们”: 以接力朗读构筑集体身体记忆 [J]. 新闻大学, 2024 (5): 98-115+121.
- [3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165.
- [40] 习近平在湖南考察时强调 坚持改革创新求真务实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蔡奇陪同考察 [N]. 人民日报, 2024-03-22 (1).
- [4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118.
- [4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45.
- [43] 邹慧. 国际话语权视角下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研究 [J/OL].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15 [2025-05-30]. <https://link.cnki.net/urlid/50.1023.C.20250429.1256.004>.

责任编辑: 龚静阳 校对: 王京菁



全面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的 时代背景、主要意涵与创新路径

汪曙申

（中国社会科学院 台湾研究所，北京 100000）

摘要：两岸融合发展是中国大陆促进两岸关系发展、推动国家统一进程的重要理念、政策举措，也是大陆对台工作持续创新创造的新时代呈现，成为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的重要内容。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全面促进两岸融合发展面临的时代背景是：中国式现代化波澜壮阔向前推进；国际格局与全球体系加速复杂演变；中美战略竞争持续向台海地区聚焦；民进党“绿色独裁”显著加剧两岸关系对立对抗，这为全面促进两岸融合发展带来机遇和挑战。在此时代背景下，两岸融合发展主要包含以下意涵：两岸融合发展是推进国家完全统一的重要路径，两岸融合发展追求两岸互嵌式关系和共同体状态，两岸融合发展突出两岸人民共有共治共享的价值理念，两岸融合发展支持守正创新和探索新路。全面促进两岸融合发展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要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引领，以战略眼光、创新思维推动渠道、制度、法治、舆论等四方面建设，不断丰富和发展国家统一理论与实践。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两岸融合发展；国家统一；两岸关系；中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5）03-0112-11

一、问题的提出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体系和话语的重要创新，也是新时代党推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5.03.009

作者简介：汪曙申，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引用格式：汪曙申. 全面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的时代背景、主要意涵与创新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3): 112-122.

汪曙申. 全面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的时代背景、主要意涵与创新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3): 112-122.

动对台工作发展的一种价值标识。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就对台工作提出一系列重要理念、重大政策主张,形成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2022年8月,中国政府发布的《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指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是通向和平统一的重要途径,突出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勇于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率先在福建建设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1]。这一表述明确了两岸融合发展在推动国家统一事业中的定位,指出了探索新路的方向。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继续致力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2]。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使用“各领域”的表述明确了促进两岸融合发展政策的范畴、广度与深度,意味着它不会局限于一时一地一处。2024年7月18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完善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制度和政策,深化两岸融合发展。”^[3]这一论述将制度建设和政策体系作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

两岸融合发展是一个制度构建、创新和不断完善的过程。自从台湾问题形成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时代背景、国际环境、大国关系、国内路线的调整变化,实事求是地不断推动对台大政方针的创新发展。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致力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大体经历了“反独遏独”(2000—2008年)、“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2008—2016年)、“反分裂反干涉促统一”(2016年至今)三个阶段。两岸融合发展的概念提出与政策实践,始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阶段,在“反分裂反干涉促统一”阶段得到拓展与深化。对于两岸融合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国内既有研究主要聚焦四个层面。一是探究两岸融合发展的概念及其与中国大陆对台政策的内涵关联^[4]。二是两岸经济贸易、产业合作、社会文化、青年等各个领域的交流融合发展状况及影响^[5]。三是探讨两岸民间信仰精神纽带对两岸融合发展的历史经验与现实价值^[6]。四是立足于两岸关系形势,梳理分析两岸融合发展进程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7]。然而,经过40多年的发展变化,中国的国家统一以及两岸融合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之上,也具有了不同以往的时代背景与任务需求,对两岸融合发展的研究亟需结合新形势新背景新变量展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8]从国际来看,在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同时,国际权力格局与秩序深度调整,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与战略遏制的步伐不断加快,对中国的发展进步乃至国家主权、安全问题带来更大的挑战。从国内来看,台湾地区的政治生态、经济结构、社会脉动与民意心理正在经历深度的适应性调整,与全球地缘政治经济变迁、海峡两岸关系变化相互叠加影响、同频共振。这一系列新形势新情况,无疑成为我们审视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的台海形势演变,评估大陆对台政策创新发展着力点和增长点,塑造两岸关系总体态势朝着有利于和平稳定、遏控“台独”、促进统一方向发展等的宏观背景和变量。

新时代新征程,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特别是日益严峻的台海局势,立足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和国家统一的战略全局,中国大陆保持战略信心、战略定力和战略主导,坚持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的价值理念与政策方向不动摇,不断丰富内涵、创新形式、拓展深度、扩大影响。这对于反

对“台独”分裂主义、塑造国家完全统一大势，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立足于国际国内新形势，着重探讨全面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的主要意涵，提出 5 个方面的创新路径，希望深化对这一重要对台工作理论和实践重大创新的认识。

二、全面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的时代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加快推进国家完全统一的历史进程。与此同时，国际力量对比出现冷战后最为深刻的调整变化，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面临新的战略环境和战略条件。时代大背景与战略环境、条件的演进、变迁，成为中国共产党统筹当前和长远，丰富和发展国家统一理论和两岸方针政策的重要因素。

（一）中国式现代化波澜壮阔向前推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9]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擘画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战略举措，牢牢坚持创新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3]。

中国式现代化为促进两岸融合发展以及台湾同胞共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成果和荣耀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从历史逻辑看，引领两岸关系发展、国家统一方向的最主要力量在于祖国大陆，最关键因素在于大陆的发展进步。物质基础、经济基础、科技基础构筑一个现代国家的硬实力。2024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134.9 万亿元，比 2023 年增长 5%；2024 年中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 43 万亿元，同比增长 5%，连续 8 年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在第 4 次工业革命开启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经济保持高质量发展，制造业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全球创新指数 2024 年排名升至第 11 位，新质生产力不断迸发。我国的人工智能、量子科技、载人航天、数字经济、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发展处于世界第一梯队。环顾全球，第 4 次工业革命的竞争将主要在中国与美国两个国家之间展开。

改革开放以来，祖国大陆的综合实力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对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从实践逻辑看，中国的国家现代化始终是一个不断累积经验和持续开拓创新的前进过程，不封闭僵化，不停滞倒退，坚持通过制度创新拓展两岸关系路径、提供发展动力。20 世纪 90 年代的两岸两会谈判实践，21 世纪初加入世贸组织后的两岸经贸合作实践，2008 年开启两岸“先经后政”的和平发展实践，2016 年以来的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制度和政策实践等，均立足于“以我为主、积极运筹、政策供给、实践成效”的原则，始终引领着两岸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不断促进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进程。

（二）国际格局与全球体系加速复杂演变

21 世纪以来，国际权力格局的调整步伐明显加快，国家间力量的分化越来越凸显，大国战略格局不断发展^[10]。2022 年俄乌冲突、2023 年巴以冲突和 2024 年伊朗、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冲突，都推动了全球地缘政治更为剧烈的震动，俄美矛盾、俄欧矛盾达到冷战结束以来的最高点。美国拜登政府强化了美国与七国集团、北约国家间的关系，建立“奥库斯”联盟，在“印太地区”构建美日韩、

汪曙申. 全面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的时代背景、主要意涵与创新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3): 112-122.

美日菲、美日澳等小多边安全机制, 对中国和俄罗斯进行战略围堵与遏制。2025 年特朗普再次执政, 对华发起史无前例的关税战和贸易霸凌, 空前打乱全球地缘经济秩序。与此同时, “全球南方” 国家实力增长, “金砖国家” 扩容, 非西方世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力量继续上升, 非西方力量在世界多极化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在国际秩序调整与转换的历史过程中, 美国的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兴起, 肆意挑战全球治理格局, 削弱世界贸易组织规则, 破坏《信息技术协定》(ITA), 以产业补贴和关税高墙维护美国半导体产业优势, 以泛安全化思维和不正当竞争政策打压他国企业。美国这种霸权霸道霸凌在相互依赖的全球化时代备受国际社会质疑和批判^[11]。美国推行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政策, 实施对华贸易再平衡和科技脱钩断链。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 为缩减美国的巨大贸易赤字和重振本土制造业, 大规模发动全球关税战, 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征收史无前例的重税, 中美经贸关系出现颠覆性挑战^[12]。虽然经过 2025 年 5 月 12 日的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 明确美方取消 91% 的加征关税, 中方同步取消对等反制措施, 并暂停实施 24% 的“对等关税”, 但美方不断变化的关税政策仍然为未来两岸经贸关系增添了复杂变数和不确定性。

(三) 中美战略竞争持续向台海地区聚焦

自特朗普第一任期起, 美国摒弃传统的对华接触政策, 改以对华竞争与遏制为主。中国反对美国霸权至上, 坚持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处理中美关系, 坚决反对中美关系滑向“新冷战”的深渊。这种局势演变至今, 台湾问题成为中美战略竞争中最敏感、最可能触发危机的问题, 对构建稳定、健康、可持续的中美关系带来双方建交以来最为复杂的严峻挑战。习近平主席曾向拜登表示: “台湾问题的真正现状和一个中国的核心内容是: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实现完全统一, 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是有耐心的, 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但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挑衅逼迫, 甚至突破红线, 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13]

然而, 美国出于遏制中国发展、维系持久霸权的战略需要, 仍在不断虚化“一个中国”政策。在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中, 提升美国与台湾当局的实质关系, 针对中国大陆实施更强硬的威慑政策, 几乎成为跨党派跨府会的共同看法。这一趋势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得到延续, 而且会因为特朗普的商人交易性格以及他身边聚集的对华战略鹰派而呈现出更大的不确定性^[14]。2025 年 1 月 17 日, 习近平主席应约同特朗普通电话, 指出: “作为两个国情不同的大国, 中美之间难免会有一些分歧, 关键是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办法。台湾问题事关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希望美方务必慎重处理。”^[15] 2025 年 2 月, 对台工作会议指出, 要坚决反对和遏制外部势力干涉, 巩固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16]。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政策及战略博弈, 必然将影响台湾地区主要政党的路线选择和政策倾向, 进而影响两岸关系的现状与发展。

(四) 民进党“绿色独裁”显著加剧两岸关系对立对抗

2016 年以来在台湾地区连续当政的民进党当局, 不断“绿化”岛内社会, 极力拓展“台独”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土壤。台湾当局一意孤行的战略悖离短期难以改变, 将更大范围、更深程度影响到两岸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这导致两岸关系互动模式进入“抗中拒统谋独”与“遏独促统促融”的尖锐对立。赖清德的“台独”理念更顽固, 立场更强硬, 手腕更强势。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所谓

“新两国论”立场，将加强台湾所谓“经济安全化”和“脱中融美”作为两岸经贸政策的主要目标，加大力度构建阻挠两岸融合发展的法律和政策体系。特别是民进党当局制定和实施所谓“国安五法”“反渗透法”，毫不顾忌利用公权力单方面限制两岸交流交往，打击岛内“两岸合作派”，对两岸融合发展设置了越来越大的障碍。2025 年 2 月，赖清德出席“哈利法克斯台北论坛”时妄称“全球民主阵营共同打造‘非红供应链’”，提出所谓“全球半导体民主供应链伙伴倡议”。这表明，在中美两国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台湾当局选择协助美国割裂全球化经济秩序，制造两个平行体系。2025 年 3 月 12 日，赖清德在所谓“国安高层会议”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将中国大陆定义为“境外敌对势力”，提出所谓“五大国安统战威胁”，妄称台湾社会面临大陆“借两岸交流对台湾社会统战渗透的威胁；借融合发展吸引台商、台青的威胁”，并且出台“17 项因应策略”。这些措施对两岸经济、旅游、文化、教育、城市等全领域交流，构成台湾地区“解严”以来最高程度的限制。

民进党当局持续性、大范围限制两岸经济交流合作，导致两岸经贸相互依存度有所下降。据台湾方面统计，2017 年特朗普刚上台和中美贸易冲突爆发前，台湾对大陆（含香港）的出口额占台湾总出口额的 41.2%，2024 年下降到 31.7%，减少 9.5 个百分点；同期，台湾对美国的出口额占比从 11.7% 增长到 23.4%。这一阶段性变化显示，台湾地区出口贸易对大陆的依赖度下降，对美国的依赖度上升。这种反差现象也反映在台湾地区对大陆和美国的投资数据上面。如今，台积电宣布对美国的投资计划总额已达到 1 650 亿美元，创下历史最高，其将在美国生产 3 纳米、2 纳米先进制程的芯片并且构建新的半导体供应链体系，成为美国重振半导体产业的主要协助者。台湾地区主流民意希望两岸和平、交流、繁荣，但也有部分群体疑惧两岸统一进程提速，担忧台湾会被大陆经济吸纳、社会融合和政治“统战”。这些因素相互叠加作用，无疑将制约两岸融合发展向两岸经济社会共同体的高级阶段发展演变。

综上所述，全面促进两岸融合发展处于一个大发展大变动的时代，其面临的战略机遇与现实挑战并存。未来一个时期，大陆的主导权主动权与台湾当局的排斥性抗拒性将相互交织，两岸融合发展趋势性推进和阶段性阻碍将并立并存，两岸关系、岛内政治与国际外部等因素将相互叠加、交缠影响。

三、全面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的主要意涵

中国共产党对台大政方针和政策措施的制定与出台，是基于对全球时代背景的深刻洞察，对大历史趋势的准确预见，对国家利益的精准把握，对台海局势的科学研判。全面促进两岸融合发展，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的主要意涵。

（一）两岸融合发展是推进国家完全统一的重要路径

两岸融合发展尊重历史与现实条件。它是一种先进理念，是大陆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运用到促进两岸关系和推进祖国统一事业当中。大陆越来越广泛地将“两岸一家亲”理念贯彻到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的政策体系中。不管是两岸关系稳定发展还是遭遇逆流挫折，大陆方面都始终坚持两岸融合发展的理念创新与实践探索。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创新工程，两岸融合发展做实、做好、做精，将有利于促进两岸民心相通、民意相融，有利于破除民进党当局压缩两岸交流、制造两

岸隔阂的“台独”政策。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陆促进两岸融合发展不是权宜之计，不追求短期速成效应，而是着眼统一事业长远，坚持久久为功。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政策短期效果的有限性、局部性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它是事物发展从量变到质变必然需要经历的过程。

（二）两岸融合发展追求两岸互嵌式关系和共同体状态

发展进步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两岸同胞追求的共同价值。共享发展是促进两岸融合的重要路径。与一般意义上的两岸交流合作相比，两岸融合发展属于更高层次的互嵌状态。经济领域，从一般层次的商品服务交换、贸易往来、投资合作，逐步提升至构建具有中华民族经济特色的两岸共同体。其中，经济产业总体优势互补，要素自由流动整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两岸经济一体化。社会领域，从一般层次的双向接触交流交往，逐步提升到构建社会大众参与和治理的两岸共同体。其中，进一步破除阻碍两岸民间社会互融的法律和制度障碍，构建有利于促进两岸民众生产生活交融的架构与机制。文化领域，从一般层次的文化思想交流和文化产业合作，逐步提升至构建“两岸一家亲”“两岸命运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中，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团结两岸同胞之本、国家统一之基，推动台湾同胞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从该维度来看，两岸融合发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两岸经济合作、社会互动和民意相通，其深层次、高立意的价值追求是实现两岸经济社会的互嵌式关系和共同体状态。

（三）两岸融合发展突出两岸人民共有共治共享的价值理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着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海峡两岸同属中华文化圈，同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浸润，在对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人民与权利的关系上有着本源上近趋一致的认知。在两岸政治制度、政党结构、法律体系、社会构造存在差异的情况下，促进两岸融合发展需要能够联结两岸社会和广大同胞共识的价值导向和实践轴线。宏大的政治理念叙事与见诸日常的体验相互结合，会产生价值与实践同一性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17]以全体人民为中心、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良善治理，可以包容两岸制度和社会的差异性，成为构建两岸共同价值追求的桥梁纽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涉及政府、市场、社会、观念治理的合法性、合理性和高效性，涉及政党、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民众共同参与、协同治理。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导向的良善社会治理状态是两岸人民的共同追求。两岸融合发展的制度设计和实践创新，需要契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要求，而后者的成功实践和创造性发展势必促进国家与社会的共生共荣、互促互进。这为两岸融合发展不断塑造出先进的价值观念引领，切实提高两岸融合发展的实质效益，促进两岸民众利益共享，扩大台湾民众的受益面、获得感和认同度。

（四）两岸融合发展支持守正创新和探索新路

从历史思维看，两岸经济社会的接触、交流、融合有自然发展的一面，但更为重要的是政策的引领和开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将更大程度促进中国大陆发展进步，为大陆主导主控两岸关系的发展方向提供更强基础和更大力量。中国大陆的发展进步将为塑造两岸关系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和更多的有效路径。两岸融合发展从来不是静止和固定的，而是动态发展的过程。2023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

示范区的意见》发布，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助力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和前瞻探索^[18]。2024 年 6 月 14 日，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上表示，要深刻把握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意义和部署要求，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在理念思路不断深化、在政策制度上不断完善、在实践探索上不断突破。中国式现代化将对两岸关系产生整体性、全局性和长远性影响，守正创新和探索新路将成为大陆促融促统的重要思想方法。

四、全面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

全面促进两岸融合发展是一个长期工程、系统工程，需要紧扣时代背景，围绕核心意涵，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引领，以战略眼光、创新思维推动渠道、制度、法治、舆论等四方面建设。

（一）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中国式现代化引领两岸融合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中国积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导向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精神纽带，倡导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擘画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蓝图。中国正在贯彻落实决议提出的使命任务，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将与两岸融合发展建立新的衔接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将引领两岸融合发展走向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全方位增强大陆对台湾的吸引力、影响力，以及对两岸关系的主导力、塑造力。

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包括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19]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命题呈现的必然是国家统一的战略目标坚定不移，精神力量蓬勃发展，方法路径开拓创新，成效成就愈益彰显。

（二）加强渠道建设，扩大两岸融合发展的实践空间

尽管两岸关系日益严峻复杂，大陆始终支持台湾同胞“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期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最大内生动力在于社会基础、人民主体、民间力量，维护和促进台湾同胞的利益和福祉是中国共产党对台工作的重要目标，是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价值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40 周年纪念会上指出：“两岸要应通尽通，提升经贸合作畅通、基础设施联通、能源资源互通、行业标准共通，可以率先实现金门、马祖同福建沿海地区通水、通电、通气、通桥。要推动两岸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合作，社会保障和公共资源共享，支持两岸邻近或条件相当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20]

在两岸关系史上，对话协商是破解两岸关系发展难题、开辟两岸交流合作新路的重要途径。当前，由于民进党当局拒绝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两岸官方层面的对话协商中断。

汪曙申. 全面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的时代背景、主要意涵与创新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3): 112-122.

在此情况下, 大陆更加重视与台湾社会整体面的联系往来, 与岛内中产阶层、青少年、文化教育、体育、农渔民等群体交流交往从未中断。大陆持续重视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以我为主加强两岸融合发展的渠道建设。大陆持续举办十六届海峡论坛, 积极容纳岛内社会、各行各业、基层一线参与两岸交流。大陆不断拓展海峡两岸交流渠道, 开发两岸交流独特资源。大陆连续举办十届两岸企业家峰会, 助力台胞台企融入大陆新发展格局, 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大陆搭建两岸青年企业家菁英峰会, 支持台湾青年赴大陆就业创业; 举办七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 以“两岸一家亲”理念推动两岸青年交流融合。对于来大陆就业创业的台湾青年, 大陆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支持, 使其“愿意来、留得下、融得进”。此外, 上海台北“双城论坛”、“西湖·日月潭”两湖论坛、深圳基隆海峡两岸港口城市论坛持续举办, 两岸城市相互借鉴产业创新、生态保护、社会治理等先进经验。未来加强渠道建设, 将会持续突出大陆开放、主导、创新思维, 更广覆盖两岸各地域、各领域和各阶层。

(三) 加强制度建设, 提升两岸融合发展的实践成果

两岸融合发展追求经济、社会与政治综合目标, 需要国家发展战略牵引、政策系统规范、资源条件保障。在两岸关系的实践中, 制度的适用范围十分广泛, 经济、社会、文化是其中的重点领域。规范是制度的重要内容, 两岸交流交往和经济社会关系的发展, 需要对应的规范保障体系。《反分裂国家法》规定了国家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两岸关系的 5 条措施, 强调“国家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权利和利益”。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2] 具有良好适用性与规范性的制度安排, 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长期以来, 两岸关系的制度建设紧跟两岸扩大交流合作的客观形势, 一直积极发挥规范的主动性和引领的前瞻性, 为深化两岸关系发展、增进台湾同胞福祉消除障碍、营造条件。

目前, 大陆已完成一大批制度探索和运用。比如, 推动落实台胞台企同等待遇的政策体系, 涵盖经济、社会、文教和便利化等领域。设立并不断扩充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通过挖掘独特资源, 为台湾同胞参访和开展两岸交流创造条件。提出落实“新四通”目标, 推进交通基础设施联通、行业标准共通, 促进两岸应通尽通, 支持福建等地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近些年大陆相继出台《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简称“31 条措施”)、“26 条措施”、“11 条措施”、“农林 22 条措施”等。这些制度性安排颇有成效, 并随着两岸关系的实践要求不断拓展和丰富。2024 年 9 月, 福建以“积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为主题, 提出完善两岸社会融合机制, 创新两岸经贸融合机制, 健全两岸情感融合机制, 探索福建全域融合发展机制。政策创新无止境, 大陆作为两岸制度与政策的设计者、供给者和维护者, 将会尊重客观规律, 发挥首创意识, 持续完善攸关台湾同胞福祉的政策架构体系, 不断提升台湾同胞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 提升两岸融合发展的成效境界。

(四) 加强法治建设, 保障两岸融合发展的行稳致远

在两岸关系的研究范畴中,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核心价值理念。两岸融合发展是针对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和平统一的目标而提出的, 它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相统一、相一致。2014 年“两岸经济融合”概念提出, 2016 年“深化两岸经济社会融合”概念得到强调, 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40 周年纪念会上系统阐述“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夯实和平统一基础”。

发展至今，两岸融合发展的法治基础、法治保障、法治实践不断加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无疑要求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和法律手段推动两岸关系融合发展，适时将一些成熟有效的涉台政策和行为规范予以法律化法规化。大陆学界一直在探索和深化涉台法治研究，倡导发挥法治对于“反独”和促统工作的特殊价值^[21]。涉台法治的理论和实践，一直以来与两岸关系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走向密不可分。随着两岸融合发展实践的不断向前迈进，要围绕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进行立法探索，将一些科学顶层设计、政策措施、成功实践转化为有规范力的法律法规，在两岸关系领域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

同时，两岸融合发展面临诸多挑战。从台湾地区来看，民进党当局自 2016 年上台以来一直在两岸事务上推行“反交流、反融合、反统一”政策，采取限制性和惩罚性立法阻隔两岸融合。赖清德当局持续寻求通过所谓“安全法”“反渗透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港澳条例”“资通安全管理法”等，强化所谓“安全法制”对冲和破坏大陆深入实施两岸融合发展政策。从外部势力来看，美国以及少数西方国家采取“纵容‘台独’、掣肘统一”政策，通过制定涉台法律或炮制涉台决议干涉我国内政。对此，中国越来越重视运用正义的法律原则和有效的法律制度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宪法》以及《反分裂国家法》《刑法》《国家安全法》《反外国制裁法》和《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等，对进一步加强遏“独”促统政策、反对外部国家和组织干涉我国内政或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利益，加大力度保障两岸融合发展，提供重要和明确的法律支撑。

总体上，中国大陆进一步丰富完善了“以法惩独”的制度体系^[22]。涉台法律规范体系不断充实完善，从宏观原则、中观规范到微观措施，越来越聚焦遏制“台独”、深化融合、促进统一的大方向、大目标。2024 年 6 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规定：采取刑事惩治措施惩治极少数涉“独”言行恶劣、谋“独”活动猖獗的“台独”顽固分子，及其实施的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行为^[23]。大陆通过这一举措把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与广大台湾同胞区分开来，体现了争取大多数、打击极少数的合理化原则。运用法律手段促融合与反“台独”体现了对立统一的辩证法观点，依法促融有助于反“独”遏“独”，依法反“独”有助于促和促融。

（五）加强舆论建设，塑造两岸融合发展的外部环境

40 多年来，两岸民间社会交流规模日益扩大，交流形式和内涵也更加多元，但是台湾民众对大陆发展全貌不了解或者浅层次了解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民进党上台以来，台湾社会对大陆的认知面临更大的信息壁垒和交流障碍。特别是台湾地区舆论生态“绿化”严重，新闻报道、政论节目更多地被“绿色”权力和资本所把持，不少政论名嘴完全依附于民进党，沦为“绿色”权贵代理人。在岛内这种媒体生态和“绿色”信息茧房的情况下，加强对台舆论建设对于大陆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性显著提高。对台舆论建设需要符合信息智能革命大背景下的传播规律和趋势，更加需要贯彻政治思维、法治思维、斗争思维、专业思维。这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对台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尽可能扩大传播信息覆盖台湾地区的地域、阶层、人群，丰富传播信息内容和流转方式。采取贯穿历史与现状、理论与实践、法理与情理的综合方式，对在台湾社会长期存在或者近年来形成的错误论述、观点和认知，进行逻辑严密、条理清晰、说服有力的理论驳斥和

汪曙申. 全面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的时代背景、主要意涵与创新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3): 112-122.

宣传引导。

国际战略学术界研究认为, 21 世纪将见证世界历史上西方主导时代的终结^[24]。根据英国“品牌金融”咨询公司发布的《2025 年全球软实力指数》报告显示, 中国的软实力排名从 2024 年的全球第三上升至第二, 美国继续位列第一^[25]。在全球面临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以及逆全球化思潮与国家行为扩张的背景之下,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三大全球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等一系列先进理念, 充分彰显了中华文明的自主性、包容性、和平性、共享性。在推动两岸融合发展领域, 我们要重点宣传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前景; 加强岛内受众群体分析, 坚持“内容为王”“共鸣为要”, 聚焦传播三个“以”(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掌握舆论宣传的时效度, 讲透政策, 讲好故事, 收获实效。特别是针对两岸社会政治制度和心理认知存在区别, 对台舆论工作更要深入理解台湾政情社情民意, 结合岛内社会舆论传播特点, 突出软实力构建与话语权塑造, 不断总结实践经验, 提升理性认识, 深化创造运用。

五、结语

新时代塑造两岸关系、解决台湾问题, 要不断丰富和发展国家统一理论与实践。理论和实践总是不可割裂的。两岸尚未实现完全统一, 但是两岸融合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实践探索不断往前推进, 其在目标宗旨、层次水平、制度创新、影响成效等诸多维度上超越了一般意义的两岸交流交往合作。从事物发展演变的逻辑与规律看, 全面促进两岸融合发展势必贯穿于国家统一前和统一后的全过程。从国家统一前看, 两岸融合发展将为两岸统一的最终实现创造积极有利条件、减少阻力障碍、铺陈实现路径。从国家统一后看, 两岸融合发展将为两岸统一后的良善治理、和谐进步提供制度支撑、实践引导。在未来完成两岸政治整合、国际代表权整合、社会经济融合、民心民意融合后, 两岸融合治理势必将更加全面深入彻底。尽管民进党当局推行阶段性“阻融抗统”消极政策, 祖国大陆完全有信心也有能力强化两岸融合发展的力度效度, 引领其切实服务于国家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新闻办公室. 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2022年8月)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21.
- [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 [J]. 求是, 2022 (21): 4-35.
- [3]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二〇二四年七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N]. 人民日报, 2024-07-22 (1).
- [4] 刘国深, 芮鹏. 两岸融合发展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J]. 台湾研究集刊, 2019 (4): 1-9.
- [5] 张冠华. 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内涵与路径探讨 [J]. 台湾研究, 2017 (4): 1-8.
- [6] 汪毅夫.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历史经验与未来展望 [J]. 闽台关系研究, 2023 (3): 1-7.
- [7] 苏美祥. 两岸经济融合发展的内涵、难点与推进策略思考 [J]. 台湾研究集刊, 2020 (4): 101-110.
- [8] 习近平.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J]. 求是, 2025 (1): 4-19.

- [9]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李强主持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N]. 人民日报, 2023-02-08 (1).
- [10] 斯文·毕斯科普. 大国战略: 探究 21 世纪大国关系 [M].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3: 274-292.
- [11] 美国破坏国际规则事例 [N]. 人民日报, 2021-04-17 (7).
- [12] White House. Amendment To Reciprocal Tariffs And Updated Duties As Applied To Low-Value Import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EB/OL]. (2025-04-08)[2025-04-09].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4/amendment-to-recipricol-tariffs-and-updated-duties-as-applied-to-low-value-imports-from-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 [1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 [N]. 人民日报, 2021-11-17 (1).
- [14] 汪曙申. 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涉台政策展望 [J]. 台湾研究, 2025 (1): 20-23.
- [15] 习近平同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N]. 人民日报, 2025-01-18 (1).
- [16] 2025 年对台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J]. 台声, 2025 (4): 9.
- [17]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把平安中国建设推向更高水平 [N]. 人民日报, 2025-03-02 (1).
- [18]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 [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2023 (27): 7-10.
- [19]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3 年 6 月 2 日) [J]. 求是, 2023 (17): 4-11.
- [20] 习近平.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40 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2019 年 1 月 2 日) [N]. 人民日报, 2019-01-03 (2).
- [21] 朱卫东. 新形势下运用法治方式反“独”促统的若干思考 [J]. 台湾研究, 2024 (5): 1-8.
- [22] 赵乐际. 坚定守护共同家园, 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在《反分裂国家法》实施 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5 年 3 月 14 日) [N]. 人民日报, 2025-03-15 (2).
- [23]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印发《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的通知 [N]. 人民日报, 2024-06-22 (6).
- [24] 马凯硕. 亚洲的 21 世纪 [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23: 1-2.
- [25] 全球第二, 中国软实力排名上升的背后 [N]. 环球时报, 2025-03-18 (5).

责任编辑: 龚静阳 校对: 王京菁



赖清德当局的“文化台独”：布局、危害与反制

钟厚涛

（国际关系学院 国家安全学院，北京 100091）

摘要：赖清德上台后利用公权力全方位布局“文化台独”，以美化“殖民史观”推行历史虚无主义，以“文化掏空”炒作文化虚无主义，以炮制“台湾共同体”推进民族虚无主义。其主要策略有：以“新两国论”为根本指导，以“洗涤人心”为核心宗旨，以“再造历史现场”为主要抓手，以所谓“文化基本法”为制度支撑。赖清德当局的“文化台独”给中国的文化安全、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都带来挑战，也给构建两岸命运共同体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带来变数，并为台海地区和平与稳定埋下隐患。面对此情形，须强化议题设置，揭穿民进党当局“文化台独”真面目；深化两岸文化交流，铸牢台湾同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优化对台传播策略，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以坚决挫败包括“文化台独”在内的任何分裂行径，坚定推动祖国完全统一进程。

关键词：国家安全；赖清德当局；“文化台独”；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

中图分类号：D67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2096-3378（2025）03-0123-12

2023年12月赖清德在参加竞选时就叫嚣要实现所谓“文化立国”，“让台湾人产生对台湾这片土地的认同”，“让国际知道台湾是谁”。2024年5月上台后，赖清德利用公权力大肆布局“文化台独”，妄图以文化之名行谋“独”^[1]之实。2025年3月赖清德抛出“17项策略”，其中包括“鼓励对台湾本土历史文化的研究”等，这是赖清德当局谋求“文化台独”的又一挑衅之举。综合陈孔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5.03.010

作者简介：钟厚涛，国际关系学院对台战略预置和重点问题创新研究团队负责人，海峡两岸关系法学研究会理事。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美国对台湾当局海洋政策的影响研究”（22FZZB009）

引用格式：钟厚涛. 赖清德当局的“文化台独”：布局、危害与反制，2025（3）：123-134.

立^[2]、李道湘^[3]、陈德民^[4]等学者研究成果可知,所谓“文化台独”是指1945年10月中国台湾地区摆脱日本殖民统治、重回祖国怀抱之后,岛内分裂势力以文化“本土化”为遮掩、以文化“去中国化”为特征、以服务“台独”为宗旨的分裂行径。赖清德把“文化台独”作为整个“台独”系统工程中的关键支点,竭力推行以所谓“台湾意识”“台湾精神”“台湾魂”和“台湾命运共同体”等为内容的分裂谬论,企图借“文化台独”对岛内民众“洗脑”,为“政治台独”酝酿氛围,为“法理台独”提前铺路,这将给台海地区和平与稳定蒙上阴影。目前学界关于李登辉、陈水扁和蔡英文时期的“文化台独”已有一些研究,如姚同发认为“文化台独”伴“台独”而生、随“台独”而行、是“台独”的“招魂幡”^[5],李立认为“文化台独”主要图谋“从根本上割断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联系”^[6],台湾学者谢大宁则以亲身经历解析了蔡英文时期废除“微调课纲”与“文化台独”的逻辑关联^[7]。鉴于学界对赖清德上台后民进党当局推行“文化台独”的新态势关注较少,本文对赖清德当局“文化台独”的运行机制、底层逻辑及其影响进行探析。

一、赖清德当局“文化台独”的运行机制

文化攸关人心之争和价值观念之争,向来是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相互博弈的重要场域,在冷战期间美国就以文化作为对抗苏联的重要宣传工具。“美国对苏联认知战的主要手段有三种:通过美国之音对外广播来影响苏联民众的认知;通过自由电台来煽动苏联国内的反政府情绪;通过军事威慑和政治施压来影响苏联领导层的判断和决策。这些手段相互作用,互为补充,确保美国对苏联认知战的有效性。”^[8]赖清德深谙此道,知晓文化在“台独”思潮散播过程中发挥着起始性和根基性功能^[9],声称文化是“台湾的根和灵魂”,也是台湾的所谓“软实力”。赖清德当局为谋求两岸文化“同中求异”“同中显异”和“化同为异”,打着相对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的旗号,通过历史叙事重构化、传播场域网络化和营销手法柔性化和技术手段智能化等多种方式加速“文化台独”布局,妄图切断两岸文化连接纽带,制造“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二元对立的叙事话语,引导台湾民众产生所谓“台湾主体性的国家认同”^[10],强行构建所谓“台湾文明自成体系的在地化论述”,推动文化“排中性”的加剧演进。

(一) 以“再造历史现场”推行历史虚无主义

虚无主义(nihilism)源于拉丁语的“虚无(nihi)”一词,德国哲学家雅科比首先使用虚无主义这个概念,但并未给出明晰的概念界定。尼采正式把虚无主义界定为“对历史传统和道德原则的否定”^[11]。历史虚无主义则是指“不加具体分析而盲目否定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甚至否定历史文化,否定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民族精神,否定一切的历史观点和思想倾向”^[12]。台湾自古属于中国的历史经纬清晰、法理事实清楚,大量的典籍文献对此都有明确的记录^[13]。但赖清德当局竭力推行历史虚无主义,赖清德提出的“8项主张”中的第1项中就声称要“再造历史现场2.0”,企图篡改台湾文化,湮灭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为台湾民众制造认知迷雾,为深化“台独”意识形态构造“合法性”逻辑。

一是“史为独用”,重构台湾历史叙述的时空坐标。清代学者龚自珍曾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14]。赖清德上台后,企图重构台湾历史,把历史看作“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到处鼓吹所

谓“台湾史就是本国史”，企图通过扭曲历史尤其是删除历史教材中的“中国史”，固化“台独史观”，斩断两岸历史、文化和情感联结。赖清德当局强力推行“台独课纲”，除中小学之外还要求军校通识教育删除“中国现代史”课程，恶意诋毁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将其抹黑为“殖民者”，企图将“台湾史”从“中国史”中剥离出来，并把“中国史”划入“世界史”。如此一来，赖清德当局对于台湾历史的描述不再以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为背景参照，而开始刻意凸显台湾四百年的本土历程，积极杜撰所谓“以台湾为主体”的“同心圆台独史观”。“同心圆台独史观”以“台湾史”为中心，将中国史作为东亚史一部分来编写教材和代际传承，背后的逻辑自然是“中国史只是外国史”，让接受此种教育的青年群体形成对大陆的“外国感”、疏离感和陌生感。由此可见，岛内分裂势力不是要客观再现历史，而是要篡改和虚构历史，把历史作为构建“台湾认同”的工具和对抗“中国意识”的武器。

二是炮制“中华民国寄生论”，构造“台湾想象共同体”。关于“中华民国”和“台湾”的关系，李登辉时期强调的是“中华民国到台湾”；陈水扁时期则声称“中华民国是台湾”；蔡英文时期将二者“合而为一”，制造出模糊的“中华民国台湾论”，被外界称为是“台独寄生在中华民国”。而赖清德则声称“有主权才有国家，有台湾才有中华民国”，编造出“台湾历史是外来政权统治的历史”，以行政力量把台湾历史强行划分为所谓的“史前期、荷治期、明郑期、清领期、日领期及民国期”，把蒋介石退据台湾杜撰成与荷兰、日本殖民台湾同等性质的事件，借此构筑台湾民众的所谓“亚细亚孤儿意识”。赖清德当局此举谋求为民进党在选举中打“悲情牌”和“台独神主牌”铺陈民意，同时也把蒋介石和国民党所带有的汉文化视为“外来文化”和“侵略者文化”，在抹黑国民党的同时进一步拉高台湾民众对于中华文化的仇恨意识，并将之渗透至“文化台独”布局，引导台湾民众错误认为“台湾是有主权的”“中华民国是寄生在台湾基础上的”。为了达到“脱中”目的，赖清德当局还积极推行去除性建构，企图通过取消“黄帝遥祭”等方式消除中华传统文化对台湾地区文化的影响痕迹，增强台湾地区的“国家”虚假形象，增进台湾民众的“国民”身份认同。赖清德当局妄图在本土概念和大中华概念两者之间的对比性和差异性构建中，将“台湾族群”等本土概念塑造成“共识性”认知。

三是贩卖“皇民化”认知，美化“殖民有功论”的荒谬史观。为了填补“去中国化”留下的历史空白，赖清德当局以虚构、解构和重构为手段，有意凸显台湾与殖民者的连接。例如，1624年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南部，但赖清德却推崇“台湾人四百年史”等书，将台湾被殖民的屈辱史作为“台独”操弄的资源，声称“1624年，台湾从台南出发，开启台湾全球化的开端”^[15]。赖清德当局很明显是数典忘祖、自断根脉，企图为殖民者的罪行开脱、洗白和美化。此外，日本殖民台湾期间曾犯下滔天罪行，制造了惨绝人寰的系列惨案，屠杀台湾民众高达60万人，约占当时台湾总人口的10%。但赖清德当局不断强化殖民史观，以历史虚无主义为手段，宣扬日本带领台湾进入现代化进程，企图全面恢复日据时期的历史遗迹，如把两尊在台湾光复后被推倒的日本殖民者雕像重新“迎入”公立博物馆；删去不利于“日台关系”的历史记载，如拆除慰安妇纪念铜像，以遮掩日本在台湾犯下的滔天罪行。

四是为分裂分子“贴金”，为“台独”谬论寻找历史支撑。赖清德当局既“破”又“立”，编造虚假历史故事和所谓的英雄人物“轶事”，为廖文毅、彭明、谢聪敏等“台独”分子歌功颂德、

树碑立传。2024年9月，赖清德专门参加“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60周年纪念活动，声称“要继续共同推动这项运动”。赖清德当局还故意把“反抗日本殖民的台湾主体意识”与“台独意识”相互混淆，给近代台湾知识分子如林呈禄（1886年6月27日—1968年6月16日）、林献堂（1881年10月22日—1956年9月8日）等强行贴上“台湾主体意识觉醒者”的标签，企图进一步虚构“台独”的“丰厚历史和民意基础”。

（二）以“文化掏空”炒作文化虚无主义

文化虚无主义是指“不加分析地盲目否定人类文化遗产”^[16]。赖清德当局“文化台独”锚定的目标是抢占文化叙事的主导权，否定台湾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把文化虚无主义视为构造“文化台独”的“灵丹妙药”，把客观存在的“实然”替换为凌空蹈虚的“应然”，通过“去中国化”来否定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客观事实。

一是将“台语”虚构为“台独语”。“自古以来，语言文字问题始终关系到国家和民族主权。”^[17]在近现代历史发展进程中，语言民族主义问题尤为引人关注^[18]，因为其既有整合建构性功能，在欧洲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和亚非国家后殖民时代都曾发挥过重要的“粘合剂”角色，也有解构割裂性效应，经常与其他各色分离主义相互交织。岛内分裂势力也刻意效仿，布局“舌头上的台独”，将“语言台独”视为“文化台独”布局的重要板块和着力点。2023年10月，赖清德抛出以“文化永续、世界台湾”为题的文化竞选政见，提出“8项文化主张”，其中第2项声称所谓“复振国家语言，促进多元文化社会共融”^[19]，其本质是打着所谓“保护母语”“语言平权”“族群平等”“保护濒危语言”等名义来落实“语言暴力”，弱化“国语”地位，否定大陆和台湾属于“同语言”“同文化”和“同民族”的客观事实，为台湾文化赋魅，为中华文化祛魅，企图建立台湾“语言文化”的“独立性”。

二是凸显台湾文化所谓“主体性”。赖清德当局进行倒置性建构，将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对立起来，片面强调台湾文化的本土性与多元性，无视“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一部分”的客观事实，反而抛出“中华文化是台湾文化一部分”的荒诞谬论，将原本“以中华文化为主体、多元文化差序并存”的结构扭曲为“多元文化同等共存、中华文化仅为其中之一”的叙述模式。赖清德当局“文化台独”总体目标在于割裂两岸文化的传承性，矮化甚至遮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嵌套文化殖民叙事，凸显台湾海洋性文化“主体性”特征，企图把所谓“台湾文化”“台湾历史”和“台湾民族”虚构为上位概念，而把中华文化、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建构为下位概念，全面扭曲台湾民众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塑造“台湾主体意识”及背后的台湾“独立”意识，为民进党“政治台独”和“法理台独”进行社会意识形态铺垫。

三是以所谓“文化基本法”铺陈战略布局。民进党当局长期谋求制定所谓“语言发展法”。陈水扁时期首次抛出所谓“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草案”，2019年经蔡英文签署，该“法”在岛内正式生效，成为台湾各项语言政策的“法源依据”。在此基础上，赖清德当局图谋从战略高度和法制层面实行“文化台独”，将所谓“文化基本法”提升到所谓“文化宪制性规定”位阶，要求台湾当局各部门都必须恪守，企图以所谓“基本法”的高度赋予“文化台独”超然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三）以杜撰“台湾共同体”推进民族虚无主义

2024年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一行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两岸

同胞应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坚定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 坚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这是从中华民族的高度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但赖清德当局却以“文化台独”为遮掩, 暗度陈仓推进“法理台独”, 甚至试图通过消解中华民族来达到其“台湾国族建构”的政治目的。

一是妄图消解“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两岸同胞都是炎黄子孙, 都是中华儿女; 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 也是两岸同胞携手前行、继往开来的历史进程。台湾王昆义教授曾把中华民族视为继“九二共识”后赖清德当局能够与大陆开启政治互动的“通关密语”^[21], 但赖清德始终拒不接受, 反而认为台湾的语言文化源于“南岛语族”。赖清德刻意忽视台湾同胞自古以来就是中华儿女的重要组成部分, 即使是“南岛语族”, 根据多学科探源实证也是起源于 8 400 年前的中国东南沿海^[22]。对于赖清德的数典忘祖,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痛批,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 今天如果连祖先都不认了, 已经忘本了”^[23]。

二是以“去价值化”割裂两岸精神纽带。赖清德当局在岛内疯狂推行“文化台独”路线, 鼓吹“台湾人是新兴民族”, 否认“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分支”, 主张以所谓“国与国”定位进行两岸文化交流^[24]。民进党以选举为诉求, 实施的“本土主义的身份政治”可被视为“反应性身份政治”。“文化台独”则顺势借本土文化进行自我包装, 实现了由手段向目的转换。这不仅危害了两岸文化原生性联结, 也严重腐蚀了岛内民众对中华文化母体的认同, 产生严重的身份认同错位。赖清德当局“文化台独”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背弃了中华民族主张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优良传统, 是对潜隐于文化背后的价值理念的排斥和拒绝, 也将导致台湾的社会道德和人伦物理遭遇价值困境。

三是融入海洋文明来对抗陆地文明。2019 年赖清德出版传记《用行动带动希望》, 其中多次提及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著的《想象的共同体》, 声称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在此认知驱动下, 赖清德当局企图先将台湾文化“去中国化”, 再将其“共同体化”和“再民族化”, 杜撰“台湾文化民族主义”。近年来岛内频频构建“台湾海洋文明论”, 声称“台语”是海洋文化催生出来的“独立语言体系”^[25], 并强行将此与“大陆属于大陆文化、台湾属于海洋文化”的伪命题相呼应, 以此来凸显台湾文化与大陆文化的差异, 其目的是为“台独意识”提供理论阐释和文化支撑。

四是推动“文化台独”日常化和生活化。赖清德当局特别注重“文化台独”的在地化氛围营造, 建造了大量以台湾本土风土人情、历史典故为主题的博物馆、纪念馆和文化馆等。赖清德提出的“8 项主张”中的第 4 至 8 项, 分别涵盖博物馆、地方文化等方面, 实质是强化议题设置, 将“文化台独”蔓延渗透至艺术领域, “使之成为公众关注、思考甚至可能采取行动的焦点”^[26]。赖清德还承诺任内将逐年增加文化预算, 2025 年预算超过 290 亿元(新台币, 下同), 创历年新高, 未来势将进一步拉高。这些费用主要用来制作相关文化产品, 钳制台湾民众认知。例如, 台湾“反中神剧”《零日攻击》就获得了台湾当局高达 1.13 亿新台币补助款^[27]。此外, 赖清德当局还不断推动岛内民众强化对于台湾本土的地理认知, 如在地图上不再将台湾作为中国一部分来看待, 而只是保留台澎金马。

二、赖清德当局“文化台独”的主要危害

为避免明火执仗地搞“法理台独”，赖清德当局绕开“正名”环节，转而从叙事方式的虚构化、特定对象的歪曲化和传播策略的隐蔽化等多个方面铺陈宏大叙事，以柔性和渐进方式制造“文化台独”话语陷阱，不断逼近“法理台独”等难以直接实现的目的，危害深远。

（一）掏空台湾发展动能，加剧台湾社会对立

2024 年 7 月即赖清德上台两个月后就提出，“台湾必须捍卫自己‘主权’，了解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此后，赖清德当局全方位铺陈“文化台独”布局，加速对两岸同文同种历史真相的遮蔽和对文化事实的曲解。这势必会消弭中华文化的崇高性，动摇台湾的文化根基，拉低台湾民众的文化认同。

一是加速台湾文化的失根失语。两岸同根同源，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但赖清德当局却生硬制造了“台语文”，妄图借此与“国语”区隔，还专门设立“台语文”电视台，并将“台语”与“母语”画上等号，举行所谓“母语日”活动，并通过各种比赛来推广“台语文”。著名文化学者金克木曾说：“骑在树枝上锯树，决不可锯自己骑的一支，否则必然摔死……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发展变化，可以有革命性的变化，但抛弃不得；抛弃越多，失败越大；若彻底抛弃，必然彻底失败。历史不缺乏证明。”^[28]赖清德当局在文化领域“去中国化”，抛弃和背叛了台湾的历史文化传承，势必导致台湾陷入浮萍漂泊的无根困境。

二是加剧台湾社会的族群撕裂。赖清德当局利用“文化台独”来推进所谓“台湾主体认同”，是想利用民众的“出头天”意识赚取更多的政治资本，占据道德制高点，打压在野党、巩固政治权力，塑造“凡是不认同民进党意识形态的，就是‘中共的同路人’”和所谓“在地协力者”叙事。这种非友即敌、非黑即白的对立思维方式，势必会加剧台湾社会的族群对立。此外，岛内民众普遍希望赖清德当局能够以发展经济民生为主业，但赖清德却醉心“文化台独”和政治斗争，导致台湾社会遭遇“权力失衡、民主失灵、治理失能、社会失和的恶性循环”^[29]。岛内的中间选民和泛蓝阵营民众对赖清德满意度急剧下滑，但绿营支持者则会对作为“台独金孙”的赖清德倾力相挺，这会加剧岛内绿营与非绿阵营的对立与对峙。2025 年 4 月 26 日，岛内 25 万人走上台北凯达格兰大道，发出“罢免赖清德”的怒吼，表明岛内的阵营对抗正在进入新一轮的升级。

三是加剧台湾民众的悲情意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和有关力量的建构，部分台湾民众心中存在着一定的“亚细亚孤儿的历史悲情”，与之相伴而生的是“受害者悲怆意识”。这种负面情绪导致台湾民众特别是绿营民众经常情不自禁地沉溺于往日苦难而无法自拔。在“文化台独”铺陈过程中，赖清德当局有意利用民众“对加害者的仇视心理”。2025 年 2 月，赖清德在参加“二二八事件 78 周年”纪念活动时声称蒋介石“犯下滔天罪行”^[30]，意在挑动岛内民众的创伤体验，制造死亡情景的持续呈现也即“死亡提醒”，企图强化民众对中国国民党的“原罪”认知和敌对心理，背后则是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意识的排斥。

（二）扩充“两国论”意涵，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赖清德被称为“升级版李登辉”“加强版陈水扁”和“暴力版蔡英文”，在“文化台独”布局上也更加明晰：把“文化台独”与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深度捆绑，借助“信息茧房”和“算

法黑箱”等对台湾民众精准推送, 图谋在台湾“主体文化”的基础上建立“主权文化”, 把台湾“文化认同”推向“国家认同”。赖清德当局借文化议题对大陆进行认知战, 将带来系列深层影响。

一是“文化台独”被塞入“新两国论”。蔡英文时期炒作的是所谓“两岸互不隶属”, 而到赖清德时期则升级为所谓“两国互不隶属”, 并提出“祖国论”“中华民国在台澎金马落地生根论”等谬论, 这些谬论被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定性为“新两国论”^[31]。赖清德当局在布局“文化台独”过程中, 极力向民众灌输“新两国论”, 企图将“台独中华民国化”或者是“中华民国台独化”。为在文化认知领域贯彻“互不隶属”谬论, 赖清德当局积极进行对立性建构, 将“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视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这种“你是你、我是我”的异己分裂思维直接冲击了两岸文化交流的成效, 使得两岸同胞即使在互动中也较难产生真诚的亲情体验, 更难达到心灵契合的目的。

二是与外部干涉势力形成联动效应。赖清德声称, 文化是“台湾的脸庞”, 要“让国际社会真正认识台湾”, 就必须实现所谓“文化立国”^[32]。为在国际社会制造“台湾是独立政治实体”假象, 赖清德当局积极将“文化台独”向海外输出, 指派台湾“侨委会”和文化、教育事务主管部门在海外开办“台湾书院”, 表面上是向世界宣讲“台湾文化”, 但实质上是在向世界兜售“文化台独”。此外, 赖清德当局还企图在“文化台独”中强行塞入“民主叙事”, 通过参加“民主峰会”等方式向美日等外部所谓“民主联盟”靠拢, 让外部势力误认为他们不是在支持台湾而是在支持所谓“民主”和“普世价值”。但赖清德当局这种“倚外谋独”的做法, 势必会进一步搅动台海地区的紧张局势。此外, 赖清德当局以文化为名制造“分裂”, 将“台独”与“去中国化”同步推进, 也会对“藏独”和“三股势力”等形成负面示范效应, 引导后者如法炮制, 为各种分裂谬论制造幌子。在此过程中, 各种反华势力和分裂势力可能会加速集合和勾连, 逐步走向合流。

三是软硬对抗叠加导致台海风高浪急。赖清德当局将“文化台独”与意识形态相互捆绑, 向民众灌输分裂谬论, 具有较强的迷惑性和误导性, 意在以“文化台独”作为“法理台独”的“引擎”和“加速器”。赖清德具有“斗鸡”性格, 在强化“文化软实力”的同时, 还图谋提升“军事硬实力”, 图谋打造“韧性社会”, 声称“备战以避战”以及“以战力求和平”, 将两岸关系的敌对态势升级到新的高点, 成为激化两岸矛盾的“麻烦制造者”和“战争制造者”。

(三) 冲击中华文化安全, 为两岸关系埋下隐患

文化强则民族强。文化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直接牵动社会的稳定和谐与民众的国家认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必须既积极主动阐释好中国道路、中国特色, 又有效维护我国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33] 赖清德虽然担任台湾第九届“中华文化总会”会长, 却打着推广中华文化的名义诋毁中华文化, 煽动两岸对立对抗, 发动权力机器及绿营媒体进行信息流控制, 以潜移默化、悄无声息的方式造成岛内民众思想认同的偏离, 企图完成“去中国化”的“最后一公里”。

一是两岸文化交流面临制度性障碍。民族语言既是民族文化历史传承的载体和纽带, 也是族群认同的重要构成和标识。各种分裂势力倾向于借助语言“区分异己”的认同辨识功能, 制造民族或主权分裂。赖清德当局也以所谓“文化基本法”为核心, 辅之以所谓“语言发展法”“语言发展法施行细则”“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等, 构建了一整套所谓“语言文化台独法律体系和制度保障”。赖清德当局还从制度层面着手, 提高“行政机构文化会报”机制的层级, 指派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

构负责人担任召集人，“政务委员”担任副召集人，文化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担任执行秘书，定期密谋如何进一步推进“文化台独”。赖清德当局在岛内编织“绿色恐怖”，将两岸族扣上所谓“通敌”“中共间谍”“背叛国家”的罪名。2024 年因所谓“共谍”案起诉人数达 64 人，是 2021 年的 3 倍之多。仅 2025 年 3 月就将 3 名陆配驱离台湾。台湾当局“打击中华文化、拉抬本土文化”的差异化构建策略对台湾语言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效应，进一步加剧两岸同胞的文化疏离和心理疏远。赖清德当局为两岸融合发展设置壁垒高墙，推动两岸“脱钩断链”，逐步从“政策对抗”转向“制度封锁”，迫使两岸交流陷入“事事需审批、处处有禁区”的“大限缩、大倒退”困境。这会使“抗中独派”以“清除敌对势力协力者”为名，向任何不满民进党当局的人施压，让台湾陷入“抗中有理、交流有罪”的恐怖氛围。

二是台湾青少年沦为“人造独”。赖清德当局选择性地虚无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虚构并强化所谓“台湾主体意识”及背后的“台湾独立意识”，妄图向校园渗透，培养“天然独”，洗脑青年人，让台湾中小学生在台湾意识流里，成为从小认同“台湾主体”的“天然独”。民进党当局把台湾普通高中语文课文文言文比例下调 10 个百分点，韩愈《师说》、诸葛亮《出师表》等经典之作都已经淡出了台湾中学生课堂。对于台北第一女子高级中学教师区桂芝等反对“去中国化”的人士，民进党当局则对其展开“先射箭后画靶”的“猎巫行动”进行政治恐吓。民进党当局降低文言文比例，并不是一场单纯的“文白之争”，而是又一次“灭其文”“灭其史”的“去中国化”分裂行径，企图蒙蔽误导台湾青少年一代，让台湾的年轻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最终迷失在历史虚无的泥潭中无法自拔。在民进党当局捏造的政治语境里，台湾青年人传承中华文化就是“卖台”，“台人就要讲台语、本土语言”才是“政治正确”；无论蓝绿都要以“台湾认同”“台湾优先”“以台湾为主”“台湾主体性”等为价值标榜。政治道德标准的转换导致部分台湾青年对台湾地区的认同逐渐与“中国认同”对立起来，甚至错误地认为“台湾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三是台湾民众身份认同被严重异化。赖清德当局培植以“台湾想象共同体”为核心的所谓“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家国认同”，导致部分台湾民众出现认为“中国”是“他者”、“台湾”为“我群”的家国认同危机，在关涉“家国认同”的语言文字表述上出现严重的语义错位。罗兰·罗伯森指出，“认同就是权力”^[34]。受“台独”意识形态思维作祟，民进党当局利用手中的公权力，以潜移默化、无孔不入的方式，将孔孟思想、汉唐盛世等“他者化”，将“台独”文化渗透至台湾社会的方方面面。文化转换势必会牵动政治认同，加剧台湾民众的认同混乱。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民调数据显示，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高达 64.3%，创历史新高；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两者都是”为 30.4%；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者仅为 2.2%，创历史新低^[35]。

三、应对赖清德当局“文化台独”的基本策略

赖清德当局图谋以体系化的方式全面推进“文化台独”，通过放大被殖民悲情意识、炮制“台湾主体地位”认知误区和利用算法推荐技术三部曲，打造深层次的“台独”意识形态，制造虚无主义的迷雾，培植“台湾是独立政治实体”的错误认同，将“台独”意识形态制度化、日常化、生活化、感性和沉浸化。这些行径已经成为台湾民众身份认同的“迷魂汤”、社会稳定的“分离器”

和台海冲突的“催化剂”。我们对此应高度重视，妥为因应，开出有针对性的慑“独”良方。

（一）强化议题设置，揭穿民进党当局“文化台独”真面目

一是曝光“文化台独”的“台独”底色。例如，所谓“台语”不过是中国语言文化中的一种方言，它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台湾话”，就像“湖南话”“四川话”“山东话”一样，只是充满地域特色的汉语方言，而非自成体系的另外一种语言。对于赖清德当局的“文化台独”行径，要果断亮剑，明确指出“台语运动”表面上是一场所谓“文化思潮”，但更多是一种顺从和服务于“台独”意识形态的政治炒作，核心图谋是“去中国化”。

二是揭批赖清德当局把台湾带入“文化浩劫”。台湾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强调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承继，社会道德价值体系普遍奉行“讲信修睦”，这一定程度上为台湾在此后的经济腾飞和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打下坚实基础。现在台湾学校不仅不教中国历史，还把“本土语言文化”纳入课纲。经台湾当局认证的少数民族部落多达16个，但人口总数只有55万人左右，约占台湾总人口数的2.36%。人口比例如此之低，却要求台湾全体中小学生都要学习“少数民族语言”，这只会让台湾走向“方言化”和“部落化”。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官网2023年曾写明“台湾目前已设户籍人口组成以汉人为最大族群，占总人口96.4%”，但最新版本却将相关文字更改为“台湾目前已设户籍人口2.6%为原住民族群，外来人口占1.2%，其余人口占96.2%”^[36]。有台湾地区人士对此痛批，赖清德当局搞“去中化”“去汉化”已经走火入魔，这种“大改名”根本就是“认知作战”，实在太过荒谬。赖清德当局将政治凌驾于文化之上，自断文化根脉只会让台湾出现断档或断代现象，摧毁台湾的文化生命力、创造力和竞争力，让台湾陷入价值迷失、道德沉沦和认同错乱的困境，进而失去向上提升的前景。

三是戳破所谓“台湾民族论”等分裂谬论。为以文促“独”，赖清德当局把妈祖、保生大帝、关帝等民间信仰及两岸相关交流打上“中共统战”的标签，还纵容绿营势力在“全台首学”台南孔庙里对着“至圣先师”孔子像叫嚣“用‘台独’包围中国”。这些表面看似文化性的行为实则充斥着政治野心，企图进一步固化台湾民众对于“台湾民族”的想象。未来应该加强理论研究，击中“文化台独”的“死穴”，以丰富的史料展现赖清德当局“台湾民族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让岛内民众彻底认清所谓“台湾人不是中华民族一部分”等“台独”论调的现实荒谬性和长久危害性。在学科建设上，要加快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深入研究阐释实体性的“中华民族”、整体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三个核心概念，贯通以“多元一体”标识中国力量，以“五个共同”标识中国价值，以“四个与共”标识中国精神，夯实反对“台独”的理论基础和学术支撑^[37]。

（二）深化两岸文化交流，铸牢台湾同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是倾听岛内主流民意。赖清德当局加速“文化台独”布局，充满了政治算计，意在挑动两岸关系紧张局势，本身就远离了中华传统文化中修齐治平和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岛内民众也在逐渐觉醒，“台独”信息茧房终将被破壁。岛内的主流民意是希望两岸交流而非交恶、对话而非对抗、双赢而非双输。赖清德当局否定中国历史的客观性、破坏两岸文化的关联性、诋毁中华民族的真实性，与岛内主流民意完全是逆向而行，必将遭到民意的反噬，导致赖清德当局陷入公信力坍塌的塔西陀陷阱。中国大陆则可顺势而为，激浊扬清，与岛内主流民意相向而行，以两岸文化交流消解“文

化台独”。

二是深化两岸融合式交流。大陆可深化两岸经贸往来，推动两岸人文交流等，增强两岸同胞的利益联结，由利益共同体走向命运共同体，进而实现情感传递和价值引领，彰显两岸共同的文化记忆，强化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提升两岸同胞的互嵌程度，推动两岸同胞的交流由“互”向“融”迈进，从“你是你，我是我”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进而变成“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正如陈孔立指出的：“两岸文化认同不是谁吃掉谁的问题，不是要大陆认同台湾的文化，也不是要台湾认同大陆的文化，而是要走互相融合的道路。”^[38]

三是构建两岸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属。”两岸同胞有义务有责任“共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39]。在此过程中，要激活台湾同胞的中华文化记忆，由“文化一中”逐步过渡到“民族一中”和“政治一中”，引导台湾同胞传承“大一统”观念，对中华民族产生应有的归属感和荣誉感，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全面铸牢台湾同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优化对台传播策略，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一是创新驱动。迈克尔·舒德森曾对传播过程中的“信息模式”和“故事模式”进行了概念区分：“信息模式”主要是指相对客观中性的新闻呈现，而“故事模式”主要是指带有某种价值和情感立场的事件讲述^[40]。在两岸文化交流过程中，大陆可以适度淡化宣传色彩，强化信息与故事的调和与平衡，讲好两岸集体记忆的故事，并逐渐由低语境向高语境延伸，强化两岸同胞的共情与共鸣，通过日常生活的氛围感染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41]。

二是柔性叙事。孔子曾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未来，要继续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破解两岸文化交流时面临的融入不足、文化折扣等难题，化抽象为具象，将宏大叙事的“大道理”转化为微观可感的“小故事”，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两岸同胞日用而不觉的内在价值观，提升中华文化对广大台湾同胞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引导台湾同胞坚持正确的文化观、历史观、民族观和国家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三是技术赋能。在大数据和算法推送双重加持下，台湾舆论场域的“信息茧房”效应有增无减。赖清德当局对中华文化的去除从未停止，在此情势下两岸文化交流除了聚焦趣味性和喜闻乐见的“故事”，还应以新质生产力推进以社交网络为代表的数字平台建设，让中华文化在岛内从“潜在”到“显在”，让更多岛内受众听得到、听得懂和听得进。例如，近年来，大陆《甄嬛传》《哪吒之魔童闹海》等影视剧、《黑神话：悟空》等游戏以及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平台在台湾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未来可进一步加强两岸在流行文化上的对接，增加两岸语言文化的关联性，导正台湾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凝聚两岸同胞共同振兴中华民族的行为意愿与使命自觉，引导两岸同胞携手共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四、结语

海峡两岸，血脉相连、文脉相通。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不断推行各种“文化台

独”分裂行径, 极大影响了两岸融合发展。但其所作所为, 改变不了深植于台湾社会的中华文化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 也无法阻挡两岸最终走向统一的历史大势。祖国大陆将会以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和足够的能力守牢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 挫败包括“文化台独”在内的一切分裂国家的行径, 提升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民族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 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 [1] 露出真面目! 赖清德高喊“改造社会洗涤人心”令人毛骨悚然 [EB/OL]. (2024-04-09) [2025-04-25]. <https://www.huaxia.com/c/2024/04/09/1905761.shtml>.
- [2] 陈孔立. 台湾“去中国化”的文化动向 [J]. 台湾研究集刊, 2001 (3) : 1-11.
- [3] 李道湘. “文化台独”理论及其批判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3 (6) : 29-34.
- [4] 陈德民. “文化台独”析论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04 (10) : 39-46.
- [5] 姚同发. 关于“文化台独”的几个问题 [J]. 台湾研究, 2001 (3) : 52-55.
- [6] 李立. 略论“文化台独” [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07 (5) : 109-112.
- [7] 谢大宁. 课纲、认同与“文化台独” [J]. 台湾研究, 2017 (1) : 1-12.
- [8] 史澎海. 冷战后期美国对苏联的认知战及其当代启示 [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1) : 251-265+307.
- [9] 刘奎, 陈子倩. 海峡两岸“文化台独”研究的文献综述与研究展望 [J]. 台湾研究, 2024 (1) : 98-110.
- [10] 王丹. 赖清德公然鼓噪建立所谓“台湾主体性的国家认同”, 国台办: 再次暴露其实施“台独”分裂活动的本来面目 [EB/OL]. (2024-07-22) [2025-02-11]. <https://hqtime.huanqiu.com/article/4IiSOVBuNjw>.
- [11] 洛维特. 墙上的书写: 尼采与基督教 [M]. 田立年, 吴增定,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4: 123.
- [12] 张首吉, 杨源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名词术语辞典 [M]. 济南: 济南出版社, 1992: 85.
-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 [N]. 人民日报, 2022-08-11 (5).
- [14] 曹志敏. 龚自珍集 [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6: 11.
- [15] 赖清德出席“就职庆祝大会”并发表就职演说 [EB/OL]. (2024-05-20) [2025-02-15]. <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8428>.
- [16] 奚洁人. 科学发展观百科辞典 [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7: 170.
- [17] 周庆生. 国家、民族与语言——语言政策国别研究 [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3: 1.
- [18] 陈平. 语言民族主义: 欧洲与中国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8 (1) : 4.
- [19] 赖清德文化政见允每年宽列预算 提强化艺文工作者权益等 8 主张 [EB/OL]. (2023-10-13) [2025-01-12]. <https://www.cna.com.tw/news/aipl/202310130261.aspx>.
- [20] 习近平会见马英九一行 王沪宁蔡奇等参加会见 [N]. 人民日报, 2024-04-11 (1).
- [21] 王昆义. 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 赖清德的通关密语 [EB/OL]. (2024-05-09) [2025-02-19]. <https://www.huaxia.com/c/2024/05/09/1918359.shtml>.
- [22] 敖鹏. 多学科探源实证: “南岛语族”起源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 [J]. 中国民族, 2025 (2) : 9-12.
- [23] 郑羿菲. 朱立伦: 中华文化是本 中华民族是根 [EB/OL]. (2025-01-01) [2025-02-23]. <https://bj>.

- crntt.com/doc/1600/8/6/3/160086385.html?coluid=1&kindid=0&docid=160086385&mdate=0101105330.
- [24] 杨立宪. 台湾社会对中华文化的态度探析 [J].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 2011 (4): 75-80.
- [25] 郑良伟. “台语”口语及书面语的活力 [J]. (台湾) 语言政策的多元文化思考, 2007 (3): 78.
- [26] 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 议程设置: 大众媒介与舆论 [M]. 郭镇之, 徐培喜,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5.
- [27] 王千豪. 台剧“零日攻击” 挨轰拿“国库” 1.13 亿元认知作战 [EB/OL]. (2024-08-02) [2025-01-17]. <https://udn.com/news/story/6656/8134804>.
- [28] 金克木. 比较文化论集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4: 189.
- [29] 钟厚涛. 台湾地区 2024 年选举对岛内政局与两岸关系的深层影响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2): 122-134.
- [30] 赖清德出席“二二八事件 78 周年中枢纪念仪式” [EB/OL]. (2025-02-28) [2025-03-19]. <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39086>.
- [31] 赖清德“祖国论”系新瓶装旧酒的“台独”谬论 [EB/OL]. (2024-10-08) [2025-02-19]. http://www.gwytb.gov.cn/m/fyrbt/202410/t20241008_12654837.htm.
- [32] 赖清德: 文化是根是脸庞 让国际真正认识台湾 [EB/OL]. (2023-12-19) [2025-04-29].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190168>.
- [33]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 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更好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 王沪宁主持 [N]. 人民日报, 2018-08-23 (1).
- [34] 罗兰·罗伯森. 全球化: 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 [M]. 梁光严,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239.
- [35] 台湾民众台湾人/中国人认同趋势分布 (1992 年 06 月—2024 年 12 月) [EB/OL]. (2025-01-13) [2025-02-24]. <https://esc.nccu.edu.tw/PageDoc/Detail?fid=7804&id=6960>.
- [36] 超总人口 96% 汉人竟成“其余人口”? 台修改“族群分类”被骂“搞‘台独’搞得失心疯” [EB/OL]. (2025-05-12) [2025-05-13]. <https://mp.weixin.qq.com/s/HMyh2e3VpCZ9Em-5e7n-wQ>.
- [37] 林华山. 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基本概念、理论基础与学科体系 [J/OL].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11 [2025-04-30].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0.1023.c.20250429.1255.002.html>.
- [38] 陈孔立. 两岸的文化认同 [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20: 18.
- [39] 习近平. 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40 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2019 年 1 月 2 日) [N]. 人民日报, 2019-01-03 (2).
- [40] 迈克尔·舒德森. 发掘新闻: 美国报业的社会史 [M]. 陈昌凤, 常江,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79.
- [41] 欧阳彬, 魏莹. 日常生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逻辑理路与实践向度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6): 82-93.

责任编辑: 卢媛 校对: 林华山



特朗普 2.0 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环境 挑战与应对策略

徐政¹ 占智勇²

(1.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经济学教研部, 江苏 南京 210009;

2. 南京大学 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09)

摘要: 随着特朗普第二次当选并就任美国第 47 任总统, 特朗普 2.0 时期正式开启。从特朗普 1.0 时期开始, 美国政府基本延续对华打压的政策取向, 并联合西方其他国家形成意识形态同盟, 企图共同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特朗普 2.0 时期可能持续收紧对华政策, 中国经济发展或将面临科技脱钩和外部技术约束、国际供应链重构和去中国化、地缘政治和国际经贸市场分割、绿色发展和气候治理脱钩等困境。中国面对美国对华政策收紧以及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化时, 应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 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创新制度体系与政策性工具、加强国际形象塑造, 以精准而有力的经济发展策略应对变局, 确保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中美关系; 特朗普 2.0; 自主创新; 核心竞争力; 高质量发展; 国家安全

中图分类号: F171.2; F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5) 03-0135-13

DOI: 10.13946/j.cnki.jcquis.2025.03.011

作者简介: 徐政,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讲师, 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省委党校基地研究员, 河北省重点高端智库“河北省公共政策评估研究中心”研究员; 占智勇, 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江苏省全省党校系统调研课题“江苏加快打造发展新质生产力重要阵地研究”(XT24015); 2024 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课题重点资助项目“江苏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路径研究”

引用格式: 徐政, 占智勇. 特朗普 2.0 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环境挑战与应对策略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3): 135-147.

2025 年 1 月 20 日，特朗普宣誓就职，就任美国第 47 任总统，特朗普 2.0 时期正式开启。特朗普第一届政府的主要官员中不乏对华鹰派政客，包括国务卿蓬佩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等。特朗普再次当选后多次公开声称，要对中国商品加征 60% 的关税。美国东部时间 4 月 2 日，美方发布行政令，宣布对主要贸易伙伴加征所谓“对等关税”，对中国（包括香港、澳门）加征 34% 关税。美国东部时间 4 月 7 日，特朗普声称“如中方不取消 34% 报复性关税，将对对中国加征 50% 额外关税”。从特朗普第二届政府的官员名单看，其主要官员中更多的是对华超级鹰派分子，包括国务卿鲁比奥、国家安全顾问华尔兹、国防部长赫格斯、贸易代表格里尔等。特朗普竞选时提出第二任期将在“美国优先”的原则下侧重国内事务，包括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通过减税、削减开支和监管改革来应对国内经济问题，兑现公务员制度改革等核心竞选承诺。鉴于特朗普 2.0 时期政策的可能影响，中国政府与企业如何应对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环境的挑战，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课题。新华社 4 月 5 日发布的《中国政府关于反对美国滥施关税的立场》，严正声明：“近期，美国以各种借口宣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贸易伙伴滥施关税，严重侵犯各国正当权益，严重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严重损害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严重冲击全球经济秩序稳定，中国政府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当前，应充分认识到中美博弈的长期化与结构性矛盾，统筹好国内经济工作与国际经贸斗争，做好国内经济政策与国际博弈的深度联动，以更加扎实的举措应对一切风险挑战。

从现有文献看，国内学者开始重视对特朗普 2.0 时期政策走向的研究。刁大明提出从特朗普第一次当选到再次当选的 8 年间，不论是国际安全环境、中美发展现实、美国国内对华认知以及特朗普个人状态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应在特朗普新任期开始前对可能态势进行一些初步预估^[1]。朱福林关注中美经贸关系走向，分析特朗普 1.0 时期对华政策冲击与前瞻特朗普 2.0 时期对华政策，认为要提高战略认知，避免重大误判，维护中美关系总体稳定^[2]。朱民认为中美关系发展经过多次博弈，中国经济韧性已显著提升，能较好防范和应对外部不确定因素，但是应重视特朗普 2.0 时期对华政策的不确定性，总结多次博弈产生的经验教训，继续发展和壮大中国经济^[3]。除了中美经贸方面，也有学者分析特朗普 2.0 时期对台政策走向，认为美国对台将会由利益关切转向利益交换，加速地缘政治利益化^[4]。由此可见，分析特朗普再次出任总统后我国经济发展可能面临的挑战和应对策略变得非常迫切。

从特朗普 1.0 到 2.0 时期，由于美方的认知偏差，中美关系在相互摩擦中向前发展。总体而言，这两个世界最主要大国保持了较稳定的伙伴关系，对世界经济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自 2016 年特朗普首次出任美国总统，美国对外政策中便将中国界定为所谓“战略对手”，把遏制中国作为达到“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目标的战略核心，单方面对中国挑起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5]。特朗普 2.0 时期，中国可能面对更加强硬的美国，美国或将对中国在贸易发展、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国际金融、高科技技术和绿色可持续发展等诸多领域造成更大冲击^[6]。为更好应对国际新局面，我们需要总结分析特朗普 1.0 时期以来我国国际经贸发展中应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经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立协调性更强的政策应对协调机制，熟练掌握中美政策波动的应对技巧，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扎实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一、中美经贸关系特征与特朗普 1.0 冲击

中美经贸关系作为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之间的重要联系, 长期以来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全球化和国际市场的高度互联, 双方的贸易与投资往来不断加强, 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复杂经济体系。自特朗普 1.0 时期以来, 美国在全球贸易政策上的转变, 特别是其“美国优先”的战略, 对中美经贸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朗普 1.0 时期的经济政策以加征关税、削减贸易逆差和限制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为核心, 打破了过去多年的经贸合作模式, 并引发了全球市场的不确定性。分析特朗普 1.0 时期中美经贸关系的特征与冲击, 对于深入理解特朗普 2.0 时期两国经济互动的复杂性及其对全球经济治理和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至关重要。

(一) 中美经贸关系的基本特征

其一, 中美经贸关系具有双重特征。特朗普 2.0 时期的中美经贸关系走向预计在 2020 年前已然奠定的竞争性基调上持续演进, 但是中美关系不是单纯的“对抗战”, 双方都尝试在可管控的竞争范围内寻找新的合作点。随着中国国力的迅速增长, 两国经贸关系发展呈现摩擦与合作并行的特征, 两国关系在风雨中成长、在曲折中前行。一方面, 中美双方因为文化背景和发展路线等差异, 两国在多个经贸领域存有较大的分歧, 导致发展冲突与现实矛盾频现。例如, 在早期中国谋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数轮谈判中, 中美双方针对中国多个产业的开放时间与开放程度有着较激烈的争论。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以美国为首的部分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多次以中国企业恶意降价为幌子, 对多种中国商品开展反倾销调查。美国方面还在知识产权保护和高科技产品出口等方面对华频频发难。另一方面, 中美双方在博弈中不断探索深化合作的机制和领域, 双方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例如, 在与美国达成共识的条件下, 中国于 2001 年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进一步融入了全球经济的产业价值链网络。美国也充分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巨大消费市场规模便利, 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发展空间。

中美经贸关系具有显著的依存性和竞争性双重特征。一方面, 美国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 中国是美国的重要进口来源国, 两国在贸易、投资和金融等领域形成了深度交融。根据全球价值链理论, 美国处于高端环节, 提供技术、研发和服务, 中国则凭借制造业优势承担组装与生产功能, 这种互补性形成了高度依赖的经济关系^[7]。另一方面,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 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 特别是在高科技产业领域, 美国对中国的科技遏制逐步加剧。美国通过技术封锁、出口限制和投资审查等手段, 试图遏制中国的经济和技术崛起, 这种“竞争性脱钩”逐步削弱了两国经贸关系的合作基础。另外,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深度嵌套, 两国贸易不平衡与结构性矛盾, 多领域摩擦的扩散性, 双边与多边经济治理的分歧性, 地缘政治与经济脱钩的互动性等, 都是影响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因素。

其二, 中美经贸关系对世界经济秩序具有重大影响。中美经贸关系作为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 彼此之间的合作纽带对全球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推动作用^[8]。从全球总需求视角看, 美国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 而中国是全球最重要的生产基地和出口国, 两国间的贸易往来在全球经济循环中起到关键桥梁作用。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 2024 年中美贸易额达到了 6 882 亿美元, 同比增长 3.7%。其中, 中国对美国出口 5 246.56 亿美元, 增长 4.9%。两国经贸关系呈现显著正相

关，其贸易规模和深度对世界经济的稳定性具有不可替代的贡献。

中美两国市场已经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支撑了全球产业链的稳定运转。从生产端来看，中国凭借其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劳动力规模，在全球制造业链条中占据重要地位，成为世界制造中心。从消费端来看，美国通过其技术创新能力和消费能力，推动高附加值产品的研发和市场需求扩展。两国经济互为支撑的价值链关系确保了原材料、资本、技术和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高效配置，为全球企业和经济体提供了参与全球分工与合作的契机^[9]。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健康稳定会促进世界贸易体系的运行稳定，乃至成为全球贸易体系的稳定基石。两国不仅是双边贸易的重要参与者，也是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者和实施者。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成员，中美通过出口、进口和投资合作在全球贸易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作为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中国和美国在多边贸易、金融合作和全球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中美之间凸显的战略竞争导致两国合作与博弈并存，这直接影响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演变。

从全球市场的宏观角度分析，良好的中美经贸关系有助于稳定全球经济。鉴于中美两国在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有着紧密的联系，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既可以带动全球其他国家的贸易增长，为全球经济注入新的动力，促进全球贸易的繁荣与发展，也能为其他国家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和市场空间，并降低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增强市场信心。

（二）特朗普 1.0 时期冲击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形态

特朗普 1.0 时期政策对中国经济发展形态的影响由奥巴马时期的温和逐渐转向对抗。特朗普第一届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以“美国优先”为核心的经济政策。他针对中国的诸多举措从贸易、投资、技术、金融等多个领域对中国经济做出全方位围堵，对世界经济发展形态产生了深远影响，包括强化单边主义、推动贸易保护、限制技术合作以及试图重塑全球产业链格局^[10]。

特朗普第一届政府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以高关税为主要手段，先后对数千亿美元的中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这导致中国出口竞争力下降与市场结构调整。高关税增加了中国出口商品在美国市场的成本，削弱了部分中低端制造业的竞争力。受此影响，中国出口贸易增长放缓，并呈现市场多元化趋势，加快向东盟、欧盟等其他市场的布局。这也倒逼中国企业的出口转型升级，向高附加值产业链上游延伸。由于高关税政策及特朗普 1.0 时期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部分依赖出口的外资制造企业开始向东南亚、南亚等生产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了外贸不确定性，推动中国政府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扩大内需和消费转型升级，增强国内经济韧性，降低经济发展对单一出口市场的依赖。同时，特朗普第一届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加强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技术封锁和制裁，致使中国高端产业链发展受阻，导致中国参与全球技术合作环境受限。另外，特朗普第一届政府在产业链重构和气候合作、人民币国际化、地缘政治等方面试图改变现状，致使两国对抗加剧^[11]。

可见，特朗普 1.0 时期对华政策对中国经济发展形态产生了多层次、多维度的影响。尽管贸易摩擦、技术封锁、产业链重构等政策对中国经济短期内造成了一定冲击，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催化剂”。中国通过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绿色发展和深化金融领域改革等举措，积极应对外部压力，并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寻求新的战略空间。未来，中美关系的长期性竞争与合作并存特征将继续深刻影响全球经济发展趋势。

二、特朗普 2.0 时期与中国经济发展环境挑战

特朗普 2.0 时期, 美国可能在对华政策上采取更为激进和系统的手段。2025 年 4 月 2 日, 美国对外宣布实施所谓“对等关税”计划, 挑起全球范围贸易战, 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应, 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大幅震荡。美国此举意图通过科技脱钩、供应链重构、地缘政治博弈以及环境政策领域的脱钩等多方面措施, 重新塑造全球经济秩序。这些政策不仅可能对中国经济发展构成显著挑战, 也可能加剧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一) 科技脱钩与外部技术约束: 对中国创新驱动型经济的影响

随着特朗普再次执政, 中美两国在科技领域的争夺将会愈演愈烈。2022 年 10 月, 美国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所谓“优先考虑的、唯一的全球竞争对手”, 企图阻碍中国科技发展, 遏制中国高科技企业在全产业链分工协作中的提升空间, 从而维护和巩固美国企业在全产业链格局中的主导权和主动权, 实现单边主义和利益垄断的目标。可以预见, 特朗普 2.0 时期中美科技领域的竞争依旧会空前激烈, 这也是关乎我国产业能否升级、世界科技强国建设目标能否实现、被“低端锁定”的恶劣局面能否突围的严峻考验。科技脱钩和技术引进限制问题的根源在于中美之间核心技术竞争的加剧, 以及全球发展格局中技术主导权的重要性。

从美国的发展战略考量来看, 美国认为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 如人工智能、半导体、5G 通信、新能源等的快速崛起, 对其全球科技霸权构成威胁。因此, 美国谋求通过出口管制和技术脱钩措施, 限制中国获得这些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生产设备。美国对华科技制裁自特朗普 1.0 时期以来不断升级。截至 2024 年 8 月, 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已将 845 家中国实体或个人列入“实体清单”, 将 143 家实体列入“未经验证清单”, 涵盖诸多前沿科技领域。这些限制措施增加了中国企业的技术研发难度和市场不确定性, 削弱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特别是限制了中国高科技企业发展。从中国的产业升级需求方面考虑, 中国面对新发展格局提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在发展和培育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强调自主创新与科技突破^[12-13]。中国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制造 2025》明确指出, 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 我国制造业仍然大而不强, 在自主创新能力、资源利用效率、产业结构水平、信息化程度、质量效益等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明显, 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的任务紧迫而艰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 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正在重塑。面对特朗普第二届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 中国积极谋划加速技术赶超,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第一, 限制技术进步与创新能力提升。可以预见, 与特朗普 1.0 时期相似, 特朗普 2.0 时期可能加快中美科技脱钩的步伐, 可能直接阻断中国从发达国家获取先进技术的渠道, 阻碍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正常技术合作, 中国创新驱动型经济转型面临巨大外部挑战。特别是在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生物制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 外部技术限制使得中国在核心技术突破方面面临研发周期延长、研发成本攀升和技术瓶颈固化等难题。这种技术“孤立化”将直接削弱中国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潜力, 阻碍中国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实现产业升级的路径。

第二, 加剧产业链与供应链脱钩断节。科技脱钩直接影响产业技术发展, 导致全球价值链区域化与碎片化趋势加剧。这种情形下, 中国在高科技产业链中的关键环节可能因外部制约而断裂。2018

年特朗普第一届政府对华发起贸易摩擦以来，中美贸易份额整体呈下降趋势。虽然美国对华战略中不寻求中美脱钩，但脱钩进程仍在进行中。从世界银行公布的各地区及国家进口金额数据看，2018 年美国发动贸易摩擦后美国自中国进口金额整体呈下降趋势。2009—2022 年，中国一直是美国除欧盟以外的最大进口来源国。2023 年，墨西哥、加拿大均超过中国分别成为美国除欧盟以外的第一大、第二大进口来源国，而中国则下滑至第三位。除中国外，美国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进口金额均呈现整体上升趋势，而中国自 2019 年开始，对美出口上升势头出现中断。此外，供应链安全性与效率之间的权衡也进一步增加中国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和成本压力。

第三，削弱高端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外部技术约束可能导致中国在国际市场中缺乏对高端制造业产品的技术背书，从而削弱出口竞争力。尤其是在新能源设备、信息设备等全球增长迅速的领域，技术封锁将影响中国企业的技术附加值，降低在国际市场中的品牌认同度和议价能力。这将制约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向上攀升，并可能陷入技术中等收入陷阱^[14]。从美国分地区国别进口所占比例上看，这种趋势更为明显。根据美国商务部的贸易统计数据计算结果，2018 年美国自中国进口所占比例尚有 17.89%，之后一路下滑，到 2023 年已下滑至 11.70%，2024 年 11 月该比例差不多已回落至 11.2%。目前，美国对中国贸易依存度的下滑趋势仍未出现结束迹象。同比之下，美国的其他贸易合作伙伴，诸如加拿大、越南、墨西哥、韩国、印度对美国出口金额，2023 年较 2018 年分别增长了 32.49%、132.86%、39.62%、54.64%、43.00%。

（二）供应链重构与去中国化：对中国全球市场经济地位的影响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迅速崛起，美国逐渐提高对华发展的警惕性。从特朗普 1.0 时期到拜登政府再到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已经逐渐呈现清晰的强硬路线，在其盟友圈内积极鼓动“去中国化”。2008 年，奥巴马当选总统后推动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建立以及美国一直以来重申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目的就是凸显美国在亚太地区和全球的战略主动权和主导地位，借此将产业逐步由中国大陆向东南亚转移，摆脱在华产业链布局，谋求对中美之间供应链重构^[15]。特朗普 1.0 时期对前任政府的对华政策进行了大幅度调整，采取了更加激进的脱钩断链措施。特朗普第一届政府以“美国优先”为口号，抛弃了包括 TPP 在内的一系列国际合作机制，将中国确定为“战略对手”。拜登政府延续特朗普第一届政府的对华政策，加强与盟友的合作，特别是在科技和制造业领域的合作。通过与欧洲、日本、韩国等盟友的合作，美国试图形成一个技术和供应链联盟，以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2024 年 9 月，美国商务部举办供应链峰会、供应链竞争力咨询委员会会议、印度-太平洋繁荣经济框架（IPEF）供应链委员会会议。美方推出供应链风险评估工具 SCALE。其核心目标是从被动应对转变为主动管理，提升供应链风险防控能力，推广所谓“最佳实践”。这实质上是美国欲借助 IPEF 供应链支柱，推动亚太产业链和供应链重构，美国企图利用供应链协议中的劳工权利保护机制和风险评估工具，引导跨国公司重新评估生产布局，减少对华依赖。

随着美国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去中国化进程的推进，其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首先，高端制造业的技术脱钩与出口受限。全球价值链的核心环节通常由具有技术优势的国家或企业主导，而中国在高端制造业领域，如半导体、新能源、高端通信设备等正处于快速追赶阶段，尚不具有全面优势。特朗普 2.0 时期预计会继续强化供应链去中国化，并直接针对关键领域环节，通过技术封锁、出口限制及其他非市场手段限制中国企业获取先进技术、关键零部件和制造设

徐政, 占智勇. 特朗普 2.0 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环境挑战与应对策略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3): 135-147.

备。供应链重构与去中国化的目的是保护美国供应链脆弱性。供应链脆弱性有两层含义：一是依赖海外生产的风险，即进口依赖度；二是进口来源地单一的风险，即进口集中度^[16]。有研究认为，特朗普 2.0 时期会延续奥巴马时期开始实行的产业和贸易政策。美国制造业供应链脆弱性从 2018 年开始见顶回落，2018 年主要体现为进口集中度下降。2018 年后美国贸易伙伴分散化，自东南亚和拉美进口占比上升。特朗普 1.0 时期开始的贸易限制政策在 2022 年后更多体现为依赖度的减少，拜登政府侧重推动制造业回流和产业政策。美国贸易伙伴的分布呈现分散化趋势，自中国进口占比经历了两轮下降。根据中国中金公司研究公布的数据，这项占比从 2019 年前 24.5% 的高点降至 2020 年前的 19.6%，之后在 2020—2022 年期间一度回升至 20.6%，2022 年后进一步下滑至 17.1%，而同一时期美国自墨西哥、越南等经济体进口占比上升。这些数据显示，虽然中美经贸往来全面脱钩在目前并未发生、也不可能发生，但局部领域大幅度脱钩的风险正在上升。

其次，美国对华政策收紧直接导致低端产业链的转移与成本竞争优势的削弱。随着美方加速全球价值链的调整，部分跨国企业将低附加值制造业从中国迁移至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东南亚、南亚等地区，这种战略转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全球产业分工的重新布局^[17]。从经济发展角度审视美国再工业化和引导产业链重构过程，可以预见特朗普 2.0 时期对中国低端制造业短期影响有限，但对产业中长期结构性影响值得重视。就业和出口规模方面减少、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迁等，减少了中国的出口规模和就业机会。随着其他东南亚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中国在低成本生产上的传统优势逐步减弱，这可能导致中国在全球中低端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

（三）地缘政治与市场分裂：对中国国家主权战略的影响

中美坐落于东西半球，隔海相望，在国土面积与经济体量等方面同属于世界大国。中美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然而随着世界局势风云变幻以及美国方面的错误认知，中美两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博弈日趋明显。无论是在国内推出政策与措施，还是在国际上推动联盟和外交行动，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打压逐步升级，中美关系发生诸多变化。拜登政府推出“印太战略”，真实目的是构建一个以意识形态为口号、以地缘政治为手段围困中国的方案。从美国政权体制来看，这一地缘博弈战略背后是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共同战略。在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新政府依然需要与美国议会两党妥协，继续采取地缘政治博弈政策遏制中国发展。从短期来看，随着特朗普再次执政，美国继续借助乌克兰危机分化世界局势，使俄罗斯与美欧关系特别是经济文化关系趋于“脱钩”，双方处于长期对抗状态。这种背景下，中俄、俄印关系将进一步加强，中欧合作动力将上升。

一方面，地缘政治诱发全球经济分裂化趋势。特朗普 2.0 时期的政策延续通过地缘政治工具化干预全球经济格局的趋势，美国可能以多层次、多维度的路径推动全球经济分裂。美国将继续强化与欧洲等的联盟关系与区域经济协议，通过“印度-太平洋繁荣经济框架”（IPEF）等区域经济机制，构建新的经济和安全联盟体系，并将中国排除在外。此类机制不仅旨在减少成员国对中国供应链和市场的依赖，还通过政策和标准的排他性设计进一步削弱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地位。美国试图通过供应链安全、数字贸易规则、绿色技术标准等领域的合作，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同时抑制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此外，美国积极主张跨国市场准入限制，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对中国企业实施全面的限制措施^[18-19]。

另一方面，全球市场分裂对国家经济主权形成多重挑战。全球经济的分裂化趋势对中国的国家

经济主权战略构成了深远影响，中国外贸依赖度的安全风险增加。由于美国供应链区域化和同盟化的强化，中国在关键贸易领域可能面临非市场化干预。在 2024 年总统竞选期间，特朗普多次宣称当选后，将对所有其他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 10% 至 20% 的关税，对中国商品征收高达 60% 至 100% 的新关税。胜选后，特朗普威胁称，将在上任后首日，对来自中国的所有进口商品加征 10% 的额外关税。2025 年 4 月 2 日，特朗普宣布将对全球各国的进口商品征收“对等关税”：原则上，对各国商品征收 10% 的基本关税，并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情况追加额外税率，其中对中国在已实施的 20% 附加关税基础上，再增加 34% 的对等关税。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对华一系列政策或对我国国内生产和出口竞争力形成冲击，我国企业将面临关税增加带来的供应链断裂风险。

地缘政治的负面影响导致部分国家对中国企业的市场准入限制增多，加速全球市场准入的不确定性^[20]，尤其是在能源和原材料市场，这种不确定性导致全球供应链受到冲击，物流成本上升，国际贸易受阻。国际资本市场因地缘政治干扰而逐步分裂，投资与资本流动受到限制。美国当地时间 2025 年 1 月 18 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的一则视频中声称：美国应该阻止中国人未来对重要行业的所有收购，还应该开始迫使中国人出售目前持有的任何危及美国国家安全的资产。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预计会继续通过限制高科技领域对华投资、增加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监管力度等措施，增加中国吸引外资和进行对外投资的难度，削弱中国在全球资本流动体系中的参与度。此外，地缘政治对经济格局的干预会直接影响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和产业链韧性，预计会在技术断层与价值链攀升、供应链多元化趋势等方面影响中国经济发展。

（四）绿色可持续与气候治理的脱钩：对中国环境经济政策的挑战

环保政策取向是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一环。特朗普第一任期刚上台即废除了奥巴马政府的《清洁能源计划》，并于 2017 年推出《美国优先能源计划》（America First Energy Plan）。《美国优先能源计划》的目标是最大化地利用美国本土能源，摆脱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同时增加国内就业机会，促进国内实体经济发展^[21]。特朗普在 2024 年总统竞选时提出推动美国成为能源生产主导国，能源政策的核心思路为全面释放各类能源产能。特朗普 2.0 时期或将大力支持化石能源，更注重能源的短期产出效益，继续推行“美国优先”，主导世界能源市场。特朗普在环保、能源方面的政策主张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我国绿色可持续发展，导致两国在气候协作和新能源开发中很难达成深度合作。

一方面，国际市场与绿色技术扩散受限。随着特朗普政府团队的组建和到任，其释放出的政策信号显示美国可能进一步限制高效能清洁能源技术、碳捕捉与储存技术的对华出口。以碳排放标准为核心的绿色贸易壁垒，可能导致部分中国出口产品失去国际市场准入资格，特别是在能源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行业。鉴于碳排放与能源转型压力加剧、能源结构调整难度增加，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核心技术和设备进口的限制可能推高转型成本，延缓非化石能源占比提升的进程。美国主导的气候治理框架以及全球碳市场分裂的背景下，中国可能面临更大的国内减排压力，同时减少通过国际碳市场交易分摊减排任务的机会。美国的碳边境调节税和其他绿色壁垒措施将提升中国高耗能出口行业的生产成本，削弱其国际竞争力。在国际绿色投资方面，中方受阻可能增大。美国可能利用其金融霸权限制国际资本流入中国的绿色经济领域，进一步削弱中国吸引国际绿色投资的能力。

另一方面，贸易竞争加剧与绿色壁垒升级。特朗普 2.0 时期将延续 1.0 时期的做法，对中国推

徐政, 占智勇. 特朗普 2.0 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环境挑战与应对策略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3): 135-147.

出更高的环境标准, 同时加大对华绿色技术壁垒设置。美国预计会在高端绿色技术领域对华出口实施严格限制, 减缓中国绿色技术的引进速度, 迫使中国依赖自主研发, 增加了技术突破的不确定性。受美国对华政策影响, 中国吸引绿色领域外资的难度可能上升, 特别是在新能源技术和可持续发展领域。同时, 美国可能进一步挑战中国的全球治理权威与压缩对外合作空间, 阻碍中国通过多边合作推进全球绿色议程的能力。美国还会将更多节能减排责任施加于发展中国家, 增加中国的国际减排义务, 这可能使中国面临更多舆论和外交压力。

三、中国应对特朗普 2.0 冲击的经济发展策略

特朗普 2.0 时期, 中美关系在某些方面可能面临相对紧张局势。美国亦会实施更加激进的对华政策, 可能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既要中美关系的可能动荡做好充分准备, 也要保持足够定力, 在持续互动和激烈博弈中塑造美国的对华政策^[22]。面对科技脱钩、供应链重构、地缘政治冲突以及环境政策脱钩等多重压力, 以及美国宣布实施所谓“对等关税”计划的倒行逆施, 中方顺应历史潮流, 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 通过精准而有力的经济发展策略应对变局, 确保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一) 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

中国从顶层规划设计了长期坚持的科技发展方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 健全新型举国体制, 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中美科技竞争的长期发展趋势必然带来全球科技格局的深刻变革。中美两国在科技领域的竞争日益加剧, 尤其是在数据规则、芯片研发和人工智能三大高科技领域。2024 年, 美国政府接连出台多项政策措施, 旨在通过限制跨境数据流动、加强对中国半导体企业的审查来保持其技术领先地位。中美两国在全球科技格局中的竞争态势日益明显, 科技领域的竞争不仅影响两国科技产业的发展, 还会对全球经济格局和国际秩序产生深远影响。

为破解关键领域的技术封锁, 我国应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 完善原始性创新布局。一是强化核心技术攻关。优先聚焦“卡脖子”领域, 设立专项资金和科技创新计划, 推动产学研合作攻克关键技术, 集中力量解决瓶颈问题。二是优化创新生态系统。推动科技资源在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间的有效流动, 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研发体系。发展科技服务业, 推动知识产权转化和技术成果产业化。三是提高基础研究投入。基础科学是技术突破的根基, 应进一步提升研发经费占财政预算比例, 支持开展原创性基础研究, 加强关键领域长期技术储备。创新教育模式, 培养高端科技人才; 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 吸引全球优秀科研人员来华, 形成多层次、多领域的科技人才储备体系。

(二)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 年)》明确指出: “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培育完整内需体系, 是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 是促进我国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战略决策。”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长期保持在 30%左右, 无论是应对 20 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 都为全球经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外部市场分裂和贸易环境日益复杂的背景下, 特

朗普 2.0 时期的美国可能继续加大对华关税征收，限制我国外部市场发展，中美博弈将呈现“对抗常态化、竞争多维度、局部试探性合作”的复杂格局。我国应深度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夯实经济发展的根基、增强发展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一方面，深度挖掘内需消费潜力。优化收入分配结构，通过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激发国内消费需求，支持减轻消费者消费负担，促进消费转型升级。深化多边、双边和区域经济合作，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为企业拓展国际经贸合作新空间，提升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加快形成国际经济竞争合作新优势。积极推动我国实现更全面、更深入的对外开放，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不断与国际高标准贸易投资规则接轨。提升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全球分工的能力，增强在国际经济协调和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为营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消费环境创造条件。积极加强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投资合作，强化中国在区域经济格局中的地位，降低对美欧市场的依赖。

另一方面，完善供应链多元化布局。积极推动供应链从“单一依赖”向“多元分布”转变，发展与东盟、南亚、非洲等地区的产业链协作，提升供应链韧性与稳定性。充实完善政策工具箱，根据外部影响程度动态调整政策，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数字经济是新一轮技术革命深入演化发展基础上的全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表征在于数字经济国家竞争力优越。特别是在当前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立足提升数字经济国际竞争力以加快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与增长动能转换，具有关键意义。加快国内国际双循环需加快服务业和数字经济发展，推动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化布局，打造全球服务贸易新优势。

（三）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成为中国经济金融开放与合作的重要一环。随着特朗普第二届政府对华政策收紧，中国政府在不断推进制度型开放同时，应积极完善人民币跨境使用制度和基础设施建设。当前，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跨境金融活动中的使用日益广泛，应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降低美元主导金融风险。同时，还要大力发展以人民币计价的、开放的国际资产市场，为境外投资者提供更多的人民币金融资产选择。

一方面，持续扩大人民币结算规模。加强与贸易伙伴国的货币互换协议，推动能源、农产品等大宗商品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中的使用范围。积极推动数字人民币国际化应用，加快数字人民币的跨境支付技术发展，建立多边支付平台，降低传统美元主导支付体系的影响力，形成更安全、便捷的支付环境。

另一方面，深化金融市场制度型开放。引导更多优质外资进入资本市场，增强人民币资产的国际吸引力，通过提供稳定的收益率和流动性，提升人民币的储备货币地位。推进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优化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提升外商直接投资汇兑便利，扩大业务范围。积极推动区域货币合作，在“一带一路”国家及区域性经济合作框架中，探索建立人民币清算中心与区域支付体系，逐步削弱美元在区域贸易中的主导地位。

（四）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

绿色可持续发展作为全球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方向，不仅是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环境约束的关键路径，也是提升一个国家国际核心竞争力的战略举措。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绿色发展不仅是中国的政策导向，更是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重要领域。

一方面，大力发展绿色技术与产业。重点支持新能源（风能、太阳能、氢能）、节能环保技术和绿色制造产业，扩大在国际绿色经济领域的技术优势与市场份额。探索建立高效碳市场机制，完善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引导企业通过市场化手段降低碳排放，提高生产效率，推动碳定价机制与国际接轨，为绿色产品创造价格优势。推动绿色发展，引导传统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向低碳化、清洁化和高附加值转型。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全球绿色经济浪潮中抢占先机，构筑高技术含量和高增长潜力的产业集群。

另一方面，积极强化国际气候合作。在联合国气候框架下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推动绿色技术和资金合作，与欧盟、东盟等合作伙伴建立绿色发展联盟，形成国际话语权。以环保合作促进经济结构绿色转型，通过技术创新和政策引导，实现能源结构优化，推动煤炭等传统能源向清洁能源转型，确保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在绿色经济领域，通过参与国际气候谈判、主导绿色标准制定和推广绿色金融工具等方式，增强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制度性权威，塑造全球绿色经济治理的规则体系。

（五）创新制度体系与政策性工具

在特朗普 2.0 时期及其他潜在外部冲击背景下，持续创新应对外部冲击的制度体系与政策性工具，不仅是中国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保障，也是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重要手段。要通过实施更为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提升经济韧性、强化科技自立、优化全球合作机制以及保障民生稳定，提升我国应对外部复杂环境能力，为自身发展创造更加安全和有利的国际条件。

一方面，完善制度性保障政策。建立完备的出口管制和进口替代机制，加强对企业参与国际化进程中的法律支持与风险规避培训，增强企业应对国际贸易纠纷的能力。推动政策性金融支持，利用政策性银行为关键领域提供资金保障，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保障领域的持续发展。实施更为积极的强链补链延链产业政策，强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关键核心产业的政策支持，鼓励企业技术升级与产业链整合，减少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提升供应链完整性和产业链韧性。

另一方面，增强数字经济应变能力。继续完善数据要素市场规则，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以高效配置数据资源增强经济抗风险能力。打造高韧性的数字基础设施，增强网络的可靠性、安全性，为发展数字经济奠定技术基础。强化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加大核心技术研发投入，推动自主可控技术和“卡脖子”技术的突破，减少对外部技术依赖，增强技术体系的独立性和韧性。构建产学研一体化创新网络，推动协同创新，加速技术成果转化，形成技术研发与市场需求无缝衔接的机制。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创新，培育具有高成长性和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增强数字经济的多样性与灵活性。通过建设韧性基础设施、推动产业链协同、强化技术创新、完善治理体系和深化国际合作，中国数字经济将具备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和全球竞争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六）加强国际形象塑造

在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对华政策预计更加偏向对抗性和遏制性，通过地缘政治竞争、价值观

输出和全球话语权争夺，进一步削弱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在此背景下，加强国际形象塑造与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之一。

一方面，积极构建以和平发展为核心的国际形象。强化和平合作的全球认知，通过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机制，持续倡导和平发展理念，强调在重大国际事务中的建设性角色。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故事，积极倡导中国在减贫、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等领域的成就，展示中国方案在推动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和民生改善中的独特优势，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路径的认同。深化国际传播体系改革，提高国际话语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包括优化国家主流媒体的海外传播平台、扩大国际社交媒体影响力以及利用全球智库和国际会议发声，主动参与国际公共舆论引导。积极传播包容多样的中国文化，增强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形成全球范围内的文化认同与共鸣。

另一方面，筑牢国家核心利益的国际保障。强化主权和安全议题的国际表述，针对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等涉及核心利益的领域，中国应强化合法性论述，利用国际法和历史事实维护主权完整和国家安全。加强军事实力与外交协同，坚定以强大的国防实力为后盾，形成“软硬结合”的国际交涉能力，利用战略威慑和国际调解相结合的形式，增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积极谋求多边支持，推动多边主义与全球治理合作，积极参与相关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制度性权威。进一步深化南南合作，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倡议^[23-24]，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力度，构建以互利共赢为基础的全球合作网络，积极构建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安全体系。

参考文献：

- [1] 刁大明. 从 1.0 到 2.0: 特朗普政府对华安全战略的延续与政策变化 [J]. 国际安全研究, 2025 (1): 96-114+158.
- [2] 朱福林. 中美经贸关系: 特朗普 1.0 冲击与特朗普 2.0 前瞻 [J/OL]. 财经问题研究, 1-14 [2025-01-17]. <https://link.cnki.net/urlid/21.1096.f.20241227.1540.002>.
- [3] 朱民, 巩冰, 杨斯尧. 博弈特朗普 2.0, 发展和壮大中国经济 [J]. 国际金融研究, 2024 (12): 6-21.
- [4] 钟厚涛. 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对台政策走向及其影响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1): 157-167.
- [5] 崔天凯. 关于中美关系的几点思考 [J]. 国际问题研究, 2022 (1): 31-34+128.
- [6] 佟家栋, 姚星明, 鞠欣. 中美两国的经贸战略竞争关系与历史镜鉴 [J]. 南京社会科学, 2024 (1): 43-55.
- [7] 王中美. 中美经贸关系的基础逻辑: 以长周期定锚的竞争 [J]. 国际展望, 2024 (5): 27-46+146-147.
- [8] 马广奇, 陈雪蒙. 由金融大国迈向金融强国: 国际比较与中国进路 [J]. 西安财经大学学报, 2024 (2): 46-59.
- [9] Jiao Y, Liu Z K, Tian Z W, etc. The Impacts of the U.S. Trade War on Chinese Exporters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24 (106): 6.
- [10] 陈静, 周文星. 美国对华政策重构过程中的国会——以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为个案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2): 175-192.
- [11] 孙海泳. 特朗普政府对华科技战略及其影响与应对 [J]. 国际展望, 2019 (3): 78-97+159-160.
- [12] 丁守海, 徐政. 新质生产力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内在逻辑、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6): 58-67.

徐政, 占智勇. 特朗普 2.0 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环境挑战与应对策略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3): 135-147.

[13] 王缉思, 贾庆国, 唐永胜, 等. 美国战略探析与中美关系前景展望 [J]. 国际经济评论, 2024 (2): 9-49.

[14] 徐政, 宁尚通.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指向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1): 132-142.

[15] 漆海霞. 中美竞争下的对冲及其风险 [J]. 国际政治研究, 2024 (2): 6+61-77.

[16] 崔晓敏, 熊婉婷, 杨盼盼, 等. 全球供应链脆弱性测度——基于贸易网络方法的分析 [J]. 统计研究, 2022 (8): 38-52.

[17] 吕宏军, 侯娜娜. 数字经济、产业链现代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用机理和实施路径 [J]. 西安财经大学学报, 2024 (1): 94-104.

[18] 余振, 王净宇. 美国对华经贸政策转型新趋势 [J]. 现代国际关系, 2022 (12): 28-34.

[19] 达巍. 美国对华战略逻辑的演进与“特朗普冲击”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7 (5): 21-37+155-156.

[20] 吴心伯. 论中美战略竞争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0 (5): 96-130+159.

[21] 陈腾瀚, 姜蕾. 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能源计划”探析 [J]. 国际研究参考, 2017 (8): 31-37.

[22] 张腾军. 从 2024 年竞选言论看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对华政策 [J]. 当代美国评论, 2024 (4): 41-63+126-127.

[23] 刘博, 蔡文成. 习近平关于“一带一路”建设重要论述 [J]. 上海经济研究, 2024 (2): 5-16.

[24] 邵发军.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J]. 社会主义研究, 2017 (4): 1-8.

责任编辑: 林华山 校对: 卢媛



制度性话语权视角下 西方指数霸权祛魅与中国自主评价体系建设

陈奇

（清华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084）

摘要：构建中国自主评价体系不仅是破除西方指数霸权迷思的必然取向，也是参与推动全球治理转型的应然要求。美西方国家将国际指数排名包装成为“实现意识形态目标和战略利益的工具”，操纵非政府组织在国家施政、经济发展、文化教育、社会治理和生态环保等多元领域内炮制所谓“国际通用”的指数排名，蓄意将中国“置后”或是“置前”，鼓噪中国“落后”或“威胁”等虚假论调。美西方国家操弄指数排名的策略包括：概念重塑，隐蔽性植入政治动机；操纵权重，倾向性设计指标因子；制造偏差，选择性引用数据信源等。通过丑化中国国家形象、弱化中国全球贡献、助长对华攻击抹黑的三重逻辑，美西方国家形成“数据生产—话语传播—政策影响”的指数霸权闭环。为破解西方指数霸权，我国要根植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建设中国自主评价体系；动员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国际指数评价体系建设；强化舆情监测，有效批驳涉华虚假负面叙事。

关键词：新型全球治理；制度性话语权；指数霸权；自主评价体系；认知战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5）03-0148-10

一、问题的提出

202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应该秉持

DOI: 10.13946/j.cnki.jcquis.2025.03.012

作者简介：陈奇，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助理研究员。

引用格式：陈奇. 制度性话语权视角下西方指数霸权祛魅与中国自主评价体系建设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3): 148-157.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相互视对方的发展为机遇而非挑战, 相互把对方作为伙伴而非对手, 恪守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 促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1]。习近平总书记全面系统地阐明了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观, 指明了完善全球治理的正确方向。其中, 制度性话语权建设是中国推动全球治理转型和建立新型全球治理秩序的重要途径和手段^[2]。国家的制度性话语权多反映为对国际经济制度构建及改革的能力^[3]。制度性话语权融合了制度性权力和话语权两个部分^[4], 涉及国际制度与国际话语体系两个方面^[5]。制度性话语权既是国家总体话语权的重要构成板块, 也是充分彰显某一国家行为体参与新型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建设的国际制度性权力。在制度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新型全球治理体系中, 国际指数排名作为一种全球性公共产品, 已然成为霸权国家遏制新兴国家发展的重要工具。

指数是对理念的量化塑造, “指数的基础是原始数据, 关键在于相关理论逻辑, 核心是其背后承载的治理理念”^[6]。指数直观呈现的是选择性加工的变量数据, 间接输出的是背后隐含的价值理念, 国际指数评价体系的制定、设计、应用与推广过程也是全球治理话语体系的构建过程。指数排名能够在全世界治理实践中为治理主体提供科学的决策参考, 推动治理对象达成理解共识, 实现治理主体间有机良性互动, 推广自身提出的全球治理理念。然而, 已有全球治理评估体系具有较强的基于意识形态的阵营思维, 评估指数体系测量指标设置与方法设置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标准为圭臬, 背后往往隐藏着主导国的利益诉求、意识形态和价值观^[7]。美西方话语霸权呈现从语言演绎归纳转向语言逻辑和数理逻辑并行的演变脉络^[8]。美西方国家将国际指数排名包装成为“实现意识形态目标和战略利益的工具”^[9], 操纵非政府组织在国家施政、经济发展、文化教育、社会治理和生态环保等多元领域内炮制所谓“国际通用”的指数排名, 蓄意将中国“置后”或是“置前”, 鼓噪中国“落后”或“威胁”等虚假论调。

面对美西方国家以国际指数排名为工具对中国实施系统性攻讦的新动向, 如何穿透话语迷障、解构认知霸权, 构建新型话语范式; 理性识别指数内核、正确运用指数功能, 构建中国自主指数评价规范, 成为学界关注的议题。从既有相关文献来看, 学者们首先剖析了国际格局变迁如何驱动话语权力重构。有学者认为, 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突出, 而西方国家发展普遍陷于颓势, 对二者在国际话语权结构中的“权力倒置”提出了重构的客观要求^[10]。在现行全球治理传统模式破产的情况下, 中国在国际规则、国际理念方面发挥出日益强大的议程设置力和影响力^[11]。作为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 中国需要借助制度性话语权在国际事务中赢得更多参与引领全球治理的主动权^[12]。其次, 学者们分析了提升制度性话语权如何成为参与全球治理和制衡霸权的着力点。有学者直指提升制度性话语权是国家获取国际话语权更加容易有所作为的领域^[13], 其中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构建某种指数或评估指标^[14], 构建指数是后起国制衡国际霸权的辅助工具^[15]。具体到方法论层面, 有学者关注到构建指数话语体系的智库供给机制, 指出西方智库的全球性指数产品事实上是西方国家制度性话语权的抓手, 相关评价结论带有政治偏误, 中国新型智库应重视全球指数开发, 积极竞争指数的国际话语权, 维护国际社会的良秩公序^[16]。也有学者以“世界正义工程法治指数”(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为例, 分析其建构逻辑, 研究中国法治指数的具体问题和缺陷, 并提出借鉴国际指数的构造方法和经验来提升中国指数话语影响力^[17]。

既有研究在霸权运作机制的微观解构、黑箱操纵余毒的锁链反应和话语反制策略的开发应用等方面仍需深化，亟待形成兼具理论批判性与实践穿透力的研究范式。基于此，本研究立足制度性话语权理论框架，选取在国际舆论场具有较强传播力且深度嵌入西方话语霸权的典型指数评价体系作为样本，运用批判性话语分析方法，揭示其潜藏的意识形态编码与认知建构机制，深度解构涉华评价中的隐性话语陷阱，系统评估其对华多重负面影响。本文提出构建中国自主评价体系的概念框架，探索构建“立论—实践—传播”三位一体的破局路径，以期为破解“他塑”话语困境，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提供学理支撑。

二、困局：美西方指数霸权黑箱操纵

美西方国家依托其构建的制度性话语霸权，将国际指数排名异化为推行认知作战的战略武器，通过系统性操控指数生成的全链条环节，构建起对华实施战略遏制的话语陷阱。其运作机制始于概念重构的认知铺垫，将“民主”“自由”等政治概念剥离历史语境，构建起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基准的“文明标尺”；继而展开权重设计的算法霸权，在指标体系内预设权重结构，依托数学模型实施技术殖民，造成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叙事困于“指标牢笼”；最终完成指标建构的偏差闭环，选择性忽略发展中国家差异化的治理实践，将西方局部社会发展抽象为所谓的系统性优势。

（一）改造概念，隐蔽性植入政治动机

美西方构建的国际指数往往将某一特定概念作为立论基础和预设条件。“西方话语霸权运行的底层逻辑是通过概念建构‘普世均质’世界，‘西方’概念及其形成的概念网络成为‘西方’对世界进行话语控制的有力武器。”^[18]西方意识形态常用的概念大体分为三类：一是西方话语核心概念，二是西方话语炮制的攻击性概念，三是被西方话语偷换和扭曲后为西方所用的概念。这三类概念通常搭配使用，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极大的观念混乱^[19]。指数话语的主导国将政治目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霸权诉求隐蔽性地嵌入概念界定框架之中，试图实施指数话语操控。

美西方国家惯常通过改动或编造“自由”“民主”“人权”等政治概念的手段达到目的。美西方国家一直以来推销的所谓“人权体系”存在严重的双重标准：西方所谓“人权”的判断体系本质上服务于西方的政治价值体系，并维护西方在全球的霸权地位，而非人的权利本身^[20]。以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2023年发布的《网络自由度报告》（Freedom on the Net）为例，其污蔑中国连续9年被评为“世界上最严重滥用互联网自由的国家”。事实却是，“互联网自由”自美国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就已经嫁接入“个人权利”的表达范畴之中，“这一理念的提出目标、实践过程均显示出强烈的美国单边主义和利己主义色彩”^[21]。所谓“互联网自由化”最终沦为“互联网美国化”。再如，美西方国家假借“自由之家”发布的《世界自由报告》指数（Freedom in the World），妄图将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成效排挤出世界民主话语体系。在测量某一国家是否为民主国家时，“自由之家”采取较为简单且不重实际的标准，声称只要国家政体存在选举过程便可以界定为“民主”国家^[22]，以竞争性选举作为评判标准来制造“自由”与“不自由”、“民主”与“专制”等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意图遮蔽西式民主中“金钱民主”“精英民主”“选举民主”等形式民主的虚伪面目。这一系列操作揭示了国际话语权争夺中的深层次政治动机与复杂关

系。

（二）捏造权重，倾向性设计指标因子

指数评价体系是评估对象细分单元之间按照一定逻辑关系构成的信息集合，呈现多级递进的层次结构。构建科学客观的指标体系要求遵循全面细致的测量系统、严谨透明的编制流程以及公正合理的权重分配等基本原则。但是，在政治动机驱使下，美西方国家设计的概念维度与指标因子时常发生偏离，立论基础与计算方法存在明显错位，导致指标测量结果游离于标的之外，指数对理念的量化塑造难以达成全球共识。尤其是涉华国际排名，美西方倾向于增加本国和盟国的权重，或是在特定领域增加或减少涉华内容占比。以总部位于德国的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发布的“腐败感知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或称为“清廉印象指数”）为例，其测评数据并非来自第一手的数据源，而是综合多份调查报告汇总计算。这份指数反映的是部分跨国商界人士、学者及风险分析人员对有关国家公共部门腐败情况的狭隘臆断，更偏重于对主观感知变量的测度。自1995年首次发布该指数，中国就被纳入测评范围。观察历年数据发现，该指数排名一直存在发达国家在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后的“定势”^[23]。面向全球约180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结果长期出现“北高南低”的权重占比，反映出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腐败评级标准的设定往往以美西方国家为范本，导致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对“全球南方”国家的评价充满偏见和不公。这不仅扭曲了真实的腐败现象，更使得国际社会对中国及其他国家作出的反腐败努力缺乏客观理解与认可。

（三）制造偏差，选择性引用数据信源

美西方国家主导的用于评估国际社会对中国形象认知差异和认同程度的数据源，来自同盟阵营发达国家的样本含量偏高。在指标因子框定后，为了确保评估的准确性和全面性，必须对应地搜集基础层级的数据。数据信源的可靠性直接决定能否全面准确地反映所评估的对象或领域。美西方国家固守冷战思维、热衷阵营对抗，在运算指数排名结果时，通过玩弄操控地域覆盖范围的把戏干扰数据质量，回避使用或削弱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数据源。这种“联盟性”在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演进逻辑中尤为凸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以“抱团”形式，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上对中国“发难”，联合其他西方国家在涉疆议题上向中国施压^[24]。此外，在法国益普索调查公司（Ipsos）发布的“国家品牌指数”（Nation Brands Index）中，中国品牌排名长期浮动于被评估国家的中等偏下水平，国家品牌美誉度与营收效益额悬殊。该指数受访者样本来自20个国家，其中发达国家的样本占比超半成，势将导致难以全描中国品牌的全球影响力。美西方国家主导的国家形象评价指数排名在样本源头选取上就已经制造了偏差，使得数据缺乏客观性。引用的信源还常常存在主观感知缺陷、数据加工偏向以及统计审查缺失等漏洞，进一步降低了评估结果的可信度和有效性。

三、危局：美西方指数霸权运作机制

美西方国家以“规则制定者”自居的指数霸凌逻辑，实质是通过构建新型认知战场，将中国发展成就消解为计量统计数字，将社会治理创新异化为政治管控，将人民获得感曲解为权利缺失。其

最终目标不仅在于损毁中国现实的国家形象，更在于瓦解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认同基础，阻滞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建制化进程，妄图维系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权力结构。

（一）丑化中国国家形象

国际指数排名通过“点名羞辱”的方式，直接影响国际社会对某一国家的认同度和好感度。美西方对华污名化框架最直接塑造的是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和情感^[25]。从国家形象的概念层次来看，其作为“整体集合概念”^[26]，包括多元维度，国际指数的分布领域与国家形象的构成维度相互呼应。由美西方国家主导的指数排名，实际上囊括了中国国家形象集合的多个子集。美西方自诩设计的指数排名“数据客观、过程正当、结果公正、价值中立”，实际上却是在“西方中心论”乃至“西方优越论”的隐蔽话语之下操纵“指数运动”。在此背景下，算法被人为操弄，模型被随意臆造，数据被刻意拼凑，这些手段共同构成欺骗和蛊惑国际社会的伎俩，借机煽动“仇华、排华、反华”等负面情绪和谣言，恶化中国的外部发展环境，严重损害了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尤其是在市场开放、经济自由、贸易投资等领域的国际指数排名中，排名结果直接反映了对象国的国际形象声誉，并且标明了落地国的市场潜力，使得指数排名成为外资企业及跨国公司在制定商业决策、分配资源和部署战略时的重要依据。譬如，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发布《2025 经济自由度指数》（2025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评估全球 184 个经济体的经济自由度和市场活力，前 10 名除了新加坡和我国台湾地区外，其余均是来自欧美地区的主要经济体，中国排名第 151 位^[27]。声誉排名及其带来的褒贬好恶，影响了外商来华投资的意向。美西方国家故意降低涉华指数排名，妄图侵蚀中国的可信国家形象，损耗中国的国家公信力、全球市场竞争力和国家品牌的口碑信任度等，更对全球经济的稳定和繁荣产生了潜在的消极影响。

美西方国家通过系统性操纵国际指数排名构建对华污名化认知框架，其本质是以“技术治理”外衣包裹意识形态偏见的话语霸权实践。这种战略攻势呈现三重递进效应。其一，构建认知滤镜。将“西方中心论”价值标准内嵌于指标体系，通过偷换概念（如将西式多党制等同于民主）、扭曲定义（如将网络治理污名为“数字专制”）实施指数话语的政治转译。在数据采集环节设置“双重标准陷阱”，对中国采用实验室条件下的理想化评测模型，对自身问题则采取现实情境下的合理化解释框架。其二，发动符号战争。通过“点名羞辱”策略将复杂的社会治理问题简化为政治定性判断，在经济发展、市场开放等领域刻意压低中国排名，制造所谓“优等生一差等生”的二元对立叙事。符号暴力不仅损毁中国现实国家形象，更通过算法推荐机制放大负面信息，在国际舆论场形成污名化“信息茧房”。其三，实施经济围猎。被操纵的指数排名是跨国资本决策的依据之一，美西方国家通过指数排名在贸易投资、科技创新等领域人为制造“风险警示”效应。“数据殖民”策略削弱中国的国际合作空间，其终极目标是借维护“基于规则的秩序”之名，行维护西方霸权之实。美西方国家以指数霸权为载体的新型认知战，已突破传统舆论战的信息传播维度，深度介入国际规则制定、资源配置决策等战略层面，对塑造中国国家形象构成系统性挑战，亟需构建兼具学术严谨性与传播穿透力的破局话语体系。

（二）弱化中国全球贡献

美西方国家操弄指数排名，贬低中国为全球治理所作的实质性贡献，甚至妄图将中国“包装”成现有国际治理体系的挑战者。与当前热点地区动荡不安、冲突频发以及全球不确定性加剧的局面

相比, 中国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等方面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中国致力于增进政治互信、维护地区和平、加强人文交流, 并为全球治理注入正能量、稳定性和确定性。然而, 美西方国家部分反华势力常常抨击中国, 利用在国际话语权中的先发优势, 将国际指数排名打造成一种行使话语霸权的舆论武器, 通过量化处理和差异排序的方式, 选择性忽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的显著成就。不过, 近年来自欧美战略研究界的一些学者对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给予更为理性和客观的评价。他们指出: “中国崛起不会挑战现有国际秩序, 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实践有助于推进全球治理。”^[28] 欧美战略研究界的中肯观点强调了中国在全球合作与治理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他们呼吁国际社会认可和尊重中国在促进全球发展进程中作出的贡献。

美西方国家通过话语霸权工具化转向, 将全球治理的“指数化”趋势异化为贬低中国贡献的战略工具。这种认知战呈现双重叙事悖论。一方面, 中国以政治稳定性、发展普惠性、治理创新力等硬指标, 持续为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 比如“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发展范式、气候治理“南南合作”机制等, 在地区安全建构、减贫事业发展、反腐倡廉建设等领域形成示范效应。另一方面, 美西方操控的指数评价体系刻意构建“贡献—威胁”二元对立框架, 将中国发展成就解构为“体系挑战”, 通过量化排序制造“治理赤字”伪命题。这种话语策略的实质是“规则制定权”的争夺延伸。美西方国家以“科学主义”包装意识形态偏见, 用“技术治理”掩盖政治打压, 借“指数排名”实施战略误判误导。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叙事与欧美战略界部分基于实证研究的客观评价形成鲜明反差——后者承认中国全球治理实践的制度性贡献, 呼吁破除零和思维框架。制造认知分裂恰恰暴露了美西方话语操弄的矛盾性: 当指数符合其战略需求时, 被包装为“客观标准”; 当反映中国发展现实时, 则被斥为“政治工具”。这种自相矛盾的霸权话语, 恰恰成为中国突破美西方话语围堵的窗口。

(三) 助长对华攻击抹黑

国际指数排名常常被美西方国家的政要、商界人士、专家学者、媒体从业人员等多个话语圈层广泛转引, 成为境外敌对势力发起对华攻击的重要“弹药库”。一方面, 倚仗指数排名树立攻击标靶。在涉华负面指数评估报告“喂黑料”和“作假证”的“佐证刺激”下, 境外敌对势力恶意攻击中国的反腐成效、营商环境、高等教育、科技创新和生态环保等议题, 污蔑中国的国家治理现状, 借此实施渗透和破坏活动。例如, 英国《卫报》炒作“人权衡量倡议”指数报告(The Human Rights Measurement Initiative), 诋毁中国人权事业成就, 诬称“从多项指标来看, 中国是世界上人权记录最差的国家……自 2019 年以来, 香港的全球人权指数排名大幅下滑”^[29]。再如, 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非政府国际组织“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 打着非政府团体的幌子炮制“人权”领域的伪证阴谋。在美国政府开展“人权”外交的背景下, “人权观察”借助西方国家在人权领域的话语霸权, 挟“人权”而令天下, 对世界各国的人权状况进行所谓的观察和评估, 并发布报告, 对他国进行批评和指责^[30]。另一方面, 围绕指数排名构成利益链条。非政府组织发布的国际指数排名, 成为学术界/新闻界等主体开展研究/发布报道的样本依据和数据信源, 继而为美西方维护指数话语霸权提供学理辩护和舆论武器。比如, “自由之家”发布的《世界自由报告》指数排名, 为美国判断其他国家是否为“自由国家”或“民主国家”并制定相应政策提供基本依据^[26]。这种利用国际指数排名攻击抹黑他国的手段, 加剧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误读。

总体而言，美西方国家构建系统性对华攻击链条：一是制造攻击标靶，将中国在反腐成效、营商环境等领域的治理实践污名化为“制度缺陷”。二是构建利益闭环，非政府组织发布的指数排名与学术机构、主流媒体形成共谋关系，使攻击行为获得“科学性”伪装，形成自我强化的霸权话语循环。三是固化认知偏见，被操纵的指数排名通过算法推荐机制在舆论场中病毒式扩散，构建污名化标签。负面标签经多次转引后沉淀为“刻板印象”，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认知长期滞留在“他塑”话语框架中，严重消解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实际贡献。

四、破局：美西方指数霸权纠偏方略

为破解西方指数霸权，中国需要构建根植本土实践的自主评价体系。破解“西强我弱”的话语格局还需要多元主体协同合作，智库牵头研发全球指数并依托国际合作网络供给数据，外宣媒体抢占议程设置权，民间力量以实证叙事对冲偏见，力争重塑国际话语秩序，彰显中国治理自信与全球担当。最后，我国要强化舆情监测，有效批驳涉华虚假负面叙事。

（一）根植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建设中国自主评价体系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深刻影响着国际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随着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各国的利益诉求和发展目标日益多样化，全球治理面临诸多新挑战。中国迎来提升制度性话语权的窗口机遇期，建设中国自主评价体系成为关键举措之一。建设中国自主评价体系的关键在于根植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经验，以中国式现代化元话语作为逻辑演绎的基点。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经济高质量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些都应当在国际指数评价体系中得到充分体现。同时，中国应当争取在全球治理话语体系中获得事先话语权、第一定义权和首要解释权，使中国的声音在国际事务中更加响亮。比如，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取得的重要成果，它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是被实践所证明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31]。又如，聚焦中国特色人权发展道路，中国“克服了西方人权话语体系中‘先人权后发展’的历史局限性，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32]。构建中国自主评价体系要着重阐释中国基于发展的人权路径。中国的人权观不仅重视个人权利的保障，更强调在发展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对传统人权观的重要超越。

构建中国自主评价体系应当立足全球现实之需、回应时代变局之问。中国有必要通过建立符合自身国情的评价体系，回应国际社会对透明性和客观性的要求，系统性地展示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各方面的发展成就与治理成效，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与认同。中国构建的自主评价体系还应该能够成为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关注全球共同发展，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和参考。中国在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等方面的制度性贡献，要以国际指数的形式加以体现。在发布中国自主评价报告成果时，应当争取实现内容的系统性、时序的连贯性和主体的权威性。“建构集体认同是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关键。而集体认同的塑造既需要提出创新观念并获得认可；也要克服排他性的文化封闭主义，兼收各种文化优长；还要反对霸权话语宰制，处理好与西方话语体系的关系，这样才能提高中国话语被各国认同的可能性。”^[33]为此，在概念提出、权重设计和数据引用等流程环节，必须突出国际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跨国

界外溢性等基本属性, 确保其开放、公平和公正。具体而言, 构建指数评价话语体系的过程应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 邀请各国专家和学者共同参与, 确保各方利益和声音得到充分体现, 增强评价体系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促进国际间的理解与合作, 形成良好的国际合作和对话氛围。

(二) 动员多元主体, 积极参与国际指数评价体系建设

我国应当积极参与到现有的国际指数评价体系建设中。在这一过程中, 必须充分调动多元主体的力量, 包括高等院校、智库机构、专家学者和外宣媒体等, 共同参与国际指数评价体系的制定、设计、应用与推广。一是彰显高等院校和智库机构的主体价值, 不仅要自主设计搭建具有世界意义、彰显国际价值和完善全球治理的指数评价体系, 也要与国际知名高校、智库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等建立常态化的合作关系网络, 积极介入构建国际指数评价体系的全流程。二是发挥专家学者的话语作用, 中外籍专家学者的参与能够有效提升中国观点立场的传播范围和理论深度。比如, 既要提升中国籍学者观点的辐射广度, 也要“借嘴说话”“借筒传声”, 增强外籍学者跟进阐释的观点说服力, 借用外籍学者的国际影响力, 帮助传递和解释中国的声音。三是要放大外宣媒体的渠道优势, 提升中国自主评价体系的知名度和话题曝光度, 争取掌握国际议程的框架设定、价值评判和舆论引导的权力。要通过精准有效地触达传播, 引导国际公众正确关注讨论涉华议题, 塑造正面的国际舆论环境。整合高等院校、智库机构、专家学者和外宣媒体等多元主体的力量, 可以在国际指数评价体系的构建与推广中形成合力, 提升国际话语权。

(三) 强化舆情监测, 有效批驳涉华虚假负面叙事

当前美西方国家假借所谓“国际通用”的指数排名来抹黑攻击中国的领域更趋多元化、手段更具隐蔽性, 不仅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传统话题领域, 还扩展到科技、网络、教育、环境保护等新兴热点话题。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 我们要主动出击, 加强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发声能力, 占据国际涉华舆论制高点, 掌握国际涉华舆论主导权^[34]。首先, 组织专业力量, 系统梳理和整合国际指数评价体系的相关信息, 包括发布主体的背景、涉华内容的具体表现、传播路径以及影响范围等, 建立“指数黑榜”预警机制, 搭建聚焦国际涉华指数排名的大数据舆情监测数据库。数据库可以存储和分析各种国际指数的动态变化, 实时监测相关非政府组织的活动, 特别是持续发布涉华指数排名的机构。其次, 建立非政府组织的重点监看名单, 动态盯防其发布涉华指数排名报告的鼓噪动向, 及时捕捉涉华动向动态, 抢占舆情变化的制导先机。追踪和溯源反华势力助推涉华指数跨境扩散的传播链条和勾连网络, 揭示其背后的深层次利益关系。最后, 要密切关注国际舆论场对涉华指数排名的响应程度和立场倾向。通过对舆论反应的跟踪与分析, 识别在国际舆论关系网络中占据核心圈层和主导地位的观点声音, 调整传播策略, 及时就地“消毒”, 提升舆论引导效力。

基于上述舆情数据和信息支持, 开展精准化的分析研判, 制定适时策略, 有力驳斥抹黑中国的谣言和不实信息。在舆论揭批工作中, 要特别关注非政府组织捏造指数排名的资金来源、幕后推手、利益输送、暗史劣迹等问题, 揭示美西方国家干预他国国家治理的“双标”本质和险恶用心。这有利于使国际社会重新审视西方指数体系的可信度。此外, 还应该注重集纳和呈现国际社会人士对中国国家治理水平的积极评价, 展示中国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的显著成就。总而言之, 面对美西方国家利用国际指数排名抹黑中国的现状, 我国必须采取多层次、多角度的应对策略, 备好“工具箱”, 打好“组合拳”。通过系统研究、数据监测、舆论引导等手段, 构建强有力的反制体系, 有效捍卫

国家形象与利益，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中国的自信与担当。

五、结语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演进，构成当代国际秩序变革的核心议题。在全球治理视域下，立足话语评价视角加快提升与我国综合国力相匹配的话语权已经成为重中之重^[35]。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须创新治理范式展现时代担当，这既包含参与全球规则制定与标准重构，更体现在构建具有本体论的自主评价体系。破解美西方制度性话语霸权，需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评价范式：将全过程人民民主、脱贫攻坚、生态治理、数字普惠等中国式现代化经验转化为可量化的评价指标；创新多元主体协同机制，在共建“一带一路”、“南南合作”等国际议题中探索发展评价新标准；打造“监测—证伪—对冲”反制闭环，针对西方指数报告的认知战特点实施精准解构。此外，我们还要意识到构建自主评价体系绝非单纯的技术工具革新，更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战略支点。通过创新治理评估维度、重构发展评价标尺、建立话语反制机制，中国能够有效突破西方指数霸权，推动建立更加多元包容的国际指数评价体系，为国际秩序转型和世界格局转变注入制度性变革动能。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继续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 [N]. 人民日报, 2024-11-20 (1).
- [2] 王明国. 全球治理转型与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提升 [J]. 当代世界, 2017 (2): 60-63.
- [3] 陈伟光, 王燕. 全球经济治理与制度性话语权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22-23.
- [4] 马荣久. 中国提升地区制度性话语权的途径探析 [J].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3): 90-96.
- [5] 张发林. 国际制度性权力的生成及其实践 [J]. 太平洋学报, 2022 (11): 1-11.
- [6] 蒋力啸. 论全球治理实践中的指数应用与构建 [J]. 国际论坛, 2017 (2): 16-21+79.
- [7] 陈雪莲. 全球治理评估制度性话语权研究——以世界银行“全球公共部门指数”项目为例 [J]. 新视野, 2020 (1): 123-128.
- [8] 阚道远. 西方话语霸权建构的新动向及其政治影响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8 (1): 87-91.
- [9] 赵春丽, 王鲁娜. 西方学界开展意识形态领域话语权争夺的做法及应对 [J]. 科学社会主义, 2019 (4): 149-154.
- [10] 李强. 中国国际话语权: 演进逻辑、构建维度与现实挑战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0 (2): 24-32.
- [11] 相德宝, 杨月清.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国际涉华舆论斗争的新形势与新特点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2): 101-108.
- [12] 贾文山, 王婧雯. 我国国际制度性话语权的现状与构建路径 [J]. 国际新闻界, 2017 (12): 6-21.
- [13] 赵永华, 王睿路. 制度性话语权视角下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 [J]. 对外传播, 2021 (3): 17-21.
- [14] 高奇琦. 制度性话语权与指数评估学 [J]. 探索, 2016 (1): 145-148.
- [15] 周帅, 刘洪钟. 后起国如何制衡金融霸权——基于国际金融权力指数构建的新探索 [J]. 欧洲研究, 2017 (6): 1-22+100.

陈奇. 制度性话语权视角下西方指数霸权祛魅与中国自主评价体系建设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3): 148-157.

- [16] 肖群鹰, 刘慧君. 智库全球性指数产品的政治蕴涵——以核威胁倡议的 NTI/NSI 为例 [J]. 智库理论与实践, 2021 (5): 125-133.
- [17] 孟涛. 法治指数的建构逻辑: 世界法治指数分析及其借鉴 [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5 (1): 121-129.
- [18] 吴雷, 姜飞. 建构与解构: “西方”概念祛魅与中国国际传播话语重塑 [J]. 南京社会科学, 2022 (10): 105-117.
- [19] 范勇鹏. 建设中国话语首当颠覆西方概念体系 [J]. 东方学刊, 2022 (4): 58-70+119-120.
- [20] 郑亮. 涉疆人权议题国际传播: 现状分析与应对策略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1 (4): 93-101.
- [21] 刘小燕, 崔远航. 话语霸权: 美国“互联网自由”治理理念的“普适化”推广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9 (5): 5-20+126.
- [22] 杜欢. 自由的指数与不自由的偏误——对《世界自由报告》的批判性透视 [J]. 国外理论动态, 2018 (7): 31-41.
- [23] 【深度】“透明国际”排名掩盖中国之治 [EB/OL]. (2021-01-29) [2025-02-14]. <https://3w.huanqiu.com/a/de583b/41i1Rxfqd0W?Agt>.
- [24] 靳晓哲. 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演进逻辑与中国应对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1 (2): 78-88.
- [25] 龚静阳. 美西方对华污名化框架下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 梳理与应对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6): 129-146.
- [26] 陈奇. 图像社交媒体中城市国际形象建构策略——以照片墙账号@hellochengdu 为例 [J]. 南方传媒研究, 2022 (5): 69-73.
- [27]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2025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EB/OL]. (2025-03-03) [2025-03-20]. https://static.heritage.org/index/pdf/2025/2025_indexofeconomicfreedom.pdf.
- [28] 冯存万. 规则挑战还是体系建设? ——中国全球治理观的欧美学界认知与解析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4): 120-128.
- [29] The Guardian. China is state most dangerous to its own citizens' civil rights, report finds [EB/OL]. (2023-06-21) [2025-02-14].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3/jun/21/china-is-state-most-dangerous-to-its-own-citizens-civil-rights-report-finds>.
- [30] 柳华文. 论加强中国在人权领域的公共外交 [J]. 人权, 2015 (4): 53-72.
- [31] 刘远亮. 全过程人民民主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机理探赜 [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4): 52-62.
- [32] 汪习根, 张倩倩. 论当代中国人权观的理论体系构建 [J]. 人权, 2024 (5): 1-20.
- [33] 俞新天. 集体认同: 增强国际话语权的关键 [J]. 国际展望, 2016 (3): 1-16+142.
- [34] 史澎海. 冷战后期美国对苏联的认知战及其当代启示 [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5 (1): 251-265+307.
- [35] 郭德钦, 朱少云. 全球治理视域下提升中国话语权研究——话语权比较与评价视角分析 [J].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5): 92-102.

责任编辑: 龚静阳 校对: 王京菁



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四重逻辑

李丹 李龙龙

(厦门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是深化周边友好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任务, 具有丰富的内在逻辑。从历史逻辑来看, 睦邻友好传统、和平共处原则、区域一体化建设, 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古今一脉相承的理念、共识和愿景。从理论逻辑来看,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使命、全球化区域化的转型重构、周边战略博弈的严峻态势, 突出了周边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局中的优先作用和核心位置。从实践逻辑来看, 设施互联、经贸互通、安全互信等方面的丰富合作成果, 彰显了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现实成效。从情感逻辑来看, 长期人文交流、文化合作、文明互鉴形成的共同记忆、共识身份、共享情感, 铸就了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深情厚意。四重逻辑科学揭示了周边命运共同体“为什么要建设”“为什么能建成”以及“什么是重点、首要、关键”的预设前提。在四重逻辑的共同作用下, 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必然、理论应然、实践实然、情感使然更加清晰, 意义和价值更加重要, 必将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 周边命运共同体; 亚洲价值观; 周边外交; “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5) 03-0158-12

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 发展繁荣之基。2025年4月, 中央周边工作会议深刻指出, “周边

DOI: 10.13946/j.cnki.jcqi.2025.03.013

作者简介: 李丹,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李龙龙,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金砖合作对构建‘一带一路’文化交流机制的推动作用研究”(20CKS065)

引用格式: 李丹, 李龙龙. 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四重逻辑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3): 158-169.

是实现发展繁荣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点、运筹外交全局的首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中国“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建设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为共同愿景，以睦邻、安邻、富邻、亲诚惠容、命运与共为理念方针，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为基本遵循，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要平台，以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为战略支撑，携手周边国家共创美好未来”^[1]。在国际形势日趋复杂的当下，中央召开周边工作会议，强调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了正能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自2013年10月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周边命运共同体”论断以来，学术界对其进行了跟踪研究，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学者们分析了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提出背景与概念创新^[2-3]，论证其理论内涵与外在挑战^[4-5]，从政治、经济、安全、外交、人文等方面总结探讨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路径和实践成就^[6-7]，阐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范式创新及其对中国式现代化和边疆治理的时代意义^[8]。但多数研究侧重于阐释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是什么”“怎么办”的问题，较少涉及这些阐述的预设前提“为什么”的问题。在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召开之际，本文审视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必然性、时代必要性、现实紧迫性，全面提炼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逻辑，以期揭示周边命运共同体“为什么要建设”“为什么能建成”以及“为什么是重点、首要、关键”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情感逻辑。

一、历史逻辑：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是传统友好关系的时代升华

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有着深厚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渊源。亲仁善邻、讲信修睦、协和万邦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内含着中华民族内和外顺、天下大同的处世智慧。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一如既往扎根周边、睦邻周边，重视周边外交，大力推进与周边国家在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积累了宝贵的周边外交经验，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奠定了良好基础。

（一）睦邻友好传统奠定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渊源

中国自古主张“德不孤必有邻”“远亲不如近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曾高度概括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和平性是其中重要方面，这是造就“四海宾服”“国泰民安”“万邦协和”盛世气象的政治基础。汉代张骞的“凿空之旅”，是中国古代睦邻周边的典范。通过两次出使西域，张骞遍访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等西域诸国，掌握安息、条枝、身毒、奄蔡和乌孙等国的基本情况，促进中国与中亚、西亚国家的交流互鉴。张骞第二次出使归来之后，汉武帝又接连派出了数十个使团造访西域，一时间长安城里“使者相望于道”。唐朝与居住在中亚的昭武九姓粟特国家保持着常态化的外交与经贸关系，官方往来频繁，经济互通有无，长安成为世界第一国际化大都市，陆上丝路发展达到了巅峰。在千年前的撒马尔罕阿芙拉西亚卜康国宫城遗址壁画上，同时出现过唐高宗李治、天后武则天、康国国王拂呼纥、西突厥可汗乙毗射匮、萨珊波斯国王雅兹德德三世的画像，这是各国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唐朝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彰显了泱泱大国的恢弘气度。鉴真六次东渡日本弘法传教，成为中日友好关系史上的佳话。玄奘法师西行取经，促进了中国与南亚的文化交流。王玄策四次出使天竺开拓了西藏至天竺的南方丝绸之路。明太祖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将朝鲜、日本、越南等十五个“不为中国患”的

周边国家列为“绝不伐之”的“不征之国”。作为世界航海史上的创举，郑和下西洋传播了和平交往理念，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之间的文明交流。明清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构建了一种以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为核心的“封贡国际体系”，维系了东亚地区数百年的总体和平。在中国古人看来，“君欲从事于天下诸侯，则亲邻国”，邻国之间是“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的关系，亲近善待邻国，坚持“以德服邻”是建立王道霸业的基础。“国之亡也，邻国有焉”，轻视欺侮邻国，则会使国家陷入危机。

（二）和平共处原则彰显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共识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的周边外交环境复杂而凶险。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迅速与周边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朝鲜、蒙古、越南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对于属于资本主义阵营的邻国，中国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民间外交活动，推动双方关系发展。例如，中日两国之间的交往遵循“以民为主，政府配合”的原则，通过贸易投资、人才交流、文化团体演出等途径推进民间交往，逐渐推进政治接触，助力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的进程。对于那些新兴民族国家邻居，中国依据“三个世界”理论，将其视为反帝国主义反霸权主义斗争中可以团结的对象，努力与其发展关系，以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外交孤立。面对缅甸、巴基斯坦、菲律宾等邻国对新中国的疑虑，中国政府通过邀请一些国家领导人和民间团体访华等方式，传递睦邻友好信号，逐渐消除他们的疑虑和误解。随着周边国家对华交往与了解的增加，中国与周边国家迎来了两次建交高潮。1949至1965年间，中国与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斯里兰卡、柬埔寨、老挝建立外交关系，并通过友好谈判协商，与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等邻国成功解决了边境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先后被纳入中印、中缅联合声明。在三国共同倡导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确立为指导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1972至1974年间，中国又和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孟加拉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经过这两次建交浪潮，中国与周边19个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有效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拓宽了周边外交舞台，奠定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平共处的大好局面。

（三）区域一体化夯实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制度平台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开辟了新篇章，与苏联、越南、蒙古、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与朝鲜、柬埔寨、泰国、缅甸、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国家的友好关系进一步强化，与日本共同确定了“和平友好、平等互利、互相信赖、长期稳定”的双边关系四原则。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周边国家增多，周边外交迎来提质增量新阶段。中国与新加坡、文莱、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韩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至此，除不丹之外，中国与所有周边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为我国积极参与周边区域一体化进程创造了良好条件。1991年7月，外交部长钱其琛出席第二十四届东盟外长会议开幕式，标志着中国开始成为东盟的磋商伙伴。同年11月，中国正式加入亚太经合组织。1992年1月，在中国积极倡导和参与下，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正式成立。1992年，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正式成立。1996年4月，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在上海共同发起了五国会晤机制。在此基础上，上海合作组织于2001年6月正式建立。1999年11月，中日韩三方会议机制开始形成。2000年11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贸区。2002年11月，

中国同东盟 10 国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正式启动建立自贸区进程。2003 年 10 月，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成为首个明确表示支持东盟一体化进程的主要大国之一。2010 年 1 月 1 日，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建成。随着实力增强、身份蜕变，中国在推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领航角色，在亚太经合组织中致力于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和经济技术合作，对促进开放的地区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实践都为新时代共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奠定了经济基础和制度平台。

二、理论逻辑：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是加强区域合作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受到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新冠疫情、大国博弈等多重因素的交叠影响，全球主义向区域主义和国家主义回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亚太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心与重点，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意义日益凸显，成为后危机时代中国与周边国家携手应对全球挑战、共同促进地区繁荣的现实需要。

（一）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是应对世界变局的中国睦邻之道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彰显新时代中国应对全球问题的大国担当。在经济贸易层面，近年来全球增长放缓，生产率增速下降，贸易和投资萎缩，加上新冠疫情、地缘冲突、保护主义的影响，经济全球化遭遇重挫。2022 年 5 月，美国又推出了具有强烈排他性、封闭性色彩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其本质就是“美国优先”战略在印太经济合作领域的具体表现，目的在于搞“脱钩断链”“小院高墙”，企图形成一个排除中国的“新经济宗藩体系”。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借助金融霸权实施大规模对俄制裁，严重阻碍了国际贸易的正常流动，破坏全球经济秩序的稳定根基，导致全球地缘经济四分五裂。尤其是特朗普再度出任美国总统后，发起了全面的对外关税战，从对加拿大、墨西哥的直接打击到威胁欧洲，再到对几乎所有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对中国征收高额关税的行径，标志着美国彻底抛弃世界自由贸易理念，企图重回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愈演愈烈的贸易战与报复性关税，将逆全球化思潮转化为政府行为，将美国一国的政策扩展为连锁反应，引发周边国家对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国际秩序的担忧和焦虑。这也导致部分经济实力弱、对美国依赖性强的邻国迫于压力向美国单边主义妥协，部分国家则在骑墙观望局势，从而使周边经济合作面临着新的不确定性。鉴于此，中国领导人不断在全球亲自倡导、带头传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提供中国方案，为面临分裂的世界凝聚合作共赢的最大公约数，“开创了解决人类社会共同挑战的新路径，旨在更大程度实现全人类社会的合作共赢”^[9]。周边命运共同体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组成部分，其理念价值在于通过与周边国家深化合作、共担风险、共享利益，实现共同安全、发展与繁荣。这是新形势下以多边主义合作、睦邻安邻富邻方案抵制“美国优先”、以邻为壑的必要之举。

（二）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契合区域化趋势增强的现实

经济全球化屡遭波折，由全球化向区域化回退是当前全球产业分工的调整方向。从新冠疫情期间的经济交流深受影响，到俄乌冲突后的人为打压，再到特朗普 2.0 时期的处心积虑，经济全球化面临“彻底终结”抑或“暂时后退”的风险^[10]。疫情催生的全球化“熔断”效应迫使部分国家“主

动或被动地选择一种‘条形化’的全球供应链与产业链，或者采取区域一体化模式的‘块型的全球化’，以规避各种潜藏‘熔断点’的全球化风险”^[11]。俄乌冲突导致的金融、技术、粮食、能源“武器化”趋势和全球产业链安全化重构趋势难以避免。“各国建立贸易‘防火墙’和产业‘隔离带’的需求急剧上升，被动‘脱钩’和主动‘筑墙’的尝试或更加频繁。”^[12]特朗普政府向全球滥施关税的冲击波，更无异于向全球贸易体系投下了一颗“核弹”，严重破坏了经济全球化理念和秩序。全球范围内的各种分裂、分化、分歧、分割、分野，使经济全球化向区域化方向收缩后退的趋势日益明显。有的专家认为，“地球村”的黄金时代正在终结，全球化的逻辑正在被“区域化”和“伙伴圈”所取代，“不同区域联盟之间，贸易壁垒和政治分歧会越来越明显，跨区域合作的难度将显著提升”^[13]。在特朗普2.0时期，美国极有可能把战略焦点转向亚太地区，在中国周边地区掀起新的地缘政治风暴。在美对华关税大棒、出口限制、投资打压、金融胁迫、科技制裁的广度和强度全面提升的情况下，中国与周边国家经贸关系压舱石的作用更加重要。只有做好周边工作，优化周边环境，才能稳住外交“基本盘”，才能在中美战略博弈中保有回旋空间。

（三）构建周边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第一步

从中国外交的重点布局看，周边地区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行起步区。习近平总书记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阐述始于周边，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部署也起始于周边。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就选择了周边邻国俄罗斯。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他第一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要概念。4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强调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应该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正确方向，坚持同舟共济，推动亚洲和世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14]这标志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入中国周边外交活动议程。9月7日，习近平主席访问中亚邻国哈萨克斯坦时提出：“我们要全面加强务实合作，将政治关系优势、地缘毗邻优势、经济互补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优势、持续增长优势，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14] 289}在这次讲话中，他还第一次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演讲中指出：“中方高度重视印尼在东盟的地位和影响，愿同印尼和其他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使双方成为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双方和本地区人民带来更多福祉。”^{[14] 292}他还首倡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概念，表示“中国愿通过扩大同东盟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同东盟国家共享机遇、共迎挑战，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14] 293}。此后，在巴厘岛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将命运共同体的外延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扩展到“亚太命运共同体”大周边层次，指出：“我们要牢固树立亚太命运共同体意识，以自身发展带动他人发展，以协调联动最大限度发挥各自优势，传导正能量，形成各经济体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格局。”^{[14] 350}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1949年以来的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提出了“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的时代命题。他强调，“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努力使周边同我国政治关系更加友好、经济纽带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联系更加紧密”^{[14] 292}。2014年11月，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切实抓好周边外交工作，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

安邻、富邻, 深化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和互联互通。”^[15] 2015年11月, 习近平主席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演讲时强调: “中国始终将周边置于外交全局的首要位置, 视促进周边和平、稳定、发展为己任。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 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都是从周边先行起步。”^[1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由周边到大周边或泛周边(亚太、亚洲、亚欧)最终走向全球的过程。周边国家和地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始发之地、重点之地、关键之地、示范之地, 也是决定兴衰成败之地”^[17]。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成功实践和鲜活经验, 能够为新型全球化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基石和试验田。

三、实践逻辑: 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具备深厚的现实基础

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探索。中蒙俄经济走廊、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尼印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 以及正在建设中的以中日韩为中心的东北亚经济走廊, 从陆上将中国与周边联结成了利益共同体。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域也在周边, 与周边国家构成了紧密的海洋合作网络。中国与周边国家在设施联通、贸易畅通、战略互信等领域的合作可圈可点, 为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奠定了深厚的现实基础。

(一) 设施联通: 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血脉经络

“如果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 那么互联互通就是两只翅膀的血脉经络。”^{[15] 497} 基础设施联通是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纽带桥梁, 是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骨架支撑。“发展实体经济, 重点是制造业, 前提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没有基础设施, 很难保障制造业健康发展; 没有互联互通, 融入全球化也无从谈起。”^[18] 中国周边邻国众多, 各国政治体制、资源禀赋、意识形态、历史文化迥异, 时空发展的巨大差异性十分显著。但是, 基础设施匮乏成为阻碍周边各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中国式现代化的一条成功经验就是修路致富, 中国深知积极推进与周边地区设施联通的重要性, 不遗余力地帮助周边国家打通发展堵点。东盟地区是中国开展周边互联互通的重点区域。中国开通了150多条联通东盟国家的班轮航线, 实现了中国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的全覆盖。已建成通车的中老铁路未来将向南延伸, 与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境内的铁路相互贯通, 通过中新铁路连接中欧班列(昆明)。2024年12月, 中国和越南“关于跨境标轨铁路合作项目的政府间协议”正式签署, 相关项目有望于2025年底动工, 泛亚铁路的宏伟构想渐行渐近。日本、韩国、中国华东和东北、俄罗斯远东地区是全球港口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 各主要港口之间航线相互覆盖。俄罗斯、中国、蒙古、朝鲜、韩国都是铁路合作组织(OSJD)的成员国。西伯利亚大陆桥连接中俄, 辐射日韩, 形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陆地集装箱运输通道。在“一带一路”建设驱动下, 以满洲里为枢纽的“中蒙国际贸易通道”, 包括“滨海1号”“滨海2号”、跨黑龙江公路铁路大桥、中俄欧班列在内的“中俄陆海联运国际交通走廊”, 以图们、珲春为中心的“中朝交通走廊”, 以及中国珲春—俄罗斯扎鲁比诺—韩国束草—日本新潟“四国陆海联运航线”等国际化通道已经初具雏形。在中亚方向, 双方初步建立起了涵盖铁路、公路、航空、油气管道的立体化基础设施联通网

络。中欧班列西安中心开通了 17 条通向中亚的铁路干线。中吉乌公路、中塔公路以及已经开工建设的中吉乌铁路，打开了中亚通往太平洋的大门。在南亚方向，中国通过远东—东南亚航线与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临海国家实现了海路联通。中国与南亚国家主要港口均可以实现货物双清关。中巴友谊公路联通卡拉奇和瓜达尔港两个重要港口，与巴基斯坦公路网相互联通，为中国从西部进入印度洋提供了便捷通道。便捷高效的基础设施联通网络有利于推动中国与周边大市场深度融合，促进人、财、物要素的自由顺畅流动，塑造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互惠机制。中国式现代化高速发展成果可以更快地惠及周边，周边地区丰富的自然与社会资源也能够为中国发展提供强大助力。

（二）经贸合作：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利益基础

经济贸易往来有助于为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夯实利益基础。经济利益是国家利益的最基本内容，经济联系是影响国际合作的关键因素。密切的经贸合作有利于强化共同利益认知，构建相互信任机制，使国际合作从经济领域外溢拓展至文化、政治和安全等各个领域，为命运共同体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密切程度和贸易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彼此难以替代的“互为必须”特征愈发显著。除不丹、尼泊尔、文莱、阿富汗、老挝等少数国家外，中国是所有周边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2024 年，中国与亚洲周边国家贸易总额为 1.89 万亿美元，占中国与全球贸易的近三分之一，在中国 10 大出口市场和 10 大进口来源地中，亚洲周边国家各占 5 席和 4 席^[19]。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建利益共同体的典范。2013 年以来，中国与东盟贸易额年均增长 7.5%。2024 年，双边贸易总值 6.99 万亿元人民币，占中国外贸总值的 15.9%，双方连续 5 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中国连续 16 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20]。RCEP 正式生效后，中国东盟中间品贸易占比进一步上升，中国与东盟之间更加紧密、更具韧性的产供应链关系已经形成。2024 年 10 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实质性结束了 3.0 版升级谈判，将自由贸易范围从传统的货物与投资合作，拓展到了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等新兴领域。在东北亚方向，中国是蒙古国、俄罗斯、朝鲜、韩国、日本等五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草原之路”合作对接共建中蒙俄经济走廊，大图们倡议不断走深走实，中日韩泛黄海经济技术交流合作成效突出。2025 年 3 月，在第 11 次中日韩外长会议期间，三国达成了“重启自贸协定谈判”的共识，为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擘画了光明前景。在中亚方向，中国是中亚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主要投资来源国，双方贸易额从建交初期的 4.6 亿美元增加至 2024 年的 948.2 亿美元。截至 2024 年下半年，中国对中亚直接投资存量超过 170 亿美元，累计完成工程承包营业额超过 600 亿美元^[21]。在南亚，中国与南亚国家贸易额从 2013 年的不足千亿美元，增长到了 2023 年的 2 000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过 8%^[22]。中国与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马尔代夫等国已是连续多年的最大贸易伙伴。密切的经济往来是形成相互依赖的必要条件，相互依赖是命运与共的初级阶段，命运共同体是相互依赖的最高形态。通过经贸合作厚植利益因子，是通向周边命运共同体宏伟目标的重要支撑。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成就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实践为中国与周边各国共享发展成果创造了更多更大机遇。

（三）政治互信：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安全保障

政治安全互信为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保驾护航, 增添抗险能力。中国周边安全环境错综复杂, 世界主要军事大国和有核国家集聚于此, 俄乌战争、阿以冲突、朝核问题、印巴争端等全球热点问题此起彼伏, 区域内安全困境螺旋上升, 各种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中国与周边国家面临着共同的安全挑战, 各国在区域安全治理的实践中, 不断增进战略互信和安危与共意识, 为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构筑了安全保障。中国和东盟在 1997 年就建立起了“面向 21 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进入 21 世纪以来, 中国先后成为第一个签订《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对话伙伴、第一个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第一个表示愿意签署《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的国家、第一个明确表态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中中心地位的国家。在系列合作框架下, 中国与东盟及其成员国建立起了类型多样的伙伴关系网络, 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就是多年来双方制度化合作的累积叠加。在中亚方向, 中国于 2020 年倡导建立中国—中亚机制。2022 年 6 月, 第三次中国—中亚外长会晤期间, 各方一致同意建立中国—中亚元首峰会晤机制。2023 年 5 月, 六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中国—中亚峰会西安宣言》, 并于 2024 年 3 月建立了常设秘书处, 标志着中国—中亚机制正式升级定型。在南亚方向, 囿于中印两国的复杂关系, 中国与南亚传统安全合作略显不足, 但在反恐打恐、跨国犯罪、公共卫生、防灾减灾、跨境河流治理、海洋治理等非传统安全领域, 仍然有较好的合作基础。依托上合组织成熟的地区反恐机制, 各国合作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执行委员会, 为地区反恐合作奠定了国际制度基础。中国始终坚持周边睦邻友好政策, 大力倡导周边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理念, 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普遍安全观, 向周边国家表明中国维护地区和平发展安全稳定的决心与愿景。《新时代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展望》指出: “中国愿同周边邻国长期友好, 求同存异, 聚同化异, 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 共同维护地区持久和平。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 中国永远不称霸, 永远不搞扩张。”^[23] 中国致力于打造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 与周边国家协同推进区域安全治理, 构建责任分担、红利共享的安全共同体。这些积极友好信号在周边国家的影响力和认同度日益提升, 为各国走出安全困境、走向安全共同体创造了良好条件。

四、情感逻辑：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拥有坚实的心灵契约

情感逻辑是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重要的底层逻辑。命运共同体的最本质特征, 就是成员之间的共生感和归属感。相互毗邻的地理位置, 相亲相近的文化传统, 频繁密切的文明、文化、人文交流, 有效拉近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情感距离。情感层面的共享共鸣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塑造集体身份的关键要素, 身份认同是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最终归宿。

(一) 文化传统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情感基础

共同体是一种以情感和传统所激发的“我们—感觉”(we-feeling)为基础, 酝酿深化而成的拥有共同身份认同的社会关系。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基础“除了共同的地域、血缘、宗教、文化、目标等‘共同性’之外, 还需要情感联结”^[24]。共同情感是促进个体对集体身份认同的关键因素。积极的情感共鸣可以激励个体协调一致维护集体利益, 减少“搭便车”现象, 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 从而转化为共同体构建的情感冲动。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国际合作和区域一体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以实现全人类“共治共享”为目标，超越了狭隘的“利己”观，实现了“利己”“利他”“利集体”的有机统一，彰显了极大的情感感召力。但凡关注人类未来命运的人，都会逐渐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形成观念共同体^[25]。中国与周边国家在情感共享方面，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现实基础。“义利之辨”的儒家伦理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集体价值观，“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观，已深深融入东北亚各国共同的文化内核。涵盖整个南亚次大陆的“喜马拉雅文明圈”自古就与“中华文化圈”相映生辉。大米文化、小麦文化、棉布文化、丝绸文化是两大文明圈共有的文化要素^[26]。“中国太极和印度瑜伽、中国中医和印度阿育吠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两国人民数千年来奉行的生活哲理深度相似。”^[27]中国和巴基斯坦也有类似的世界观与价值观——“都崇尚向善友爱、包容互鉴、和谐共生”^[28]。中华文明与中亚文明交往历史悠久、情谊深厚。佛教、伊斯兰教与基督教都是经由中亚传入中国，与中国本土的儒道文化相互交融，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多元包容的信仰体系。时至今日，中国与中亚国家“都将文明的和谐共存作为发展目标，在坚持文明多元化和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积极推动人类各大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冲突论’，反对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形成开放、包容、平等、共赢的文明交流氛围”^[29]。亚洲价值观融合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融合”等核心要素，将成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根脉和价值纽带。

（二）身份认同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标识

情感共鸣触发的集体身份认同是共同体构建的重要载体。“群体成员身份是集体身份建构的核心变量，在群体身份认同的建构进程中，群体情感因素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30]在国际关系领域，积极有效的情感赋能有助于推动共有观念在各国之间的扩散传播。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共有观念是塑造国家行为体身份的最核心因素，身份认同直接框定国家处理对外关系的行为选择。在维护共同利益、应对共同威胁、追求共同发展的进程中，国家行为体之间会逐渐对彼此的利益观、价值观、发展观、区域观、全球观产生相互理解包容的认知和认同。随着“熟悉感”的强化和“陌生感”的弱化，国家之间的相互认同即“我们感”（we-ness）也会由此增强。这种认同感经过长期酝酿发酵，就会逐渐萌生出“我们是一体”（We Are One）的集体身份意识。在此过程中，“我们”和“他们”之间的界限就会逐渐模糊消解，“自我”和“他者”将会共享同一身份。拥有共同身份认同的个体就会倾向于把“他者”的利益也视为自己利益的一部分，其对外行为自然具有“利他性”。从地区合作实践来看，“集体认同是一体化的关键变量，缺乏认同的一体化只能算暂时合作，不能算形成了共同体”^[31]。卡赞斯坦等学者在对比欧洲与东亚区域合作时也明确提出：“国际多边合作除了要有共同利益之外，还需要强烈的集体认同感。”^[32]丝绸之路是中国与周边各国共同的历史记忆遗产。东南亚自古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各国在两千多年的互学互鉴中，衍生出了别具一格的“海丝文化集体记忆”。中亚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敦煌是中国与中亚国家千年友好交往的缩影和典范。蜀身毒道、茶马古道是中国与南亚国家友好交往的历史名片。“一带一路”是古代丝绸之路精神的传承与弘扬，丝路集体认同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拉近了心理距离，为超越多元主体之间利益纠葛并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现实路径。

（三）人文交流是实现情感共享和身份认同的有效路径

人文交流是编织周边命运共同体网络的经纬。马克斯·韦伯在对社会行为进行分类时，区分了

目的一工具合理性行为、价值合理性行为、情感行为和传统行为等四种行为模式^[33]。人文交流互动更多的是一种情感行为^[34]，是实现个体之间情感共享的主要路径。中国周边各国文化多样，既有受中国影响的汉字文化圈，也有伊斯兰文明、佛教文明、东正教文明彼此交相辉映。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演化而绵延不断、历久弥新，正是得益于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和而不同”文明发展与共存观念。以文化人、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彰显中国这一古老文明的大国风范。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进一步加强了人文交流和社会互动，不断强化民众在文化层面的相互理解与认同。培育澜湄意识是中国与东盟通过人文交流促进情感共享的典型案列。在 2017 年 12 月举办的澜湄合作第三次外长会议上，各方明确倡议要共同努力提升六国民众的“澜湄意识”。培育“澜湄意识”就是要以澜沧江—湄公河这条“天然彩练”为枢纽，通过人文交流培育和塑造“平等相待、真诚互助、亲如一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随着集体身份和文化认同的构建与强化，中国与澜湄国家合作的主要动力源从外部驱动转化为内在需求，不断拉紧构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纽带。高等教育一体化是促进青年人文交流的有效渠道。在 2009 年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期间，三国共同提出了“亚洲校园”（CAMPUS Asia）构想，服务东亚共同体建设。“亚洲校园”主要针对的是三国高校中的知识青年和有影响力的年轻学者，他们之间的深入交流有助于拓展和深化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民意基础。“久而久之，会有更多的青年对中日韩三国有包容的理解，逐渐形成独特的东北亚社群意识。”^[35]2016 年，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联合开发了“万里茶道”国际旅游线路和特色旅游产品，成为增强中俄蒙走廊人文交流的一个重要亮点。中国与中亚国家在丝路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合作也有异曲同工之妙。2014 年，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共同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球首例跨国合作申遗成功的项目。这条长达 5 000 公里的文化线路涵盖了 33 处遗址，是中国与中亚国家共享丝绸之路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佛教在中国—南亚人文交往中发挥着特殊作用，是双方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平台。2014 年，由中国政府出资创办，印度、中国、斯里兰卡等 18 个国家的学者共同管理运营的新那烂陀佛教大学正式开始招生，为亚洲佛学文化的国际交流合作提供了新平台。这些共同的文化对塑造亚洲价值观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以人文交流合作走出一条超越经济利益、民族种族、文化差异的文明之路，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进入了近代以来最好的时期，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截至 2024 年底，中国与周边 25 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与 17 国及两个地区达成了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共识，在中南半岛和中亚地区形成了周边命运共同体“两大集群”，实现在双边和多边层面上的“全覆盖”。“三大全球倡议”在周边国家先行先试，中国的地区治理理念和方案在周边国家深入人心。在经济全球化退缩、地缘政治回归、大国博弈加剧、贸易冲突升级的背景下，周边国家在我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平衡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畅通国内国际双向循环中的角色作用愈发凸显，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大大提升。中国应当继续将自身发展置于周边共同发展的大棋局之中，通过自身现代化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着力改善周边环境，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和周边国家共同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不断结出硕果。

参考文献:

- [1] 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李强主持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会议 [N]. 人民日报, 2025-04-10 (1).
- [2] 刘卿. 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理论创新与实践 [J]. 国际问题研究, 2022 (2): 1-19+153.
- [3] 王健. 中国周边形势新变化与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 [J]. 国际展望, 2022 (1): 23-37+157-158.
- [4] 夏立平, 钟琦. 全球和合共生系统理论与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 [J]. 国际展望, 2022 (1): 38-53+158-159.
- [5] 方长平, 周方银, 卢光盛, 等. 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成就 [J]. 国际论坛, 2023 (6) 3-35+155-156.
- [6] 许利平, 王俊生, 屈彩云, 等. 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 构建与路径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55-75.
- [7] 许利平. 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理论、现实与人文交流的路径探索 [J].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 15-29+222-223.
- [8] 孔金磊. 从周边地区主义到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周边地区合作的新范式与新路径 [J]. 国际论坛, 2024 (3): 3-22+155.
- [9] 曾向红, 田嘉乐.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的构建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2): 129-137.
- [10] Adam S. Posen. The End of Globalization? What Russia's War in Ukraine Means for the World Economy [EB/OL]. (2022-03-17) [2025-03-24].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world/2022-03-17/end-globalization>.
- [11] 刘贞晔. 全球化“熔断”及其历史大转折 [J]. 国际政治研究, 2020 (3): 138-146.
- [12] 赵隆. 俄乌冲突中的大国博弈及对未来世界格局的影响 [J]. 国际展望, 2022 (3): 56-78+158-159.
- [13] 刘栋, 陈志武. 全球自贸体系崩溃全球化谢幕, 区域性联盟将成主流 [EB/OL]. (2025-04-11) [2025-04-13].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0613697?commTag=true.
- [1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330.
- [1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2 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444.
- [16] 习近平. 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276.
- [17] 石源华. 中国周边学与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 [J]. 世界知识, 2020 (4): 72.
- [18] 李丹. “一带一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探索 [J]. 南开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 (1): 136-145.
- [19] 赵忠秀. 中国与亚洲周边国家经贸合作全面深入、稳中有进 [EB/OL]. (2025-02-11) [2025-04-13]. <https://www.chinanews.com.cn/cj/2025/02-11/10367024.shtml>.
- [20] 蓝庆新, 翟崑, 张中元. 深化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合作 [N]. 经济日报, 2025-04-04 (7).
- [21] 汪金国. 中国与中亚经贸合作的现状与未来展望 [J]. 人民论坛, 2024 (19): 76-80.
- [22] 邱海峰. 中国同南亚国家经贸往来势头好 [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4-07-10 (3).
- [23] 新时代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展望 [N]. 人民日报, 2023-10-25 (6).
- [24] 韦红, 马赞菲. 论灾难外交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情感建设 [J]. 社会主义研究, 2021 (2): 163-172.
- [25] 王清涛.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情感赋义 [J].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 2019 (4): 49-54.
- [26] 谭中. 探索中国“家园主”文明国的诞生与成长——兼论喜马拉雅文明圈 [J]. 亚非研究, 2015 (8):

李丹, 李龙龙. 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四重逻辑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3): 158-169.

175-189.

- [27] 习近平. 携手追寻民族复兴之梦——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的演讲 (2014年9月18日, 新德里) [N]. 人民日报, 2014-09-19 (3).
- [28] 习近平. 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 开辟合作共赢新征程——在巴基斯坦议会的演讲 (2015年4月21日, 伊斯兰堡) [N]. 人民日报, 2015-04-22 (2).
- [29] 曾向红, 王子寒. “三大倡议”与新时期中国的中亚外交 [J]. 国际展望, 2024 (1): 75-96+160.
- [30] 聂文娟. 群体情感与集体身份认同的构建 [J]. 外交评论, 2011 (4): 83-95.
- [31] Alexander Wendt.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 [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4 (2): 384-396.
- [32] Christopher Hemmer, Peter J. Katzenstein. Why is There No NATO in Asia? Collective Identity, Region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Multilateralism [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02 (3): 575-607.
- [33] 马克斯·韦伯. 经济与社会: 上卷 [M]. 林荣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56.
- [34] 王晓玲. “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与人文交流思路的转换 [J]. 现代国际关系, 2015 (5): 48-55.
- [35] 董亮, 缪高意. 中日韩青年人文教育合作: 以“亚洲校园”项目为例 [J]. 当代韩国, 2020 (4): 74-90.

责任编辑: 林华山 校对: 卢媛



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 历史成就、实践智慧与现实启示

蒋永强 张青兰

（华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摘要：周边是我国实现发展繁荣的重要基础，也是运筹外交全局的首要。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加强与周边国家的优势互补和情感联系，实现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共同发展，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当前，随着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深入推进，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周边经济贸易日益繁荣，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周边环境明显改善，文明互鉴、开放包容的周边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周边经济共同体、安全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建设取得了重要成就。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蕴含着和合共生的系统智慧、求同存异的大局智慧、共同繁荣的发展智慧，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和文明理念在新时代的周边外交工作中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重视周边外交，坚持以相互尊重为前提、以公平正义为准则、以对话协商为抓手，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迈上新台阶。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周边外交；亚洲价值观；中华文明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5）03-0170-11

DOI：10.13946/j.cnki.jcqiis.2025.03.014

作者简介：蒋永强，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张青兰，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华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培育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文明建设研究”（ZDPY2301）；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技术封建主义‘文明观’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研究”（2025KYLX001）

引用格式：蒋永强，张青兰. 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成就、实践智慧与现实启示 [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3）：170-180.

一、问题的提出

周边是我国安身立命之所, 发展繁荣之基。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既让中国从周边国家的共同繁荣和发展中获得裨益与助力, 也使周边国家从中国的发展中受益, 是新时代中国周边战略的重要目标。当前, 不同民族和国家彼此孤立、隔绝的状态早已被现代化的世界历史和全球化的普遍趋势所打破,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自我封闭中实现发展。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既有共同的生态和人文环境, 也有共同的发展方式和发展目标。因此, 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 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不仅是必然的, 而且是可行的, 这已然成为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并基于中国的周边外交推动其实现了从理念到行动、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演进。2013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1], 紧接着又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2], 为中国的周边外交提供了理论指引和行动指南。2018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 “要做好周边外交工作, 推动周边环境更加友好、更加有利。”^[3] 2022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坚持亲诚惠容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 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4] 2023年, 《新时代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展望》强调要“努力使中国同周边政治关系更加友好、经济纽带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联系更加紧密, 深入推进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5]。2025年4月8日至9日, 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会议指出: “周边是实现发展繁荣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点、运筹外交全局的首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 强调中国“要以全球视野审视周边, 增强做好周边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6]。4月14日至18日, 习近平主席本年度首次出访就落笔周边, 对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 深刻彰显了中国对周边外交的重视和中国的睦邻之道。从中国自身与周边国家共同利益的视角出发来思考问题和制定行动方案, 推动形成新型周边国际关系和新型周边国际秩序, 既是中国携手邻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出发点, 也是为周边各国合作共赢、发展进步提供战略支撑的坚实基础。

当前, 学术界基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视角对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进行了系统研究,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时代背景看, 刘卿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周边外交理论创新的外部环境, 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周边外交理论创新的内生动力”^[7]。从理论内涵看, 王健将周边命运共同体概括为利益、安全、文化三大共同体, 并分析了各共同体的建设现状^[8]; 孔金磊认为“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沿袭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核心要义, 更以中国的周边地区为绝对地理核心, 进一步明确了理论的适用范围, 强调整体而非个体、突出平等而非强弱、寻求‘普适’而非‘普世’”^[9]。从现实挑战与实践路径看, 许利平认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面临着意识薄弱和紧密度欠缺的双重深层次难题”, 主张“建立周边国家人文交流统筹机制, 多渠道深化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 推进国际传播、提升国际话语权”^[10]; 颜欣认为“‘邻里’矛盾和分歧、大国竞争和博弈、周边内生性因素及周边机制拥堵在不同程度上对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造成一定阻碍”, 主张“完善和健全周边基础性秩序与制度体系、多措并举搭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长效机制、在周边时空结构中注重周边构造的过程建构及加强周边命运共同体知识生产”^[11]。李宇婧、王战从中印共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研究视

角出发，认为“双方在经贸、安全及人文交流上存在贸易保护主义、边界争议、安全战略分歧和认知差异等问题”，主张“依托‘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及‘全球文明倡议’，通过政策协同、务实合作及人文交流等策略，共同推进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12]。学术界对于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研究大多立足“理论阐释—现状审视—路径选择”的逻辑，侧重于实践层面，但是对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成就、现实经验的研究不够丰富，较少专门从和合共生、求同存异、共同繁荣的视角出发，系统研究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智慧和现实启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美国对华遏制战略和周边环境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仍然存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仍然要高度重视并着力解决这些问题，加大力度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因此，深入研究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成就，总结蕴含其中的实践智慧和现实启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成就

新时代以来，中国高度重视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动和交流合作，将周边外交置于外交全局的首要位置，积极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在经济、安全、文化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一）经济共同体维度：周边经济贸易日益繁荣

经过长期发展，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纽带更为密切，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周边经济贸易日益繁荣，周边经济共同体建设取得了重要成就。中国和周边国家的经济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一方的发展离不开另一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一带一路”倡议为重要平台，将周边国家作为首要合作伙伴，加大投资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把中国与周边国家串联起来，整体性推进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构建了联系密切的经济共同体。一方面，“中国高度重视周边地区的铁路、公路、航空、港口、电力和电信建设，完善陆、海、天、网‘四位一体’复合型互联互通格局”^[13]，推动周边多项“一带一路”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成完工。中老铁路、雅万高铁顺利通车、中巴经济走廊默拉直流输电项目正式送电、中吉乌铁路项目正式启动、中蒙俄经济走廊等项目建设稳步推进等，为促进周边各国的经济贸易奠定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随着各项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推进，中国大力支持货物、资本、服务在周边国家自由流动，与周边国家的经贸活动更加密切和深入，周边多边合作机制和区域合作组织逐步落地，如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澜湄合作”等都得到了深入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和周边国家的经济贸易。当前，在中国 10 大出口市场和 10 大进口来源地中，亚洲周边国家各占 5 席和 4 席^[14]。除了不丹、文莱、老挝、阿富汗、尼泊尔等少数几个国家外，中国已经成为其他周边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与周边国家的贸易总额占中国与全球贸易总额的近三分之一^[15]。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合作持续扩大，经济共同体建设取得显著成就。中印经贸数据显示，2023 年中印进出口贸易总额达 1 362.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其中，中国对印出口 1 176.8 亿美元，同比增长 0.8%^[16]。昆明海关数据显示，2025 年第一季度，我国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物 150.8 万吨、货值 41.9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9.2%、17.5%。南宁海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两个月，我国经友谊关口岸对东盟国家进出口货值 722.3 亿元，同比增长 11.1%^[17]。从历时性的角度看，自 1991 年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以

来, 双边货物贸易额从 79.6 亿美元增长到 6 846 亿美元, 累计双向投资额超过 3 100 亿美元^[18], 东盟已然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点地区。除此之外, 中国还与周边国家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展开深度合作, 积极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推进, 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深度发展, 经济关联度越来越高, 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的经济交往已经成为构建经济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的压舱石。

(二) 安全共同体维度: 周边安全环境逐渐夯实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在周边安全事务上主动担当作为, 为解决周边地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提供了诸多方案, 营造了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周边环境, 推动周边安全共同体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从逻辑上看, 共同安全是周边国家各自安全的基础和前提。只有不遗余力地维护共同安全, 各个国家自身的安全才能有所保障。当前, 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呈现“东升西降”的趋势。一方面,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呈现健康稳定的发展态势; 另一方面, 冷战思维回潮、保护主义横行、安全治理问题、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等也严重威胁着周边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面对和平与动荡并存、安全与危险同在的国际局势,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不仅得到了周边国家的认同, 还被写入了中国与俄罗斯、柬埔寨、越南、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老挝、蒙古国和中亚五国的政府联合声明中, 成为各国解决周边安全问题的行动指南。2025 年 4 月, 中央周边工作会议提出的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 为进一步维护亚洲安全明确了实践遵循和推进路径, 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支撑。在维护周边安全的具体实践中, 中国始终“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安全观, 以相互尊重各国领土主权作为解决问题的原则和出发点”^[19], 主张周边各国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主权纠纷, 积极应对各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挑战, 推动着周边秩序乃至全球秩序向普遍安全转变, 使得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续安全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特别是针对跨国性、联动性、多样性的安全问题, 中国坚持从周边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出发, 积极寻求维护共同安全和解决矛盾冲突的契合点。如在朝鲜半岛问题上, 中国先后提出“双暂停”倡议与“双轨并进”思路, 提供了一个现实可行、合情合理、客观公正的解决方案, 有力地推动了朝美历史性首脑会晤。在阿富汗问题上, 中国不仅任命特使, 还相继出台了《屯溪倡议》《关于阿富汗问题的中国立场》等文件, 积极帮助阿富汗开展重建工作。在应对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进程中, 中国与周边国家积极开展合作与磋商, 加强多方交流与联合打击力度, 推动了周边区域的安全治理。中国对周边安全问题的高度重视与积极作为, 极大地推动了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周边环境建设, 不仅为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安全稳定的有利环境, 也为促进周边地区的和平、发展与繁荣作出了贡献。

(三) 文化共同体维度: 周边人文交流不断发展

中国与周边国家有着共同的边界、生态和相通的人文、礼仪。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 中国与周边国家以相通的文化为基础, 相继成立了一系列人文交流合作机制, 推动构建周边文化共同体, 畅通了文明互鉴、开放包容的周边人文交流渠道。从逻辑上看, 随着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人文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与者更加多样化, 这是今后周边人文交流发展的必然趋势”^[20]。从结果上看,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各种人文交流活动促进了文化交往和文化互鉴, 推动周边文化共同体

建设取得重要成就。其一，中华文化对周边国家传播效果显著。截至 2023 年年底，中国在全球已建立孔子学院 496 所、孔子课堂 757 所^[21]，其中韩国、日本、中亚五国等周边地区占比显著。韩国首尔孔子学院作为海外首所孔子学院，成为中韩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柬埔寨孔子学院积极推行“中文+职业教育”的模式，加固了中柬之间沟通、合作的语言桥梁。现如今，以孔子学院为主要载体推动中华文化传播已在周边地区取得显著成就。其二，中国和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活动日益密切。中俄、中哈、中印等互办“文化年”“旅游年”，如在 2023 年中亚峰会上，中国与中亚五国联合举办文化遗产展，展示丝绸之路历史文物。中日韩共同推动“东亚文化之都”项目，通过戏剧、影视作品深化了中日韩人民的文化交往。中国和柬埔寨、蒙古国、乌兹别克斯坦、尼泊尔、缅甸、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积极开展文物古迹保护和修复，与多国合作举办文物进出境展览，密切了与周边各国的文化交流。其三，中国和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机制不断建立和完善。经过长期的努力和实践，中俄教文卫体合作委员会、中国—印尼人文交流机制、中哈合作委员会文化和人文合作分委会、中土政府间合作委员会人文合作分委会等人文交流机制纷纷成立并不断完善，为周边各国文化交流提供了保障。“中国对与周边国家人文交流的重视以及交流现状，显示出中国与周边国家地缘相近、文缘相似、血缘相亲的独特优势”^[22]。随着周边经济贸易的不断扩大，中国与周边各国的文化交往也日益繁荣，周边文化命运共同体的根基越来越牢固。

三、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智慧

面对复杂深刻的国际局势和周边环境，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既不是权宜之计，也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为了实现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共赢式发展所提出的中国理念、中国方案，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做好周边工作和推动周边外交的必要性、重要性所做出的科学决策，蕴含着深刻的实践智慧。

（一）和合共生的系统智慧

中国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蕴含着和合共生的系统智慧。中国与周边国家不是彼此孤立、毫无联系的，而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共同发展的关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周边外交的持续推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相互依存性正在加强，周边系统呈现出共生共存共荣的图景。作为周边系统的共生体，中国和其他国家具有不可分割性和紧密联系性。这意味着，任何一个国家都必然置身于周边系统之中，必将同其他国家发生联系，通过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都不可能通过孤立、退群的方式来维护自身利益、实现自身发展。为了进一步规避、协调、解决矛盾和冲突，推动周边各国的共同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积极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坚持以和谐共处、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方式实现共同体内各个国家的和谐共处，推动周边各国合作共赢，彰显了和合共生的系统智慧。

世界大同，和合共生，中国和周边国家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相互依存关系。坚持和合共生理念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基础和价值支撑。以和合共生为实践遵循，追求的是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和谐相处，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与民族品格，是我国为推动周边各国和谐共处、共同发展提出来的新思路和新方案。从实践逻辑看，坚持以和合共生的理念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强调要实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和谐共生与相互融合，倡导共同体内各国和衷共济，共同应

对各方挑战, 携手创造美好生活, 使中国周边系统中“偏利共生的要素在上升, 偏害共生的要素在下降”^[23], 最终使共识、利益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不利影响、消极因素的范围进一步缩小, 兼顾各方利益, 实现整体发展。

（二）求同存异的大局智慧

中国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蕴含着求同存异的大局智慧。对于中国和周边国家而言, 有异无同不可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有同无异不必要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本质上是一个求同存异的过程。国家作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组成元素, 在维护国际秩序、构建国际关系的进程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当然, 在这个共同体内部, 所有国家并不是绝对同一的, 而是各有其特殊性。一方面, 周边各国的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发展程度、语言风俗习惯等不同。这不仅使得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信仰等方面存在差异, 还使得不同国家在思维方式、交往方式、交往行为、实践活动等方面存在差别。另一方面, 在国际交往中, 国家利益是影响国际关系、决定国家对外政策与行动的根本原因, 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会因为维护本国利益而同周边其他国家产生矛盾和分歧。如何在经济联系密切但利益矛盾仍然存在的现实背景下实现周边国家的和谐相处、通力合作、共同发展, 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对于此, 中国提出并倡导和而不同的理念和求同存异的方针。针对国情差异, 中国主张各国要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尊重差异、理解差异、接受差异, 营造不同国家和谐相处的氛围和环境; 针对矛盾和分歧, 中国主张各国要抛开分歧、搁置争议, 为了共同利益而加强合作, 并允许保留不同意见, 从而实现周边各国共同的利益, 推动各国共同的发展。坚持求同存异为周边国家解决利益矛盾和分歧提供了客观公正、科学合理的方法和思路, 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周边外交中的实践智慧。实际上, 中国和周边国家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 在现实国情、国家利益等方面并不是完全相同的, 这个共同体本身“包含着差异和对立, 是多样性的有机统一”^[24]。中国周边既有人口大国、社会主义国家、以伊斯兰教为主要信仰的国家, 又有小国、非社会主义国家、以佛教或基督教为主要信仰的国家。因此, 只有坚持全局视野, 坚持求同存异, 努力将具有不同社会制度、发展程度、语言文化、生活习俗的国家全部纳入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范围内, 在周边各国发展中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 努力维护好实现好各国的共同利益, 才能凝聚周边国家的共识和合力, 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实效。

（三）共同繁荣的发展智慧

中国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蕴含着共同繁荣的发展智慧。百年来, 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行为体经常在“零和游戏”中博弈, 进一步加剧了不同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与之相反, 今天的国际社会更希望拥有一个和平稳定、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世界。这一点同样也是中国周边关系行为体的希冀与期待。发展既是中国的首要任务, 也是周边国家和世界各国的共同命运和重要任务。能否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实现自身发展、维护本国利益, 是周边国家能否真正参与到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关键动因。正是基于这一点, 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 实现周边各国的繁荣和发展是推动周边外交的重要动力, 也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支撑。特别是周边贫困地区工业基础设施较为薄弱, 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较为突出, 人民生活水平不高。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进程中, 需要将贫困地区发展和周边政策统一起来, 促进优惠政策向贫困地区倾斜, 进一

步缩小周边各国的发展差距，进而实现周边国家的整体发展、共同发展。但同时也要注意，周边命运共同体内各个国家的发展绝不能秉持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而是要立足全局，具有普遍发展、共同发展的天下情怀和大同理念。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建成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好、守护好周边各国的共同家园。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既不为了谋求势力范围，也不是为了形成利益圈子，而是为了实现周边各国共同的发展。长期以来，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进程中始终关注周边其他国家，既愿意帮助、支持其他国家的发展，也愿意把自身的发展成果同周边国家一起分享，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避免周边贫富差距越来越大。2014年8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蒙古国时指出：“中国愿意为包括蒙古国在内的周边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正所谓‘独行快，众行远’。”^[25]2015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演讲时强调：“中国愿意把自身发展同周边国家发展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欢迎周边国家搭乘中国发展‘快车’、‘便车’，让中国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周边，让大家一起过上好日子。”^[26]2023年6月，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正式将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列入第三章，表明我国周边外交理念和方针已从伦理道德要求上升为国家法律规范，充分体现了中国坚持自身发展与共同发展协调推进、相互促进的实践智慧。对于周边关系和周边国家的发展，中国一如既往地坚持着互惠互利、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原则，始终主张以合作共赢超越零和博弈，这是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智慧和实践遵循。

四、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启示

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社会历史性实践，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周边各国协同参与、久久为功。新时代新征程，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求我国必须重视周边外交，坚持以相互尊重为前提、以公平正义为准则、以对话协商为抓手，携手邻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共创美好未来。

（一）坚持以相互尊重为前提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相互尊重是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基本要求，也是我国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经验和现实启示。从逻辑上讲，相互尊重是主权国家与其他国家进行交往交流的前提条件，也是能否在国际交往中构建真正的共同体，推动各国勠力同心、协同发展的关键所在。古往今来，没有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会在不被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对外交流，也没有任何一个互相合作、彼此帮助、科学民主的国际关系会在被侵犯、胁迫、威压下构建。只有给予对方作为主权国家应有的尊重和重视，才能得到对方的认可和接纳，促进彼此之间的交往。因此，对于中国而言，在推动周边外交的进程中，必须要建立一种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坚持主权平等的原则，夯实相互尊重的基础，以尊重带动地区交流与合作，从而促进我国和周边国家的共同发展，谱写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首先，各国在处理周边关系时要充分尊重彼此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当然，这种尊重并不

是表面的礼仪, 而是既要真正尊重周边各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旗帜鲜明地反对干涉别国内政, 反对输出本国模式, 反对将自己的发展建立在牺牲他国正当利益之上的行为, 同时又要真正理解并接纳不同国家的发展状况, 满足其现实需求, 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国家间平等的交流与合作。其次, 相互尊重还体现在对不同国家历史文化、生活习俗的尊重和认同上。对于中国而言, 周边国家众多, 即使其历史文化具有不少相通的部分, 但各个国家的历史背景和传统文化也不可能完全一样, 必然具有各自的特殊性。因此, 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 要坚持相互尊重、理解和包容, 促进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 增强周边区域各个国家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再次, 充分尊重其他国家与其人民的自主选择, 反对将本国意志粗暴地强加于他国的霸权行为。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不是要在发展层面实现模式化的同一, 而是要充分尊重周边各国发展的独立选择权和自主选择权, 坚决反对将自己的发展模式强加于人。最后, 必须要坚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 在平等协商、互利共赢的前提下推动周边关系稳定发展。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方针作为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要求和遵循, 对于周边其他国家之间的交往同样适用, 既是周边各国民主交往、平等交往的科学理念, 也是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行动指南。

(二) 坚持以公平正义为准则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公平正义是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保障, 只有坚持公平正义, 才能真正构建起新型国际关系和周边命运共同体。当今时代, 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意味着周边各国要形成稳定和谐的合作关系, 构建一个相互信任、相互依赖、共同发展的命运共同体。这要求周边各国要和平共处、加强合作、协调一致, 共同应对困难和挑战, 努力解决周边争端和冲突, 推动经济互联互通, 实现周边所有国家的共同繁荣。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必须要将公平正义作为国家交往的基本准则, 推崇平等和公正, 竭力消除各种不对等的邻里关系。特朗普 2.0 时期, 美国加征关税政策使全球经济秩序遭到了严重冲击, 极大地损害了公平正义的国际贸易原则和其他国家的合法权益。面对这一局面, 我们既要坚决维护自身利益, 又要坚持国际公平正义, 切实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从实践逻辑看, 坚持公平正义, 一方面要求坚持周边国家一律平等, 这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原则和行动规范。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 且其周边各国大小、贫富、强弱各不相同, 具有较大的发展差异性, 既有发达经济体, 也有新兴经济体, 还有许多不发达国家。这要求各个国家在寻求对外交往、发展周边关系时必须坚持一视同仁, 充分落实周边各国主权平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并以此为基础与周边国家凝聚共识、互帮互济, 寻求维护周边共同利益的发展方式和治理方案。另一方面, 必须坚持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平等地享有发展权利, 推动各个国家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这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和实践指向。发展是周边国家乃至世界各国的普遍追求, 在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 周边各国不论大小、强弱、贫富, 都平等地享有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机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世界上所有国家、所有民族都应该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和权利”^[27], 就深刻彰显了坚持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为此, 我们必须直面贫富差距、发展鸿沟等重大现实问题, 在平等的基础上加强国际合作与联动发展, 既把自己发展好, 也帮助其他国家发展好, 形成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让构建周

边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在各国的通力合作、共同发展中越来越牢固。

（三）坚持以对话协商为抓手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对话协商是解决矛盾和冲突的重要方式，对于周边国家管控分歧、实现友好合作至关重要，是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有力抓手。在中国周边系统中，总是存在着利益共生与矛盾共生的双重逻辑，矛盾和冲突是普遍存在、不可避免的。面对矛盾和冲突，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的交流思路是通过武力强制、以暴制暴的方式来解决，最后必然会导致冲突的加剧和国际关系的恶化。与之相反，中国一贯主张通过对话和协商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2024 年 12 月 18 日，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 23 次会晤在北京举行，双方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进行了建设性沟通和实质性讨论，在划界谈判、边境管控、机制建设、跨境交流合作等方面达成了重要共识。2025 年 3 月 25 日，中印举行了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 33 次会议，双方就 2024 年 12 月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 23 次会晤中达成的共识进行了全面深入的交流并交换意见，力求为最终解决边界问题奠定基础、积累条件。坚持对话和协商已然成为中国解决矛盾分歧，维护周边稳定的重要遵循。从结果看，“目前中国已通过友好协商同 14 个陆地邻国中的 12 个国家彻底解决了陆地边界问题”^[28]，充分彰显了对话协商对于解决周边矛盾、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驱动作用。

坚持以对话协商为抓手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需要做好三方面工作。第一，在出现矛盾、争端和分歧时，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来解决争端，要确保各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展开对话和交流。平等是对话协商的前提，也是对话协商能够取得成效的重要保障。因此，必须坚持将国际法作为解决争端的准则，以法治为保障推动周边各个国家之间的平等对话与协商，确保各国无论大小、强弱，在面对国际争端时都能够自由、平等地表达自身的意愿和诉求。这既是凝聚各国共识、促进争端解决的有力抓手，也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方式和实践指向。第二，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为对话协商提供平台和途径。要建立或深化多边对话机制和论坛，如东盟、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为周边国家提供一个定期交流与协商的平台，帮助各国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或普遍存在的争端进行对话协商。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进程中，联合国可通过搭建多边对话平台推动地区国家深化安全互信与发展协作，同时依托国际法框架调解领土争议、促进跨境经济合作，为区域稳定注入制度性保障。中国可借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机制，将全球发展倡议与周边国家需求对接，通过联合基建、减贫等项目强化利益纽带，形成以规则为基础、发展为导向的周边治理新模式。第三，提高政策透明度，定期举办周边高层或专家会议，加强各国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的交流与沟通，确保各方对周边其他国家的立场和政策有充分了解，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导致误解和冲突。

五、结语

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国和周边国家利益共享、责任共担、风险共承，促进了周边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发展。然而，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不可能一蹴而就，必将要经历一个循序渐进的漫长过程。特别是当前大国竞争和政治博弈常常会扩大周边利益分歧和负面效应，使周边国家面临两难立场，导致周边国家“集体行动”的碎片化，对构建周边命运共同

蒋永强, 张青兰. 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成就、实践智慧与现实启示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3): 170-180.

体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 中国需要不断对周边环境进行优化改善和升级加固, 与周边国家通力合作, 竭力规避西方国家的干扰和限制, 积极剔除阻碍周边国家经贸活动、人文交流的观念性、机制性、传导性和功能性障碍, 在经济共同体、安全共同体、文化共同体日见规模的基础上实现中国与周边国家良好关系的塑造和强化, 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155.
- [2] 习近平. 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201.
- [3]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179.
- [4]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61.
- [5] 新时代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展望 [N]. 人民日报, 2023-10-25 (6).
- [6] 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李强主持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会议 [N]. 人民日报, 2025-04-10 (1).
- [7] 刘卿. 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理论创新与实践 [J]. 国际问题研究, 2022 (2): 1-19+153.
- [8] 王健. 以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周边命运共同体 [J]. 当代世界, 2025 (2): 28-33.
- [9] 孔金磊. 从周边地区主义到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周边地区合作的新范式与新路径 [J]. 国际论坛, 2024 (3): 3-22+155.
- [10] 许利平. 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理论、现实与人文交流的路径探索 [J].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 15-29+222-223.
- [11] 颜欣. 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逻辑、挑战与路径——以中国和东盟合作为例 [J]. 理论月刊, 2023 (6): 25-33.
- [12] 李宇婧, 王战. 中印共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现状、挑战与路径 [J]. 南亚研究季刊, 2025 (1): 34-53+157.
- [13] 谢伏瞻. 引领区域经济合作新实践 深入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J]. 当代世界, 2022 (4): 4-9.
- [14] 赵忠秀. 亚洲国家应携手共进 坚定不移以开放促合作 [EB/OL]. (2025-02-11) [2025-04-17]. <https://www.chinanews.com.cn/cj/2025/02-11/10367024.shtml>.
- [15] 李丹, 李龙龙. 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四重逻辑 [J/OL].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3): 1-11 [2025-04-15].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0.1215.C.20250415.1714.002.html>.
- [16] 2023年1—12月中国与亚洲国家 (地区) 贸易统计 [EB/OL]. (2024-03-04) [2025-04-17]. https://yzs.mofcom.gov.cn/yzjmh/zhsj/art/2024/art_a4d58f407476406db8e6830945f41590.html.
- [17] 罗珊珊. 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 构建高水平互联互通网络——携手周边国家共创美好未来 [N]. 人民日报, 2025-04-13 (1).
- [18] 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 周年之际关于进一步提升经贸合作水平的联合声明 [EB/OL]. (2021-10-28) [2025-04-17]. https://bn.mofcom.gov.cn/cms_files/oldfile//bn/202110/20211028145736912.pdf.
- [19] 罗圣荣. 全球安全倡议与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 [J]. 当代世界, 2024 (4): 36-41.
- [20] 王晓玲. “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与人文交流思路的转换 [J]. 现代国际关系, 2015 (5): 48-55.

- [21] 马箭飞. 不平凡的 20 年（孔院二十年）[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4-09-06（11）.
- [22] 王俊生. 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进展、启示与深化路径[J]. 国际问题研究, 2024（6）：1-17+127.
- [23] 夏立平, 钟琦. 全球和合共生系统理论与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J]. 国际展望, 2022（1）：38-53+158-159.
- [24] 严文波. 中国传统“和合”理念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J]. 红旗文稿, 2020（16）：45-47.
- [25]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 1 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171.
- [26] 习近平. 深化合作伙伴关系 共建亚洲美好家园——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演讲（2015 年 11 月 7 日）[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5：6.
- [2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22：425.
- [28] 邢广程. 习近平外交思想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J]. 当代世界, 2021（8）：10-15.

责任编辑：王京菁 校对：龚静阳



中国—中亚外交中的民心相通实践与成效

——兼论对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启示

曾向红 安凯欣

(兰州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 民心相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社会根基,也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所在。在当前周边格局与世界变局深度交织的背景下,中亚作为中国的重要邻国以及主要大国博弈的核心区域,正逐渐成为影响中国外交格局的关键力量。过去30余年间,中国与中亚国家通过深化教育、旅游、科技领域的合作建筑起民心交融的桥梁,民心相通工作在教育、旅游和涉华舆论改善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成果。中国与中亚国家在民心相通方面的实践成效能为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启示,包括中国应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推进周边外交,多管齐下协同推进民心相通工作及用精准细腻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等。当民心相通工作能够稳妥推进并取得实效,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定能行稳致远。

关键词: 周边命运共同体; 周边外交; “一带一路”; 中亚地区; 民心相通; 大国博弈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2025)03-0181-14

民心相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和底层基础。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5.03.015

作者简介: 曾向红,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兰州大学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教授;安凯欣,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3VXJ03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战略发展专项)“一带一路”建设专项项目“俄乌冲突以来中亚地区形势的变化与中国的中亚政策研究”(2024jbkyzx003)

引用格式: 曾向红,安凯欣.中国—中亚外交中的民心相通实践与成效——兼论对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启示[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3):181-194.

中国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民心相通工作取得较大进展。学界也围绕这一议题展开诸多有益的探讨,挖掘并丰富民心相通的理论内涵^[1-3],归纳民心相通工作的实践^[4-6],并尝试对民心相通工作的成效进行评估^[7-8]。整体而言,已有研究多聚焦于阐述民心相通“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而对于如何推进、实现民心相通,即“怎么办”的问题关注较少。在此背景下,重点考察中国与中亚国家民心相通工作所取得的成效,在此基础上探讨其能为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提供何种启发具有较高研究价值。

事实上,中国与中亚国家不仅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周边命运共同体方面达成广泛共识,还在推动民心相通方面取得丰硕的成果。如民心相通指数显示,中亚国家与中国的民心相通程度在所有周边区域中位居第二^[9-10];不仅如此,中国与中亚国家在教育、旅游、涉华舆论等关键领域上同样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在大国博弈升级与周边安全形势日趋复杂的背景下,如何通过民心相通推进周边命运共同体顺利构建,成为当前中国周边外交工作中一个重要问题。基于此,本文通过聚焦中国—中亚外交中的民心相通实践,系统梳理相关重点举措与合作成效,以期探讨对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启示。

一、中国周边外交中的民心相通

习近平主席 2013 年 9 月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以及包括民心相通在内的“五通”构想。2015 年 3 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三部委通过《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首次以文件的形式确立民心相通的重要地位和具体范畴。

(一) 民心相通体现民本思想在国际层面的“两创”

民心相通作为中国周边外交的核心理念,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在国际层面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 2 000 多年前的中华传统民本思想。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等论断,强调了“民”在国家构建中的基础性地位。历代思想家中无论是孔子的“富之教之”,柳宗元的“吏为民役”,朱熹的“新民”思想,王阳明的“亲民”思想,抑或顾炎武的“厚民生,强国势”,均不同程度地阐释了民本思想。传统民本思想强调“民”的本体性,倡导重视和爱护民众,然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君主专制统治,因此存在历史局限性。中国共产党立足于时代发展,对传统民本思想进行了吸收、扬弃,尝试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与超越。这种转化体现在多个层面,诸如从“天下为公”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从“立君为民,政在养民”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从“圣人政治”到“全过程人民民主”,从“以德治国”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11]。在国际层面,中国同样秉持并发展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不过在具体的语境中更多强调的是“人”这一属性,即国际社会交往中去政治化的人^[12],而非具备一定政治认知能力并能够表达政治态度的公民群体或人民。

(二) 民心相通赋能中国周边外交实践

民心相通既依托政治、经济、安全等其他外交要素,又可对之赋能,协同促进中国周边外交发展。民心相通的实现有赖于中国与周边国家政治互信的提升、经济合作的深化以及安全环境的稳定。

这些要素为民众间的交流互动提供了制度保障、利益驱动与安全环境, 是民心相通得以发展的关键前提。与之相应, 民心相通通过促进跨文化交流, 能够有效提升民众对双边及多边合作议题的认同度与参与意愿, 为周边外交活动拓展更广泛的社会基础, 赢得更坚实的民意支持, 形成对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赋能。以中国与东盟国家为例, 一方面, 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国家层面的日益紧密的政治互动 (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中国—东盟中心、中国—东盟外长会等) 和经济联系 (东盟自 2020 年起连续 4 年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 直接促进了人员往来和经贸活动, 为增进民众间的相互了解提供了重要契机, 构成了民心相通的重要依托和基础。例如, 2024 年的调查显示, 首次有超过半数 (50.5%) 的东南亚受访者认为中国是其优先战略伙伴^[13]。另一方面, 积极的民意基础反过来也以润物无声的方式为深化国家间合作提供有利条件。2025 年 4 月 14 日至 18 日, 习近平主席应邀对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三国进行国事访问, 推动数字经济、绿色转型、产能合作与互联互通等领域的上百项合作成果, 这些成果的最终成效落实有赖于中国与相关国家之间稳固的民心相通基础。

(三) 民心相通成效受外部环境变化和目标国家认知的双重制约

从外部结构性因素来看, 国际秩序变迁及其带来的结构性压力深刻塑造着国家间的互动模式。作为中小型的周边国家, 其外交战略往往面临三种选择, 如追随、平衡或自主, 但无论采取何种策略, 都难以完全摆脱国际体系结构性力量的影响。具体而言, 以欧亚地区为例, 存在由全球、地区、国家三个层面形成的“套娃模式”。其中, 第一层是俄美双方在全球层面上的竞争和合作; 第二层是俄美双方在地区层面所展开的复杂竞合关系; 第三层则是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在国家层面形成的关系模式^[14]。就中国周边安全环境而言, 美国、日本和俄罗斯是主要的外部影响因素^[15]。从具体的目标国家来看, 中国与部分周边国家之间在特定议题上的分歧对民心相通构成另一重制约。例如, 关于朝核问题的不同立场, 以及在部分东南亚及中亚国家中存在的不良论调等, 不仅加剧了区域内的信息不对称和舆论复杂性, 也直接或间接阻碍了民心相通取得有效进展。

(四) 民心相通是衡量中国周边外交成效的重要指标

习近平主席指出: “关系亲不亲, 关键在民心。”^[16] 民心相通是衡量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亲疏远近的关键性指标。近年来, 中国与周边国家在政治、经济等国家间合作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 部分西方国家持续散播有关中国的负面舆论。相较于政治和经济层面的快速发展, 中国同周边国家在民间层面的人文好感和信任程度的积累往往是一个更为长期和渐进的过程。这种信任不同于政府间的协议或项目合作, 它建立在双方人员频繁接触、深入理解的基础之上, 无法以行政手段强行塑造, 却对整体关系的稳定与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只有真正实现中国同周边国家的民心相通, “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才能有效转化为区域民众广泛的集体好感与认同, 为中国周边外交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持续有力的支撑。

回顾近年来的周边工作可以发现, 中国在推动周边外交整体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但在较为关键的民心相通工作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 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 中国同部分周边国家之间的民心相通基础仍相对薄弱, 进展相对缓慢, 且极易受到域外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等外部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其二, 当前对民心相通成效的评估工作亟待加强。这是由于民心相通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 其行为过程 (如人文交流活动数量) 与最终结果 (如真正的理解与信任水平) 之间不

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例如，若仅凭人文交流活动的数量和机制建设来衡量，中国在与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之间的友好城市数量、孔子学院设立数量、科研合作频率和深度等方面均显著高于多数周边国家^[17]。然而，这种基于量的比较所推导出的民心相通指数，可能与实际的民间情感和相互信任的现实观感并不完全一致，需要进一步科学评估。

二、中国—中亚外交中民心相通的具体实践

中国是最早承认中亚国家独立的国家之一。与中亚五国自 1992 年建交以来，中国便开始推进与中亚国家的民心建设工作。其中，教育、旅游和科技合作是中国—中亚外交中促进民心相通的重点实践领域。

（一）教育合作：中国与中亚国家民心相通的基石工程

教育合作是推进我国与中亚五国民心相通的重点工作。中国推进的教育对外开放战略与中亚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在需求呈现出高度的契合性。中国与中亚国家自建交之初即在双边层面开展了教育合作。1992 年以来，中国先后同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签署文化合作协定，明确了教育交流和合作的基本方式。但由于相关法律文本相对粗糙、缺乏可操作性文件的支持^[18]，教育合作如教育合作协定、学历学位互认的进展可谓举步维艰。上海合作组织于 2001 年成立后，中国与中亚国家教育合作步入机制化阶段。

教育合作机制方面，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教育合作在依托双边合作的基础上，还通过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中亚”等多边机制开展多边合作予以推进。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与中亚国家开展教育合作的重要多边平台。中亚五国中，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四国系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成员国各方就教育领域达成重要共识，先是 2006 年 6 月颁布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教育合作协定》，又于同年召开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首次教育部长会议，还于 2007 年 8 月 16 日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大学的成立，实现教育合作的初步推进。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双边教育合作也由此取得了显著进展。为促进教育资源共享，中国分别于 2002 年和 2006 年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两国签署相互承认学历、学位证书的协议。2005 年，在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政府此前协议的基础上，中亚地区首家孔子学院——塔什干国立东方大学孔子学院在乌兹别克斯坦正式成立，成为中国文化传播的重要平台。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中亚地区陆续建立 9 所孔子学院。但即便如此，中国与中亚地区各国教育合作进程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对中国文化在中亚影响力的评估存在偏差，多种文化力量在中亚地区的并存与竞争，加之孔子学院在运作过程中存在一些不足等因素，中国文化在中亚的传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19]。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特别是 2016 年相关政策文件的发布，为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教育交流合作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中方制定并发布《愿景与行动》（2015 年 3 月）、《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2016 年 4 月）、《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2016 年 7 月）等一系列重要政策文件，明确了面向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国际教育合作的基本方向。2020 年 7 月，中国—中亚机制——首个仅有中国与中亚五国参与机制的成立，为教育交流注入了强劲动力。2023 至 2024 年间，双方成立教育部长会议机制、教育高官会议机制，

并依托“中国—中亚峰会”“中国—中亚高等教育合作论坛”“中国—中亚高校数字教育合作论坛”以及“中国—中亚产学研用合作会议”等平台, 全方位、立体式、系统性地深化教育领域合作, 推动其蓬勃发展。

教育合作内容方面, 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教育合作集中于丝绸之路大学联盟、中国国际学校以及鲁班工坊等项目。首先是丝绸之路大学联盟的构建。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 西安交通大学于 2015 年首倡发起由海内外大学组成的非政府教育合作平台——丝绸之路大学联盟。截至 2018 年 10 月, 该联盟已吸引中亚四国 19 所大学加入, 其中包括哈萨克斯坦 8 所、吉尔吉斯斯坦 7 所、乌兹别克斯坦 2 所以及塔吉克斯坦 2 所^[20]。其次是中国国际学校建设。2019 年 12 月, 基于此前印发的以教育现代化为主题的中长期战略规划《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 国务院颁布《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 0405 号(教育类 073 号)提案答复的函》纲领性文件。根据该文件, 中国的国际学校建设有三种模式: 一是依托现有阳光学校或孔子学院, 逐步发展成中国国际学校; 二是在所在国现有教育机构中“借壳”开办“中国教学部”; 三是鼓励国内教育机构在条件成熟国家独立举办全日制中国国际学校。具体到中亚国家, 西北工业大学哈萨克斯坦分校于 2023 年 10 月 12 日正式启用, 标志着中国第一所高水平大学在“一带一路”首倡之地正式开始办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塔什干分校也于 2024 年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国立农业大学揭牌成立。可以预见, 中国高校在中亚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将成为一种趋势。最后是鲁班工坊的设立。鲁班工坊是以中国古代工匠鲁班命名的国际职业教育平台, 由天津市于 2016 年在教育部指导下率先推动设立, 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合作的重要载体。早在 2015 年,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与塔吉克斯坦冶金学院合作共建冶金学院孔子学院, 开展类似“汉语+职业教育”模式。鲁班工坊与孔子学院虽同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但在定位、功能和运作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一是在定位上, 鲁班工坊侧重于职业教育合作, 而孔子学院则定位于以汉语教学和以中国文化传播为核心的非营利性公益机构。二是在功能上, 鲁班工坊提供学历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 致力于培养技术人才, 而孔子学院则专注于推广汉语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是在运作模式上, 鲁班工坊以中国职业标准为基础, 指导当地教师开展培训, 注重技术技能的传承, 而孔子学院则主要依赖中方提供的教学资源 and 师资支持, 侧重于语言文化的传播。迄今, 中亚地区已建设 4 个鲁班工坊, 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各有 1 个。由于该项目获得中亚国家的积极评价, 中亚五国正与中方就新建或扩建鲁班工坊项目进行磋商。

(二) 旅游合作: 中国与中亚国家民心相通的重要渠道

旅游合作是近年来中国与中亚国家发展民间交流的新兴渠道。旅游合作符合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同的发展需求。对中亚国家而言, 发展旅游业是推动经济结构多元化转型的重要途径。中亚地区历史悠久, 文化底蕴深厚, 拥有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 例如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古城、哈萨克斯坦的广袤草原、土库曼斯坦的达瓦扎天然气坑洞、吉尔吉斯斯坦的伊塞克湖以及塔吉克斯坦的山地风光。但受制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签证等因素, 该地区的旅游潜力并未获得有效释放。中国拥有庞大的出境游市场且近两年中国公民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旅游意愿显著增强^[21], 这无疑为中亚旅游增加了发展契机。相较于教育合作, 中国与中亚国家旅游交流合作起步较晚。“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后，旅游合作才被纳入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重点推进领域之一。

旅游合作机制方面，双方合作主要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中亚机制予以推进。在“一带一路”框架下，2014 年，由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共同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成为首例跨国合作、成功申遗的项目。在中国—中亚机制框架下，旅游合作进入实质性发展阶段。2023 年 5 月，中国—中亚峰会在西安召开，习近平主席与中亚五国领导人共同签署的《中国—中亚峰会西安宣言》明确提出通过“共同制定中国—中亚旅游线路”深化旅游合作。双边领域，中国分别于 2023 年、2025 年同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签署 30 天的免签政策，极大地便利了双方人员往来。中哈两国元首宣布 2024 年为中国的“哈萨克斯坦旅游年”，2025 年为哈萨克斯坦“中国旅游年”，彰显了双方在旅游业等领域合作的不断深化。鉴于旅游业在中亚国家生产总量中的占比相对较低，其潜力未来得及充分挖掘，故该地区各国正积极出台相关政策以推动旅游业发展，如塔吉克斯坦制定《2030 年前旅游业发展战略》，土库曼斯坦积极开展旅游宣传和推广活动。此外，中亚各国高度重视中国游客，陆续推出便利化的措施，如吉尔吉斯斯坦 2024 年 10 月表示对中国旅游团免签 21 日。塔吉克斯坦亦于 2024 年 3 月宣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 16 个国家（55 岁以上公民）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

旅游合作内容方面，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主要涉及旅游基础设施合作、旅游投资合作和旅游数字化合作^[22]。具体到中亚各国，首先，在旅游基础设施合作方面，中国与中亚国家已基本建成涵盖航空、铁路、公路的综合运输网络。公路方面，一条东起江苏连云港，途经陕西西安、新疆阿拉山口，西至中亚各国重要城市的公路运输网络已然成型。铁路方面，中欧班列增设的“旅游班列”和中吉乌铁路项目的启动加强双方的互联互通。根据 2023 年 4 月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就中国—中亚旅游线路达成的共识，中国与中亚各国积极磋商开通中国—中亚旅游班列。2025 年 3 月 19 日，由北京开往塔什干的首趟中亚班列顺利开行。截至目前，已规划并调整中亚班列图定线路 44 条，极大地提高中国与中亚五国的旅游吸引力。同时，延宕多年的中吉乌铁路项目在三方积极协调下取得历史性进展，并于 2024 年 12 月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中吉乌铁路启动仪式。按照先前的计划，该铁路将于 2031 年建成通车。在航空方面，中国已与中亚五国签署政府间航空运输协定，并开通了连接两国主要城市之间的直飞航线。例如北京、上海、西安及乌鲁木齐等地均已开通直飞中亚的航线。其次，在旅游投资合作方面，以中国向中亚国家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为主。近两年，中亚各国通过不断完善旅游与投资相关法律体系，吸引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投资者。目前中国企业在中亚的投资主要集中于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矿业和农业等领域，但旅游业已然成为新的投资增长点。现有中资企业投资主要集中于改善中亚各国的旅游交通基础设施。例如，中国华润置地有限公司、万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及深圳君豪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已投资哈萨克斯坦的商业地产和酒店业。中国企业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投资建设国际会展中心、酒店和商业街等旅游与商业综合体项目。最后，在旅游数字化合作方面，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合作尚有较大发展空间。目前合作案例仍较有限，例如 2023 年陕西旅游集团等文旅企业与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州联合开展的“数字丝路”跨国巡展。随着中亚各国与中国数字经济合作的加速推进，旅游数字化合作有望在未来成为双边合作的重要议题。

(三) 科技合作：中国与中亚国家民心相通的现代载体

科技合作是中国与中亚国家民心相通的重要内容。科技合作使双方的共同利益高度契合。就中亚国家而言，科技合作是实现经济多元化、减少能源依赖的重要路径，也是提升自身科技水平、对接国际体系的现实选择。就中国而言，这是构建全球创新网络、增强未来技术优势的关键一步。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陆续与中亚五国签署科技合作协定，规定科技领域合作总体原则、双方合作内容和方式、参与科技合作的主体等，为双方的科技合作奠定了必要的基础。进入21世纪后，中国与中亚国家在科技领域的合作进程明显加快。

科技合作机制方面，双方合作主要依托上海合作组织平台和“一带一路”倡议予以推进。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通过签署科技合作文件（如《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召开常态化的科技部长会议以及建立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中国—上合组织技术转移中心等，中亚各国与中国得以实现战略层面的沟通与政策对接。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习近平主席2017年5月14日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时，提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该计划指出的开展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验室、科技园区合作、技术转移四项行动，为驱动中国与中亚科技互动、促使合作愿景转化为具体成果提供核心途径。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宣布“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其中之一便是“推动科技创新”。在双边层面，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设立政府间合作委员会及创新合作分委会，推动联合实验室、技术转移中心等实体平台建设。例如，中国、哈萨克斯坦共建农业科学“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中国、乌兹别克斯坦设立新药“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中国、塔吉克斯坦设立生物资源保育与可持续利用联合实验室。

科技合作内容方面，双方合作覆盖农业科技、数字技术、生态治理、卫生与健康等领域。首先，在农业科技上，双方合作以惠及民生为目标。以示范园建设为例，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通过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建立示范园，使得哈萨克斯坦试种的小麦品种增产60%，乌兹别克斯坦棉花产量提升50%、节水50%。其次，在数字技术上，中国通过技术转移与基础设施建设，助力中亚国家的数字经济建设与信息化转型，如华为公司与乌兹别克斯坦展开合作，在塔什干等重点城市部署5G基站，为该国数字经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设施保障。再次，在生态治理上，中国为中亚生态提供技术方案。中国培育适宜哈萨克斯坦生长的植物，协助建设苗圃，开展种植技术和灌溉措施培训，助力其建成20万公顷的生态屏障。最后，在卫生与健康领域，中国与中亚的合作也在稳步推进。习近平主席在致2016“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的贺信中提到：“中国愿同沿线国家一道，构建‘一带一路’互利合作网络、共创新型合作模式、开拓多元合作平台、推进重点领域项目，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智力丝绸之路’、‘和平丝绸之路’，造福沿线国家和人民。”其中，打造“健康丝绸之路”的倡议积极引导中国医疗服务惠及中亚各国。依托该倡议，中国科学院中亚药物研发中心已初步构建起以乌兹别克斯坦为重点，辐射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1+N”合作格局。上述举措有效提高了中亚国家相关产业的生产效率和生态环境质量，关注民生福祉已成为中国与中亚国家科技创新合作的显著特点之一^[23]。

综上，推动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民心相通的领域呈现若干共性特征。一是合作的开展高度契合

各自发展需求与发展方向。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合作并非泛泛而谈，而是紧密围绕各自国家发展战略目标与现实需求展开。教育合作服务于中亚培养人才，适应经济合作的需求，同时也满足中国高水平教育的对外开放要求；旅游业发展顺应了双方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扩大交流的愿望；科技合作聚焦农业、数字、卫生等具体领域，契合双方在技术升级、产业多元化等方面的诉求。二是合作的渠道呈现多元化特征，多边、双边以及“二轨”并行。这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双方的合作空间。除以上三个合作方面，文体合作、扶贫合作、公共卫生外交等亦有助于增进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民心相通。但相较而言，教育、旅游与科技合作在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对深化中国与中亚各国合作、夯实中国与中亚各国民心相通基础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

三、中国—中亚外交中民心相通的实际成效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正步入新的发展阶段。民心相通是深化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的重要支撑，对其建设成效的评估与衡量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在梳理当前中国—中亚民心相通成效评估体系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与中亚各国在民心相通的实质表现，选取教育、旅游、舆情三个具有代表性的维度构建评估框架。

（一）中国—中亚外交中民心相通成效的横向评估

评估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民心相通程度，可为检验现有政策的实施成效、未来双边关系策略的优化提供重要参考。当前学界及研究机构已构建多种定量评估体系，旨在衡量中国与共建国家在民心相通层面的联结强度。例如，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于 2016 年选取“文化与人才交流”和“双边合作期待度”两项二级指标，构建起民心相通指数的基本评价体系。2017—2018 年，该机构将“文化与人才交流”这一指标细分为“旅游与文化”和“人才交流”两项独立指标。然而，该机构的研究重点在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整体的“五通”指数（文中称为“国别合作度”）以及国内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参与度；中亚地区的民心相通指数仅以次区域形式呈现，且该指数在连续发布三版后未再更新。北京大学“一带一路”五通指数研究课题组于 2016 年也提出了由“旅游活动”“科教交流”和“民间往来”等四项二级指标构成的评价体系，并明确给出了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民心相通的具体数值。该评价体系在当时具有代表性，但与上述机构情况类似，数据持续发布三年后未再更新。2021 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合作局发布了更为详尽的民心相通衡量指标体系，包含“旅游活动”“科教交流”“民间舆情”和“智库合作”四项二级指标。同样地，该机构并未明确给出中国与中亚国家民心相通指数。

除了上述机构的评估成果外，部分学者在民心相通指数的研究中也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观点。例如，常非凡构建了包含“科教环境”“社会事业”“人文交流”和“公共外交”等二级指标的评价体系，通过考察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教育、医疗、科技等 13 个领域的合作概况，罗列出详细的民心相通指数^[24]。许庆红以湄公河五国中资企业的当地员工为切入点，运用认知—情感—意向模型评估中国与湄公河五国之间的民心相通程度^[25]。表 1 为中亚国家在已有涉“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指标体系的具体排名。

表 1 中亚国家在民心相通评价体系中的指数排名

提出机构	二级指标	中亚国家民心相通指数排名
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 (2016 版)	文化与人才交流	中亚作为次区域位列第 3/6 名 ^[26]
	双边合作期待度	
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 (2017、2018 版)	旅游与文化	中亚作为次区域位列第 2/6 名 ^[9-10]
	人才交流	
	双边合作期待度	
北京大学“一带一路”五通指数研究课题组 (2016 版)	旅游活动	哈萨克斯坦位列第 16/64 名; 乌兹别克斯坦位列第 31/64 名; 吉尔吉斯斯坦位列第 20/64 名; 塔吉克斯坦位列第 41/64 名; 土库曼斯坦位列第 46/64 名 ^[27]
	科教交流	
	民间往来	
北京大学“一带一路”五通指数研究课题组 (2017 版)	旅游活动	哈萨克斯坦位列第 18/63 名; 乌兹别克斯坦位列第 32/63 名; 吉尔吉斯斯坦位列第 27/63 名; 塔吉克斯坦位列第 33/63 名; 土库曼斯坦位列第 44/63 名 ^[28]
	科教交流	
	民间往来	
北京大学“一带一路”五通指数研究课题组 (2018 版)	旅游活动	哈萨克斯坦位列第 34/94 名; 乌兹别克斯坦位列第 62/94 名; 吉尔吉斯斯坦位列第 50/94 名; 塔吉克斯坦位列第 72/94 名; 土库曼斯坦位列第 74/94 名 ^[29]
	科教交流	
	民间往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合作局	旅游活动	——
	科教交流	
	民间舆情	
	智库合作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已有涉“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指标评估体系整理, 借鉴王秋彬的框架进行了细分。

现有评估多采用横向比较的评估方法, 旨在反映同一时期不同国家间“民心相通”的相对水平。基于这些机构的民心相通指数评价体系, 中亚作为一个重要的次区域, 其整体民心相通指数在“一带一路”沿线共建国家中位居前列, 体现了该地区与中国的民心相通基础较好。然而, 中亚国家内部存在显著的差异性。除哈萨克斯坦之外, 其他 4 个中亚国家民心相通指数排名并不高。其中, 土库曼斯坦由于长期奉行相对封闭的外交政策, 民心相通指数比较靠后。然而, 在具体考察中国与中亚国家“民心相通”的实践效果时, 已有评价体系中的部分指标与中国—中亚民心建设实效的联系较为有限, 因此无法完全契合并充分反映双边关系的实际。基于此, 下文将在现有框架的基础上, 结合中国—中亚各国外交的具体实际状况, 选取更能体现民心相通真实进展的关键维度进行评估。

(二) 中国—中亚外交中民心相通成效的纵向评估

中国与中亚外交中的民心相通取得的成效主要体现在教育、旅游、涉华舆论三个方面。

第一, 教育领域的双向互动逐步深化。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双方学习对方语言的动机已发生显著变化。此前, 中亚国家的民众学习汉语主要基于就业和职业发展的需求, 较少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兴趣而学习。然而,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亚民众不仅认识到中文的重要性, 更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学习兴趣。中亚学生学习中文的心理动机也日趋多样。除了服务于职业发展, 许多中亚留学生认为, 赴华留学为他们提供了通往其他国家发展的可能性^[30], 甚至承载着在中国追求

“中国梦”的期望^[31]。同时，中亚国家相对灵活的学制、较低的留学费用，以及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学历学位的互认，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有机会学习到中亚语言、前往中亚国家留学深造，从而促进双方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其二是中国与中亚国家间留学生双向流动规模持续扩大。一方面，中亚国家学生来华留学热度持续攀升。从绝对数量来看，2010—2018 年间，中亚来华留学人数由 11 930 人增至 29 885 人，年均增长率为 12.33%，增速高于同期“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从占比看，2010 年中亚国家来华留学生数量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总数的比例由 2010 年的 10.74% 提升至 2015 年的 12.72%^[32]；从学历层次来看，中亚国家来华留学生的层次结构不断优化。2008 年，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接壤的新疆地区，留学的外国学生以本科生和培训生为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人数总计仅为个位数^[33]。而近 10 年内，来华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中亚籍学生日益增多。以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为例，已累计培养中亚籍留学生 55 人，其中博士研究生 32 人，硕士研究生 23 人^[34]。从生源国别结构来看，哈萨克斯坦占据主导地位。2018 年，哈萨克斯坦留学生为 11 784 人^[35]，超过当年来华中亚留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另一方面，中国学生赴中亚国家的留学与访学活动亦呈现稳步增长趋势。2021 年，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中国属于该国国际学生十大生源地的国家有 24 个，其中就包括中亚三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36]。

第二，中国—中亚旅游业发展潜力正不断释放。作为全球入境旅游增长速度最快的区域之一，中亚各国的旅游潜力正不断被发掘。中国是中亚旅游的主要客源国，赴中亚旅游的游客数量持续攀升。2024 年，中国赴哈萨克斯坦游客达 65.5 万人次，同比增长 78%；赴乌兹别克斯坦 7.43 万人次，同比增长 75%；赴吉尔吉斯斯坦 12.8 万人次，同比增长 56%；赴塔吉克斯坦 2.04 万人次，同比增长 56.9%。根据中国驻土库曼斯坦大使馆发布的旅游提醒，赴土库曼斯坦的中国游客数量也呈现增长趋势。与此同时，中国也正在成为中亚国家游客的热门旅行目的地。2023 年，哈萨克斯坦入境中国的游客人数达到 31.1 万人次，较 2022 年翻了一番^[37]。上述数据表明，旅游已然成为促进中国与中亚各国民心相通的有效手段。

第三，中亚涉华舆论整体有所改善。中亚国家涉华舆论是衡量其对华政策走向的重要风向标。近 3 年来，中亚国家涉华舆论整体呈现积极向好的趋势。中亚五国涉华舆论范围主要包括：政府、智库和学界、主流媒体报道以及个人评论等。在政府层面，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持续深化，如中哈建立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乌建立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吉建立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塔建立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与中亚各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全面覆盖，奠定了中亚五国涉华舆论环境的底色与基调。智库和学界层面，随着“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的国际舆论环境发生变化，“强硬派”和“反华派”在涉华舆论中的声音逐渐减弱。中亚学者普遍认为，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合作为本国带来巨大利益。塔吉克斯坦经济学家扎马力金·阿基纳耶夫表示，“一带一路”理念的落实，将为塔解决一系列重要问题，首先便是塔希望通过吸引投资解决的经济问题^[38]。哈萨克斯坦政治学家卡伊尔詹·阿布迪哈里科夫认为，“与华合作为该国带来新的制造业和就业机会”^[39]。媒体层面，涉华正面报道增多。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两国媒体对中国普遍持友好态度，正面报道数量占比始终较高。哈萨克斯坦涉华主要媒体“腾格里新闻”曾在 2020 至 2022 年期间多次报道诸如所谓“中国制约欧盟”“土地

霸占”等涉华负面话题。然而, 自 2022 年以来, 该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显著减少甚至鲜有出现。民众层面, 对中国的印象整体向好。调查机构“中亚晴雨表”在统计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四国民众 2017—2023 年期间对华好感度数据后得出, 往年抗议活动数量最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两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正在改善, 分别于 2022 年春、2019 年秋开始趋于正面。土库曼斯坦民众对华好感度虽有所下滑, 但仍有近三分之二的人保持积极态度。乌兹别克斯坦民众自 2020 年春后好感度指数呈现波动, 目前对华好感超过三分之一^[40]。此外, 报告显示, 自 2022 年秋季以来, 哈萨克斯坦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已超过美国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拉普”(TALAP)应用研究中心发布的《2024 年哈萨克斯坦中国感知指数》报告也印证了这一观点^[41]。

四、中国—中亚民心相通实践对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启示

民心相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社会基础, 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所在。民心相通之道不只是加强相互了解, 更在于创造共同记忆、共同身份及共同的辉煌^[42]。中亚各国不仅是我国“一带一路”沿线支点国家, 也是在国际事务上的重要伙伴和友好邻邦, 双方开展的民心相通工作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近年来,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提升与全球战略布局的调整, 周边外交在国家总体外交格局中的地位愈发凸显。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营造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的关键一步。对此, 有学者提出开展“融和”^[43]和“融通”^[44]型周边外交的政策建议。中国—中亚外交中的民心相通实践与成效有三点启示。

(一) 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推进周边外交

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对待中国与周边国家推进民心相通工作过程中的差异问题。中亚历来是多元民族融合的区域, 其主体民族直至 1924 年苏维埃政权开展民族识别才得以确认。其中, 吉尔吉斯斯坦至今还没有完全实现本民族的整体认同, 其部族认同的观念尚未完全消解, 国家和民族认同难以达成。由此导致的部落主义不仅阻碍了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转型, 使其陷入了“民主—专制”的怪圈^[45], 还对中吉乌铁路建设构成一定阻力^[46]。在地区层面, 中亚地区各国在苏联解体后得以独立, 虽在地缘政治层面被视为整体, 但各国在政治文化、领导人风格、执政特征、发展模式、社会心理等维度呈现出显著异质性, 在领土、水资源问题上也存在分歧。中亚国家间这种微妙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掣肘地区一体化^[47], 导致中亚地区合作处于漫长沉寂期, 直至 2018 年才得以重启^[48]。

中亚国家文化与中华文明存在深刻共鸣, 例如中国民间说唱艺术在土库曼斯坦的传播, 吉尔吉斯斯坦史诗对孔子学说的融合。在与中亚国家交往交流过程中, 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的姿态, 致力于寻求彼此间的共通之处, 促进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 尊重中亚各国复杂的内部情况以及中亚地区内部存在的分歧。中吉乌铁路的顺利运行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亚地区的稳步推进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坚持开放心态的阶段成果。中国周边国家拥有各种文化、制度、习俗和语言, 且发展程度、与世界接轨的程度各异, 在诸多理念和价值观上具有一定的共性, 因此中国应该始终秉持“和而不同”的东方智慧, 基于各国的基本国情, 尊重其历史文化与政治传统, 践行差异化、因地制宜的合作模式。

（二）多管齐下协同推进民心相通工作

广泛的接触是实现民心相通的基本前提。这一目标的实现通常包括三个基本步骤：第一阶段是接触，即双方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互动建立基本认知；第二阶段是观察，一方或双方开始关注对方的行为表现、价值取向及社会文化特征；第三阶段是评估，即在前述基础上形成对他者的认知判断，这种判断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具有负面倾向。唯有当双方均形成相对正向的认知评价，方有望推动社会减距，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心相通”。结合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实践可以发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流不应局限于“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单一框架，其他合作机制同样值得重视。一是既要充分参与和周边国家同处的多边机制，又要积极推动中国—具体行为体等双边合作。双方国家专家会议、论坛和智库等“二轨”机制同样值得关注。二是既要推动教育、科技等传统领域的高质量共建，也应实现传统领域的创新延伸和开拓新兴领域合作的两大突破。

（三）以精准细腻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

回顾过去，中亚部分社会舆论对中国呈现消极态度的根源在于双方合作项目的宣传实践不到位。由于双方在具体议题上的实践有所偏差，加上中国国内的民族政策信息和社会现象在中亚语境中的误读传播，部分中亚民众对中国持负面情绪。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外宣传的重要性不亚于国内宣传。在对外宣传方面，一是要加强与周边国家之间的交流和沟通，通过本土化叙事模式来帮助周边国家民众理解双方合作政策内涵。二是要支持宣传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友好故事，以老百姓的视角展示我国国家繁荣昌盛、百姓安居乐业、两国民众友好互动等内容，使双方民心相通程度更上一个台阶。在对内宣传方面，一是有效、快速地回应涉及国际社会民众关切的相关问题，通过各种渠道有针对性地讲好故事，澄清误会、化解成见，以尽可能消除、削弱周边国家涉华负面舆论生存、扩散的基础。二是加强对国内主流自媒体平台上相关内容的审核，重点加强对发布关于周边国家不友好民众社交媒体账号和内容的监管，避免某些极端观点在周边国家引发舆情。一旦出现这类情况，须以最快速度进行调查和澄清，谨防被域外别有用心之人利用。

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战略协同的不断深化，人文交流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民心相通被赋予更多的战略意义。民心相通对于中国周边而言，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在国际层面的“两创”，在赋能周边外交实践的同时，其实际成效也受到复杂外部环境和目标国家的双重制约，成为衡量中国周边外交成效的重要指标。中国与中亚通过开展教育、旅游和科技领域的务实合作，在民心相通工作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在教育领域的双向互动逐步深化，旅游合作方面潜力正在不断释放，中亚国家对华舆论有所改善。中国与中亚国家 30 余年民心相通的实践表明，以开放包容心态推进周边外交、多管齐下协同推进民心相通工作、以精准细腻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是行之有效的经验，亦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启示。未来，民心相通的建设必将与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同气连枝、同向共进。

参考文献：

- [1] 郭宪纲, 姜志达. “民心相通”: 认知误区与推进思路——试论“一带一路”建设之思想认识 [J]. 和平与发展, 2015 (5): 1-11+114.
- [2] 李自国. “一带一路”愿景下民心相通的交融点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

曾向红, 安凯欣. 中国—中亚外交中的民心相通实践与成效——兼论对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启示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3): 181-194.

67-74.

- [3] 张胜军. 民心相通: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特质和重要原则 [J]. 当代世界, 2019 (5): 31-35.
- [4] 郑东超. 共建“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成就、经验与前景 [J]. 当代世界, 2024 (1): 67-71.
- [5] 杨辉. 民心相通“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 [M].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18.
- [6] 王义梳, 等. 民心相通的中国实践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4.
- [7] 赵可金. “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理论基础、实践框架和评估体系 [J]. 当代世界, 2019 (5): 36-41.
- [8] 丁辉, 周宇翔. “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建设成果评估及政策建议 [J]. 当代世界, 2019 (4): 58-61.
- [9] 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 “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 (2017)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25.
- [10] 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 “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 (2018)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46.
- [11] 王岩, 孙伟超.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及其创造性转化 [J]. 学术界, 2025 (2): 111-114.
- [12] 张勇锋. 民心相通析论 [J].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1 (9): 44-48.
- [13] The State of Southeast Asia: 2024 Survey Report [EB/OL]. (2024-05-07) [2025-05-06]. <https://www.irsea.ro/en/The-State-of-Southeast-Asia-2024-Survey-Report/>.
- [14] 曾向红. 欧亚秩序的套娃模式: 地区分化及其影响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9 (5): 25-26.
- [15] 仇华飞. 国际秩序演变中的中国周边外交与中美关系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107-114.
- [16]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155.
- [17] 王秋彬. “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评估体系、影响要素及生成机理探析 [J]. 南洋问题研究, 2023 (3): 20-30.
- [18] 肖甦, 时月芹. “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与中亚五国教育交流合作 30 年审思 [J]. 比较教育研究, 2022 (12): 3-15.
- [19] 焦一强. 中国文化走向中亚障碍因素分析 [J]. 新疆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 (1): 79-81.
- [20] 丝绸之路大学联盟成员一览表 [EB/OL]. [2025-04-20]. <https://uasr.xjtu.edu.cn/info/1092/1707.htm>.
- [21] 2023 年上半年出境旅游大数据报告 [EB/OL]. (2023-08-01) [2025-04-20]. <https://www.ctaweb.org.cn/index.php?m=home&c=View&a=index&aid=7117>.
- [22] 宋瑞. 旅游绿皮书 2023—2024 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4: 86-89.
- [23] 韦进深, 陈虎. 中国与中亚国家科技创新合作——动因、进展与前景 [J]. 甘肃科技纵横, 2024 (11): 1-7.
- [24] 常非凡. “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发展指数报告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7-9.
- [25] 许庆红, 等. 中国与湄公河五国民心相通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2: 1-377.
- [26] 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 “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 (2016)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46.
- [27] 北京大学“一带一路”五通指数研究课题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五通指数报告 [M].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17: 38-40.
- [28] 翟崑, 王继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五通指数报告 (2017)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91-93.
- [29] 太和智库与北京大学联合发布“一带一路”五通指数研究报告 (2018) [EB/OL]. (2018-12-24) [2025-04-26].

- <http://en.taiheinstitute.org/Content/2018/12-24/0913043250.html>.
- [30] What Happens to Central Asian Youth After Following China's 'Educational Silk Road?' [EB/OL]. (2023-12-29) [2025-05-06]. <https://thediplomat.com/2023/12/what-happens-to-central-asian-youth-after-following-chinas-educational-silk-road/>.
- [31] 蔺紫鸥. 春风化雨润民心——中国和中亚国家人文交流不断深入 [N]. 光明日报, 2023-05-18 (2).
- [32] 中亚青年来华留学热潮不断 [EB/OL]. (2023-05-16) [2025-04-26]. https://www.fmprc.gov.cn/ziliao_674904/zt_674979/ywzt_675099/2023nzt/zgzyfh/bjz1/202305/t20230516_11078268.shtml.
- [33] 蔡文伯, 孙毅婷. 新疆中亚留学生教育现状分析及对策 [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1 (7): 35-39.
- [34] 白佳丽, 阿依努尔. “我们留学在新疆”——吉塔青年中国留学记 [EB/OL]. (2019-06-13) [2025-05-03]. https://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6/13/c_1124620019.htm.
- [35] 2018 年来华留学统计 [EB/OL]. (2019-04-12) [2025-04-27].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904/t20190412_377692.html.
- [36] 中国留学发展报告蓝皮书 (2023-2024) [EB/OL]. [2025-04-27]. <http://www.ccg.org.cn/archives/84288>.
- [37] 311 thou Kazakhstanis visit China in 2023 [EB/OL]. (2024-07-02) [2025-05-05]. <https://qazinform.com/news/311-thou-kazakhstanis-visit-china-in-2023-5f4470>.
- [38] Проект «Один пояс—один путь»—выгоден всем странам-участницам, —эксперты [EB/OL]. (2017-05-17) [2025-05-21]. <https://avesta.tj/2017/05/17/proekt-odin-poyas-odin-put-vygoden-vsem-stranam-uchastnitsam-eksperty/?ysclid=maxqflqekm977496824>.
- [39] Қытай-көрші ғана емес, мүмкіндік көзі. Сарапшы не дейді? [EB/OL]. (2025-04-20) [2025-04-27]. <https://dknews.kz/ru/alem-zhanalyktary/357860-kytay-korshi-gana-emes-mumkindik-kozi-sarapshy-ne>.
- [40] Beyond the Silk Road: Navigating the Complexities of Central Asia's Public Opinion on China [EB/OL]. (2024-11-01) [2025-05-09]. <https://ca-barometer.org/en/publications/beyond-the-silk-road-navigating-the-complexities-of-central-asias-public-opinion-on-china>.
- [41] Индекс восприятия Китая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2024год [EB/OL]. (2024-12-12) [2025-05-09]. <https://talap.org/ru/news/news-detail/122/>.
- [42] 王义桅. “一带一路”：中国崛起的天下担当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 191-192.
- [43] 苏浩. “融和”促进中国与周边关系提质升级 [EB/OL]. (2025-04-23) [2025-05-09]. <https://opinion.huanqiu.com/article/4MNzNq00Zcq>.
- [44] 邢广程. 全球视野下中国融通型周边外交的主要内涵与实践路径 [J]. 当代世界, 2025 (4): 7-12.
- [45] 焦一强. 影响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的部族主义因素分析 [J].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2010 (3): 15-22+95.
- [46] 杨雷. 中、吉、乌跨国铁路的阻力及其前景 [J]. 欧亚经济, 2015 (5): 86-96+128.
- [47] 周明. 影响中亚地区一体化的主要因素探析 [J]. 国际问题研究, 2016 (3): 32-50+138.
- [48] 曾向红. 大变局下中亚地区合作的特点、动因及影响 [J]. 当代世界, 2024 (7): 32-37.

责任编辑：王京菁 校对：龚静阳



亚洲安全模式的形成逻辑、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

黄正松 单凌涛

(贵州财经大学 应用经济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当前亚洲面临着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等繁杂问题。在美方发起的贸易战、关税战等外部压力与挑战下,构建亚洲安全模式的意义格外重大。该模式以共建共享的安全理念为核心,强调通过对话协商推进地区机制化安全合作,试图突破安全壁垒,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诉求。理论内涵上,亚洲安全模式融合传统、非传统安全要素,倡议亚洲国家在安全事务上平等参与、携手承担责任。实践路径方面,亚洲安全模式倡导通过强化对话协商机制凝聚安全认知,扩大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以抵御新型威胁,同时坚定自主发展的道路,维护区域安全的有序格局,高效抵御外部搅扰。实施亚洲安全模式可促进亚洲国家的团结与协同,齐心应对外部困境,守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关键词:亚洲安全模式; 周边命运共同体; 共建共享; 区域合作; 国家安全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5) 03-0195-12

一、问题的提出

亚洲为人口数量最多的洲,其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比重不断提升,已跻身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关键一极。亚洲安全问题不单单关乎亚洲的安全情形,也牵涉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与昌盛。在复杂多

DOI: 10.13946/j.cnki.jcqi.2025.03.016

作者简介:黄正松,贵州财经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单凌涛,贵州财经大学应用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贵州省商务厅招标课题重点资助项目“深入研究全省开放型产业现状,大力发展开放型产业,培育壮大开放型企业”

引用格式:黄正松,单凌涛.亚洲安全模式的形成逻辑、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3):195-206.

变的国际经贸斗争背景下，亚洲的安全形势与经济稳定受到国际经贸规则重构、贸易壁垒高筑等因素影响。一方面，经贸领域的紧张局势可能成为某些国家转移国内矛盾、制造地区紧张的借口，进而引发军事对峙、地缘政治冲突等传统安全问题升级；另一方面，经贸摩擦导致的经济下滑、民生困境又可能滋生社会动荡、极端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风险，形成安全与经济问题的恶性循环。拥有大量人口、广袤地域、多样文化且经济发展势头迅猛的亚洲，目前遭遇复杂安全挑战，这些问题损害亚洲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也给世界经济的繁荣进步带来风险与潜在危机^[1]。因此，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周边命运共同体强调国家之间命运相连、相互依赖，借助平等磋商、互利合作解决彼此间各种安全和发展问题。探求一种贴合亚洲实际的安全模式，成了地区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共同渴求，而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为这一探索给出了明确方向。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地区热点问题频繁涌现，海洋争议、领土纷争、恐怖活动、跨国违法等问题纷至沓来^[2]，这些问题不只是考验亚洲国家的智慧和能力，还对既有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构成严峻考验。

2025 年 4 月，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系统总结新时代以来我国周边工作的成就和经验，科学分析形势，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周边工作的目标任务和思路举措，强调要聚焦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努力开创周边工作新局面。此次会议不仅对我国未来周边工作作出了重要部署，更是首次提出“亚洲安全模式”这一概念^[3]。在周边环境日趋复杂的背景下，亚洲国家有必要携手以共，以安全合作增进互信，共同应对各类风险挑战。基于地缘政治角度，亚洲是地缘政治最复杂的地区之一，稳定的安全环境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亚洲安全模式”的提出，正是为了有效凝聚地区共识，推动地区安全合作，从而为我国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4]。基于经济安全角度，实施“亚洲安全模式”将进一步巩固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给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坚实后盾^[5]。在和平稳定的环境里，亚洲各国相互间的贸易壁垒将渐渐消除，经济合作关系会进一步强化，为亚洲地区经济的全面繁荣筑牢坚实根基。对中国而言，这将带来更开阔的发展空间以及更多的合作机缘，有利于我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增强国际层面的竞争力。基于周边外交策略角度，中国跟周边国家同呼吸共患难、命运相连，依靠倡导亚洲安全观，构建起相互信赖的合作机制，可以进一步增进周边合作，一起应对风险问题^[6]。提出“亚洲安全模式”，正是这一外交策略的具体示例体现，有益于强化我国跟周边国家的互信与合作，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后盾。基于全球安全治理角度，随着国际安全局势日益错综复杂，中国提出的“亚洲安全模式”不只是对地区安全合作的关键探索，也是对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积极贡献^[7]。它着重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理念，倡导以对话协商、多边合作等途径处理安全事务，为亚洲甚至全球的安全治理给出了新思路和新方案。“亚洲安全模式”还可带动地区国家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在安全合作的背景下，亚洲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将会更加注重提升地区连通度与应急保障能力，这会使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企业获得更多合作商机以及发展空间，拉动我国基础设施建设迈向国际化。此外，和平稳定的环境有益于亚洲国家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透明、金融合作深入推进。“亚洲安全模式”的提出对降低金融风险有好处，有利于提高金融市场的稳健程度和韧性水平，有利于我国金融企业改善经营业绩^[8]。

二、亚洲安全模式的形成逻辑：多重背景下的必然选择

在全球化背景下，亚洲安全模式形成具有多重逻辑。一是复杂安全形势产生倒逼，传统安全问题像领土争端、军事同盟等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相互穿插，传统安全理念无法适应现有的形势，促使亚洲国家提出统筹兼顾的新安全理念。二是区域合作需求起到推动作用，亚洲经济合作的加深态势凸显，经济融合使各国相互的依存关系增强，经济安全需求明显突出，同时经济融合影响了政治、社会层面，亚洲国家意识到需调整安全理念，注重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应运而生。三是国际格局深刻调整演变，因外部势力介入，亚洲的安全压力有所增大，解决跨区域非传统安全问题离不开国际合作，然而外部环境错综复杂，亚洲国家应摸索安全路径，以维护自身利益，推动亚洲和平发展。

（一）复杂安全形势倒逼：传统与非传统问题交织催生新理念

在全球化进程加速推进的当下，亚洲地区的安全形势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9]，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断交织叠加，形成了复杂且严峻的安全挑战格局。这种复杂的安全形势成为亚洲安全模式形成的强大倒逼力量，催生出全新的安全理念。传统安全问题根深蒂固，领土争端及海洋权益纠纷问题不断恶化。如南海问题，周边有关国家非法占有中国的南海岛礁且不断在南海地区挑衅，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南侵占中国南沙群岛岛礁29个，菲律宾侵占8个，马来西亚侵占5个，文莱声称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拥有主权^[10]。有关国家不仅在侵占的岛礁上进行大规模军事设施建设，还频繁派遣军舰和飞机进入中国管辖海域和空域进行挑衅活动，仅2022年菲律宾就多次在仁爱礁等海域制造事端，严重侵犯中国的主权和海洋权益，影响地区的和平稳定。军事同盟图谋和军备竞赛问题也一直影响着亚洲地区^[11]。一些域外大国为了谋取亚洲利益，不断加大对亚洲的军事同盟压力和军事部署压力。例如美国近年来不断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与韩国、日本等盟友频繁举行联合军演，2025年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创下近年新高，参演兵力达3.5万人，投入大量先进武器装备，演习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提升，给地区安全环境带来压力与挑战。这种传统安全问题不仅直接威胁到一个国家的主权，而且会导致地区军备竞赛、造成大量经济资源消耗、影响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面对传统安全困境，亚洲国家开始意识到“兵器相加”不能真正解决冲突，必须寻求一种更加综合、更加包容的安全模式。

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迅速崛起和蔓延，进一步加剧了亚洲地区的安全困境。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跨国性、突发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对亚洲国家的安全和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12]。如2019年斯里兰卡发生的连环爆炸恐怖袭击事件，造成数百人伤亡，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该组织在亚洲多地策划和实施恐怖活动，其组织使用暴力的手段制造社会恐慌，破坏社会秩序，给地区安全稳定带来了巨大影响。随着网络安全迅猛发展，信息安全技术所引起的网络攻击、数据泄露等同样给国家带来了政治、经济等巨大安全问题。传统的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安全理念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安全形势，必须寻求一种可以涵盖多种安全领域、并且还能应对多种安全问题的新安全理念。

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叠加，这使得亚洲地区的安全问题越发复杂且难以应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安全形势，促使亚洲国家必须认真审视现有的安全观念与安全模式，积极探

索一种全新的安全理念，即统筹兼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安全理念。亚洲安全模式正是在此背景下，以对话、谈判、合作等和平方式解决安全问题为指引，着重发挥地区国家在国家安全治理中的主体作用，进而推动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建设^[13]。这种新安全理念的形成，不仅是对亚洲地区复杂安全形势的积极回应，也为亚洲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了关键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引。

（二）区域合作需求推动：经济融合催生安全理念革新

亚洲地区的经济合作范围越来越广，合作程度不断加深，形成了“互为彼此、互为对方”的经济发展格局。从贸易角度看，亚洲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占全球贸易的比重不断上升。中国与东盟已经连续多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双方在制造业、农业、服务业等各个领域开展了广泛的深入合作。亚洲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与实施进一步推进了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提高了亚洲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与依存度。经济融合以及依存度的增加使得一个国家的经济波动能够迅速通过溢出效应传播到其他国家，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鉴于此，维护地区经济安全已成为亚洲国家的共识。传统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安全理念已经不符合当前经济融合的安全需求，需要安全理念的创新发展。

经济交融进程中相互依存、相互交流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同时在政治、社会等其他层面也得以延伸。亚洲国家在经济交融进程中，政治互信逐步增强、人文交流不断深化、文化交融不断加深。亚洲国家意识到地区安全稳定是发展经济的基础和前提，只有强化地区安全合作才能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如“一带一路”倡议下大量的跨国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加强地区国家之间安全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项目顺利实施则需要良好的地区安全环境。因此，亚洲国家在安全理念上需要调整创新，更加注重共同安全、合作安全。

基于经济融合过程中所带来的安全需求变化，亚洲国家需要探索能够适应新形势的安全理念。2014年5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亚信第四次峰会上强调：“中国将同各方一道，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14] 习近平总书记将亚洲安全观拓展到对世界普遍适用的安全观，提倡各国应该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这是对经济融合背景下安全理念创新的集中体现。共同安全理念强调亚洲国家之间的安全是相互关联、紧密相连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都不能以牺牲他国安全为代价^[15]。综合安全涉及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各个范畴，需要全面统筹各类安全问题。合作安全倡导以对话、协商、合作等和平手段解决安全问题，摒弃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观念^[16]。可持续安全强调安全与发展的相互促进，实现安全与发展的良性互动^[17]。这种安全理念创新为亚洲地区的安全合作开辟了新路径，指明了新方向。它有利于推动亚洲地区在安全领域构建更为紧密的合作机制，共同应对各类安全挑战，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为亚洲经济的持续繁荣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三）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外部压力促使安全模式探索

从世界权力结构转型的维度看，对于传统国际权力格局而言，西方中心主义渐趋失势，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逐步上升。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2023年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经济的份额达58.9%，世界经济重心持续向非西方世界转移。世界格局的演变让某些西方大国滋生战略焦虑，它们竭力用政策手段维护自身既有的世界霸权地位，

黄正松, 单凌涛. 亚洲安全模式的形成逻辑、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3): 195-206.

对地区大国事务进行插手与渗透。诸如美国推行的“印太战略”，从表面看是强调保障各地区自由开放，实际是美国联合盟友遏制中国发展，维护自身霸权地位。美国通过加强与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军事合作，频繁举行联合军演，影响地区国家间关系。外部势力的介入致使亚洲国家承担更大的安全压力，以往的传统安全模式难以有效处理这种复杂的外部安全形势，亚洲国家急需探索适合本地区的安全模式，以维护自身利益安全。

未来国际安全形势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态势，亚洲安全受跨区域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影响正逐渐显现，像恐怖主义、大规模跨国犯罪等问题，应由国际社会共同处理^[18]。在这样的背景下，有的国家出于一己私利，采取单边主义及保护主义做法，拖慢了国际合作开展的步伐。就亚洲地区而言，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要求各国增进合作、共享资讯、统一行动，但外部环境的复杂特性和不确定性增添了合作难度^[19]。面对外部压力，亚洲国家需要探索搭建能够促进地区安全合作、携手应对区域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安全模式，以此增强亚洲地区的安全韧性与安全应对能力。

国际格局的重大调整迫使亚洲国家必须重新思考如何制定自身安全战略及经济外交政策。亚洲国家在外部压力的影响下，意识到只有团结协作才能谋取更大的地区安全。加强地区安全合作是亚洲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争取地区更多话语权和影响力的重要手段，而亚洲安全模式探索是亚洲国家应对国际格局调整、争取亚洲国家发展和安全利益的重要方式。亚洲安全模式探索有利于促进亚洲地区持久和平、可持续发展，使国际格局朝着更加均衡合理的方向发展。

三、亚洲安全模式的理论内涵：从理念共识到制度构建的内在逻辑

亚洲安全模式理论内涵涉及多方面逻辑。共建共享安全理念是核心要点，展现各国在安全事务方面平等参与、一起担责，促进安危一体，提升命运共同体认同感，为安全合作给予理论支撑。统筹融合的安全战略打破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的界限，要求在制定政策时统筹兼顾二者，建立跨部门、跨领域的综合统筹机制，给应对复杂安全问题作出战略指引。协商合作的安全路径强调要以对话为指引方向，把对话作为解决安全问题的有效途径。把地区机制化安全合作向前推进是重要目标，拓展合作的范围、深挖合作的内容、强化机制的有效性，增强地区机制相互间的协调衔接。此安全路径作为亚洲安全模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利于保障地区和平与发展。

（一）共建共享的安全理念：推动安危与共，凝聚命运共同体意识

共建共享的安全观念凸显了亚洲各国在安全事务中平等参与及共同担责的重要意义。即便亚洲各国在政治制度框架、经济发展态势、文化传统内涵等方面差异明显，但安全呈现出相互关联状态，任何一个国家若出现安全问题，都可能对其他国家的安​​全产生影响。共建共享要求各国树立起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理念，立足各国平等参与，携手制定安全规则、完善安全机制、实施安全行动。如应对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事宜，离不开各国的协作互助，各国借助加强情报互通与合作、联合执法等途径一起打造安全防线。这种平等参与体现出各国在安全事务中的主体特性，提高安全合作的效率及效果。共建共享同样要求各国共同扛起安全责任，亚洲地区安全体现整体性，各个国家的内政安全皆关乎地区安全大局，不管国家大小如何，都需承担相应义务，皆有义务参与共同安全事务，合力应对安全问题。

共建共享的安全理念有助于推动安危与共，凝聚命运共同体意识^[20]。随着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依存度不断提高，亚洲各国逐渐形成了“一国安全事关其他国家安全”的安全利益共同体。共建共享的安全理念有助于促进各国深刻认识这一点，能让它们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共同防范安全风险。如自然灾害发生时，各国可相互救援、相互救助，减轻自然灾害损失，这种安危与共的合作关系能够凝聚命运共同体意识，使各国更加团结一致。命运共同体意识让亚洲各国从更长远和更广阔的视野看待安全问题，共同维护亚洲地区的和平稳定。命运共同体意识让各国在安全合作中更加注重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不会为了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而影响地区安全大局。共建共享的安全理念是亚洲安全模式理论内涵的核心内容，是推动亚洲安危共济以及命运共同体意识生成的基础，为亚洲地区安全合作与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未来，亚洲各国要积极倡导共建共享安全理念，深化安全合作，共同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实现亚洲长治久安和发展。

（二）统筹融合的安全战略：打破壁垒，整合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维度

统筹融合的安全战略本质上是打破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之间固有的界限。传统安全通常指的是国家面临军事冲突、政治对抗等问题；非传统安全则指的是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多样化安全风险与威胁。在亚洲地区，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如在阿富汗地区，长期的军事冲突和政治动荡为恐怖主义滋生提供了土壤。2021年美军撤离阿富汗后，当地局势迅速恶化，塔利班重新掌权，“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等恐怖势力趁机在阿富汗多地发动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21]。恐怖主义活动加剧了国家间的紧张程度，增加了传统安全风险，周边国家担心恐怖主义外溢，一些国家加强了边境管控和军事部署。所以，既不能孤立地看待传统安全，也不能孤立地看待非传统安全，而是需要将两者看作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传统安全风险与非传统安全风险的交织，要求亚洲国家在制定安全政策时需要在考虑传统安全因素的基础上，同时考虑非传统安全因素，进而打通部门间障碍、领域间障碍，使安全资源利用更加有效。这也意味着各国需要建立跨部门、跨领域的统筹机制，加强不同安全部门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共同面对各种安全问题。

统筹治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是推进新时代安全战略的必然之义。亚洲国家应全面把握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内在关联，让非传统安全融入国家安全战略范畴，既维护传统安全，又要关注非传统安全因素给国家安全带来的影响。应进一步加大对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视程度，在抵御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阶段，要充分借助传统安全领域里的安全机制及资源，依靠加强国际合作、联合执法等方式打击跨国犯罪及恐怖主义，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格局；同时借助安全理念的革新、安全文化的构建，树立以综合、共同、合作为核心的新理念，培育亚洲命运共同体^[22]。要增进安全教育及培训实施，增强公众的安全警觉与应对安全威胁的本事。如新加坡政府通过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活动，提高公众对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认识和应对能力。统筹融合的安全战略是亚洲安全模式理论内涵的核心组成内容，它突破了传统与非传统安全之间的界限，聚合了安全维度，为亚洲地区应对复杂多变的安全问题给出了有效的战略指引。未来，亚洲各国应积极落实此战略，增进安全合作，携手营造更为安全、稳固的亚洲安全格局。

（三）协商合作的安全路径：坚持安全对话优先，推动地区机制化安全合作

协商合作的安全路径强调坚持对话导向。亚洲国家由于处在不同的政治制度环境中，有差异化的文化背景、安全需求等，安全对话共识形成难度较高。而对话是解决安全问题争议、增进安全互

黄正松, 单凌涛. 亚洲安全模式的形成逻辑、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3): 195-206.

信的最基本方式, 也是国际关系中处理安全问题最直接、最有效、最易接受的方式。目前, 亚洲已经具备对话的平台和空间, 如东盟地区论坛、上海合作组织等, 这些都为各国的平等对话提供了条件, 推动了地区安全对话的持续开展^[23]。如在南海问题上, 相关国家之间通过对话协商解决海上安全、资源开发等难题, 这有助于增进相互理解与信任, 对缓解紧张局势、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有着重要意义。除此之外, 坚持对话导向还意味着各国应用和平的、理性的、有建设性的方式解决安全分歧, 而不是使用对抗的、冲突的方式。

推进地区机制化安全合作是探索协商合作安全路径的重要目标。机制化的安全合作可为亚洲国家间构建一种稳定且规范的安全合作机制, 提升安全合作效率和效果。亚洲地区已经建立了一些安全合作机制, 这些机制在合作范围、合作深度、合作执行力等方面仍存在不足, 需要从机制建设、机制规则完善、机制适应性提升、机制有效性增强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一是扩大安全合作机制的合作范围, 将更多的亚洲国家纳入安全合作机制, 使安全合作机制更具代表性和广泛性。另一方面, 深化安全合作机制的内容, 不仅注重传统的安全合作, 更注重非传统的安全合作。这需要各国建立有效的安全合作机制、监督机制和评估机制, 对安全合作中的表现进行监督和评估, 促使各国积极进行安全合作, 进而提高安全合作的效率。此外, 推进地区机制化的安全合作还需要增强地区机制之间协调和衔接, 避免地区机制之间的重叠和冲突, 形成合力以共同解决亚洲地区的安全问题。

以对话为导向的协商合作安全路径, 是亚洲安全模式理论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亚洲各国在安全领域协商合作的一种有效方式, 有利于维护亚洲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有助于推动亚洲地区的繁荣与进步。在未来, 亚洲国家应该始终坚持安全协商合作, 逐步推进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化, 共同营造更加安全与稳定的亚洲安全环境。

四、亚洲安全模式面临的挑战：复杂局势下的多重考验

亚洲安全模式面临一系列挑战, 其中差异明显的政治文化与安全诉求相互碰撞, 导致共识构建陷入困难, 影响到地区安全合作的协同效果。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断扩散与强化, 诸如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 具备跨国性、突发性和复杂性, 给亚洲安全模式造成巨大压力。外部势力的地缘博弈干涉, 采用政治、经济、军事等途径扰乱地区安全秩序, 导致亚洲安全局势呈现不确定性与不稳定的态势。面对此类挑战, 亚洲国家需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加大沟通交流力度, 守住战略节奏、抵御外部搅扰, 探索贴合地区实际情况的安全合作机制。

(一) 差异多元下的共识难题：多样政治文化与安全诉求交织碰撞

亚洲区域内国家数量众多, 政治文化呈现显著的多元性。不同国家具备独有的历史发展路径、文化风尚和价值信念, 这些缘由造就出不同的政治文化模式。东亚国家受儒家文化熏陶甚久, 重视集体至上、等级安排与安稳和谐, 在安全意识上更倾向用协商合作维持地区和平^[24]; 南亚和中亚国家受宗教文化的影响十分明显, 其政治文化浸透着深厚的宗教色彩, 安全诉求通常与宗教信仰、民族认同紧密结合^[25]。这种政治文化的多样属性, 促使不同国家在安全问题的理解及处理问题的态度与做法上出现差异, 有时难以就安全理念、安全价值观等思维内容达成共识。此种文化差异使拥有不同政治文化的国家投身安全合作时, 对安全问题的认识、安全合作模式、安全利益边界存在分歧,

在安全抉择和行动上不易协调统一，提高了安全合作的门槛。

多样的安全诉求交织碰撞是亚洲安全模式建构所面临的另一个重大挑战。由于亚洲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地缘政治地位以及安全环境等存在差异，这使得安全需求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一些大国基于地缘政治利益和自身发展的考虑，在安全合作中可能更加突出自身的主导性以及利益需求。中小国家则更加关注本国的主权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习惯于在大国博弈中选边站队、自保^[26]。当前，亚洲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断涌现，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非传统安全诉求：有的是恐怖主义问题诉求，有的是网络安全问题诉求，还有的是气候变化问题诉求，等等。在不同安全诉求的碰撞下，亚洲各国有时难以形成共同利益平衡点，难以形成统一的安全合作思路以及行动方案。

差异多元的共识难题集中体现为政治文化与安全诉求的多元碰撞、交织，这使亚洲安全模式构建面临极大挑战，不仅影响到亚洲国家安全合作的协同配合，而且减弱了亚洲地区整体安全问题的处理效能。怎样在复杂多变的亚洲安全局势下突破这一难点，谋求最大程度的共识要点，是亚洲安全模式亟须处理的关键事项。这需各国在尊重彼此差异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开展沟通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信任、探索亚洲地区安全合作协调配合的模式与体系，借此推动亚洲安全模式不断趋向完善。

（二）新型威胁带来的压力升级：非传统安全挑战持续扩散与深化

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扩散深化体现为其影响范围扩大。亚洲最突出的安全问题是恐怖主义活动，其活动范围突破了国界限制，恐怖组织借助亚洲地区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与差异化的社会治理方式，在亚洲诸国建立恐怖袭击点。就“伊斯兰国”极端组织而言，虽其活动范围主要在中东地区，但其影响范围已蔓延到亚洲各国。跨国犯罪同样是亚洲地区正面临的严峻非传统安全挑战之一。亚洲地区也面临毒品走私、人口贩卖、网络犯罪等问题，此类犯罪活动破坏社会秩序，更严重威胁到各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

非传统安全挑战之所以造成不良影响，重点在于其复杂属性。这类问题大多呈现出跨国性、突发性和不确定的特点，是由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维度造成的。实际面临的风险中，既有气候变化引发的洪水、干旱、台风这类自然灾害带来的经济损失，还牵涉资源欠缺、环境破坏、土地盐化以及人口迁移等系列社会问题。气候变化的成因和全球能源结构、经济发展模式等紧密相关，所以应对气候变化需各国合作完成^[27]。非传统安全挑战之间还存在相互关联、彼此影响的关系，如恐怖主义与跨国犯罪相互勾搭，依靠网络技术实施违法活动，引发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这让亚洲国家在面对非传统安全问题时难以采取有效的手段，而在处理非传统安全问题时，各国需加强合作协调，但亚洲各国在安全利益、发展程度、应对能力等层面存在差异，造成合作协调环节容易产生分歧及矛盾，使非传统安全挑战的处理难度上升。新型安全问题引发的压力，让亚洲安全模式的构建面临严峻挑战。亚洲国家需要加强协作统筹，相互交流借鉴经验，采取有效对策，以推进亚洲安全模式不断完善。

（三）外部干预引发的稳定困境：地缘博弈影响区域安全秩序重塑

亚洲地区由于其关键的地缘政治位置和充裕的战略资源，成为大国地缘争夺的核心地带。域外大国从自身战略利益角度考量，争先插手亚洲区域事务，采用政治、经济、军事等手段搅扰亚洲地区安全局面。如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大国推行“印太战略”，扩大域内军事同盟规模，密集安排军事演习及部署，企图维持其在亚洲区域的军事领先地位与战略领导角色。该军事干预加剧了地区紧张

局势的恶化, 也打乱了亚洲国家间形成的安全平衡架构, 使部分国家在安全保障上陷入两难困局。如菲律宾一方面要维护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以获取经济利益, 另一方面又受到美国等域外大国的蛊惑, 在南海问题上不断挑衅, 提高了地区安全的不可预测性。域外大国的经济干预也会对亚洲地区安全秩序造成负面影响, 某些大国施行贸易保护、经济制裁等招数, 试图牵制域内国家的发展势头, 阻滞亚洲地区经济合作的开展。这种经济干预会影响社会稳定、破坏经济秩序, 进而对地区安全秩序产生冲击。

地缘博弈也对亚洲区域安全秩序重构进程产生影响。亚洲各国寻求符合地区实际的安全合作机制及安全秩序, 以达成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但域外大国的干预令此进程充满变数。大国之间地缘政治博弈干扰了亚洲地区安全合作机制运转, 各国在安全合作中的立场和行动为外部因素所影响, 不易形成统一的意志和行动。如亚洲地区若干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因域外大国干预, 造成各方安全议题分歧难以消弭, 安全合作进程遭遇障碍。地缘博弈让亚洲地区安全秩序在重塑方向上充满未知, 域外大国时常妄图依据自身意愿与利益塑造亚洲地区的安全秩序, 这与亚洲国家的自主诉求及地区实际状况相悖。此偏差极有可能阻碍亚洲地区安全秩序重塑进程, 甚至引发新的安全矛盾与危机, 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外部势力的干预使亚洲陷入稳定困境, 尤其是地缘层面的博弈对区域安全秩序的重塑产生了不利影响, 给亚洲安全模式的构建带来了严峻挑战。这种干预破坏了亚洲区域安全平衡, 影响亚洲国家安全合作, 阻滞亚洲地区安全秩序重塑进程。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 亚洲国家务必保持高度的战略定力, 强化团结与合作, 共同应对外部干预所带来的挑战, 推动亚洲安全模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稳步迈进。

五、亚洲安全模式的实践路径：区域探索对全球治理的启示

亚洲安全模式实践路径的探索为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启示。面对共识问题, 亚洲各国增强对话磋商, 以东盟地区论坛等平台为依托增进互信, 积攒安全层面的共识, 探求共同利益的契合点。面对非传统安全方面的问题, 亚洲国家扩大合作, 增进情报共享与提升能力。亚洲国家秉持自主发展理念, 通过产业升级、区域经济合作强化自身实力, 抵御外部搅扰, 打造公正合理的地区安全秩序。这些实践不仅维护了亚洲地区的和平稳定形势, 也为全球非传统安全治理积累了宝贵经验, 体现了多边合作、情报共享以及能力建设的重要意义, 推动了全球安全秩序的健全与进步。

(一) 针对共识难题：强化对话协商，凝聚安全共识

亚洲地区的国家数量庞大, 各个国家在政治体制、文化传统与安全诉求上存在显著差异, 这些差异让各国在安全问题范畴内达成共识面临较大挑战。但是依靠强化对话磋商机制, 可以切实增进各国之间的沟通与理解, 为凝聚安全共识奠定有利基础。亚洲地区已存在各类对话协商平台, 譬如东盟地区论坛、上海合作组织等, 皆为各国搭建了平等交流的平台, 亚洲各国能在这些平台就安全事项进行商洽。如东盟地区论坛定期安排召开论坛会议、研讨会等活动, 研讨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海上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难题, 互相分享信息和经验, 共同摸索解决方案, 搭建对话协商机制, 增进相互理解信任, 为达成安全问题共识奠定基础。

为扎实凝聚安全相关共识，亚洲各国应依托对话协商途径，踊跃探索共同利益的最大契合点。虽然各国在安全需求上存在差异，但在保障地区安全稳定、推动经济发展等方面存有共同利益，各国可借助对话磋商，精准地界定共同利益，并把它作为安全合作的核心与关键着力点。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难题之际，亚洲各个国家均遭遇海平面上升、极端气候事件增加等棘手挑战。根据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中心数据库（C3S）的公报，截至 2024 年 6 月，全球平均气温已连续 12 个月比工业化前（1850 年至 1900 年）水平高出至少 1.5 摄氏度；极端气候事件如暴雨、热浪等的发生频率在过去几十年中显著增加。此类问题对各国经济发展及社会稳定造成重大威胁。各国可借助沟通商谈，共同商定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及手段，深化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等方面的合作。亚洲各国需相互借鉴全球治理相关经验，建立更公正合理又具实效的安全合作规则及机制。在全球治理中，各国依靠多边合作方式，共同应对各类全球性难关，取得了一定效果^[28]，亚洲各国可借鉴这种多边合作的理念和模式，以对话协商作为根基，确立贴合亚洲地区实际的安全合作规则与机制，保障各国在安全合作中的权利与义务得以落实。

强化对话交流、凝聚安全共识是亚洲安全模式实践路径之一，采用这一路径，亚洲各国能顺利破解共识障碍，拓展安全合作范畴，维系地区和平安定局面。该路径为全球治理贡献了有益借鉴，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亚洲的智慧和方案^[29]。在未来，亚洲各国需不断强化对话磋商，持续拓宽安全合作的领域，为亚洲地区的长久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夯实基础。

（二）应对新型威胁：深化非传统安全合作，提升应对能力

伴随全球化进程的提速，亚洲地区所面对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正呈现出愈发错综严峻的态势。为高效应对此类新型威胁，亚洲各国需进一步强化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目前亚洲地区已搭建起一些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如上海合作组织框架范畴内的安全合作、东盟在反恐和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的配合等。由于非传统安全问题不停演变，仍需进一步深化拓展安全合作机制，各国之间需强化情报信息交流与共享活动，设立便利、高效的情报信息互通渠道，以保障能够及时洞察非传统安全问题动态，及时采用相关举措应对。如在打击恐怖主义的相关活动中，可利用情报共享掌握恐怖组织运行模式、人员构成、资金来源等情况，再实施打击行动。

提升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能力是深化合作的关键环节之一。亚洲各国应当增进能力建设方面的合作，共同组织培训、演练等事宜，提高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本领。亚洲各国可在网络安全范畴联合开展技术研发、培养网络安全人员，共同抵御数据泄露、网络攻击等方面威胁。亚洲各国需开展应急响应机制建设方面的合作，设定一致的应急预案及响应机制的标准，加快应急响应的步伐，提升应急响应效果。就公共卫生危机而言，亚洲各国合作构建了公共卫生危机监测及预警体系，巩固了医疗物资储备以及人员培训机制，以此保证公共卫生危机爆发时可以迅速且高效地采取防控手段。

亚洲地区为世界各国提供了推进非传统安全合作、提升联合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能力的经验借鉴。在全球范畴内，非传统安全问题体具有复杂属性，这需要各国强化合作、携手应对。亚洲地区的实践历程说明，采用构建有效合作模式、增进情报信息共享以及强化能力培育，可提升各国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能力。世界各国可汲取亚洲地区的实践经验，打造更宽广的非传统安全合作网络，加深在国际组织中的协同合作，共同健全全球非传统安全治理体系。

黄正松, 单凌涛. 亚洲安全模式的形成逻辑、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3): 195-206.

(三) 抵御外部干预: 坚持自主发展, 维护区域安全秩序

部分域外大国基于其战略利益经常插手亚洲地区事务, 以政治、经济、军事等手段影响亚洲地区安全和发展, 试图谋取亚洲地区安全格局的“领导权”。这种外部干预行为打破了亚洲地区原有的安全平衡, 阻碍了亚洲国家自主发展的进程。亚洲国家必须坚定地走自主发展道路, 增强自身综合实力与战略自主性, 有效抵御外部干预。在经济发展方面, 亚洲地区国家须加快产业升级和自主创新, 提高经济自主性和竞争力, 降低对其他地区的依赖度。推进区域经济合作, 构建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和合作机制, 提高区域经济风险抵御能力。如东盟国家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建立了东盟自由贸易区, 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提升了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

维护区域安全稳定是亚洲国家抵御外部干预的重要保证。亚洲国家有必要共同建立适应地区安全状况的安全合作机制和安全秩序, 以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一方面, 亚洲国家需要强化安全对话协商, 借助构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 推动安全互信建设, 化解安全矛盾^[30]。在立足国内安全的基础上, 亚洲国家还要从安全能力建设方面提高军事防御能力以及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能力, 通过加强军事合作、开展联合军演等方式, 提高区域安全合作的协同性和有效性。同时, 积极参与全球安全治理, 为亚洲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参考文献:

- [1] 张天顶. 地缘经济割裂、再全球化及中国的应对 [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24 (2): 49-56.
- [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230.
- [3] 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李强主持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会议 [N]. 人民日报, 2025-04-10 (1).
- [4] 江时学. 论构建普遍安全的世界: 必要性、路径及中国的贡献 [J].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24 (6): 1-19+133.
- [5] 孙云霄. 国际规范转变视角下的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 理论与实践 [J]. 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3): 124-136.
- [6] 钟联. 同舟共济向未来 [J]. 当代世界, 2022 (4): 1.
- [7] 凌胜利, 王秋怡. 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安全治理的中国角色 [J]. 外交评论 (外交学院学报), 2023 (2): 1-21+165-166.
- [8] 徐政, 宁尚通.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指向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1): 132-142.
- [9] 高祖贵.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J]. 科学社会主义, 2015 (2): 4-10.
- [10] 唐盟. 越南侵占中国南沙群岛岛礁数据集 [J]. 全球变化数据学报 (中英文), 2018 (2): 210-214+333-337.
- [11] 董向荣. 识别朝鲜半岛的安全困境与非安全困境 [J]. 东北亚论坛, 2019 (1): 102-115+128.
- [12] 汤光鸿. 非传统安全——以人为本的新安全观 [J]. 太平洋学报, 2005 (9): 11-20.
- [13] 王亚军. 亚洲安全治理转型的历史分析与趋势展望 [J]. 国际安全研究, 2019 (3): 3-22+155-156.
- [14] 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在上海举行 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 共创亚洲安全合作新局面 [N]. 人民日报, 2014-05-22 (1).
- [15] 傅勇. 非传统安全与中国的新安全观 [J]. 世界经济研究, 2004 (7): 10-14.

- [16] 徐步,唐永胜,傅梦孜,等.全球安全倡议的重大理论意义与实施路径笔谈[J].国际问题研究,2022(4):20-38.
- [17] 余姣.论中国与联合国的可持续安全合作[J].社会主义研究,2021(3):158-169.
- [18] 李怀义.亚太安全:概念与模式[J].国际政治研究,2001(1):89-94.
- [19] 蔡拓.全球学:概念、范畴、方法与学科定位[J].国际政治研究,2013(3):1-22+186.
- [20] 欧佳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的理论、特征与方案[J].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4(2):95-104.
- [21] 魏亮.“伊斯兰国”组织在阿富汗的发展及其制约因素[J].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3):88-103+120.
- [22] 李洪才,杨光海.亚洲安全观的依据、来源和实施路径[J].和平与发展,2015(2):15-26+115-116+131-142.
- [23] 王俊生.中美安全秩序观的差异与亚洲安全秩序构建[J].东北亚论坛,2024(5):20-33+127.
- [24] 颜声毅.当代中国外交[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7.
- [25] Zhai Yida. A Peaceful Prospector or a Threat to Global Order: How Asian Youth View a Rising China [J].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019 (1): 43.
- [26] Cui Shunji, Buzan Barry. Great Power Management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J].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16 (2): 182.
- [27] Hameiri Shahar, Jones Lee, Sandor Adam. Security Governance and the Politics of State Transformation: Moving from Description to Explanation [J]. Journal of Global Security Studies, 2018 (1): 464.
- [28] 林宇晖.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社会风险的辩证审视[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1):5-11+21.
- [29] 王帆.全球安全倡议与中国外交方略[J].国家安全研究,2022(4):143-147.
- [30] 习近平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并发表特别致辞 强调解决时代课题,必须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2021-01-26(1).

责任编辑:王京菁 校对:龚静阳



国际经贸斗争背景下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新环境、新挑战与新路径

陈玉斌

(曲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曲阜 273165)

摘要: 在特朗普政府全球“对等关税”政策的冲击下, 国际经贸斗争加剧, 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出现新环境, 即美国携手“印太同盟”加强规锁中国, “美国联盟”内部分歧增多并趋于破裂, “东升西降”态势削弱美国话语霸权, 关税冲击或将深化区域经济重组。随着国际经贸斗争形势加剧演进, 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也面临新挑战, 即畸高关税附加“脱钩断链”制造周边恐慌, “泛安全化”意识形态话语挑拨周边关系, 关键核心技术“去中国化”制造周边疏离, 非理性“疯子策略”破坏现有周边秩序。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以深化经贸合作增强周边经济韧性, 以命运与共理念推动周边价值认同, 以关键领域创新提升周边技术协作, 以亚洲安全观打造周边安全格局, 不断为周边国家和人类社会注入确定性、未来性和机遇性。

关键词: 特朗普政府; “对等关税”; 国际经贸斗争; 周边命运共同体; 亚洲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5) 03-0207-12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 国际经贸斗争呈现高度紧张与多极对抗态势。2025年4月25日,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DOI: 10.13946/j.cnki.jcqi.2025.03.017

作者简介: 陈玉斌, 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后。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21世纪美国共产主义史学新发展研究”(23XJC710013)

引用格式: 陈玉斌. 国际经贸斗争背景下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新环境、新挑战与新路径[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3): 207-218.

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作出“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1]的重大部署。“今年以来，美方从以‘芬太尼问题’等为借口加征关税到以一纸行政令滥施关税，从肆意加征单边关税到轮番加征畸高关税，从‘关税暂缓 90 天’到豁免部分产品关税，再到酝酿新的关税政策……短短数月之间，朝令夕改，荒腔走板的关税政策，让全球大跌眼镜。”^[2]美国滥施关税贻害世界经济，是全球化浪潮的“逆行刺客”，是“美国优先”的霸权体现，是“冷战思维”的时代再现，根本目的在于推进区域经济阵营化，联合“印太同盟”封锁、打压和遏制中国。经济学界普遍认为，这是美国历史上最激进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给世界相对稳定的经贸秩序带来了极大不确定性，可谓是特朗普政府的“核弹爆炸”和“休克疗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对此也表示，全球贸易体系正在经历重启，金融市场波动加剧上升，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爆表”，世界经济正面临显著挑战，全球增长预期将被下调^[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日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 2025 年和 2026 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 2.8% 和 3%。

当前，中国通过政策协同、经济互惠、安全互信、人文交融等途径，已与周边 17 个国家达成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共识，与周边国家累计签署 200 余项战略合作协议，“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和亚洲价值观逐渐被周边国家接受并认可。但是，在特朗普政府全球“对等关税”政策下，中国及周边国家是美国加征关税最高的地区，也是受“关税战”影响最严重的地区，给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周边是实现发展繁荣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点、运筹外交全局的首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4]2025 年 4 月 8 至 9 日，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指出当前我国同周边关系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时期，同时也进入周边格局和世界变局深度联动的重要阶段。2025 年 4 月 14 至 18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对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三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此访是今年元首外访的开篇之作，是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后采取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在单边主义、强权政治冲击世界的大背景下，此访以命运共同体建设为主线，聚焦睦邻友好、推动互利合作，取得圆满成功。中国以全球视野审视周边关系新变化，加快推进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进程，能够有效提升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抗风险能力，抵制美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贸易行径，打破美国“强权即公理”的霸凌逻辑，推动经济全球化向更加公平、更加稳定的方向发展。

对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研究，国内外学界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第一，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性质。一方面，周边命运共同体对推进多边主义、区域安全和经济稳定具有重要作用^[5]；另一方面，周边命运共同体具有战略性中心意义，中国通过“中心—边缘”框架强化对周边国家的影响^[6]。第二，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周边命运共同体包含发展、利益、安全、文化和价值五个层面^[7]，要从“亲诚惠容”和“政治互信、经济融合、安全合作和民心相通”方面进行阐释^[8]。第三，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挑战。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对中国周边具有重大威胁^[9]，周边国家间的边界争议、战略分歧、观念差异和贸易保护是主要挑战^[10]，“制度过剩”、制度适用以及舆论误读是重要困境^[11]。第四，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路径。要妥善处理美国对华博弈引起的周边风险^[12]，在秉承亚洲价值观基础上夯实利益、责任和人文共同体支柱^[13]。上述研究为本文提供了重要参考，但在国际经贸斗争日趋复杂的背景下，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面临新环境、新挑战，这为本文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语境和写作视角。在国际经贸斗争日趋复杂的背景下，厘清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出现的新

环境、面临的新挑战并提出新路径, 对夯实亚洲地区“板块稳定”, 统筹周边国家发展与安全, 共同应对地区风险和挑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二、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新环境

特朗普此次发动的“关税战”与其第一任期相比, 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其外部性, 即中国周边国家成为美国对华博弈的重点地带。特朗普政府不仅通过关税“剪刀差”对中国精准打压, 还利用畸高关税胁迫周边国家与中国“脱钩断链”, 目的在于联合中国周边国家共同抗衡、打压和遏制中国。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外部环境, 呈现出风险与机遇并存、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变化。

(一) 美国携手“印太同盟”加强规锁中国

为了在“印太战略”基础上实现对中国经济和安全的双重“规锁”, 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对“印太联盟”进行“深耕细作”, 以“构建繁荣、安全、强韧的亚太地区”的谰言拉拢中国周边国家, 在中国周边密织起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的“牵制之网”。其一, 美国政府开始深度介入“印太联盟”。特朗普政府在“美国优先”基础上, 加速推进与印太盟伴的合作。比如, 推动印太国家参与美国主导的军事供应链整合, 与印度制定量化目标(2030年双边贸易额达5000亿美元)并通过《美印TRUST倡议》加强国防、芯片、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的技术协同。再如, 继续强化美菲同盟, 与菲律宾国防部再次确认“重建南海震慑力”的战略意义, 助推美菲日、美菲澳等“小多边”合作模式。其二, 中国周边成为对华博弈重点地带。特朗普第二任期进一步延续并强化“四方安全对话”机制, 将其作为“印太经济框架”的核心支柱, 目的在于建立拥护“美国优先”的“排华小圈子”, 限制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直至将中国挤出亚太产业链^[14]。特朗普政府还对印太盟伴建立意识形态同盟, 企图既避免传统联盟“被牵连”的风险, 又增强遏制中国发展的重点性和协调性。“印太战略”对中国的影响短期内较为有限, 但长期可能会推动中国周边国家在关键核心技术供应链上“去中国化”进程, “在周边搭建排斥中国参与的数字供应链, 进一步压缩中国参与地区数字合作的空间”^[15], 加速中国周边国家与中国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合作的“脱钩断链”。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呈现“对华遏制”和“战略收缩”双重属性: 一方面通过“小多边”合作机制和“印太盟友”强化分担军费支出以降低美国成本; 另一方面以技术封锁、供应链重组的方式与美印、美菲等协同深化对华围堵。鉴于美国毫无例外地将关税作为包含“印太同盟”在内的霸凌武器, “中国周边国家对于美国‘印太战略’的走向仍然疑虑重重”^[16], 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也因此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

(二) “美国联盟”内部分歧增多并趋于破裂

“二战”结束以后, 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建构了以军事力量为震慑、盟友伙伴为支点和安全制度为框架的联盟体系。其中, 在亚太地区建立了“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泰国和菲律宾”双边联盟“辐射体系”^[17], 目的在于维系其国际霸权地位和遏制中国发展。特朗普在其第二任期, 完成了对共和党的“特朗普化”, 推行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迫使盟友的政策、决策必须符合“美国优先”逻辑, 这必然导致“美国联盟”内部松散甚至走向解体。其一, 盟友战略主体性意识强化。特

特朗普第二任期推行的“交易式”双边模式和加征“对等关税”政策，使其盟友在“被抛弃”的心理恐慌和维护本国发展利益双重因素驱动下，试图做出从战略依附向战略自主的范式转变^[18]。比如，日本全力推动的汽车关税豁免已逐步显示出其战略自主性追求，韩国贸易协会和三星、CJ（希杰）、POSCO（浦项制铁）等 100 多家韩企积极寻求与中国经济合作^[19]。其二，联盟战略协调性趋于弱化。由于军费分摊、防务支出、关税分歧以及去意识形态化的联盟管理方式，美国亚太联盟的经济一体化网络进程将会出现松动、延宕和破碎，“小多边、大多边的战略协调功能将下降，甚至成为形同虚设的拜登遗产”^[20]。“美国联盟”内部一旦出现利益分化和协作破裂态势，盟友将会基于自身利益跳出美国主导的联盟框架，从而进一步加剧联盟本不稳固的经济一体化的脆弱性。印度学者卡希夫·哈桑·汗指出：“印美贸易冲突可能会削弱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政策协调性，印度或将深化与中国、东盟、欧盟等替代性贸易伙伴关系。”^[21] 尽管盟友不会立即站到美国对立面，但联盟趋于散裂的势头将为地区安全和中美关系带来新趋向，即美国联合其盟友对华封锁、打压的能力下降、难度增大，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将迎来历史性机遇。

（三）“东升西降”态势削弱美国话语霸权

随着“金砖国家”“全球南方”世界政治经济地位的持续上升，全球权力结构正朝向“既不依赖北美也不依靠欧盟”的方向演进。虽然特朗普政府发动的全球贸易战可能会暂时扰乱某些国家的判断，但从新兴市场国家和传统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趋势来看，“东升西降”态势将不会改变。其一，“美国优先”暴露美国经济困境。特朗普第二任期以“美国优先”为核心，自恃其在科技、军事和市场规模上的霸权地位，企图通过关税战使美国重新回到“单边主义”轨道。该政策强调传统帝国式的“交易艺术”而非多边合作，实质上是美国“实力优先”“霸权至上”的回归，不仅严重破坏基于多边主义的全球“产业—供应”链体系，也充分暴露美国产业空心化、财政赤字、信任赤字、债务危机等经济困境。其二，“东升西降”态势助推全球秩序重构。“东升西降”趋势已然显现，美国主导的传统国际格局效能逐渐衰减，AI 革命、地缘冲突、“对等关税”等新变化，使美国“展现出新的垂而不死的形态”^[22]。“美国优先”的贸易战虽能使美国实现短期反弹，但特朗普政府的随意性将加速金融资本向亚洲、欧洲分流，更会因其内部的结构矛盾加速 TTC、IPEF、CHIP4 等走向崩溃。“美国优先”的贸易战随时可能因利益冲突而与其同盟国发生对抗，也极有可能因“关税豪赌”导致内部经济失衡进而演变成金融危机，新兴市场国家通过科技创新、技术优化和区域整合推动世界格局向多极化、公平化演进。这种由外而内与由内而外的双重挤压，将不断加剧“美国优先”与“东升西降”的时代错位，“东升西降”的态势正在重塑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全球新秩序，为构建和平互信、合作互利的周边命运共同体提供主流化氛围。鉴于以美国为中心的 G7 国家及其附属国在发展过程中展现出强烈的“拖尾效应”，“‘西强东弱’格局尚未根本改变，‘西升东降’短期反弹和‘东西对峙’长期并存的局面不可避免”^[22]，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必须充分估计可能面临的极限挑战。

（四）关税冲击或将推动区域经济重组

国际经贸斗争的负面效应并不局限于一国，世界各国都会深陷其中并深受其害，特别是深度嵌入全球供应链或依赖中美转口贸易的国家。其一，中国周边地区遭受“关税战”冲击最为严重。中国周边国家是受特朗普“关税战”冲击最严重的地区，一方面因为特朗普政府对亚洲地区加征的关

税最高, 另一方面源于亚洲地区大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随着国际经贸斗争进入“竞争性僵持”阶段, 中国周边国家或将出现产业断链、出口受阻、通货膨胀、工人失业等严重的经济危机现象。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郑永年指出, 特朗普政府发动的全球“关税战”, 不仅惩罚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发达经济体, 也使孟加拉国、柬埔寨、越南等仍在寻求“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前景更加黯淡, 订单锐减可能会使这些国家随时发生经济危机甚至是生存危机。其二, 关税冲击或将推动周边国家“抱团取暖”。“关税战”背后是国家间综合实力的较量, 能否经受住“关税战”冲击完全取决于该国的综合国力和经济韧性。中国周边国家在此次“关税战”中已完全暴露其对美国的依赖性和自身经济的脆弱性, 而中国的经济韧性则在 6 年多的中美贸易摩擦中充分显现并显著提升。中国周边国家基于自身生存问题, 不得不加速与中国及周边国家的深化合作, 以对冲美国加征畸高关税带来的通胀、失业、断链等压力。从长时间段来看, 中国周边国家定会深化区域经贸合作, 建立区域贸易同盟, 加速区域经济重组, 以“抱团取暖”方式提升自身经济韧性和抵抗风险能力。

三、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新挑战

当前, 中国与周边国家已经进入深度联动、共同发展的新阶段, 周边国家经济体量的增长使“亚洲话语”在国际话语权中的分量迅速提升, 助力“东升西降”的国际格局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从特朗普政府当前坚持“美国优先”的战略以及对华加征畸高关税的总基调来看, 美国未来一段时间对中国及周边的战略部署将更具霸凌性、遏制性, 这无疑会给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带来新挑战。

(一) 畸高关税附加“脱钩断链”制造周边恐慌

特朗普政府认为, 自 1913 年开始实施征收个税、下调关税政策以来, 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全球地位日渐衰退。为了让“制造业回流”, 特朗普试图通过提高主要对美出口国的关税, 以调整国家财政结构, 使“美国再次强大”, 对中国及周边国家加征畸高关税就是其核心一环。其一, “中国威胁论”是美国两党的普遍共识, 他们均将中国视为重塑全球秩序的对手, 与中国“脱钩”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主要目标。其二, 美国政府将“修昔底德陷阱”视为圭臬, 对“中国崛起”的焦虑明显加剧, 加征畸高关税是其霸权主义的典型表现。其三, 特朗普提名的政府官员(Marco Antonio Rubio、Pete Hegseth、Michael Waltz 等)大都是“反华派”^[23], 他们一致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手段、施加强大压力, 将关税作为与华“脱钩断链”的工具、武器。在美国对华加征畸高关税、制造与华“断链”舆论影响下, 中国周边地区被迫寻求与美国深化合作。比如, 2025 年 4 月 8 日, 韩国通话美国, 表示将在造船、LNG、贸易平衡三大领域, 深化与美同盟关系与经济合作, 制定供应链多元化等针对性战略, 以避免中美“关税战”对韩国中间产品出口的间接影响^[24]。2025 年 4 月 21 日, 印度总理莫迪和美国副总统万斯举行会谈, 表示希望在高科技、国防、贸易、能源等领域达成合作共识^[25]。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华思维依然是霸凌主义, 通过鼓吹“中国威胁论”、宣扬“与华脱钩论”制造中国周边国家恐慌, 在“小院高墙”“长臂管辖”中加速美国与中国、亚太盟友与中国的“脱钩断链”, 达到围堵、打压、遏制中国发展的霸权目的。

（二）“泛安全化”意识形态话语挑拨周边关系

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华经贸政策的加剧演变，使中国周边成为美国在地区层面遏制中国的重点地带，以至于特朗普政府不断挑拨中国与周边的关系。美国第 79 任财政部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就曾妄称：“美国面临的贸易问题最大原因在于中国，将与贸易伙伴一同加以解决。”^[26]其一，美国对华博弈压力向中国周边传导。为了实现“以周遏中”进而全面打压中国的目的，特朗普第二任期也对其“亚太盟友”加征“对等关税”，迫使其在经贸压力中放弃与中国的合作，促使其到美国投资建厂以助力“实体经济”恢复。这不仅严重破坏了国际经济规则和经济运行逻辑，还进一步恶化了中国与周边经贸合作的地区环境。其二，美国对中国周边倡议的落地设置障碍。为了打压、遏制、消弭中国对于周边国家的影响力，特朗普政府不断阻挠中国周边倡议、政策在中国周边地区“落地生根”。比如，要求金砖国家、东盟等放弃“去美元化”计划，故意挑拨、制造中国与周边地区的矛盾，给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带来重重障碍。中国在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进程中，始终秉承“睦邻、安邻、富邻”的理念，目的在于与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共享成果和共同繁荣。但是，特朗普政府基于霸凌主义的强权逻辑，试图将“周边命运共同体地缘政治化”，把“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合作载体“泛安全化”^[27]，推动中国与周边的关系话题不断向国际焦点、敏感问题演进。特朗普第二任期对中国与周边地区的负面话语挑拨，是对中国“亲诚惠容”理念的扭曲和误读，更是对中国“胸怀天下”格局的诋毁与践踏。

（三）关键核心技术“去中国化”制造周边疏离

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特朗普第二任期继续推行“科技排外体系”“虚拟帝国主义”，目的在于进一步巩固美国“全球科技霸主”地位和科技“西方中心化”格局。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半导体、5G/6G 等关键核心技术的竞争，不仅是中美两国战略博弈的“高边疆”，也是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宽桥梁”。中国在美国对华技术封锁战中，不仅扛住了早期打压，而且在关键技术领域取得长足进步，获得了周边国家的技术认可。北斗导航系统在东盟的应用，中马半导体产业园的建立，东南亚数字丝绸之路的开辟等，对美国全球技术霸权地位造成了严重冲击。特朗普第二任期对中国核心技术的遏制较以往更甚，如加强对中资互联网企业应用程序运行监控，对 TikTok 及其母公司进行监管和审查，对中国 AI 大模型 DeepSeek 进行打压等^[28]，而且挑唆、鼓励盟友将供应链移出中国，推进科技、数字领域的“去中国化”，严重破坏了全球技术生态多极化格局。2025 年 2 月 13 日，美印两国宣称将在人工智能领域加强合作，与中国在该领域加强竞争和对抗，目的在于提高美国人工智能发展速度并恢复其世界主导地位^[27]。这种“以权力竞争与安全对抗为目标的小多边技术联盟，固化并加剧了地区权力结构中由权力消长引发的安全博弈，使得东盟人工智能建设环境面临更高的不安全性和不确定性，也更容易导致既有以东盟为中心的多边合作体系走向衰落”^[29]。事实上，中国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以及加强与周边地区的技术合作，一方面是为了通过技术创新减少对外界的技术依赖以增强技术自主性，另一方面为周边国家提供“去西方中心化”的多元技术选择。特朗普政府不断强化中国周边“科技外交”的零和博弈色彩，将其污名为地缘政治的技术性工具，这是对中国关键核心技术发展实质的“视听混淆”。未来一个阶段，中国定能经受住美国对中国的科技打压，赢得周边国家的技术信任，有效软化关键核心技术“去中国化”竞争的锋芒，为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提供实质性支撑。

（四）非理性“疯子策略”破坏现有周边秩序

国际秩序是维系世界各国或区域范围相对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的重要依托，其核心在于如何管理国家间竞争、合作和冲突，确保国际社会的相对稳定与良性互动。自世界历史形成以来，国际秩序经历了从以主权国家为核心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到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再到新兴的“多极化秩序”的发展。但是，特朗普政府不顾当前国际秩序的演变趋势，以“疯子策略”^[30]对中国商品附加畸高关税，对亚太盟友挥舞“贸易大棒”，“肆意推行高风险政策，以非理性方式打压对手”^[31]，进一步加剧破坏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现有秩序。其一，鲁莽行径引发全球经济动荡。特朗普第二任期“关税新政”已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影响，世界各国经济面临新一轮的大幅下跌，包括黄金在内的国际“避险”产品都出现了罕见大波动，甚至可能引发全球系统性金融危机。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约研究员赵健认为，特朗普这一举动是非理性的、鲁莽的，将“灰犀牛”变成了“黑天鹅”，全球经济极有可能发生大的衰退，给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带来了不可预估的国际环境。其二，“疯子策略”加剧中国周边风险。特朗普政府基于现实主义的优先原则将美国利益置于国际秩序首位，凭借美国在军事上的霸权一再突破国际秩序的底线和边界，在亚太地区与中国周边建立竞争性的“小多边主义”关系，进一步侵蚀中国周边理性、自由、稳定的多边主义国际秩序。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络版报道称，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要求关税谈判对象国限制中国产品通过转口贸易出口，提出的要求包括防止中国产品经由第三国出口美国，以及中国企业在该国设立据点以逃避关税的可能性^[32]。特朗普第二任期内，“无知的政府、糟糕的判断力、低劣的道德”^[33]以及不受约束的疯狂行径，可能使中国与周边国家间的安全与繁荣的平衡被打破。这或许是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面临的最不确定的外部风险。

四、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新路径

在“逆全球化”快速升温和国际经贸斗争加剧演进的境况下，中国周边的战略环境由相对稳定状态向不确定性方向发展。面对新环境、新变化与新挑战，中国必须准确研判环境变化、与时俱进调整策略，充分发挥负责任大国的基础性作用和建设性力量，为不确定性、不稳定的周边环境注入新的确定性、稳定性因素，不断开创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性新局面。

（一）以深化经贸合作增强周边经济韧性

在特朗普政府加剧对中国及周边经贸封锁的战略环境下，中国应将周边工作作为突破美国经贸封锁的战略重点，“使之与‘一带一路’进行深化对接，共同构成中国外交的战略前沿和新增增长点”^[34]。其一，深化中国与周边的经贸合作。周边国家基于自主性制定了合乎自身实际的发展战略，如“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 2025”、柬埔寨“四角战略”、“泰国 4.0”战略等，旨在推动本国经济发展与战略转型。深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就必须实现中国与周边的战略融合互通，探索新型合作方式、深化融合发展机制、拓展多边共同利益，如深化中国—东盟 3.0 战略合作，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孟中印缅、中巴、中老、中越经济走廊等，在确保周边国家利益最大化基础上推进中国与周边的融合发展，以强大的经济韧性提升对抗外部风险、挑战的能力。其二，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特朗普政府全球“关税战”的干扰和冲击下，中国周边国家对“一

带一路”发展前景出现担忧心理,认为“推进大规模、长时段、高水平的深度合作与过去相比面临更大困难”^[27]。一方面,推动“小而美”民生项目落实落地,补足周边国家交通、能源、数字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让周边地区切实享受“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基础设施发展成果,不断夯实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民心基础。另一方面,增强“一带一路”对周边市场的辐射力,推动“一带一路”融入周边经济一体化建设,搭建以“一带一路”为纽带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平台,创新产业贸易、金融货币、核心技术等领域的合作模式,“重点推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蓝色经济、旅游经济合作”^[35],有效筑牢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经济基础。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纽带,深化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向周边国家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提升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水平,以经济韧性“对冲美国的‘战略预期’”^[36],是在“断链风险”加剧、“零和博弈”干扰下推进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必然之举。

(二) 以命运与共理念推动周边价值认同

一国经济的发展、安全的保证,不仅取决于该国的独立自主、科学谋划,也需要周边国家携手同行、共同维护。习近平主席指出:“家门口太平,我们才能安心、踏实办好自己的事情。”^[37]构建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命运与共的理念,摒弃独善其身的观念,从共同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在共同安全中探寻自身安全。其一,大力弘扬亚洲价值观,推动周边各国繁荣发展。亚洲各国地缘相近、山水相连、人文相通,和平、合作、开放、包容是亚洲各国共有的价值观,它强调和平而非战争、整体而非个体、团结而非对抗、普适而非普世。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必须大力弘扬亚洲价值观,突破“第三邻国”思想和“刺猬效应”观念,“以开放包容、团结合作抵制‘脱钩断链’、‘小院高墙’和滥征关税,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回应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以亚洲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应对世界的不稳定和不确定”^[38],让周边国家在命运与共理念指引下实现共同进步、共同繁荣。其二,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消弭周边国家对华错误认知。价值观攻击是美国在周边地区对华博弈的重要工具,其不断向周边国家鼓吹所谓“中国威胁论”“修正大国论”“中国崩溃论”,以此抹黑中国“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破坏中国与周边国家互利共赢合作模式,企图鼓动周边国家联手打压、遏制和孤立中国。为匡正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消除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误解,需向周边国家讲清亚洲价值观、周边命运观、人类命运观的核心要义,进一步强化与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拉紧与周边国家的民心纽带,拉近与周边国家的情感距离^[39],“结合文化与历史传统,与周边国家深入探讨彼此间‘价值观共通性’”^[40],确保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不被域外“嘈杂”“负面”声音所干扰。

(三) 以关键领域创新提升周边技术协作

世界百年变局以前所未有方式展开、世界局势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关键核心领域的技术创新越成为大国博弈的核心驱动力,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和周边影响力。中国只有加强关键领域的技术创新和突破,形成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并占据全球领先地位,才有底气和实力对抗美国在中国周边制造“科技脱钩”的“新冷战”。其一,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科技领域交流合作。随着全球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南北差距”在美国技术垄断下面临不断拉大的风险。加强与周边国家系统性、多维度技术合作,签署多边技术合作协议、成立技术合作组织、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搭建区域数字共享平台,是将中国的技术优势转化为周边国家发展红利的重要途径。同时,要注重国

家间技术合作的平衡性与包容性, 建立技术创新与合作发展共同体, 让技术合作成果惠及更多周边国家, 特别是技术相对滞后的周边国家, 同他们一道在关键技术领域实现“逆风领跑”“弯道超车”。其二, 构建关键技术领域周边命运共同体。美国政府基于所谓的“技术东方主义”“数码东方主义”, 不断在中国周边制造科技竞争、“科技矛盾”和“科技断链”, 规锁中国关键技术发展空间, 鼓动周边国家加快技术链“去中国化”进程。为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技术合作以及科技产业优化升级, 必须同周边国家构建关键技术领域的命运共同体, 如在半导体、芯片封装、导航系统领域建立中国—东盟“技术共生链”, 减少对美技术依赖并遏制其技术霸权主义, 让科技不再是单一国家的“专利品”、大国博弈的“对抗器”, 而是加强周边合作的“助推器”、共同繁荣的“动力源”。

(四) 以亚洲安全观打造周边安全格局

中国与周边国家“有相似历史遭遇, 实现国家安定和人民幸福是我们共同体的目标”^[41]。作为亚洲大家庭一员和负责任大国, 中国是维护亚洲稳定的重心和区域安全的支撑。与周边国家增进战略互信, 以亚洲安全观推进周边共同和可持续安全, “共同维护地区稳定, 开展安全和执法合作, 应对各类风险挑战”^[4], 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义。其一, 完善地缘政治矛盾化解机制。以亚洲安全观为基本理念, 妥善管控区域矛盾分歧, 强化周边各领域战略互信, 建立多层次安全合作机制, 健全周边安全联防联控机制; 以 10+3、ARF、ADMM-Plus 为基础框架, 深化周边国家对话协调、安全合作机制, 降低区域安全议题的政治化倾向, 扩大区域安全合作模式的国际影响力; 以亚洲价值观为情感依托, “斡旋相关热点和地区冲突, 减少地缘政治对区域发展的干扰”^[42], 不断增强区域治理的战略自主性。其二, 科学引领周边安全合作。以亚洲安全观为基本安全理念, 整合现有安全合作框架, 强调周边共同安全不可分割, 反对零和博弈和结盟对抗, 不断推进高水平综合性区域安全合作; 以具体的区域安全合作机制为抓手, 搭建周边国家良性互动与安全协作平台, 推进“小机制”与“大框架”的有效融合, 实现“大国协调”与“周边共治”的共同推进^[43]; 加大周边安全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 加强周边安全措施的互联互通互融, 有效提升周边国家应对域外风险、新型威胁的安全韧性。未来, 中国需进一步平衡大国责任与区域共识, 推动亚洲安全观的制度化、常态化, 为避免或减轻大国博弈带来的负面效应提供中国方案, 为塑造和合共生的周边安全秩序贡献中国智慧。

五、结语

特朗普政府在全球发动的贸易战, 不仅推动国际经贸斗争加剧演进, 也在撕裂多边主义全球经济秩序, 给相对稳定的世界经贸格局注入了极大不确定性。美国对华加征关税政策加速推进, 已超越传统贸易摩擦范畴, 形成经济、战略、政治与科技多维度联动的系统性压制工具^[44]。新时代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分析国际局势和周边形势的新变化, 科学研判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面临的新挑战, 准确提出一系列推动周边国家共同发展的新理念, 使中国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负责任的世界大国, 中国始终以亲诚惠容理念凝聚共识, 以经济韧性深化周边合作, 以制度优势推动周边发展, 以团结协作对抗经济风险, 不断完善周边机制、扩大周边开放、做大合作“蛋糕”, 为周边国家提供发展机遇, 让周边国家共享合作效益, 不

断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落实落地、走向纵深。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文明进步的一边，始终坚持求善、求真、求美，始终是理性、坚强、可靠的伙伴，始终意味着确定性、未来性、机遇性^[2]，积极维护国际多边主义，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形成最广泛的“周边统一战线”，给中国周边乃至人类社会注入更多稳定、带来更多希望。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N]. 人民日报, 2025-04-26 (1).
- [2] 任仲平. 为什么中国意味着确定性、未来性、机遇性 [N]. 人民日报, 2025-04-26 (1).
- [3] IMF 总裁称世界经济面临“重大考验” 各国应尽快解决贸易争端 [EB/OL]. (2025-04-25) [2025-04-27]. <https://finance.sina.com.cn/roll/2025-04-25/doc-ineuieui3043786.shtml>.
- [4] 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李强主持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会议 [N]. 人民日报, 2025-04-10 (1).
- [5] William A. Callahan. China's "Asia Dream": The Belt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New Regional Order [J]. *Asi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2016 (3): 226-243.
- [6] Jeffrey Reeves. Imperialism and the Middle Kingdom: The Xi Jinping Administration's Peripheral Diplomacy with Developing States [J].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18 (5): 985.
- [7] 许利平. 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理论、现实与人文交流的路径探索 [J].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 15-29.
- [8] 刘卿. 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理念、特色品格和实践创新 [J]. *当代世界*, 2025 (2): 8-15.
- [9] David Shambaugh. U.S.-China Rivalry in Southeast Asia: Power Shift or Competitive Coexistence? [J].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8 (4): 125-126.
- [10] 李宇婧, 王战. 中印共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现状、挑战与路径 [J]. *南亚研究季刊*, 2025 (1): 1-25.
- [11] 周晓蕾.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韩命运共同体”: 对韩国舆论的分析 [J]. *国际论坛*, 2021 (1): 119-136.
- [12] 王俊生. 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 进展、启示与深化路径 [J]. *国际问题研究*, 2024 (6): 1-17.
- [13] 刘振民. 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营造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 [J]. *国际问题研究*, 2015 (1): 11-16.
- [14] 竺彩华, 刘让群. 中美博弈对国际经贸规则体系重构的影响 [J]. *太平洋学报*, 2021 (4): 1-14.
- [15] 王健, 张群. 中美博弈背景下周边战略环境变化与中国周边战略塑造 [J]. *太平洋学报*, 2023 (1): 25-36.
- [16] 张洁. 中美博弈下的中国周边安全环境: 演进动力、主要特征与发展趋势 [J].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25 (2): 1-19.
- [17] 魏冰, 刘丰. 冷战后美国联盟体系扩张的逻辑 [J]. *拉丁美洲研究*, 2024 (5): 34-56.
- [18] 吴怀中. 日本谋求“战略自主”: 举措、动因与制约 [J]. *国际问题研究*, 2018 (6): 12-31.
- [19] The 11th Korea China Economic Cooperation Forum was Held in Anhui [EB/OL]. (2025-04-18) [2025-04-27]. <https://cn.yna.co.kr/view/ACK20250418004500881?section=china-relationship/index>.
- [20] 袁征, 陈桂芸. 特朗普 2.0 版联盟战略与美国联盟体系的嬗变 [J]. *国际安全研究*, 2025 (2): 3-22.
- [21] Kashif Hasan Khan. The Trade Difficulties Between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EB/OL]. (2025-04-04)

陈玉斌. 国际经贸斗争背景下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新环境、新挑战与新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3): 207-218.

- [2025-04-26]. <https://thediplomat.com/2025/04/the-india-us-trade-dilemma-tariffs-tensions-and-the-road-ahead/>.
- [22] 辛向阳. 中国式现代化与“东升西降” [J]. 东华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5 (2): 1-9.
- [23] 蒋殿春. 美国经济政策及中美经贸关系的前景展望 [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5 (6): 1-13.
- [24] The Tariffs Imposed by China May have an Impact on South Korea's Exports of Intermediate Products [EB/OL]. (2025-04-13) [2025-04-26]. <https://cn.yna.co.kr/view/ACK20250413001700881?section=china-relationship/index>.
- [25] US Vice President Vance Visits India [EB/OL]. (2025-04-22) [2025-04-29]. <https://www.thehindu.com/ews/national/india-us-have-finalised-terms-of-reference-for-proposed-bilateral-trade-agreement-ustr/article69477522.ece>.
- [26] The United States May Demand Restrictions on China's Transit Trade Japanese High-ranking Officials Set off for the United States [EB/OL]. (2025-04-16) [2025-04-27]. <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25/04/2174c508b53a-.html>.
- [27] 周方银. 大国竞争视域下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 [J]. 当代世界, 2023 (6): 30-35.
- [28] 沈国兵. 特朗普 2.0 新政关注点及对中美经贸的影响 [J]. 思想理论战线, 2025 (2): 53-66.
- [29] 孙成昊, 蔡依航. 全球技术竞争态势下东盟人工智能治理 [J]. 东南亚研究, 2025 (2): 1-23.
- [30] 王明国.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全球治理主张及其多重影响 [J]. 国际展望, 2025 (2): 25-48.
- [31] Michelle Bentley, Maxine David. Unpredictability as Doctrine: Reconceptualising Foreign Policy Strategy in the Trump Era [J].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1 (3): 383-406.
- [32] The United States Uses Tariffs as a Bargaining Chip to Force Japan to Make Concessions on Defense Burden [EB/OL]. (2025-04-18) [2025-04-26]. <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25/04/641824779eb3.html>.
- [33] Thomas G. Weiss. The UN and Multilateralism under Siege in the “Age of Trump” [J]. Global Summitry, 2018 (1): 4.
- [34] 卢光盛, 别梦婕. 新型周边关系构建: 内涵、理论与路径 [J]. 国际观察, 2019 (6): 22-42.
- [35] 习近平在马来西亚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让中马友谊之船驶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N]. 人民日报, 2025-04-16 (1).
- [36] 王贯之. 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对华政策走向探析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2): 159-170.
- [37] 习近平. 守望相助, 共创中蒙关系发展新时代——在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的演讲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乌兰巴托) [N]. 人民日报, 2014-08-23 (1).
- [38] 习近平同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举行会谈 [N]. 人民日报, 2025-04-17 (1).
- [39] 李丹, 李龙龙. 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四重逻辑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3): 1-11 [2025-05-30].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0.1215.C.20250415.1714.002.html>.

- [40] 王俊生. 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 进展、启示与深化路径 [J]. 国际问题研究, 2024 (6): 1-17.
- [41] 习近平. 命运与共 共建家园——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 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 (2021 年 11 月 22 日) [N]. 人民日报, 2021-11-23 (1).
- [42] 刘卿. 中国式现代化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构: 耦合与协同 [J]. 当代中国与世界, 2025 (1): 17-25.
- [43] 王玉冲, 郑坤芳. 中国与周边国家安全共同体建设面临的挑战、机遇及路径 [J].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1): 62-69.
- [44] 徐政, 程梦瑶, 郑霖豪. 美加征关税背景下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 [J/OL].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13 [2025-05-30]. <https://link.cnki.net/urlid/50.1023.C.20250414.1006.002>.

责任编辑: 林华山 校对: 卢媛

本刊文后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细则

根据《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15)、《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CAJ-CD B/T 1—2006)和《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修订版)的规定,本刊对稿件的文后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作出如下要求,请向本刊投稿的作者按照本细则著录。

一、基本要求

稿件中所有引文和引用观点的文献出处,做到凡引必注,按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集中列于正文末尾,序号用带方括号的阿拉伯数字序号标注。参考文献请注明主要责任者,题名(专著名、文章名),出版地,出版社名或期刊名,出版时间(版别、期数),页码。多次引用同一出处的参考文献时,在正文中标注首次引用的参考文献序号,并在序号的方括号外标注引文页码。

二、著录格式

(一) 专著

适用于普通图书、会议录、汇编、学位论文、报告等。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其他责任者(任选). 版本项(任选).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引文起止页码[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陈登原. 国史旧闻: 第1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29.

[2] 哈里森, 沃尔德伦. 经济数学与金融数学[M]. 谢远涛,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235-236.

[3] 贾东琴, 柯文. 面向数字素养的高校图书馆数字服务体系研究[C]//中国图书馆学会. 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论文集: 2011年卷.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1: 45-52.

[4] 袁洪权. “统一战线”政策下的“整合”——1951年的新中国“文艺界”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0.

[5] 吴云芳. 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并列结构研究[D/OL]. 北京: 北京大学, 2003 [2013-10-14]. <http://thesis.lib.pku.edu.cn/dlib/List.asp?lang=g&type=Reader&DocGroupID=4&DocID=6328>.

(二) 期刊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期刊名, 年(期): 起止页码[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袁训来, 陈哲, 肖书海, 等. 蓝田生物群: 一个认识多细胞生物起源和早期演化的新窗口[J]. 科学通报, 2012(34): 3219-3227.

[2] CAPLAN P. Cataloging Internet resource[J]. The public access computer systems review, 1993, 4(2): 61-66.

[3] 李炳穆. 韩国图书馆法[J/OL]. 图书情报工作, 2008(6): 6-12 [2013-10-15]. <http://www.docin.com/p-400265742.htm>.

(三) 报纸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报纸名, 出版日期(版次)[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谢希德. 创造学习的新思路[N]. 人民日报, 1998-12-25(10).

[2] 余建斌. 我们的科技一直在追赶: 访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N/OL]. 人民日报, 2013-01-12(2) [2013-03-20].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3-01/12/nw.D110000renmrb_20130112_5-02.htm.

(四) 电子资源

凡属电子专著、电子专著中的析出文献、电子连续出版物、电子连续出版物中的析出文献的著录项目与著录格式分别按上述有关规则处理。除此而外的电子资源根据如下规则著录。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引文页码(更新或修改日期)[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现状统计报告[R/OL]. (2012-01-16) [2013-03-26].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zxbg/201201/P020120709345264469680.pdf>.

[2] HOPKINSON A. UNIMARC and metadata: Dublin core[EB/OL]. (2009-04-22) [2013-03-27]. <http://archive.ifla.org/IV/ifla64/138-161e.htm>.

三、文献类型和文献载体标识代码

(一) 以纸质为载体的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M——普通图书, C——会议录, G——汇编, N——报纸, J——期刊, D——学位论文, R——报告, S——标准, P——专利, Z——其他。

(二) 以网络为载体的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M/OL——网络图书, J/OL——网络期刊, N/OL——网络报纸, D/OL——学位论文, EB/OL——电子资源(不包括网络图书、网络期刊、网络报纸、学位论文)。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25年第3期 总第51期 第9卷

双月刊 2025年5月20日出版

主管单位：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

主办单位：重庆社会主义学院

出版单位：《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

主 编：王 鸿

地 址：重庆市南岸区涂山路140号

邮 编：400064

电话/传真：023-62874725

电子信箱：ysyxb@vip.163.com

采编平台：<http://cqsh.cbpt.cnki.net>

发行范围：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中国邮政局集团重庆市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78-128

印刷单位：重庆巍承印务有限公司

封面设计：向海涛

广告许可：渝工商第023053号

ISSN 2096-3378

CN 50-1215/C



微信公众号

定价：20.00 元